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6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编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6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集刊，迄今已出版五辑。本辑内容包括研究与探索、北域撷英、学术史回顾、经典述评等栏目，收录论文18篇，以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探索为重心，自本辑起特别增设北域撷英一栏，旨在翻译一些重要的境外考古发现和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方面的前沿动向和重要成果。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6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3-060776-8

Ⅰ. ①北… Ⅱ. ①中… 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3150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380 000

定价：1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魏　坚

副主任：吕学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王建新　王　巍　白　岩　吕学明

朱　泓　乔　梁　齐东方　李文瑛　李延祥

李梅田　陈胜前　杨建华　林梅村　徐光辉

高　星　韩建业　霍　巍　魏　坚

特约编委：阿列克谢·提什金（A.A.Tishkin）

策·特尔巴图（Tsagaan.Turbat）

主　编：魏　坚

副主编：李梅田

编　辑：陈晓露　丁　山　仪明洁　魏离雅　常　璐

目　　录

辽宁锦州天桥东山青铜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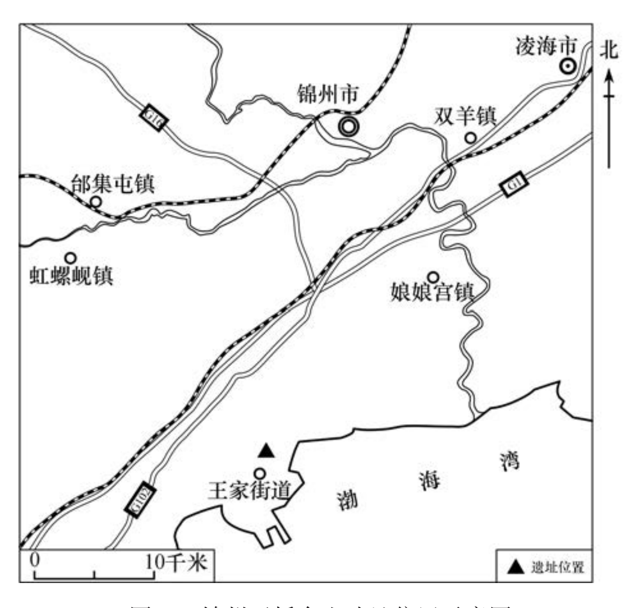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锦州，121000）

内容摘要：天桥东山遗址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经济开发区王家街道天桥村东约200米处。2010年6月，为配合中石油锦州地下油库项目建设，受辽宁省文物局委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座、灰坑3个，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等。经过对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可知，该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距今4300～36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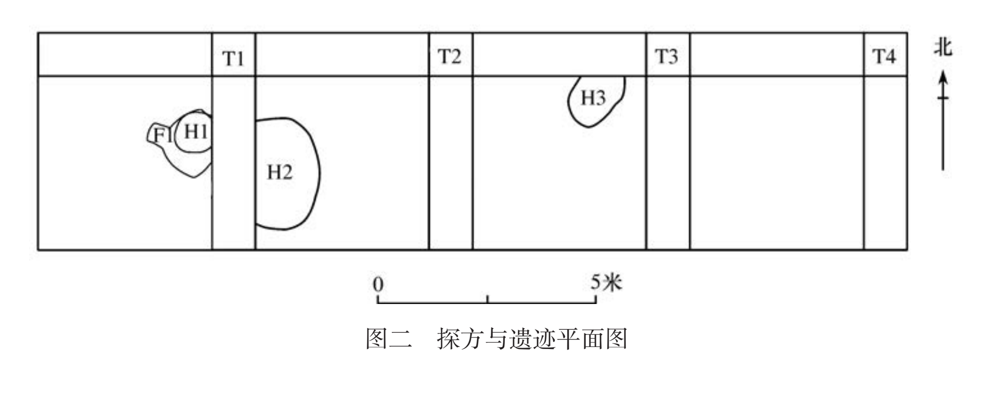
关键词：辽宁锦州；天桥东山遗址；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

天桥东山遗址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经济开发区王家街道天桥村东约200米处。该遗址所在地为沿海丘陵地带，东侧为一小山包，遗址即位于西侧山坡地（图一）。2010年6



图一　锦州天桥东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月，中石油锦州地下油库项目建设在即，受辽宁省文物局委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项目占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一处青铜时代遗址。随即组织人员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座、灰坑3个（图二），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等。现将具体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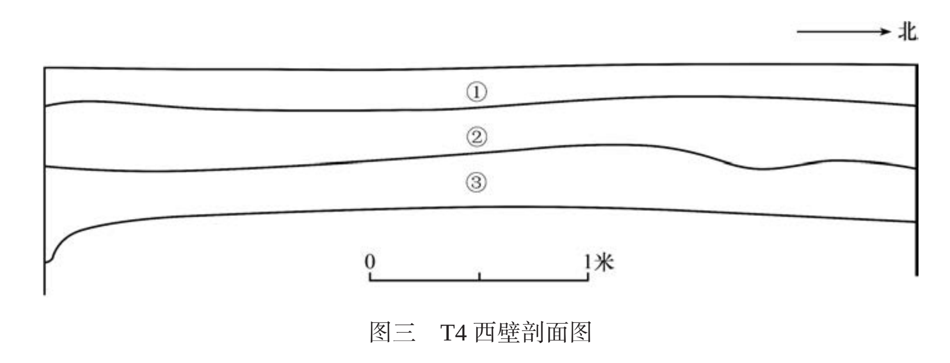


图二　探方与遗迹平面图

一、地层情况

天桥东山遗址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60米，面积约3600平方米，文化堆积最深处可达1米。此次发掘按照由西至东布5米 ×5米探方4个，共100平方米。

近年来，由于生产建设活动多次在此取土，遗址南部（友和彩印厂北）已被破坏。现以T4西壁为例（图三），说明遗址地层情况。



图三　T4西壁剖面图

第1层：耕土层。黄色砂土，土质疏松。厚15 ~ 35厘米。内有少量红色夹砂陶片及大量植物根系。

第2层：黑砂土层。土质较疏松。厚20 ~ 40厘米。包含陶片数量较多，以红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罐、鬲、甗等。F1、H1 ~ H3开口于第2层。

第3层：灰黄砂土层。土质疏松。厚20 ~ 40厘米。夹杂黑色炭粒及大量陶器残片，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次之，少量素面。可辨器形有罐、鬲、

甑、鼎、甗、网坠、纺轮和石器等。在这一地层下发现的遗迹有 H1、H2、H3。

以下即为生土，含有大量白色沙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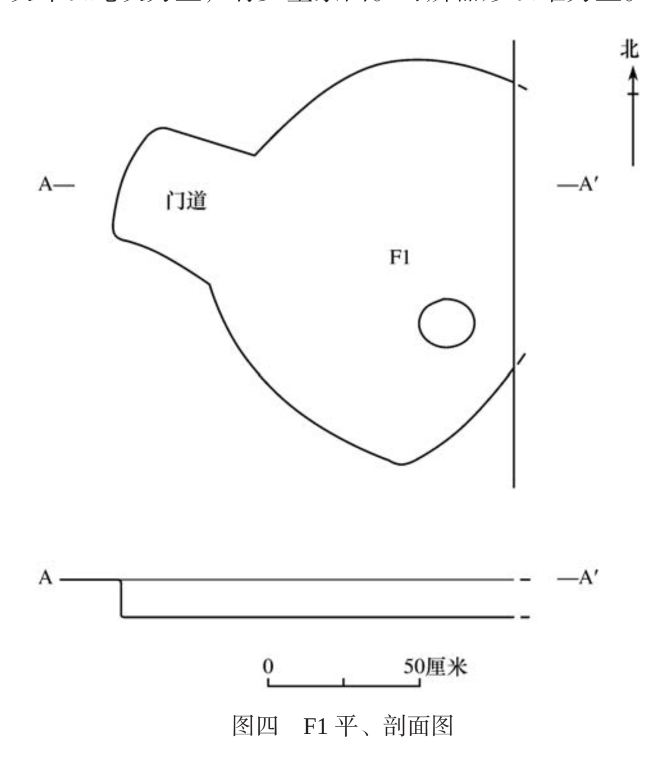
二、遗　　迹

该遗址发现遗迹较少，有房址 1 座、灰坑 3 个。

1. 房址

1 座。

F1　F1 位于 T1 内东部，开口于第 2 层下，为半地穴式建筑（图四）。平面近似椭圆形，通长 1.5、宽 1.3、深 0.13 米。门道位于房址西侧，呈长方形。长 0.4、宽 0.4、深 0.13 米。房内偏东处有一圆形灶。被现代扰坑破坏严重，保存较差。F1 内出土遗物均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素面。可辨器形以罐为主。



图四　F1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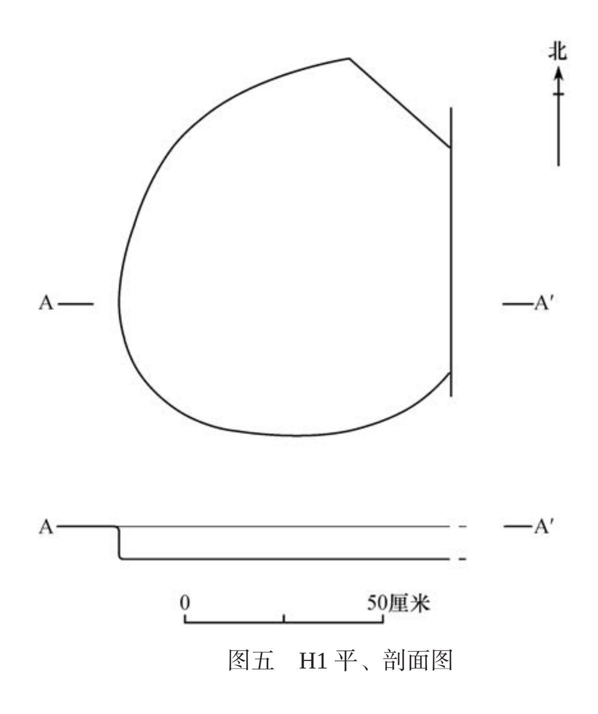
2. 灰坑

该遗址发现灰坑 3 个。根据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和椭圆形两种。

（1）圆形灰坑，2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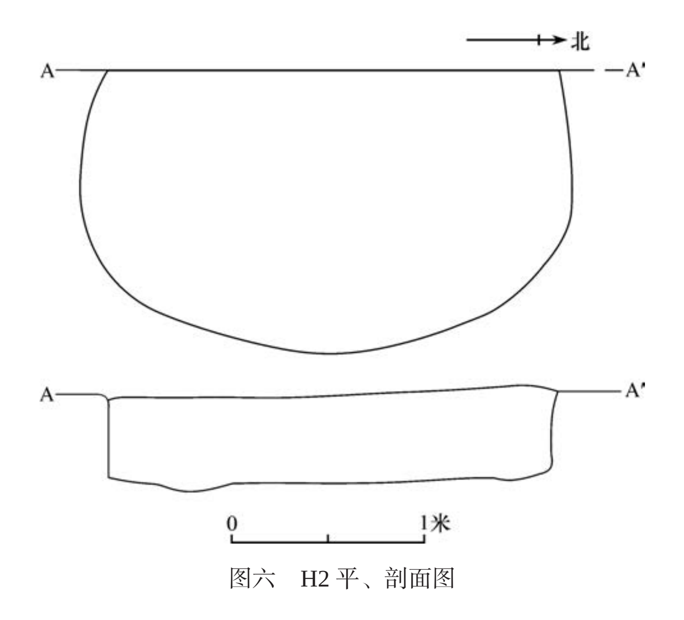
H1　位于 T1 内，开口于第 2 层下。平面近似圆形，直壁，平底。直径 0.9、深 0.2 米（图五）。坑内填土为黑砂土，夹杂大量木炭屑和炭粒，土质较硬。在清理 H1 接近

底部时，在一个陶片下面发现一小堆谷物颗粒，大部分已炭化，谷物颗粒个体为长圆形，种类不详。填土内包含大量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素面。器形有罐、鬲、甑、甗、纺轮等。



图五　H1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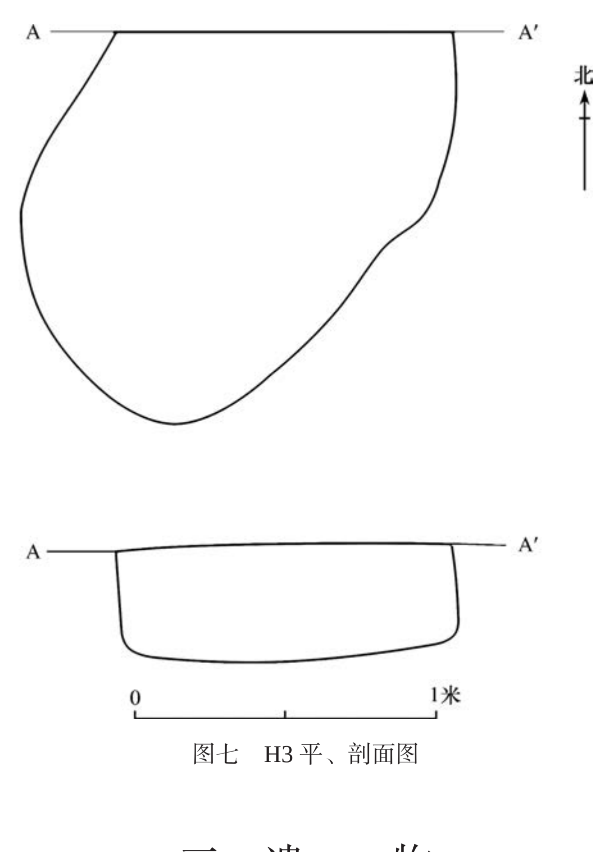
H2　位于 T2 内，开口于第 2 层下。平面为圆形，口大底小，直壁，近似平底。南北长 2.6、深 0.5 米（图六）。坑内堆积为黑砂土，土质疏松，包含物较多，以夹砂红陶片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素面。可辨器形有罐、鬲、网坠等。另出土了石器残片 3 件。



图六　H2 平、剖面图

（2）椭圆形灰坑，1个。

H3 位于T3内，开口于第2层下。灰坑平面大致呈椭圆形，斜壁，圜底。直径1.3、深0.4米（图七）。坑内填土为黑砂土，土质疏松，填土内包含大量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素面。可辨器形有罐、鬲等。



图七 H3平、剖面图

三、遗 物

该遗址破坏严重，地层堆积较浅，发现遗迹少，出土遗物较少，以陶器等为主，另有少量石刀等。

（一）陶 器

该遗址出土物均为陶器残片，未见完整器。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附加堆纹和素面，器壁较厚重。器形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可辨器形有陶罐、鬲、鼎、甑、网坠、纺轮等。

陶罐 该器形在遗址出土物中所占比例较大，根据口沿形状可分成三型，现分别叙述如下。

A型 方唇罐。2件。方唇，侈口，器形较大，器壁较直。H2：2，泥质灰陶。残。

器表饰绳纹。残宽 4.7、残高 5.4 厘米（图八，1）。T1②：4，夹砂灰陶。残。残宽 3.2、残高 2.7 厘米（图八，2）。

B 型　圆唇罐。3 件。圆唇，侈口，束颈，其腹部弧度都较大，素面无纹饰。T1②：1，夹砂灰陶。残。残宽 4.8、残高 3.2 厘米（图八，3）。T1②：2，夹砂灰陶。残。残宽 2.4、残高 2.3 厘米（图八，4）。F1：2，泥质灰陶。残。残宽 4.6、残高 3.7 厘米（图八，5）。

C 型　叠唇罐。2 件。陶罐从口沿向外叠加一层陶泥形成外叠唇，叠唇部分饰绳纹（部分陶罐即使器身无纹饰，但在叠唇部位也饰绳纹），而且绳纹均经人为抹平。F1：1，夹砂红陶。残。残宽 3.2、残高 3.1 厘米（图八，6）。T3③：5，夹砂红陶。残。残宽 5.4、残高 3.9 厘米（图八，7）。

陶鬲　根据该遗址出土的鬲足可将其分为二型，现分述如下。

A 型　实心足鬲。1 件。H1：4，泥质灰陶。残。器形较大，足部粗大。器表饰绳纹。残高 18 厘米。

B 型　空心足鬲。1 件。T1③：3，夹砂灰陶。火候低，保存较差，残。器形较小，足部较细。素面。残高 3.8 厘米（图八，8）。

陶甗　该遗址出土陶甗均为腰部残片，根据腰部装饰将其分为二型，现分述如下。

A 型　陶甗腰处附加一泥条，泥条上用手指按压出指窝痕迹，既能起到装饰作用，也能使泥条更好地与陶甗的腰部结合在一起。T3②：1，夹砂灰陶。残。残宽 4.3、残高 3.6 厘米（图八，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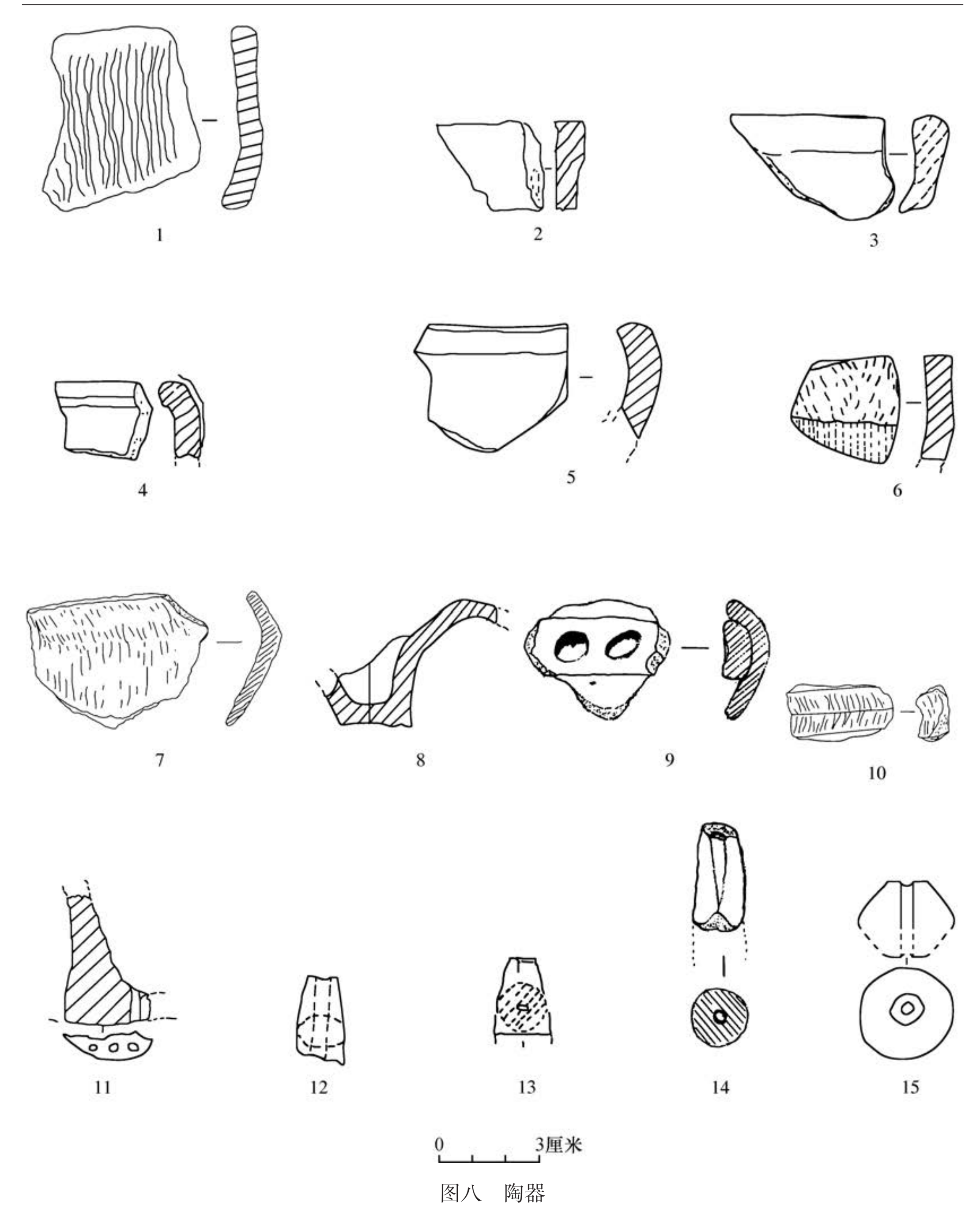
B 型　陶甗腰处附加一泥条，泥条上分上、下两个方向压印绳纹，既能起到装饰作用，也能使泥条更好地与陶甗的腰部结合在一起。T3③：2，夹砂红陶。残。残宽 3.2、残高 1.6 厘米（图八，10）。

陶甑　2 件。均为平底，在平底上刺甑孔，甑孔布列不均匀，孔数不详。T1②：3，泥质灰陶。残存 3 个甑孔。残高 3.9 厘米（图八，11）。

陶鼎　1 件。T3③：8，夹砂红陶。锥状实心足。连裆处为平底。素面。残高 5 厘米。

陶网坠　3 件。均为纺锤形，中间有圆孔，残断，残长 3.4 ~ 3.8 厘米，残宽 1.2 ~ 2.2 厘米。T1②：5，泥质红陶。直径 1.4、残长 2.7 厘米（图八，12）。T1③：4，泥质灰陶。残。直径 1.5、残长 2.3 厘米（图八，13）。T3②：2，泥质灰陶。残。直径 1.5、残长 3.2 厘米（图八，14）。

陶纺轮　2 件。T1②：6，泥质灰陶。形状近似球形，中心有一圆形穿孔，略残。直径 2.9、残高 2.3、孔径 0.4 厘米（图八，15）。T1②：7，泥质灰陶。近似球形。直径 3.7、残高 3、孔径 0.5 厘米。



图八 陶器

1、2. A 型陶罐（H2：2、T1②：4） 3～5. B 型陶罐（T1②：1、T1②：2、F1：2） 6、7. C 型陶罐（F1：1、T3③：5） 8. B 型陶鬲（T1③：3） 9. A 型陶甗（T3②：1） 10. B 型陶甗（T3③：2） 11. 陶甑（T1②：3） 12～14. 陶网坠（T1②：5、T1③：4、T3②：2） 15. 陶纺轮（T1②：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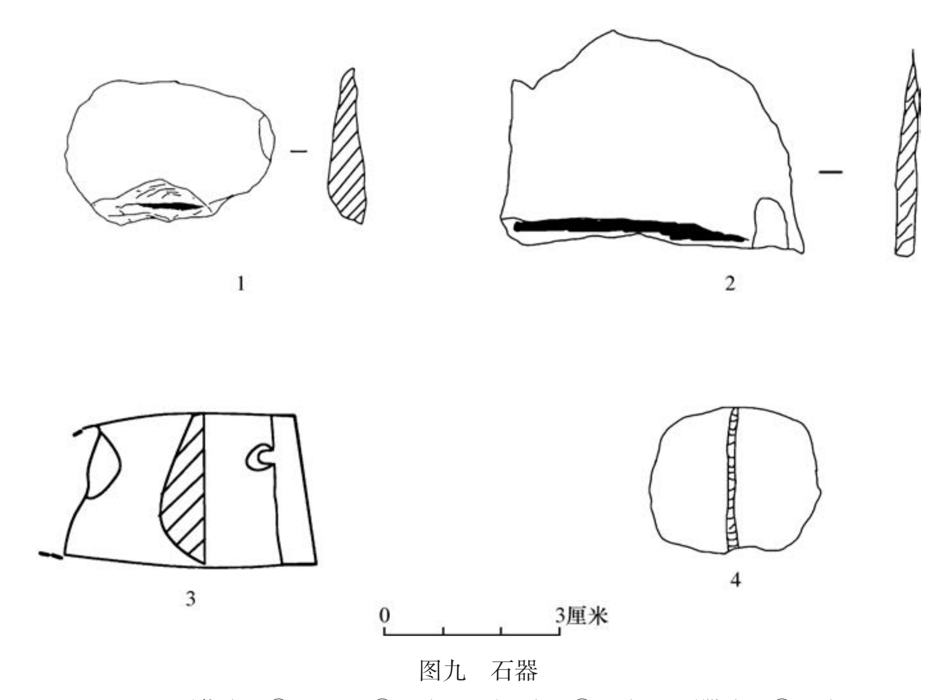
（二）石　　器

4 件。有磨制石器，磨制精细，器形规整，个别打制。器形主要有斧、刀及石器残片等。

石斧　2 件。均为打制，残存刃部，刃由双面打击而成。T2 ③：1，青灰色石质。略残。宽 4、高 3.3 厘米（图九，1）。T2 ③：3，青灰色石质。残。长 4.8、宽 3.6 厘米（图九，2）。

石刀　1 件。T1 ③：5，青灰色石质。磨制。弧背直刃，两端尖部残断，单面刃，一端可见钻孔形状，双面钻孔。残。长 4.3、宽 2.7、厚 0.8 厘米（图九，3）。

石器残片　1 件。T2 ③：2，灰褐色石质。磨制。平面近似椭圆形，薄片状。残。长 2.9、宽 2.5、厚 0.2 厘米（图九，4）。



图九　石器

1、2. 石斧（T2 ③：1、T2 ③：3）　3. 石刀（T1 ③：5）　4. 石器（T2 ③：2）

四、结　　语

天桥东山遗址的发掘是首次在锦州沿海地区进行的青铜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面积仅 100 平方米，发掘面积较小，遗迹简单，出土遗物较少。经过对遗迹和出土遗物的研究，我们对该遗址的时代和经济形态有以下初步认识。

（一）遗址的时代

该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所占比例最大，陶质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除少数几件附加堆纹及素面外，均为绳纹。虽然该遗址陶器未见完整器形，但是遗址出土陶罐口沿、鬲足、甗腰、甑底、鼎足，石斧、石刀等，都反映出辽宁西部地区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其中该遗址出土甗的形制与装饰手法与赤峰药王庙遗址[1] Ⅰ式甗（T1③：13）、阜新界力花遗址[2]甗袋足（H23：3）结合处的形制及装饰手法相同；甑与康家屯遗址[3]的甑（T2310④：25）形制相似。因此，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天桥东山遗址应该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大体在距今4300～3600年。

（二）经济形态

该遗址地处渤海沿岸，遗址中出土了石刀和谷物颗粒，说明农业经济发达。另外，该遗址又出土了陶制网坠，说明该遗址有渔猎经济。因此，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都在该遗址的古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桥东山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和研究环渤海地区古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为研究锦州地区古代人类生活环境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附记：此次发掘领队为李龙彬，参与发掘人员有吴鹏、崔蕾、白彬、尹世丹，绘图由张壮完成，照片由崔蕾拍摄。此次发掘得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崔　蕾　张　壮

注　释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1）.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界力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4（6）.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1（8）.

A Brief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ianqiao Dongshan Bronze Age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 Jinzhou

Jinzho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site of Tianqiao Dongshan is located about 200 meters east of Tianqiao Village, Wangjia Street, Jinzho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Liaoning Province. In June 2010,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ground oil depot project of CNPC Jinzhou, entrusted by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Bureau,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the Jinzho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formed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to carry out a rescu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site. The excavation area was of 100 square meters, one site was found, 3 ash pits, and unearthed artifacts included stoneware, pottery, spinning wheel and net pendant.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the site belongs to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dating from about 4300 to 3600 BP.

Keywords: Liaoning Jinzhou; Tianqiao Dongshan Site; Bronze Ag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简介几种环黄海文物及其历史意义

朴淳发[1]著　朴智熙[2]译

（1.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大田；2. 韩国高丽大学，首尔）

内容摘要：中国山东地区的古居民与器物在史前时代开始不断地通过自然或政治、社会因素越海转移到辽东半岛，在此与土著文化融合，再次扩散到位于极东亚农猎区文化东南部的朝鲜半岛地区。这样的历史过程，在古朝鲜时期通过与齐国交易等方式而延续，设置乐浪郡以后，特别是公元前后更是频繁地发生在连接山东半岛—乐浪郡—朝鲜半岛三韩社会的网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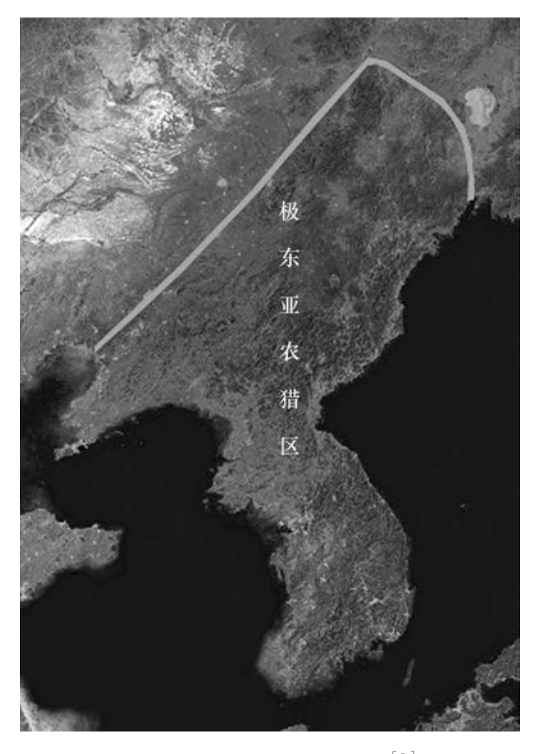
关键词：极东亚农猎区；山东地区；文化交流

一、极东亚农猎区农耕文化的形成

中国山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以辽东半岛为媒介而连接，自史前时代一直存在文化交流。从地理角度来看，朝鲜半岛本身并不完整，以长白山（白头山）为最高峰，连接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及吉林省的山地。所以，以考古学来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不得不考虑到与朝鲜半岛连接的中国东北的山地地区。注意到这一点，笔者曾把包含连接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山地的地理空间设定为“极东亚细亚农猎区简称为极东亚农猎区”[1]。

极东亚农猎区的空间范围是指穿过小兴安岭山地东流的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辽东半岛及辽河以东的山区和整个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以来，该地区的生业经济有赖于混合渔猎、狩猎、农耕，可谓为农猎混合经济区。农耕文化在该地区以北或以东不能维持，所以该地区是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边的农业地区（图一）。

新石器晚期以来，在极东亚农猎区可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即以农业和渔猎为中心的生计经济，以筒形罐为主的炊器，积石墓、石棺墓、支石墓等的石墓传统，还有琵琶形铜剑、多纽镜等具有特色的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极东亚农猎区出现农耕特征源于从公元前 3000 ~ 前 2500 年形成的偏堡文化，偏堡文化本身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密接相关，具体说偏堡文化特有的细条堆纹来源于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同时期的胶东半岛的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的考古学文化[2]。由图二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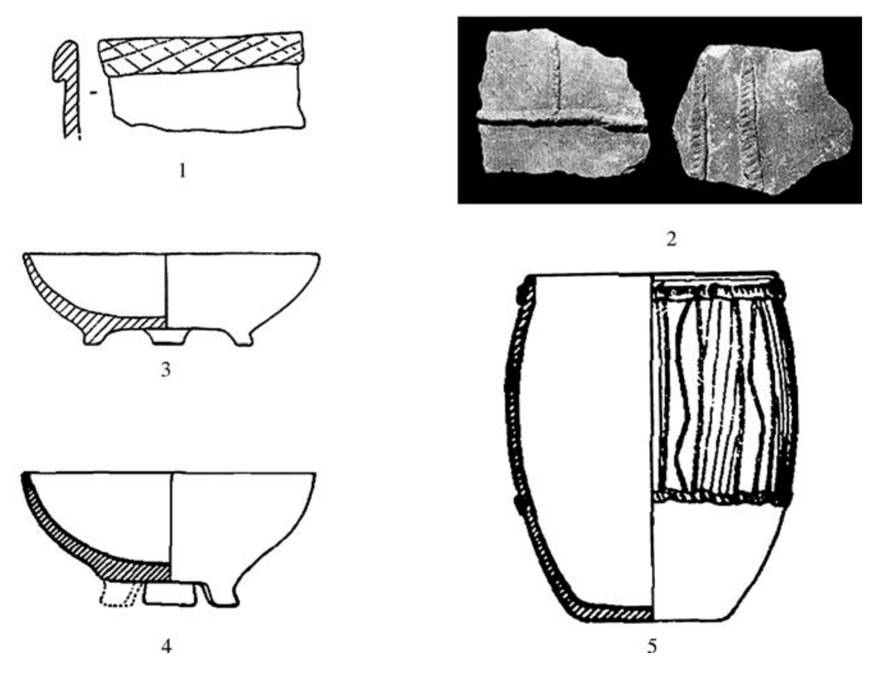


图一　极东亚农猎区范围[3]

属于偏堡文化早期的大连长兴岛三堂遗址[4]出土的陶器与山东烟台白石村遗址的陶器[5]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据最近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农业考古资料发现[6]，在公元前4500年，已确认该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在1994年发掘的王家村遗址上层遗存，该层位同期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阶段。其前的下层只发现了粟、黍等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作物的植硅体。该层时期就是属于前述的偏堡文化时期，根据王家村遗址上、下层发现的植硅体资料，可知偏堡文化早期的北方地区，即辽西地区，是以旱田农耕为主，到了晚期开始种植水稻。

水稻种植是从山东地区传到极东亚农猎区的。目前为止，山东地区已确认的最早的水稻植硅体是在蓬莱大仲家遗址发现



图二　偏堡文化陶器与山东白石村文化陶器对比

1～3. 白石村遗址陶器　4、5. 三堂遗址陶器（偏堡文化早期）

的，时间大致为大汶口早期。至龙山时期到达出土植硅体的高峰，在栖霞杨家圈遗址也发现了水稻颗粒、颗粒壳、谷子、叶片等[7]。胶州赵家庄遗址是通过分析稻子植物硅素体而确定为水田遗址的[8]，时间为距今4000年。由此，确定了在中国长江下游流域开始的水稻农耕进入朝鲜半岛地区的路线，即经由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北路。

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朝鲜半岛的中南部地区，即韩国地区，开始种植水稻的时间一般推测为公元前13世纪渼沙里类型阶段[9]。从辽东半岛南端传播到朝鲜半岛南海岸地区，需要的时间大概推定为230年[10]，所以不能排除以后还会发现更早时期的相关水稻遗址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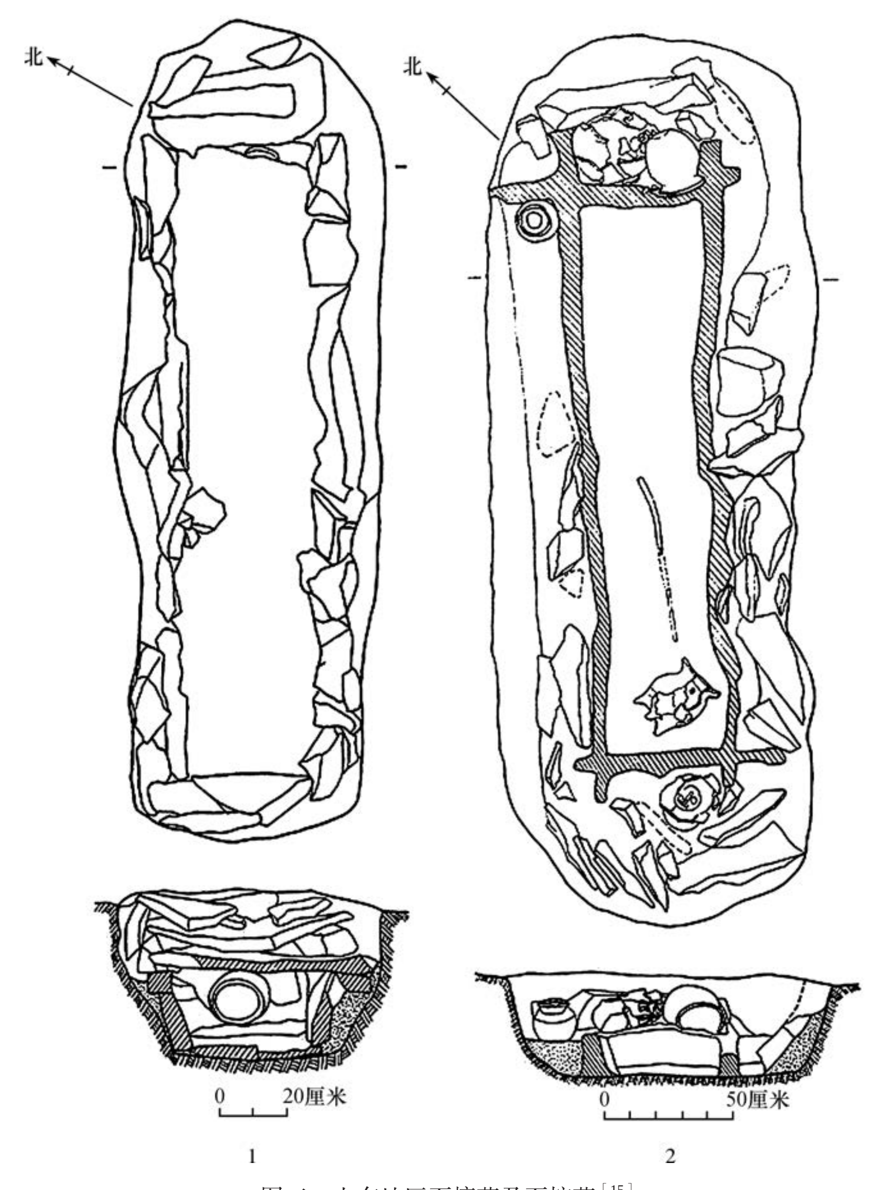
极东亚农猎区的史前文化与山东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另一个考古学证据，表现在青铜时代的墓制上。如上所述，极东亚农猎区的墓制是石墓。以与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处于同时期的辽东半岛小珠山上层文化形成前后出现的积石墓为始，延续到了羊头洼文化或者双砣子文化三期形成前后的公元前16 ~ 前15世纪出现的支石墓、石椁墓、石棺墓等。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沿着千山山地的西北山脚继续北上，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扩散至松花江上游流域。至今，关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积石墓的准确数量还不确定，但大约有114处，存在着至少300座墓葬[11]。其中，密度最集中的地区是辽东半岛北部及东北沿海的几条河川流域，共66处。在朝鲜半岛地区，随着以羊头洼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农耕文化的扩展和支石墓等石墓传统的扩散，朝鲜半岛南端的全罗南道地区最为集中。

在山东地区，也发现了支石墓等石墓传统。1928年，由鸟居龙藏发现的淄博市淄川王母山为始，支石墓的存在被学界所知。一般多分布在以胶东半岛东段的荣成、乳山、文登为中心的一带，但现在几乎没留下任何遗迹。王母山支石墓是3个支石上加大小1.84米 ×1.16米 ×0.88米的盖石，高0.7米构成的。形制上属于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多见的棋盘式[12]。在乳山南黄庄发掘了15座石椁墓和5座石棺墓[13]，墓葬集中分布，结构上极似于极东亚农猎区的石椁墓及石棺墓。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时期为西周中晚期，即公元前1000 ~ 前770年。鉴于当时山东其他地区的墓制为土圹墓，可以将石椁墓的墓主集团理解为居住在胶东半岛东段的嵎夷。

曾经有观点提出把山东地区的支石墓、石椁墓、石棺墓看作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交流而产生的[14]，但考虑到同一类型的墓制在极东亚农猎区的辽东半岛一带最先出现的事实及时间，可以说它是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交流产生而来的（图三）。

二、古朝鲜时期环黄海文物交流

“朝鲜”的名称，最初出现在《管子·揆度篇》和《管子·轻重甲篇》中的“发朝鲜”。虽“发”与“朝鲜”的关系不清楚，但可将“朝鲜”理解为种族名或者政治体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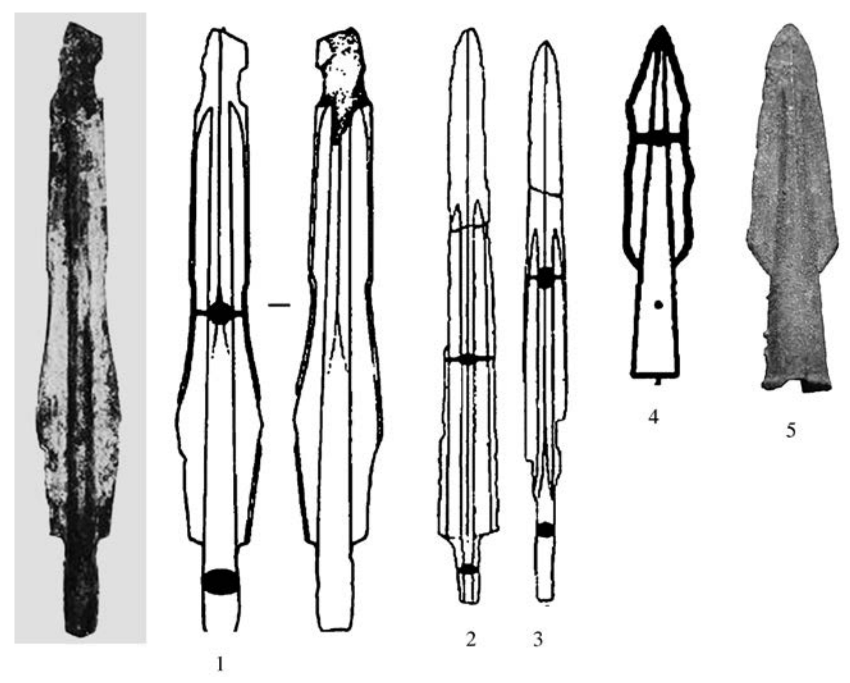
图三　山东地区石椁墓及石棺墓[15]

称。学者对于《管子》的撰述时间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管子》记述的是齐桓公时期的事情[16]。因此，古朝鲜应该是公元前 7 世纪就已经成立的政治体。在考古学时代上，古朝鲜属于青铜器时代。本部分上接前部分讨论公元前 7 世纪以后山东地区与极东亚农猎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古朝鲜与山东地区之间的交流，有根据《管子》的记载来分析齐国与古朝鲜文皮等特产交易的研究[17]，探讨雄基松坪洞出土的贝子作为山东特产进入朝鲜半岛东部地区的路径的研究[18]，以及根据山东地区出土的古朝鲜系或东北系青铜器来分辨齐国和古朝鲜或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的研究[19]等。2011 年笔者作为北京大学访问教授在山东地

区调查时，曾发现烟台市龙口博物馆展示的细形铜鉾，随后将其介绍给学界，并提出古朝鲜与山东之间交流的问题[20]。下面在整理以上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学界新发表的资料的基础上，将探讨古朝鲜与山东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面貌。

至今，山东地区出土的古朝鲜时期的考古材料有 5 件，琵琶形铜剑 1 件、琵琶形铜鉾 1 件、细形铜剑 2 件和细形铜鉾 1 件（图四）。其中，已被韩国国内学界熟知的是出土于栖霞杏家庄 M2 春秋时代墓葬的琵琶形铜剑。此铜剑在 1976 年发掘出土，1992 年发表，2001 年在韩国国内发表[21]。发掘者认定其时间为战国早期（公元前 475 ~ 前 390 年）[22]。另根据其后更为详尽的研究（图四，1；图五，2）[23]，其时间可早到春秋晚期（公元前 569 ~ 前 476 年）。它属于琵琶形铜剑的中期型，锋部流失一部分，残存长 25.8 厘米，剑身最宽处为 3.6 厘米，颈部长 3.6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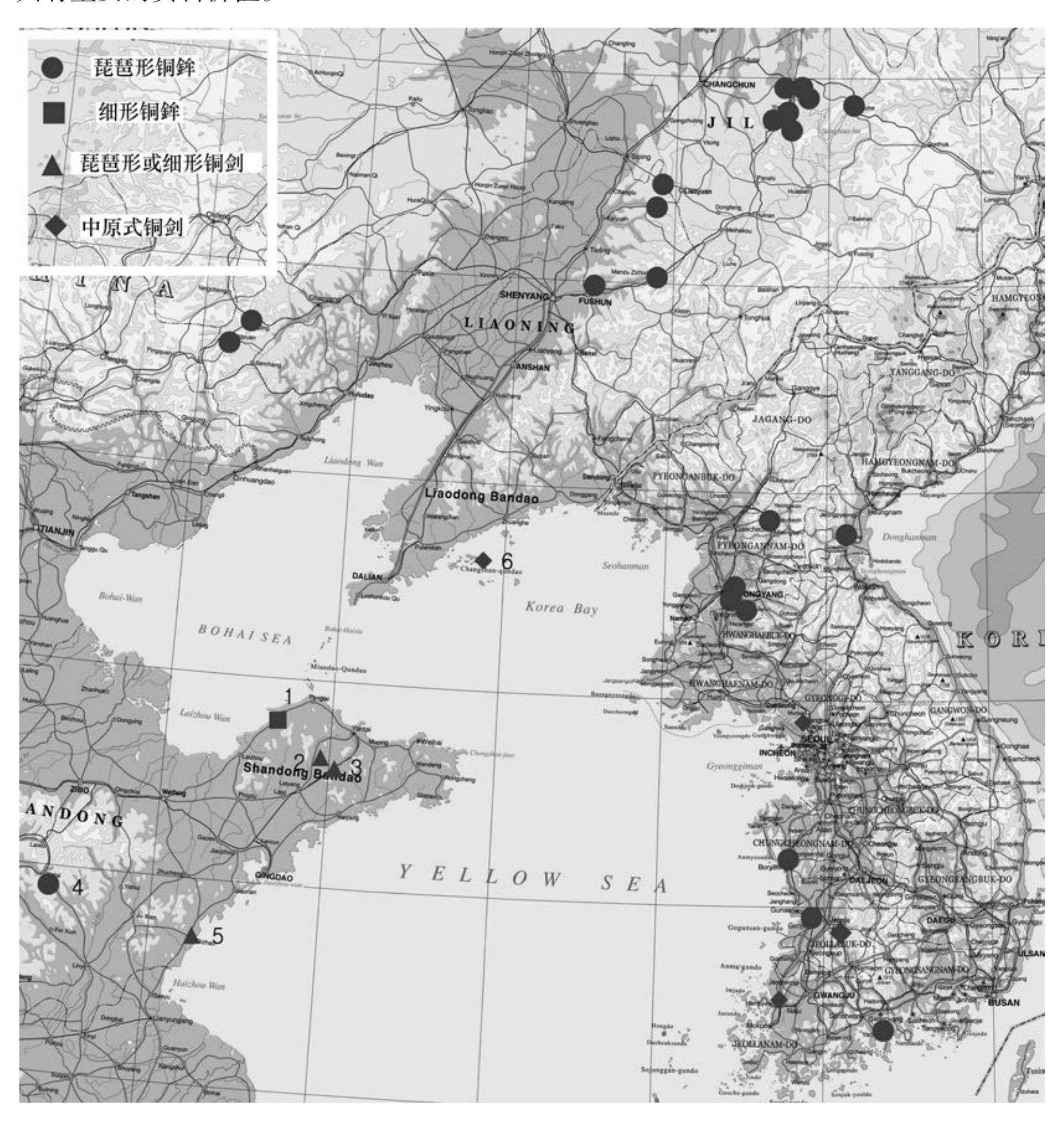
图四　山东出土东北系青铜武器

1. 栖霞杏家庄 M2　2. 栖霞金山遗址　3. 日照　4. 新泰周家庄 M67　5. 龙口

细形铜剑，有调查栖霞金山遗址时的采集品[24]和日照出土的遗物[25]。均为刃部平行的细形铜剑，大都与大连尹家村出土的细形铜剑为同一形式。这些平行直刃细形铜剑分布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地域。金山细形铜剑长 34 厘米（图四，2；图五，3），日照出土细形铜剑长 44.6 厘米，刃部宽为 2.6 厘米（图四，3；图五，5）。

除了以上介绍的青铜器之外，还有笔者推定为东北系青铜器的，即 2003 年在山东新泰市周家庄 M67 出土的琵琶形铜鉾。这件铜鉾结合中原系铜戈的头部，构成戟的一部分，从其形态上被推定为转用琵琶形铜鉾的（图四，4；图五，4）。从铜鉾结合铜戈的形式来看，时间可推定为战国中期（公元前 389 ~ 前 310 年）。因此，琵琶形铜鉾

与琵琶形铜剑，是极东亚农猎区传统的青铜武器。已发表的中国东北地区琵琶形铜鉾一共有 13 件，朝鲜半岛有 9 件（包括馆藏品 1 件）[26]（图五）。琵琶形铜鉾确切的出现时间还未知，但一般以为琵琶形铜鉾的后身，即细形铜鉾出现在公元前 3 世纪后半叶[27]，如此情况下周家庄 M67 出土的琵琶形铜鉾作为战国中期琵琶形铜鉾的新例子，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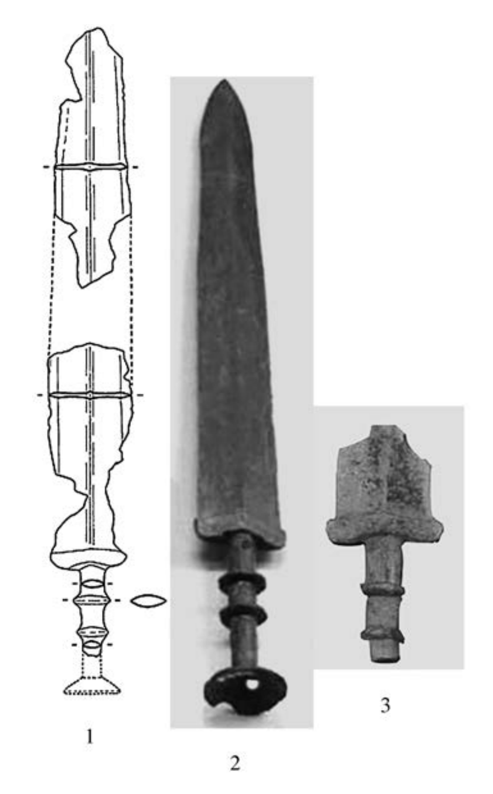


图五　山东出土东北系青铜武器的分布

如前所述，龙口市博物馆藏的细形铜鉾已被笔者发表介绍给学界，但还不知道准确的出土地点。全长约 20 厘米，属于所谓的短锋细形铜鉾，属于铜鉾中早期的形式（图四，5；图五，1）。銎部下端外侧上原有环耳，现已缺失只留下痕迹。因短锋形的细形铜鉾上具有环耳的例子少见，可重点关注一下。

以上出土于山东地区的青铜武器大体属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虽然目前山东地区出土例子不多，但反映了位于山东地区与极东亚农猎区之间的古朝鲜的交流关系。有观点认为包括杏家村琵琶形铜剑在内的一系列的铜剑是通过燕国流入齐国的[28]，齐国与古朝鲜之间借助毛皮交易通过海路而发生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较高[29]。

能够证明当时古朝鲜与齐国之间进行海路交流的考古资料，有大连长海县哈仙岛徐家沟战国墓的出土物。此遗址发现于 1980 年，位于大长山岛附近的小岛上，根据发现时当地人的描述，石头堆下面出土了 6 件青铜器[30]。目前还未发表正式报告，具体情况未知，墓葬大小约为长 2 米，宽 0.5 ~ 1 米。采集了属于末期阶段的琵琶形铜剑 1 件、细形铜剑 1 件、中原系铜剑 1 件、剑鞘 1 件、铜斧 1 件、铜凿 1 件[31]。长山列岛是属于史前时代以来来往山东半岛的海上通道。所以中原系铜剑应是源于齐国，即山东半岛，由此可充分地推断古朝鲜与齐国之间存在海上交通路线。



图六　韩国出土齐式剑

1. 韩国咸平草浦里出土　2. 韩国全罗北道完州上林里出土　3. 韩国坡州云井地区出土

1976 年在韩国全罗北道完州上林里发现埋藏有 26 件战国时期齐国铜剑[32]（图六，2）。发掘者认为此铜剑是中国内陆地区的中原式铜剑，推定其时间为公元前 500 年左右，但在中国学界上一般认为它们是属于战国中期（公元前 389 ~ 前 310 年）的齐国铜剑[33]。齐国铜剑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刃部单面有像凹透镜的浅血沟。浅血沟也发现在韩国咸平草浦里出土的中原系铜剑上[34]（图五；图六，1），所以此铜剑也可推定为齐国铜剑。同样的齐国铜剑在韩国坡州云井地区也出土了 1 件（图五；图六，3）。

对于在韩国中南部地区出土齐国铜剑的原因，有系山东地区出身的流亡民所带来的观点[35]。他们的流亡路径，应该是通过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庙岛列岛沿岸的航路，登陆朝鲜半岛的中南海岸。如上所述，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出土的齐国铜剑的时间是战国中期，即公元前 4 世纪。当时辽西地区已有战国时期燕国势力的影响，古朝鲜势力的一部分是通过海上开始南下朝鲜半岛地区。这被认为是位于极东亚农猎区北部的黏土带陶器文化南下移动的先河[36]。山东地区在公元前 431 年鲁南的莒国被楚国灭亡后，不久被编入齐国。韩国完州上林里出土的大量的齐国铜剑退藏应与当时的政势变化有关。

三、汉以后时期的环黄海文物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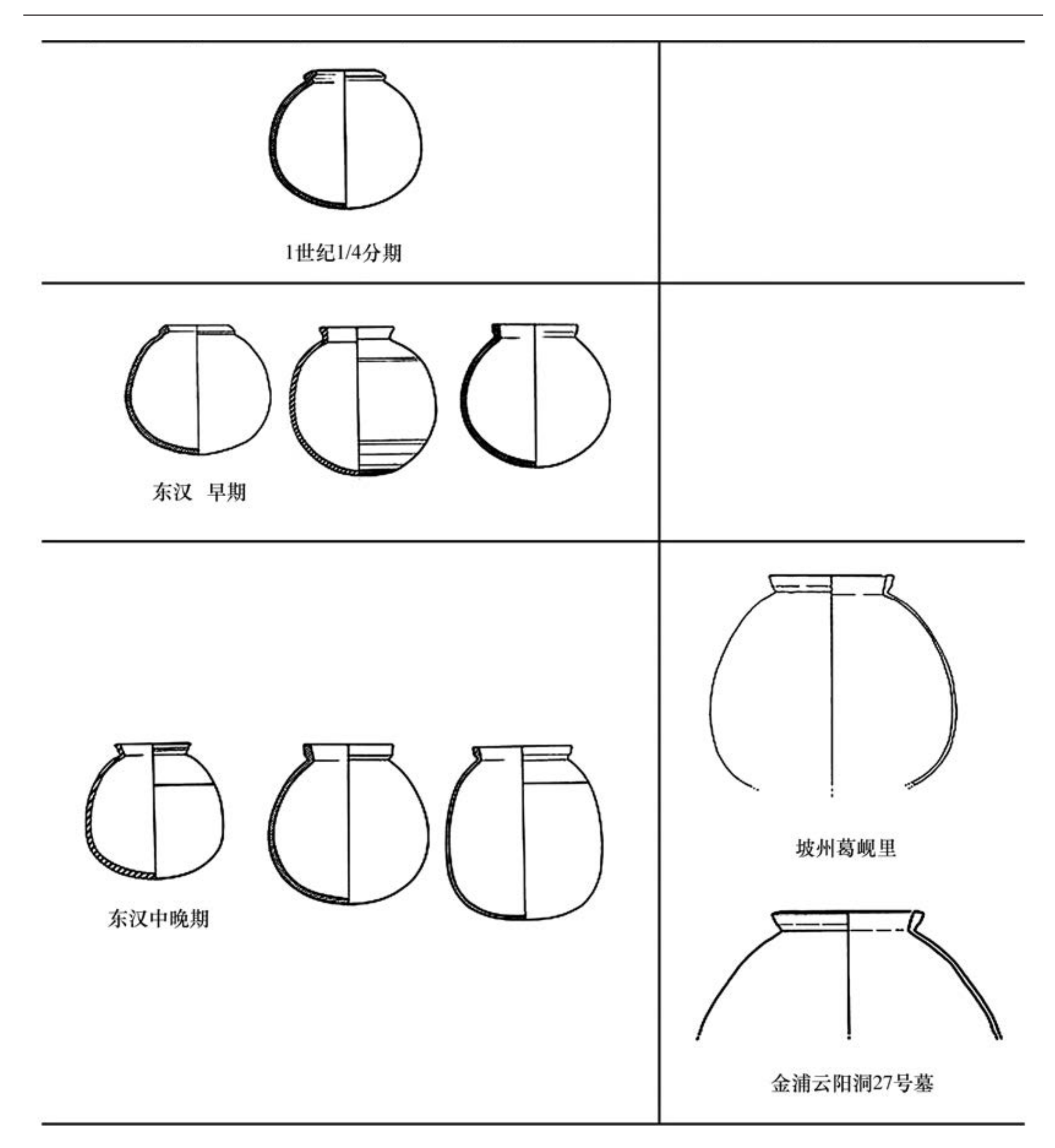
通过文献记载大家都已清楚，秦国统一结束了战国时代，为躲避战国末期的混乱，赵、燕、齐国人民流亡到朝鲜半岛的事实。据《史记·朝鲜传》也可知，公元前 198 年卫满来附属燕、齐国的流民，篡夺古朝鲜政权，卫满朝鲜的右渠在位时有许多的汉朝流民。《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辰韩”条记载，辰韩自称“为避免秦役而逃亡”。其后也继续有逃避中国内地政势混乱的流民，来到朝鲜半岛的事例。历任叫恩率的百济官员陈法子的墓志上显示他的远祖是在东汉末年避免黄巾之乱而来到朝鲜半岛的马韩地区的。还有作为百济流民死在唐朝的祢寔进及祢氏先祖，被认为是西晋末年山东的南燕被东晋灭亡的 410 年到刘宋建国的 420 年过海到百济定居的[37]。

然而，在考古材料上说明朝鲜半岛与中国山东地区之间的居民物质交流的证据不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乐浪、带方等郡县与山东地区之间的交流，从郡县势力的盛衰可反映以朝鲜半岛中南部为中心的三韩关系的一面。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仁川市云北洞出土的非乐浪系汉式陶器。推定为公元前 1 世纪前半叶的此陶器明显区别于土著文化的陶器，也不同于已发现的同时期的乐浪地区的陶器。根据在金浦云阳洞、金浦阳村、坡州葛岘里等周边地区出土的生产在中国山东地区的白色陶器，有学者提出它们不通过郡县，而可能从山东地区直接传来的观点[38]。

汉江下游流域出土的白色陶瓮的时代问题，参考最近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环渤海地区出土白色陶器的墓葬有砖室墓、砖室混筑墓、少量木椁墓，基本上属于东汉时期，目前未溯及西汉中晚期。汉代白色陶器流行从西汉末期一直到东晋，但是魏晋以后，圆底瓮和壶消失。白色陶器的原料黏土多分布在莱州湾附近的山坡上，目前烧制此器物遗址只有龙口埠下王家遗址，出土的器类以圆底瓮与壶为主。根据大连普兰店姜屯汉墓报告，白色陶瓮出现在公元 125 年左右的东汉中晚期[39]。从金浦云阳洞 27 号坟丘墓随葬的细形铜剑、铁长剑的情况来看，金浦阳村 2-3 地点나-1 号那 -1 号坟丘墓以及坡州葛岘里出土物的时间可定为东汉晚期（桓帝—献帝，146 ~ 220 年）（图七）。

汉江下游流域出土的白色陶器，的确是山东地区生产的，该时间集中于桓灵之末。关于此时期，根据乐浪郡势演变来分期研究的结果[40]，相对应为乐浪居民的逃离时期（110 ~ 190 年）。当然，不能排除因中国政势不安，导致山东等地居民流入到朝鲜半岛地区的可能性，但除白色陶器以外，未见一同出土当时山东地区产的其他文物。因此，白色陶器应与乐浪郡民逃离有关。

不过，山东地区与乐浪关系最紧密的时期是王莽至东汉的过渡期。该时期，在山东发生多次农民叛乱，农民向中央政府和地方贵族阶层频繁发生攻击。而在乐浪地区，从以前已有民间商人在中国内地进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且保持与中国内地无关的安定状态，优先被认为是理想的避难处[41]。如此，当时享受着安定与富有的乐浪的主要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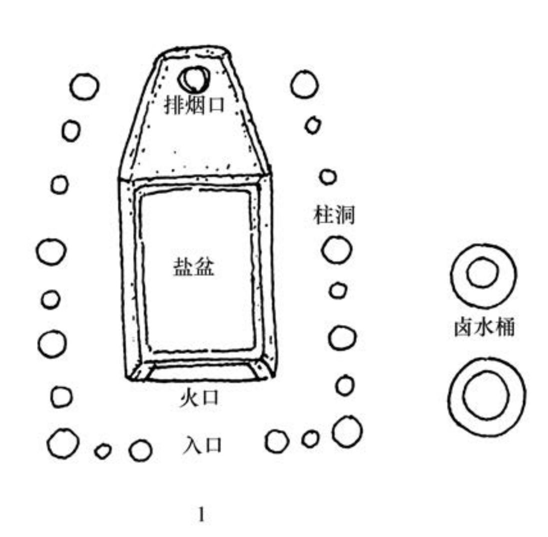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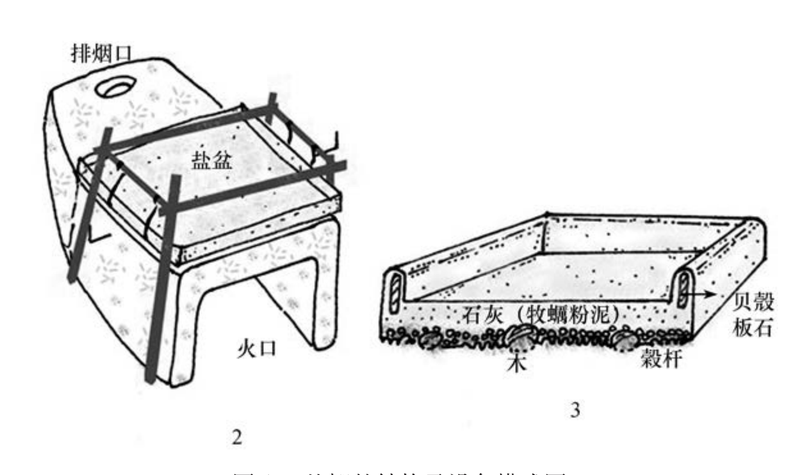
图七 汉江下流域白色陶器与比较资料

对象就是山东地区。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掌握天下之前，最大的竞争对手为山东的梁王刘永，其背后即是乐浪。中国内地霸权属于刘秀，之后发生的乐浪士人出身的王调杀害乐浪太守，自称为乐浪太守的王调政变，被认为是当时的政局引起的。公元 30 年，中国内地混乱未定，光武帝发兵镇压王调之乱，是为早点切断山东与乐浪的政治联结的措施，之后山东与乐浪郡之间在民间上的直接交流减少[42]。

公元前 1 世纪后半叶到镇压王调政变的时期，与朝鲜半岛与山东地区之间关系有关的考古材料是最近在仁川云南洞一带发现的一处遗址。该报告认为该遗址是贝冢，笔者认为是与制盐有关的遗址[43]。具体介绍如下。

众所周知，盐在真正的农耕之后的社会，为生存必需的物质。在朝鲜半岛多数分布于以西海岸为代表的泥滩，这里也有适合自然环境的制盐法，即卤水煮盐法。各地虽然在采集卤水的场所和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卤水煮盐方式上，未区别于地理上接近的山东地区。山东地区先在古海岸线附近挖盐井，再利用涌出的卤水进行煮盐，然而，以西海岸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利用现代的海岸泥滩，挖盐井采集卤水。还有在煮卤水的方式上，可以推定古代朝鲜半岛为利用陶器煮沸的方式及以贝粉和石灰泥来制造土釜的方式（图八）。





图八　盐棚的结构及设备模式图
1. 盐棚的平面结构　2. 制盐炉的形态　3. 土盆的材质与结构

从目前的考古学证据看，利用土釜煮盐始于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的可能性比较高，仁川云南洞遗址应属于其中最早的阶段。其出土遗物中，包括铁茎铜镞或者五铢钱等，可知其时期为公元前后，并且与乐浪郡有关联。据最近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44]，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采用使用如盔形陶器的陶器制盐法，西汉前期出现利用铁釜的煮盐法，原来的盔形陶器煮盐法逐渐消失。尤其是因汉武帝实行的盐业官营专卖，山东一带的

民间制盐业者离散到朝鲜半岛等地的附近地区的可能性比较高。在仁川云南洞遗址，石灰成分的物质分布于贝壳层之间，由此可判断它是使用土釜的痕迹。目前还未发现山东地区的贝粉和石灰泥制土釜的实物资料，但而后的制盐遗址上曾发现过石灰痕迹，因此有可能其起源在山东地区[45]。

公元前后时出现的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土釜制盐方式，被认为是山东地区的制盐工作者来到乐浪郡县后开始扩散到仁川云南洞等地的周边地区的证据。

关于在西汉晚期公元前 1 世纪后半叶左右，中国内地有势力的人士流入乐浪地区的另一个考古证据是金海良洞里 332 号墓出土的青铜鼎与蔚山下垈 23 号墓出土的青铜鼎（图九）。有学者提出，这些都是中国汉代制造的，通过乐浪郡流入朝鲜的[46]。



1



2

图九　朝鲜半岛南部出土青铜鼎

1、2. 青铜鼎（蔚山下垈 23 号墓出土、金海良洞里 332 号墓出土）

然而，下垈的铜鼎表面存在的固定痕，与汉朝制造的有区别，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解释为山东半岛战国时期齐国青铜器的特点“乳钉”脱落的结果[47]。良洞里铜鼎的口缘部的周边外壁上端印刻了铭文，为“西□铜鼎 容一斗 并盖重十一斤第七”。有学者认为“西”字之后的不明文字为“乡”，“西乡”是位于现在的北京南部的“涿郡”，由此指出它是西汉晚期元帝（公元前 49 ~ 前 33 年）时期制造的[48]。时间上，下垈铜鼎为战国晚期—西汉前期，其制造地是山东地区，良洞里铜鼎属于西汉晚期。总之，它们出现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原因与当时中国河北或山东等地的有一定势力的逃难者移住到乐浪地区有关。之后，在桓灵之末乐浪郡势力衰弱，可能是居民逃离过程中再次移住到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结果。

四、结　　语

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300 ~ 前 2200 年）及龙山文化（公元前 2200 ~ 前 1900 年）的晚期。维持了与中原地区政治体对等的地位。但是，夏朝（公元前 2070 ~ 前 1600 年）建立以后，山东地区衰弱到附庸于中原地区的地位，被称为东夷。在考古文化上，岳石文化（公元前 1900 ~ 前 1699 年）被认为是当时东夷文化的主要代表。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居民曾过海登上辽东半岛，其过程中，在辽东半岛的南端出现了极东亚农猎区最早的农耕文化，即偏堡文化（公元前 3000 ~ 前 2500 年）。

这时期的居民移动或考古文化的扩散是基于如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引发的，之后，受到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逐渐变大。岳石文化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的南部一带，而且文化内容上与山东文化极其类似，是明显地区别于极东亚农猎区的土著文化。不能排除始于夏王朝成立后对东夷的政治军事压力导致集团移住的可能性。根据山东地区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49]，东夷文化经历过岳石文化—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其地方范围逐渐地缩小到胶东半岛东南部。岳石文化的结束，与商朝的出现密切有关，芝水二期遗存的衰落也与商武丁（公元前 1250 ~ 前 1192 年在位）攻占东夷有关。珍珠门文化的结束也发生在西周中期前后，被认为是西周压迫东夷族的结果。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只剩下胶东半岛的东南段，即分布在现在的威海市一带的南黄庄文化。公元前 548 年莱国被齐国灭亡，便是东夷文化的终结。

根据文献资料，山东地区的东夷通称为嵎夷。根据对嵎夷的历史地理研究得知[50]，当初嵎夷位于山东半岛的东边，但后来地理上的认识逐渐认为其在辽东及朝鲜半岛。这样的历史地理认识的变化与前述的东夷文化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一致。把朝鲜半岛认知为嵎夷的地理观，从唐朝苏定方军队远征百济时唐高宗把金春秋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的事实来看，大致在 7 世纪以后形成的可能性较高。

如此，山东地区的古居民与器物在史前时代开始不断地通过自然或政治、社会因素转移到辽东半岛，在此与土著文化融合，再次扩散到位于极东亚农猎区文化东南部的朝鲜半岛地区。这样的历史行为，在古朝鲜时期通过与齐国交易等形态而延续，乐浪郡设置以后，特别是公元前后更是频繁地发生在连接山东半岛—乐浪郡—朝鲜半岛三韩社会的网络中。

在三韩社会中，在出现国家阶段的政治体的三国时代以后，山东地区作为历代中国内地政权与朝鲜半岛交流的中间据点，重要性变高。特别是与中国南朝政权维持紧密的交涉关系的百济的地位更加如此[51]。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 7·黄县”条有记载：“向新罗、百济的来往始终由此开始。”[52]东汉—三国时期东莱郡治所——黄县是现在的龙口。龙口市博物馆陈列的古朝鲜时期朝鲜半岛特有的细形铜鉾，由此可知，其情况在以后也未变。

附记：本文系高丽大学研究生朴智熙翻译为中文，以此表示感谢。

注　释

[1] 朴淳发．极东亚细亚农猎区设定［J］．百济研究，2015a：61.

[2] 朴淳发．偏堡文化의形成과展開［J］．韓國青銅器學報，2015b：16.

[3] 同［1］.

[4] 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1997（12）.

[5] 烟台市博物馆．烟台白石村遗址发掘报告［A］．胶东考古［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6] 张翠敏．辽东半岛南部农业考古新发现与突破［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

[7]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A］．胶东考古［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8] 靳桂云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 4000 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J］．科学通报，2007（18）.

[9] 据高丽大学李弘钟教授，韩国考古环境研究所调查发掘的世宗市大坪里遗址出土了该阶段的水田和有稻子壳痕的陶器碎片。该报告还未出版。

[10] 参考水稻农耕在日本列岛扩散的速度（每年 3 千米），笔者依次算出的时间，参见朴淳发．偏堡文化의形成과展開［J］．韓國青銅器學報，2015b：16.

[11] 华玉冰．中国东北地区石棚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2]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J］．北方文物，2004（1）.

[13]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乳山南黄庄石椁墓［A］．胶东考古［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4] 同［12］.

[15] 同［13］.

[16] 박준형．古朝鮮의海上交易路와萊夷［C］．北方史論叢 2，고구려연구재단，2004.

[17] 同［16］.

[18] 박선미．웅기송평동출토 貝殼및貝殼形玉검토 - 한반도동북지역의화폐사용과관련하여 -［J］．韓國考古學報，2005：56.

[19] a．吳江原．春秋末東夷系萊族木槨墓출토琵琶形銅劍［J］．韓國古代史研究，2001：23.

b．李慧竹，王青．後期青銅器——時代中國山東地域과韓國間의交流［J］．白山學報，2002：64.

c．李淸圭．韓中交流에대한考古學的접근［J］．韓國古代史研究，2003：32.

d．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关问题［J］．考古，2007（8）.

[20] 朴淳發．考古資料로본山東과韓半島의古代海上交通．백제와주변세계，진인진，2012.

[21] 同［19］a.

[22] 本文使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时间区分与公历年代标准依据为刘德彪、吴磬军，2004，其内容如下。春秋早期：公元前 770~ 前 670 年，春秋中期：公元前 669~ 前 570 年，春秋晚期：公元前 569~ 前 476 年，战国早期：公元前 475 年 ~ 前 390 年，战国中期：公元前 389 ~ 前 310 年，

战国晚期：公元前 309~ 前 221 年。

［23］ 同［19］d.

［24］ 林仙庭等．山东栖霞市金山东周遗址的清理［J］．考古，1996（4）.

［25］ 日照出土的细形铜剑，杨深富与王青教授的介绍有差异。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关问题》中的配图上细形铜剑的锋部已被切断并且刃部下端一部分流失，但原报告的配图上未显示，有可能刚发现时与王青教授实测时的铜剑状态不同。本文图五引用了《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关问题》中的图。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26］ 미야자토오사무（宫里修）．한반도청동기의기원과전개，사회평론，2010.

［27］ 成璟瑭．韓半島青銅武器研究——中國東北地域과의比較［D］．全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9.

［28］ 同［19］a.

［29］ a．同［16］.

b．同［19］d.

［30］ 2016 年 6 月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考察古代海上交通路，调查此遗址时当地居民的介绍。

［31］ 长海县县志办公室．长海县志［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2.

［32］ 全榮來．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國式銅劍에關하여 - 春秋末戰國初，中國青銅器文化의南韓流入問題［R］．全北遺蹟調查報告第 6 輯，全州市立博物館，1976.

［33］ 同［12］.

［34］ 国立光州博物馆．咸平草浦里遗迹，1988.

［35］ 同［12］.

［36］ 점토대토기문화의기원과전개．점토대토기문화의기원과전개，제 9 회한국청동기학회학술대회　발표논집，韓國青銅器學會，2015c.

［37］ 冑凡煥．중국인유이민의백제귀화와정착과정에대한검토 -《陳法子墓誌銘》을중심으로 -［J］．韓國古代史探究，2015：19.

［38］ 鄭仁盛．漢江下流域의漢式系土，중부지역원삼국시대외래계유물과낙랑，제 9 회매산기념강좌，숭실대학교한국기독교박물관，2012.

［3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40］ 權五中．낙랑역사의전개와백제［M］．백제의성장과낙랑·대방，한성백제박물관，2016.

［41］ 同［40］.

［42］ 權五中．樂浪王調政權成立의國際的環境［J］．歷史學報，2007：196.

［43］ 朴淳发，李弘钟．韩半岛古代制盐初探［A］．东方考古·第 12 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44］ a．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盔形器的用途与产地再论［J］．考古，2006（4）.

b．曹元启．试论西周至战国时代的盔形器［J］．北方文物，1996（3）.

［45］ 据山东大学王青教授，调查制盐遗址分布时，发现有石灰成分的例子，可关注以后考古调查

的结果。

［46］ 郑仁盛．韓半島出土（青銅）鼎의性格［M］．古文化，1996：48.

［47］ 同［12］.

［48］ 李学勤．韩国金海良洞出土西汉铜鼎续考［J］．文博，2002（6）.

［49］ 张锟．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50］ 刘凤鸣．嵎夷、旸谷地望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第26卷2辑）.

［51］ 同［40］.

［52］《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7·黄县》："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军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

参 考 书 目

李元章．山东栖霞县占疃乡杏家庄战国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2（1）.

梁法伟．山东地区出土东周时代铜兵器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刘德彪，吴磐军．燕下都瓦当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扬哲峰．环渤海地区汉晋墓葬出土的白陶器及相关问题［A］．海岱考古［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Introduction to Several Kinds of Artifacts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ark Sun Bal

Abstract: In the prehistoric era, ancient settlers and artifac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were moved to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cross the sea due to na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Here, they merged with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spread further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Extreme East Asian Farming Area. Such historical phenomena continued in the form of transactions with the Qi during the ancient Joseon perio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Lelang County, triangular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eninsula, Lelang Count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frequent.

Keywords: Extreme East Asian Farming Area; Shandong; cultural exchange

无轸何为琴：新疆出土“箜篌”考

张一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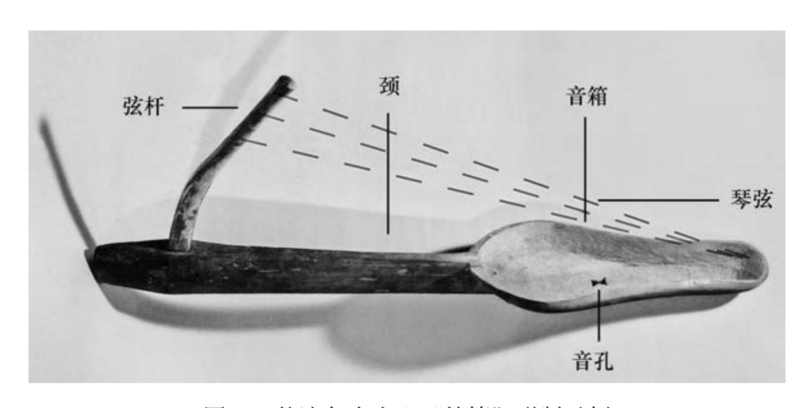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北京，102488）

内容摘要：截至 2018 年，新疆地区共发现 19 件“箜篌”实物，一直被认定是壁画及文献所描绘的乐器箜篌。然而，这些所谓的“箜篌”都有一处明显的缺陷——无轸。一方面，从乐律的角度分析，缺失固定音高、紧弦调音的弦轸，箜篌就失去了弹拨乐器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从箜篌传播的“源”（西亚、埃及、希腊、中亚）与“流”（唐以后中国及日本）所见的调弦构造来进一步佐证新疆箜篌的性质。结合出土背景、文献与民族学材料，可以进一步推断，此类墓葬语境中的“无轸箜篌”并非乐器。在无更多证据证明存在独特的调音方式前，本文认为此类“箜篌”为随葬之明器或宗教之法器。

关键词：箜篌；弦轸；调音；明器；法器

一、古代的箜篌与新疆的考古发现

箜篌是一种古代的弹拨乐器，在我国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新疆曾有 19 件此类实物先后出土或发现，因与壁画所见箜篌外形相近，甫一面世便被认定为“箜篌”。然而，当细究其形制、构造、发音原理却不难发现，作为弹拨类乐器，这些“箜篌”都有一处明显的缺陷——无轸。以扎滚鲁克出土的“箜篌”M14J、I：20（图



图一　扎滚鲁克出土“箜篌”形制示例

一）为例，箜篌由弦杆、颈、音箱、琴弦（出土时已无存，以虚线代之）组成，音箱上有音孔，但无调琴之弦轸，其性质存疑。以下就新疆出土的“箜篌”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研究材料

1. 图像与文献材料

关于箜篌较早的记载见于《世本·作篇》与西汉初《史记·孝武本纪》。

《世本·作篇》记载：

> 箜篌，空国侯所造[1]。
> 箜篌，师延所作，靡靡之音也。出于濮上，取空国之侯名也[2]。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

> 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可得而礼……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均然，命曰箜篌。侯，其姓也。”自此起[3]。

而后，《汉书·郊祀志》《释名·释乐器》中也有相似记载。虽《世本》的真实性至今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箜篌在汉代已然出现。文献所指皆为源于我国本土音乐体系的卧箜篌，而竖箜篌则属外来体系。据《隋书·音乐志》载：

>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4]。

这是“竖箜篌”（即竖头箜篌）首次见于文献。

唐杜佑《通典》也载：

> 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5]。

《后汉书·五行志》曾提到“胡空侯”之名：

>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6]。

两相印证，《后汉书》记载的“胡空侯”很可能即为后世所称的“竖箜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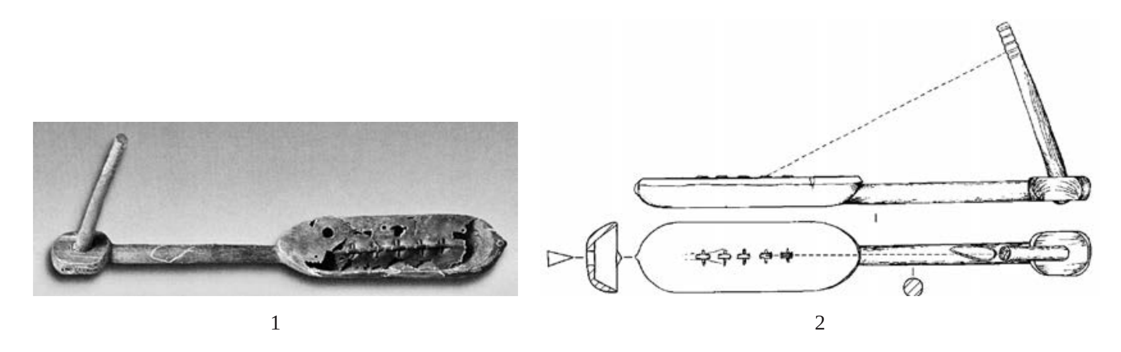
就文献与图像材料看，竖箜篌在汉代时由西域传入我国，汉灵帝时已流行于中原，且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佛教洞窟壁画、乐舞俑、砖雕石刻等图像材料中，如公元5世纪开凿的云冈石窟就有对箜篌的塑造，北宋陈旸《乐书》中也有对竖箜篌的记录。因此，学者普遍认为新疆是箜篌东传到中国的“登陆地”[7]，箜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2. 实物材料

古乐器箜篌虽在历史上名噪一时，但出土实物甚少。截至2018年，新疆共有19件似箜篌形乐器实物，除了1件为鄯善县征集的洋海箜篌外，其他18件均为考古发掘获得。这18件箜篌形制各异，按照保存情况整理可分如下三类。

（1）保留音箱、颈、弦杆、弦、蒙皮，具有箜篌的外形。1件。音箱和颈部连为一体，胡杨木制。

鄯善IM90：12（图二），音箱口呈椭圆形，底部正中有三角形发音孔。口部蒙羊皮，并将其粘在音箱外沿上，正中竖向穿一根加工好的柽柳棍，再用五个小枝等距分别穿在竖棍下，枝棍交叉呈“十”字形露出蒙皮，再分别引弦到弦轴上。颈呈圆柱形，颈首为圆角长方体，其上穿圆柱状弦杆。与琴颈夹角为82°，琴弦仅存一根，牛筋腱制（一说羊肠制）。但弦轴上有五道弦痕。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8]。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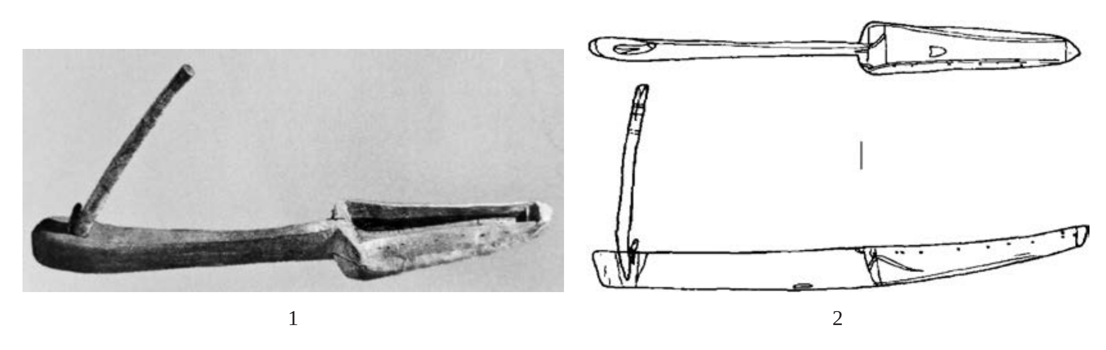
图二　鄯善IM90：12实物图及线图

1. 实物图　2. 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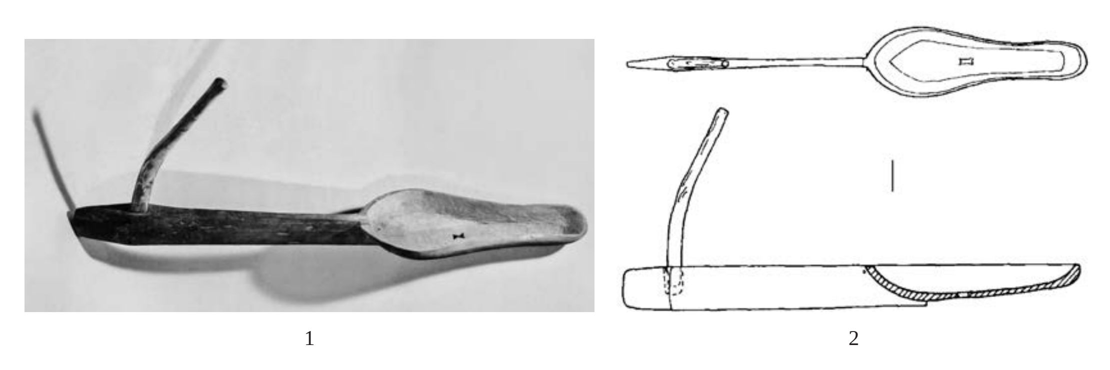
（2）保留音箱、颈、弦杆，无弦与蒙皮。5件。音箱与颈部连为一体，弦杆分制。除吉尔赞喀勒M14：2未明确外，其他标本的音箱与颈均为胡杨木制成[9]，弦杆为柽柳木制成。

且末M14N：27（图三），音箱平面呈梯形，口部外缘有固定蒙皮的小木钉。音孔呈凹底的三角形。时代为公元前5世纪[10]。

且末M14J、I：20（图四），音箱呈半葫芦形，外壁打磨光滑，口部遗留蒙皮痕迹。内壁有刃器加工的痕迹，音孔呈束腰状长方形。颈部侧面为长方形。颈首较厚，凿刻了椭圆形的卯眼以固定弦杆，弦杆呈弧形。杆首较细，截面呈圆形，有三道明显的系弦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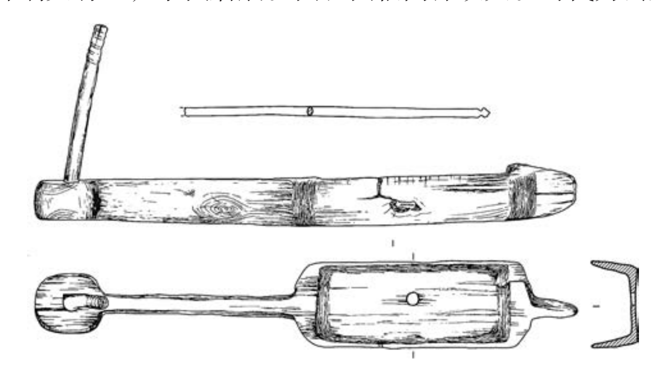
图三　且末 M14N：27 实物图及线图
1. 实物图　2. 线图



图四　且末 M14J、I：20 实物图及线图
1. 实物图　2. 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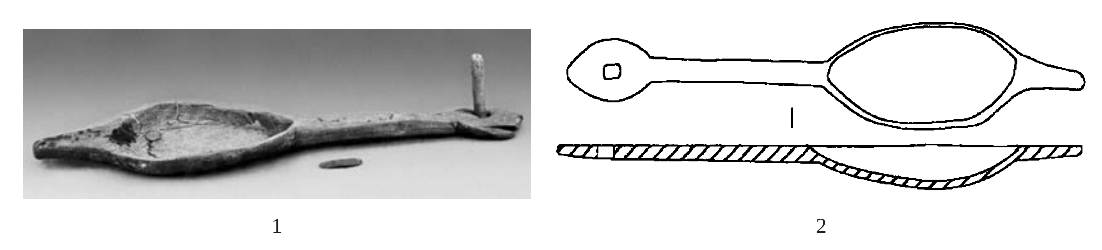
迹。杆尾插入颈首的卯眼内，以木楔加固，露出卯眼的弦杆部分截面呈椭圆形。时代为公元前 5 世纪[11]。

鄯善 M263：1（图五），音箱长方形，底部中间有圆形发音孔，箱尾长出呈船舵形，颈和音箱厚度相等，颈头略宽扁，孔中插弦杆。音箱上蒙皮缺失，仅留固定蒙皮的木卯钉孔，两边各存 5 个。弦杆端头有道，系弦磨痕。弦和弦轴同样缺失。时代为公元前 7 世纪[12]。



图五　鄯善 M263：1 线图

吉尔赞喀勒 M14：2（图六），一端为音箱呈瓢状，另一端为凿有一方孔的椭圆形弦柱盘，内插弦柱。同时伴出有两件木配件，一为圆柱状，一为三棱形。三棱形配件一



图六　吉尔赞喀勒 M14：2 实物图及线图

1. 实物图　2. 线图

端较尖，一端较圆钝[13]。箜篌没有遗留弦；琴杆无孔洞及其他残留。时代为公元前 7~前 6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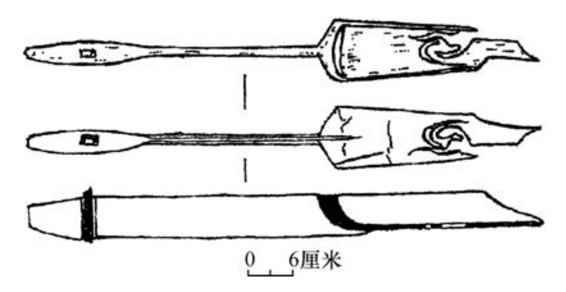
哈密艾斯克霞尔 M27：1（图七），音箱、琴颈、弦杆完整，琴弦缺失。音箱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中腰内收、两端略宽。音箱外口尚存少量蒙皮残片。上口外沿存一圈木铆钉，共计 25 个，穿透外壁。音箱底部中间有一“B”字形音孔，音箱尾端有尾舵形突起。琴颈呈长条状，近音箱一端上部刻凿了 7 个锯齿状装饰。琴颈首为柱状加粗结构，中心处凿方形卯孔。卯插结构用小木楔固定。弦杆为圆柱状柽柳木。弦杆与琴颈夹角为 79° 左右。杆首有 5 道系弦痕。时代为公元前 7~ 前 6 世纪[14]。

（3）保留音箱或（部分）颈或（部分）弦杆，较残缺。12 件。由胡杨木制成。

且末 M2：105（图八），音箱和颈连为一体，音箱残，弦杆残缺严重。音箱呈梯形，头部稍窄，音孔镂刻成花纹形。颈部直，截面呈长方形，安装弦处稍宽，弦杆孔呈长方形。时代为公元前 5 世纪[15]。



图七　哈密艾斯克霞尔 M27：1 实物图



图八　且末 M2：105 线图

和田山普拉箜篌（图九），残存长方形音箱，音箱前端有一凸起、上钻孔眼，后端似颈部位置的中部刻槽。与鄯善、且末颈部为长方形木、无刻槽的箜篌有较大区别。音箱侧壁有蒙皮痕迹，琴颈、琴杆不确定。时代为汉代[16]。



图九　和田山普拉箜篌实物图

哈密艾斯克霞尔 M1：3，仅存琴颈及少部分音箱，残存木铆钉或钉孔 4 个。琴颈呈长条状，琴颈顶端有枣核形加粗结构，顶端中心有长方形卯孔，未凿透。无弦杆。颈首底部与卯孔相对处有木钉 1 个，猜测可能用于加固卯插结构。

哈密艾斯克霞尔 M9：3，仅见音箱和琴颈，音箱残损，无弦杆和琴弦。音箱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音箱内腔呈长方形，内壁有明显刻凿痕。音箱尾端有尾舵形装饰。琴颈呈长条状，一侧隐约可见浅刻划纹。颈首为圆角方形加粗结构。中心有方形卯孔用于安装弦杆。器表未经打磨。

哈密艾斯克霞尔 M17：26，仅存琴颈首端及部分弦杆。这是目前唯一一个琴颈和弦杆一体，由整块胡杨木制成的例子，运用了树枝枝丫的原本生长状态，应是树木主干部分为琴颈、枝干部分为弦杆。虽无需卯插结构，却保留了卯插处加粗的特点。颈应为长方体，卯插加粗处为柱状，弦杆与琴颈夹角为 80.5°。琴表平整，打磨光滑。

哈密艾斯克霞尔 M26：3，仅存音箱尾端，音箱应为长方形。尾端有尾舵形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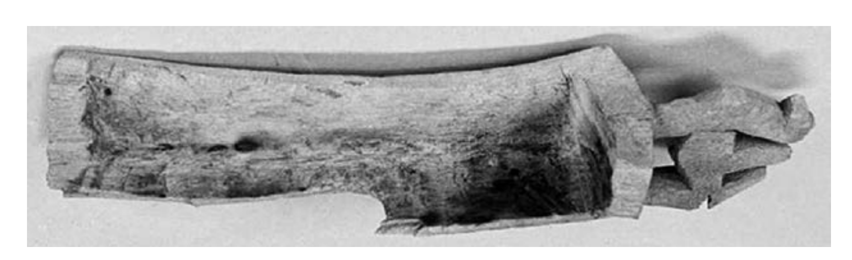
哈密艾斯克霞尔 M53：2（图一〇），仅存音箱和琴颈，弦杆和琴弦缺失。音箱横截面呈梯形，尾端有较小的尾舵形凸起，与琴颈衔接端一侧刻两个卷云纹，另一侧装饰五个横向排列的“八”字纹。箱底有“V”字纹，与“八”字纹可连接。音箱底部近琴颈端有一截由琴颈延伸而来的脊，附近有浅刻的动物纹样，线条简单。音孔似“八”字形。琴颈旁侧、底侧均饰波浪纹。两侧各有一个钻木取火留下的圆孔，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不具备乐器功能，是钻木取火的残留。颈首为枣弧形加粗结构，中间有方圆形卯孔。器表打磨光滑，装饰丰富。



图一〇　哈密艾斯克霞尔 M53：2 实物图

哈密艾斯克霞尔 M61：3，仅存部分音箱，音箱横截面呈长方形，底部有脊状造型，内底有刻凿痕迹。口部蒙皮已缺失，残留木铆钉及钉孔共计 14 个，蒙皮方式应为用木铆钉固定。音箱底部有由底向内刻凿的“V”形音孔。音孔旁边靠近尾端一侧有同样大小和形状的刻纹，但不确定是装饰还是拟开音孔的刻痕。音箱尾刻有尾舵形装饰，下部略垂。

哈密艾斯克霞尔 M63：1（图一一），仅存部分音箱，音箱横截面为长方形。口部



图一一　哈密艾斯克霞尔 M63：1 实物图

蒙皮已失，未见木铆钉或钉孔，蒙皮方式应为粘连。音孔位于音箱底中间位置，残存圆弧状。内壁残留有刻凿及火灼痕迹。音箱尾端雕刻有双峰驼形装饰。骆驼虽线条简单，但十分生动矫健，昂首挺胸，驼峰高耸，腹部圆润，下肢粗壮。音箱表面打磨平整、光滑。

哈密艾斯克霞尔 M78：1（图一二），仅存音箱和琴颈部分，音箱横截面为圆角长方形，内壁有刻凿痕迹。蒙皮缺失，箱体未见木铆钉或钉孔，蒙皮方式应为粘连。音箱底中部有一“V”字形音孔，由底向内刻凿，仅小部凿穿，呈外大内小状。音箱尾端有尾舵形装饰，与其他装饰（一整块）不同的是，“船舵”分上下两块。琴颈呈长条状，颈首有柱状加粗结构，中心处凿有方形卯孔。孔内残留弦杆尾端。器物经打磨，器底平直。



图一二　哈密艾斯克霞尔 M78：1 实物图

哈密艾斯克霞尔 M94：4，仅存部分音箱和部分琴颈，蒙皮缺失，上口外沿有铆钉孔 3 个，孔距 15 厘米以上，推测蒙皮方式为粘连和木铆钉固定相结合。音箱尾端有尾舵形装饰，下部略垂。琴颈呈长条状，琴身外表经过加工修饰。

哈密艾斯克霞尔 M99：7，仅存长条状琴颈，琴颈首端有柱状加粗结构。中心有方形卯孔。

哈密艾斯克霞尔 M1：3 等 10 件哈密艾斯克霞尔箜篌时代均为公元前 7~ 前 6 世纪。这几件出土实物，将箜篌传入我国的时间提早到了公元前 7 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二）研究回顾

1. 新疆出土箜篌的形制与渊源

关于我国箜篌之研究多集中于形制、种类与流传三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又相互关联。依照如今较通行的德国音乐家萨克斯和奥地利音乐家霍恩博斯特尔提出的乐器分类法（HS 分类法）[17]，竖琴分为弓形、角形及框架形三种基本形式。这三种基本形式在发展、流传过程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名称与变种，传至我国被称为“箜篌”，并引发了关于此类乐器类型划分的争议。

日本学者冈本彰一提出箜篌有亚述式和埃及式两个系统。田边尚雄则明确了正仓院箜篌源自亚述的 harp[18]。林谦三在 20 世纪通过对图像与文献材料分析，将中

国箜篌分为卧箜篌、凤首箜篌（弓形箜篌的一类）、竖箜篌三种，后两者均为竖琴。其有关三种箜篌形制的界定及分别源自中国、印度、亚述的论断[19]，多为中国学者认可和引用。

牛龙菲整理敦煌壁画中所出的箜篌材料，进一步阐述了三分论的观点，认为古波斯弓形竖琴有两种变体，一种为“chang”即后来的“harp”，也是中国文献的“竖头箜篌”；另一种“vin”即后来印度的“vina”，是中国的“凤首箜篌”，两者原始形状无太大区别，主要在于 harp 的琴弓分化为音槽与肘木，以肘木插入音槽，vina 则保持了猎弓原型[20]。

《中国音乐词典》认为竖箜篌与西方的竖琴相似，在汉代时由西域传入。凤首箜篌的形制与竖箜篌相同，因饰以凤首而得名，自印度与缅甸传入，是弓形竖琴的一种[21]。《中国乐器大典》则将角形箜篌与凤首箜篌均收入竖箜篌条目之中[22]。《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则将除卧箜篌外的凤首箜篌与竖箜篌均归入竖式箜篌[23]。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拉文格林（Bo Lawergren）认为弓形箜篌在公元前 4000 年后产生于伊拉克和伊朗，后从印度传至中国，角形箜篌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产生[24]。

在新疆出土箜篌实物后，学界对于箜篌的认识加深。王子初认为，中国图像材料中所见弓形箜篌与凤首箜篌不完全相同，应独立成为“第四类箜篌”，而新疆出土的箜篌音箱与美索不达米亚弓形箜篌相似，琴颈较长且弦杆有弧度，应属弓形箜篌，源于西亚[25]。贺志凌则根据新疆箜篌弦杆与音箱呈角形夹角，认为其属于角形箜篌（竖箜篌的一种），源于亚述角形竖琴[26]。谢瑾对比了新疆箜篌与印度竖琴，认为新疆箜篌具有弓形与角形相融合的趋势[27]。何芳也提出且末箜篌与古代西亚竖箜篌属于同一系统[28]，王博则认为且末箜篌与弓形箜篌、竖箜篌都有相似之处，但琴颈缺少过渡关系，难以寻到美索不达米亚箜篌与且末箜篌之间的演化过程[29]。

事实上，新疆箜篌弦杆与颈间形成接近垂直的夹角，弦杆仅见一例有弧度（即且末 M14J、I∶20），其他弦杆基本均为笔直，且不似琴瑟般有品，因此，此类乐器应属于弹拨弦鸣的角形竖琴类乐器，归入“竖箜篌”类应无疑问，虽难以确定其具体的演化过程，但中国新疆出土箜篌源于西亚、非本土产生的观点基本被学界所认可。

2. 新疆出土箜篌的调弦方式

新疆箜篌均无轸，对其调弦方式，学界认识不一。王建林比照吐鲁番吐峪沟千佛洞第 20 号窟壁画中一张有六根弦的竖形箜篌，认为紧弦可以通过直接旋转弦杆来调整[30]。而王子初认为，且末的箜篌不可能进步到用弦轸调音的程度，也没有发现使用弦轸的证据，对于且末仅有三根弦的箜篌来说，未必要弦轸调音，很可能为单向松紧的特殊弦扣“绦轸”，但这种方式难以反方向松滑[31]。拉文格林曾提出 7 世纪时中国箜篌的调音方式——由一个套在弦杆上的厚圆圈组成，每根弦分别系在一个圆圈上，通过转动圆圈来改变弦的张力[32]。贺志凌则认为，通过箜篌弦杆首端清晰的弦痕可以判

断，时人是具有调弦意识的，并根据音箱的大小、形状差别会影响箜篌的音质、音量，认为此时的箜篌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33]，但并未深入解释其调弦方式。

可见，大多数研究忽略了新疆出土箜篌的调弦问题，涉及调弦的一些论述都语焉不详。从现有可参考的石窟寺壁画上看，新疆发现的19件箜篌不仅无固定形制，且石窟壁画、乐舞俑中也无可直接对应的实物，我们只能从箜篌作为弹拨乐器的本身特征入手，结合其源（西亚、埃及、希腊、中亚）与流（唐以后中国及日本），并参考图像文献材料，对新疆出土的“箜篌”的乐器性质提出质疑与思考。

二、弦轸之疑

（一）弦轸的必要性

弦轸，是弹拨类乐器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是包括琴轴、绦轸在内的乐器调弦装置。弦轸主要用于固定音高、紧弦调音。凡弹拨类乐器必有弦轸，箜篌也不应例外。

1. 固定音高

没有弦轸的箜篌，其标准音高无法保证，会导致每次弹奏时每根弦音准都不相同。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五度相生律”（即毕达哥拉斯律），创造出了不同音高和音程的关系。而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就记载了三分损益法：

>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34]。

这其实是一种生律的方法。《周礼·春官》：“皆文之以五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35]这是最古的音阶，并要求制作乐器必须遵从十二律。《管子·地员》介绍了如何通过术数的计算来确定中国传统五音“宫商角徵羽”间的音程关系。即先确立一根定音的律管（早期为竹管），四次三等分后，即为81个单位长度，此定为黄钟小素（即宫音）的音调。然后将律管长度三分后加一份，即81乘4/3，得到108单位，定为“徵音”。徵音律管的长度再减少1/3，即108乘2/3，得到72单位，定为“商音”。商音律管的长度再增加1/3，即72乘4/3，得96单位，定为“羽音”。羽音再增加1/3，得64单位，为“角音”。“损”和“益”交替连续运用，音律就得以辗转相生。

《管子·地员》记载的音阶先求上方五度之律（即先“益”），即“上生”，应为徵调式音阶（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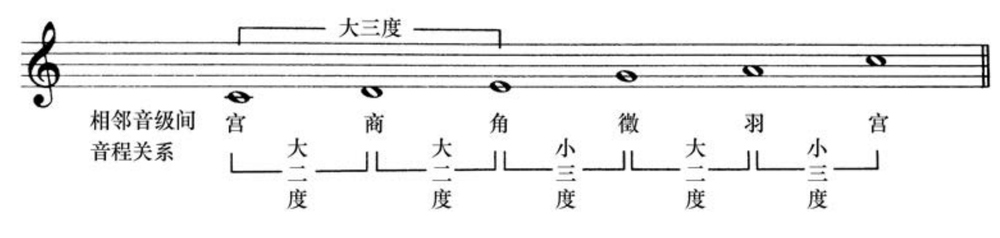
表一 《管子 · 地员》记载的徵调式音阶

传统阶名	徵	羽	宫	商	角
现代音名	g	a	c^1	d^1	e^1
琴弦长度	108	96	81	72	64
长度比例	1	8/9	3/4	2/3	16/27

而与西方唱名结合，采取宫调式，对应如下[36](表二)。

表二 宫调式中传统五音与西方唱名对应表

传统阶名	宫	商	角	徵	羽	宫
现代音名	c	D	e	g	a	c^1
现代唱名	do	Re	mi	so	la	do
长度比例	1	8/9	64/81	2/3	16/27	1/2



图一三 中国传统五音音阶

可以看到，各音程跨度各不相同。《吕氏春秋 · 季夏纪 · 音律》也有以三分损益法对十二律做出完整推算的文字记载。无独有偶，世界各地音乐律制，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律、阿拉伯的“量音学”都与中国的三分损益法在数理上相通。

对此也可从出土遗物上获得实证，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公元前 6000 年前的骨笛，经测音，其为筒音角音的清商六声音阶或筒音宫音的下徵调七声音阶[37]，说明彼时先民已掌握音调与音阶。因此，作为乐器的箜篌必须具备固定的音程关系，若无弦轸，其功能就无从实现。同时，如无弦轸，曲谱就无存在的意义，因为即使规定了拨弦顺序及位置，也无法保证乐声动听，无法保证同一箜篌每次弹奏的旋律相同，更无法保证不同箜篌弹奏的旋律相同，如此，乐器的功能就丧失了。

2. 紧弦调音

凡是弹拨类乐器均靠弦的振动引发音箱的共鸣发声，因此，每一次弦的振动都会造成琴弦一定程度的形变，形变逐渐累积，同样会影响弦的音高，即“音不准”，因此，无论是古琴、古筝、琵琶、钢琴，一定时间后都需要再次调琴。而箜篌作为弹拨类乐器，其弦必然要有一个能使其绷紧的装置，用以在长时间使用后紧弦、调整音准。

因此，没有弦轸的弹拨乐器是无法想象的。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石窟壁画箜篌也有

无轸的情况，然而，从图像资料中很难辨别出弦轸调音的迹象，况且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图录中的龟兹壁画、柏孜克里克第 48 窟壁画中凤首箜篌等有明显的用来调音的弦轸[38]。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图像也不如实物更具说服力。

（二）无轸箜篌

从新疆出土的 18 件器物来看，在弦轸和演奏问题上具有几个疑点，具有讨论的必要。

（1）琴颈、弦杆分制，弦杆插入琴颈之中，各箜篌卯眼形状不同，并以木楔加固。从实物来看，琴颈和琴杆之间是可以分离的，而相接处的卯眼有椭圆形（图四）、圆形（图二）、方形（图六、图八）等，弦杆则均为圆柱体，甚至且末 M14J、I：20 还在卯眼里增加了木楔用以加固。因此，即使琴颈与琴杆可分离，也并不像前述学者认为的可通过旋转弦杆来调弦，弦杆是有意识地固定在琴颈处上的。

从乐理来看，除非弦杆只系一根弦，否则旋转弦杆无法实现调弦的目的，因为以同样幅度转动琴杆来紧弦会造成音高的不规则变换。前文已说明，古代的三分损益法产生的五音音阶采用宫（do）商（re）角（mi）徵（so）羽（la）五音，五音间音程分别是大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而十二平均律则是将一个八度的音程等分十二份，每一份是一个半音，两个半音是一个全音，相较五音音阶多出 fa 与 si，do 至 si 七音级间的音程为全—全—半—全—全—全—半，相隔的距离并不平均。因此，即使音阶不同，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以同幅度旋转琴杆无法实现调整音高的目的。

（2）琴体经修整，弦杆有弯曲的情况。且末 M14J、I：20 的音箱外壁打磨光滑，内壁也有刃器加工的痕迹，但琴杆却较粗糙，截面为圆形，靠近卯眼的部分则为椭圆形，带有明显的折痕，为何不用直的柽柳木？天然弯成的角度也无法正确调音。而如果说是有意为之，如王子初猜测这件箜篌是仿照弓形而制，但同墓中出土的另一件箜篌（且末 M14N：27）弦杆是直的。

（3）各箜篌间夹角、音箱形状及大小、音孔形状与位置均不相同，似无定制。这几件箜篌大小各异，琴身各部分的大小也无固定比例，这会致使各乐器间音色各不相同。哈密艾斯克霞尔 M17：26 的琴颈和弦杆甚至均由整块的胡杨木制成，夹角即是天然的树枝夹角，未经整饬。音孔的位置、形状及大小影响音箱的空气容量和面板的振动波节图形，从而影响琴的音量大小与声音品质。即使彼时箜篌形制还不固定，但标本之间也并未表现出演化关系。且末 M2：105 的音孔甚至镂刻成花纹形状（图八），似乎有装饰的意味。

（4）个别箜篌呈现出特殊的使用痕迹。哈密艾斯克霞尔 M53：2 的琴颈旁侧及底侧均装饰波浪纹，且两侧各有一个钻木取火留下的圆孔，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不具备乐器的功能（图一〇）。

（5）弦杆无孔洞，除弦痕外无任何残留痕迹。琴杆无孔洞，就说明不存在一个类似

于弦轸的装置。而根据“清晰的弦痕”而判断其具有调弦意识的逻辑也有问题，因为仅仅将弦紧紧拴系在弦杆上也会留下弦痕，不能以此确定“有无调弦装置”。

王子初认为且末箜篌仅有三根弦，不必使用弦轸调音，使用单向松紧的特殊弦扣“绦轸”即可。但一方面，这一调琴方式仅为针对公元前5世纪的且末箜篌个案的解释，无法解释年代更早的鄯善五弦箜篌（公元前7世纪）或后世的多弦乐器；另一方面，使用“绦轸”调弦也会留下相应的痕迹。在鄯善箜篌中甚至出土了一根残存的琴弦，以牛筋腱或羊肠制成，但这根仅存的琴弦末端也并未发现有“绦轸”的痕迹，因此，这一假说目前也无证据证实。同时，就一弦一轸来看，弦少，乐器的音域就窄，应更需要轸来定音变调。

无论是“绦轸”调音，还是如拉文格林所说在琴杆一侧用“圆圈”来调琴，都是参考其他地区箜篌的调弦方式做出的推测。因此，我们也有必要结合新疆箜篌的“源”与“流”进一步探讨。

三、寻找弦轸

文献与以往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本土的竖箜篌源于西亚的竖琴（harp，又作 lyres，即“里拉”，译为箜篌或竖琴），流至日本。追其源流，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探究与新疆出土乐器相似的箜篌之调弦方式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参考的案例。

（一）源：西亚、埃及、希腊与中亚所见箜篌

1. 西亚（美索不达米亚）

竖琴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之一，由远古的猎弓演变而来。最早的箜篌实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4000年后期，西亚两河流域出现了弓形箜篌；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角形箜篌也随之出现[39]。20世纪上半叶，西亚的两河流域乌尔（Ur）城遗址中出土了9件弦乐器残件，其中5件可以修复[40]。《图片音乐史》中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如1件乌尔第一王国的银里拉琴，年代约在公元前2450年，相当豪华精美，应并非是箜篌的雏形。从出土原状和复原图中（图一四）可获知，这件箜篌已经有了调琴的装置，由11根银薄板包裹的木制小棒作为弦轸，成为调律的工具，木棒腐朽较严重，因此连同银管一同粘连在了弦杆横木上，横木上残存银管锈蚀的黑印，出土时，黑印上还有丝织物的残留附着。可见弦没有直接固定在弦杆横木上，可能是绑缚于银管上，银管再通过纽状织物与弦杆固定在一起[41]。这里译著用“らしい”（表示推断、传闻、委婉判定）说明此系弦方式也只是作者的推断，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箜篌已具备了较成熟的调音构造。结合另一件乐器的附板图案（图一五）来看，每根琴弦应以一种丝绦织物将轸木固定于琴杆之上，通过旋转来调音。

到了古巴比伦时期，在浮雕中也出现了弹奏箜篌的图像，年代从公元前1950 ~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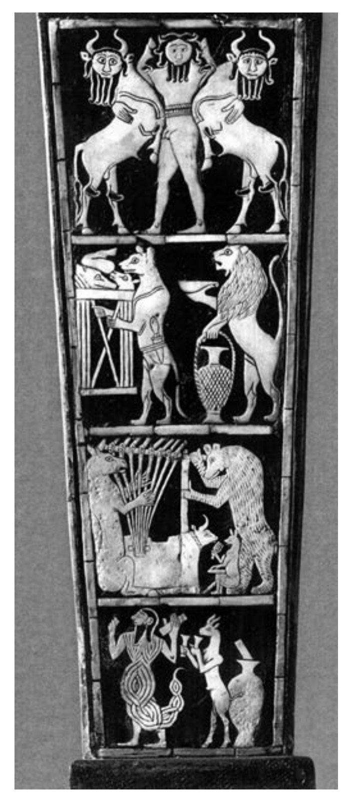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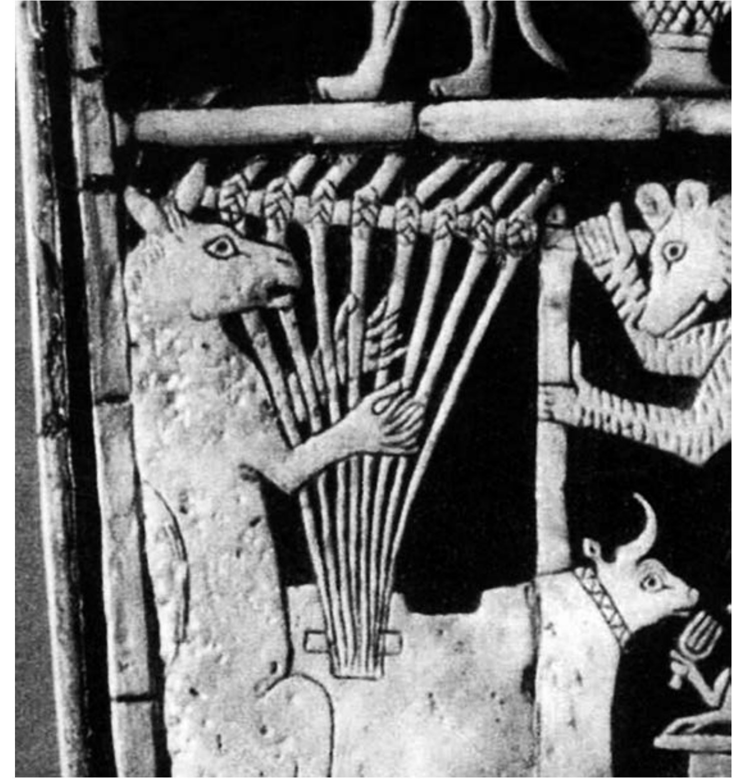
2

图一四　乌尔城遗址出土的银里拉琴

1. 出土原状　2. 复原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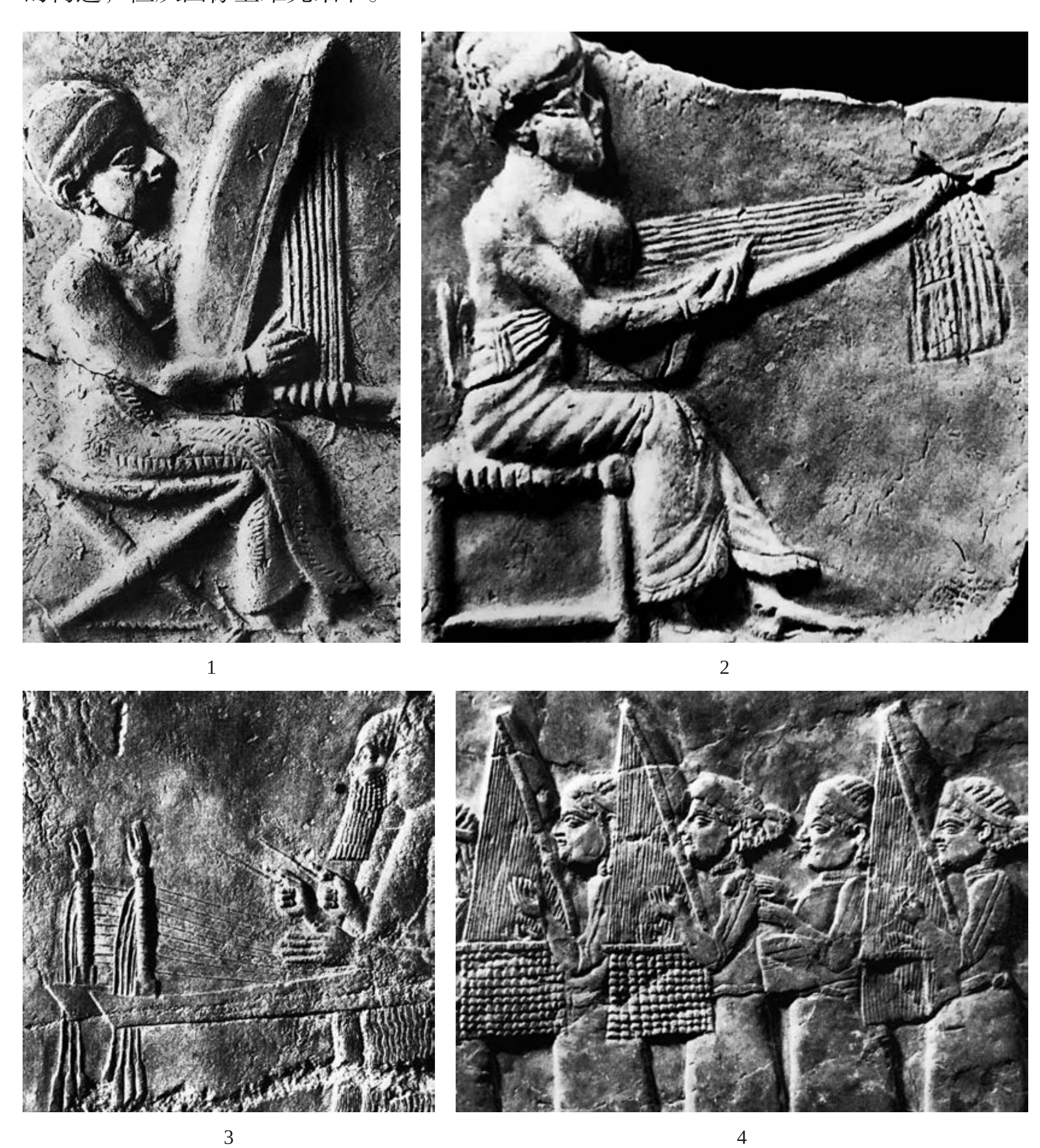


2

图一五　乌尔王陵出土乐器的附板图案

1. 附板上的“动物乐队”图案　2. 箜篌细节图

1530 年至公元前 668 ~ 前 627 年，疑似调音的装置分别有弦杆部分明显粗于琴弦的环形装置（图一六，1）、弦杆处的穗或流苏状坠子（图一六，2 ~ 4）[42]，有些类似于“绦轸”的构造，但从图像上难究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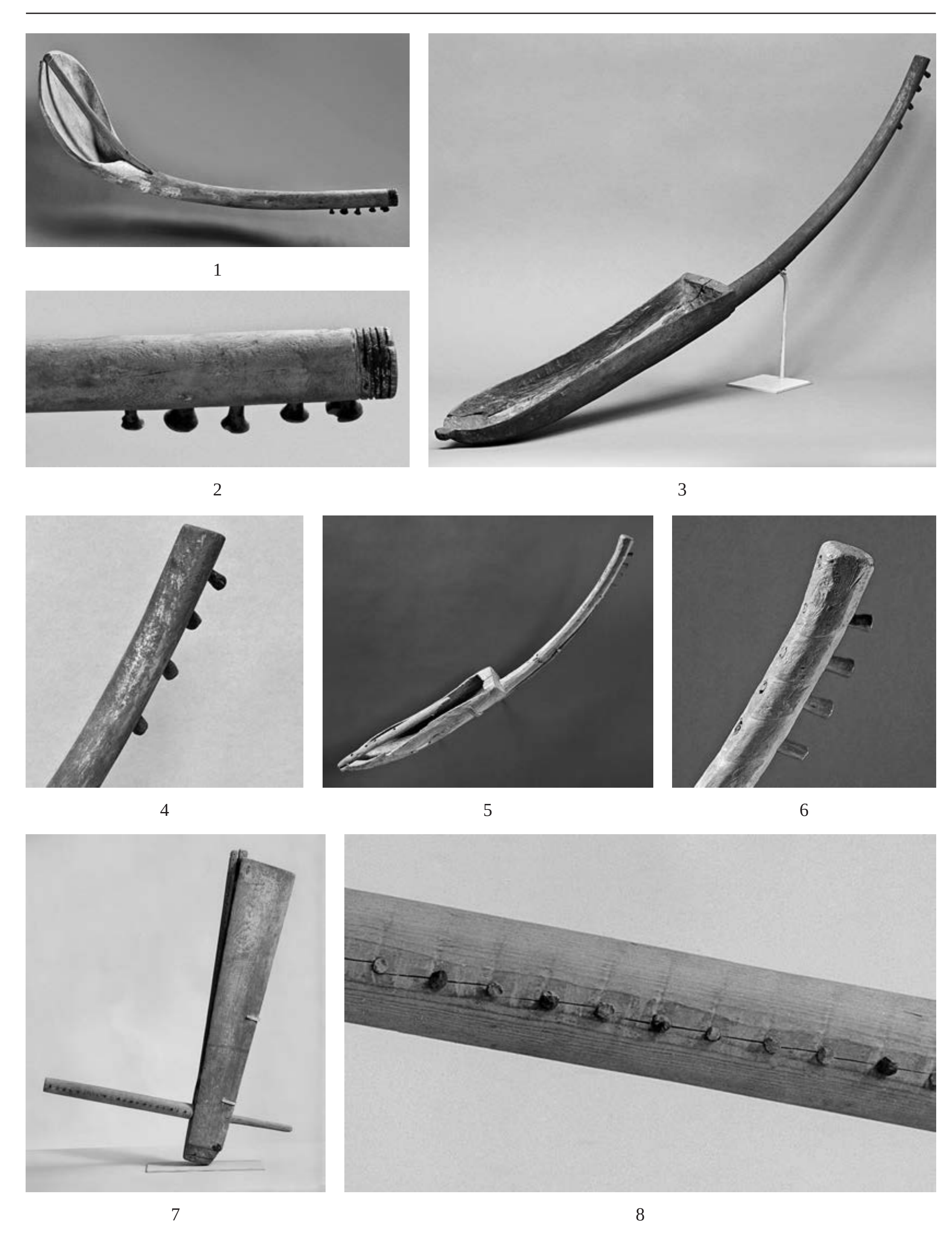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一六 巴比伦与亚述浮雕所见箜篌

1、2. 古巴比伦时期浮雕（前 1950 ~ 前 1530 年） 3. 新亚述帝国辛那赫里布时期尼尼微王宫浮雕（前 704 ~ 前 681 年） 4. 新亚述帝国巴尼拔时期尼尼微王宫浮雕（前 668 ~ 前 627 年）

2. 埃及

在埃及，年代最早的实物是出自公元前 2030 ~ 前 1640 年的中王国时期底比斯的 1 件



图一七　埃及出土箜篌及弦杆位置图

1、2. 古埃及第 12 王朝箜篌及弦杆（前 2030 ~ 前 1640 年）　3、4. 古埃及第 13 ~ 18 王朝箜篌及弦杆（前 1700 ~ 前 1450 年）
5、6. 古埃及第 17、18 王朝箜篌及弦杆（前 1580 ~ 前 1295 年）　7、8. 古埃及第 26 ~ 30 王朝箜篌及弦杆（前 664 ~ 前 332 年）

弓形箜篌（图一七，1、2），琴杆上已经有了调琴的 5 个弦柱。在埃及卢索克市德拉阿布埃尔纳加山（DraAbuel-Naga）出土过 1 件公元前 1700 ~ 前 1450 年的第二中间期到新王国早期的箜篌（图一七,3、4），其音箱与新疆箜篌十分相似，但弦杆直接连于音箱，上有 4 个弦柱，表明其包含四根弦，能够通过弦轸来调弦。在底比斯的停灵庙（Deir el-Bahri）的祭司墓葬中也出土过 1 件箜篌（图一七，5、6），年代在公元前 1580 ~ 前 1295 年，也有着清晰的可转动的 4 个弦轸来调弦。与现代的调弦方式已极为相似，还有 1 件年代在公元前 664 ~ 前 332 年的箜篌（图一七，7、8），弦杆上有清晰的一排木楔，用以系弦调弦[43]。这类弦柱样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埃及开罗博物馆藏的数件箜篌也与之有相同的调弦装置[44]。

埃及壁画中出现的箜篌也都包含用以调琴的弦轸，如第 18 王朝的墓葬壁画中出现的弓形与角形箜篌，弓形箜篌与实物相同，用弦柱调弦（图一八，1、2），而角形箜篌从图画上看（图一八，3），与新亚述帝国时期尼尼微王宫的浮雕相似，应是用一个类似于流苏或木条的装置调弦。

3. 希腊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Neapel Museo）馆藏彩绘陶罐中曾出现了希腊箜篌的图像（图一九），根据音箱与弦杆的角度判断，应为角形箜篌，一位乐师正在拨弦演奏[45]。箜篌的琴弦系于弦杆之上，而弦杆的上方和下方分别各有两列半环形装置，应是使用类似圆圈状的调琴装置。

4. 中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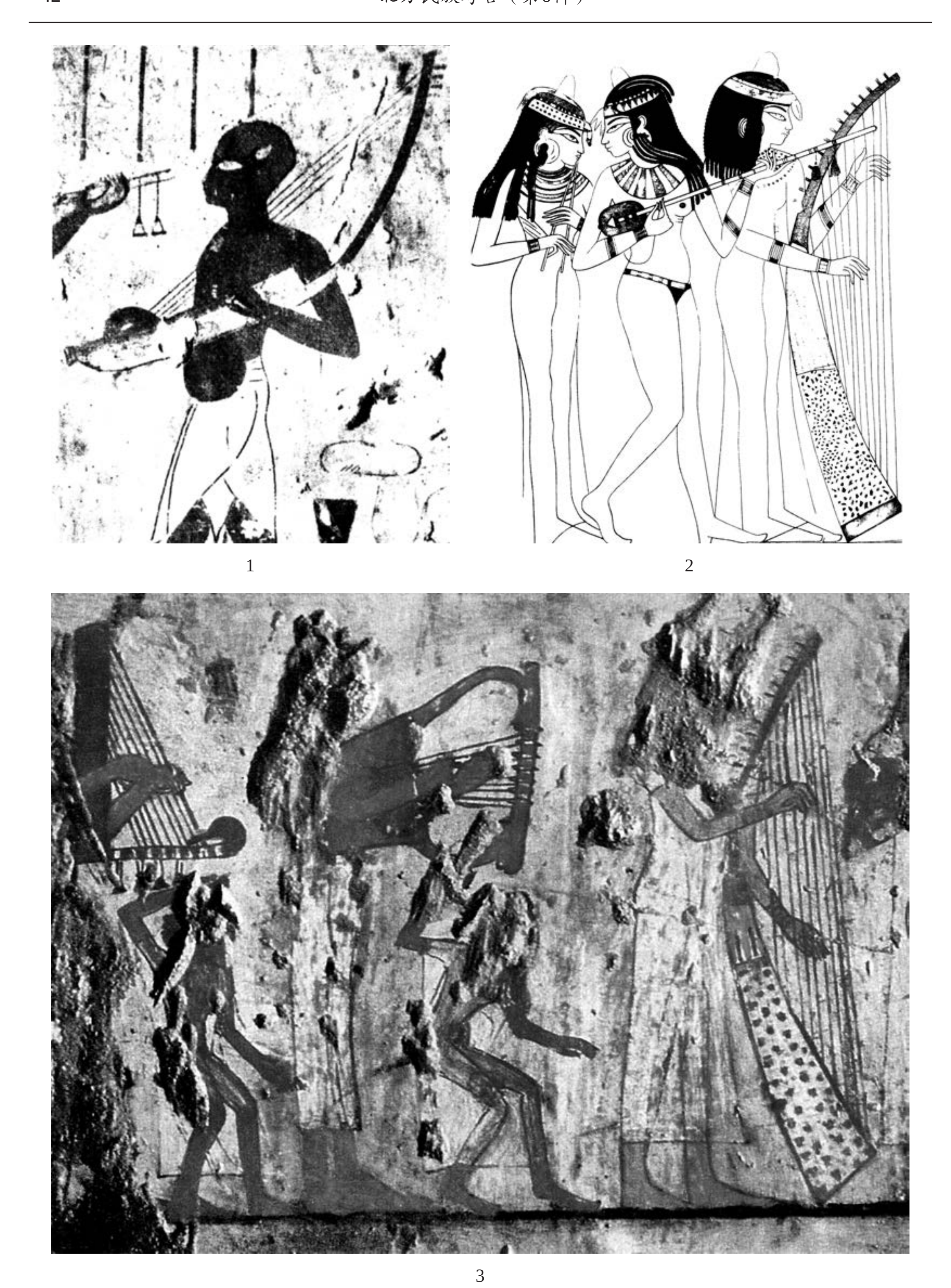
波斯统治两河流域和埃及后，箜篌经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近东地区的弓形箜篌基本被角形箜篌替代，但弓形箜篌成为印度主要的弦乐器[46]。

巴泽雷克墓葬曾出土 1 件公元前 5 世纪的角形箜篌，与新疆出土箜篌实物在时间、地域上较为接近，但形制有别，而与亚述竖琴更为相似。琴上有一个呈倒置“T”字形的三角棍（图二〇），其上有 5 个水平、深色的皮带，是每根琴弦的调音带，用于调音紧弦，出土时可见皮带印记[47]。然而，即使此件乐器已经复原，学者仍对琴弦绑缚到琴杆上持有疑问。

（二）流：唐以后中国与日本所见箜篌

1. 中国

竖琴在公元前 7 世纪由中亚传入西域，后传入中原，随后逐渐变迁，出现了大小箜篌之分，一直流传至清。与竖箜篌相似的乐器大量出现在所见的历朝壁画、雕塑、文献中，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能够找到一些案例，公元 9 世纪新疆吐峪沟 20 窟壁画的 1 件竖箜篌下端有丝绦状物（图二一，1），绑缚到弦杆之上，而甘肃、山东等地唐



1　　2

3

图一八　埃及壁画所见箜篌

1. 18 王朝初期墓室壁画局部（前 1425 ~ 前 1405 年） 2. 18 王朝那赫特墓室壁画《三个女音乐家》（前 1425 ~ 前 1405 年） 3. 18 王朝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墓葬壁画（前 1450 ~ 前 14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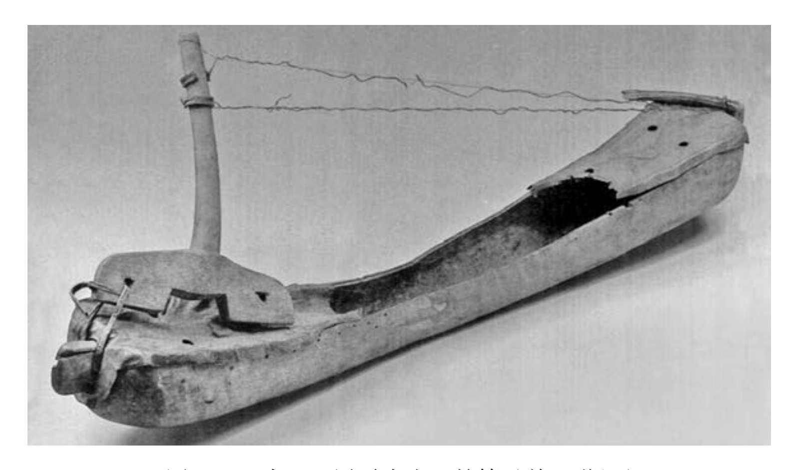
代图像上的竖箜篌则采用类似流苏的丝绦将弦绑缚至弦杆上（图二一，2、3），既有紧弦的功用，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清代文献中的小箜篌则采用拧转式调弦法，与现代箜篌的调音方式更为接近[48]（图二一，4）。



图一九　希腊陶器彩绘所见箜篌（前 5 世纪）

2.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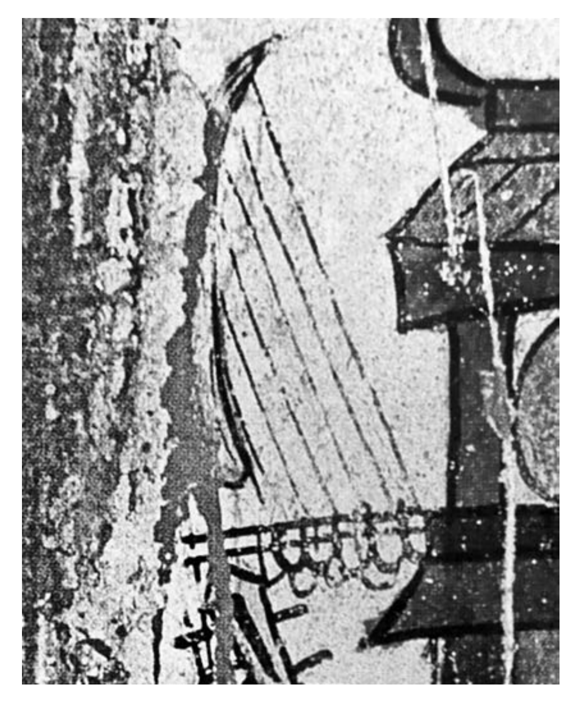
至迟到隋唐，中国箜篌先后传入朝鲜、日本[49]。在日本东良大寺的寺院中，至今还保存着两架唐代箜篌残品：漆箜篌和螺钿槽箜篌，它们的外形与新疆出土的竖箜篌大体相同。据《正仓院的乐器》中的图片及文字记录，这两件箜篌的构造大体相同，只是横木及调弦方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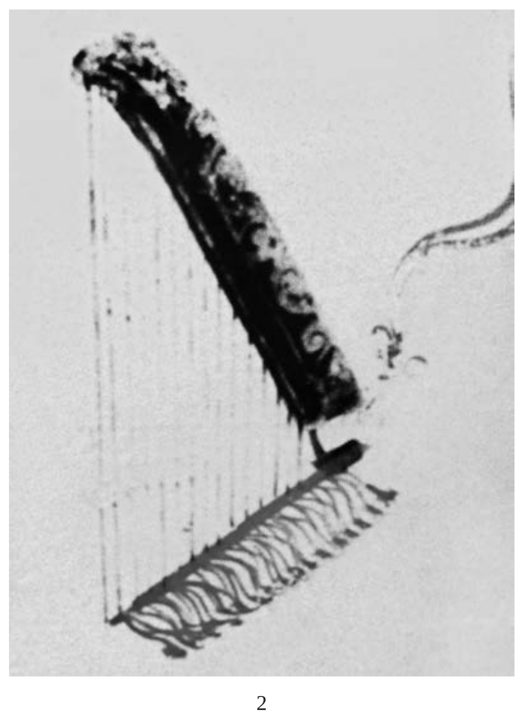
图二〇　中亚巴泽雷克出土箜篌（前 5 世纪）

螺钿槽箜篌是以“绦”通过鋲（即凸起的钉），使绦轸拉紧。另外，有残存的一条“绦轸”，即用五色丝绒编成的绦辫，用它作为调弦的转。弦的一端结在弯骨（在音箱一端）上，调弦的轸在肘木一侧，弦穿过鋲结在绦轸上，再把绦轸缠在肘木上，以缠得松紧来调节弦音的高低。绦轸多余部分垂下作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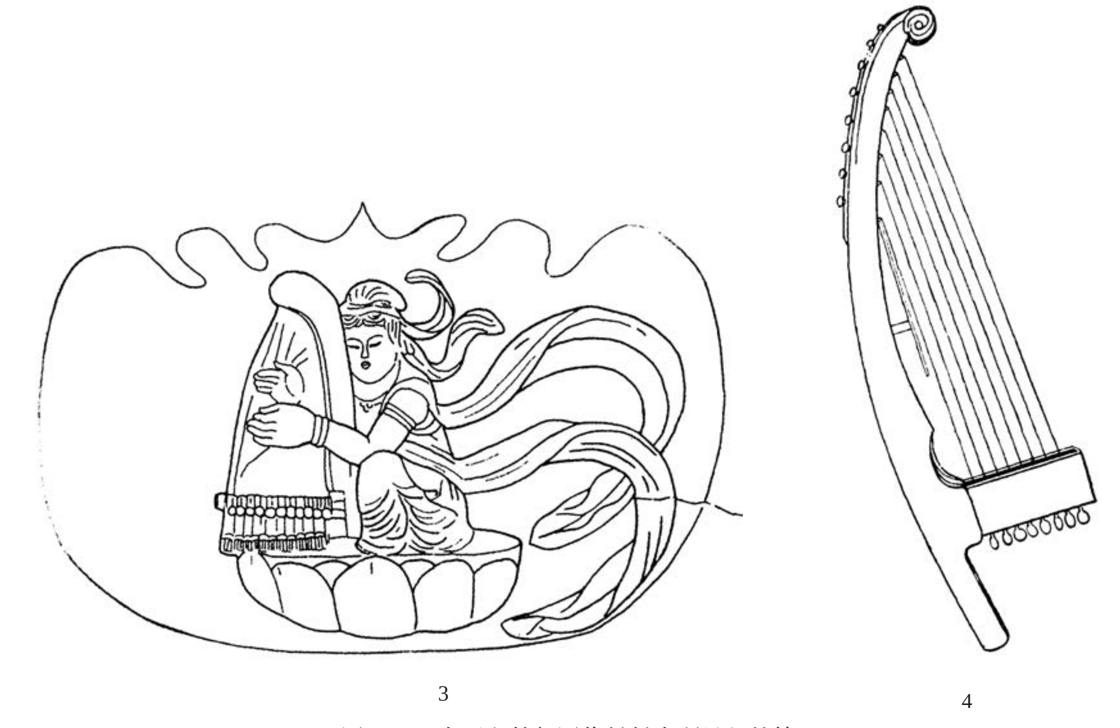
漆箜篌的肘木则由 23 个“鋲”孔及 23 个“轸”孔构成，调弦方法是把弦经过肘木上的鋲，再紧缠在轸的轴上，通过转动轸轴来调节弦音，与现代调弦方式更为相似。两箜篌的轸部断面如图二二[50]。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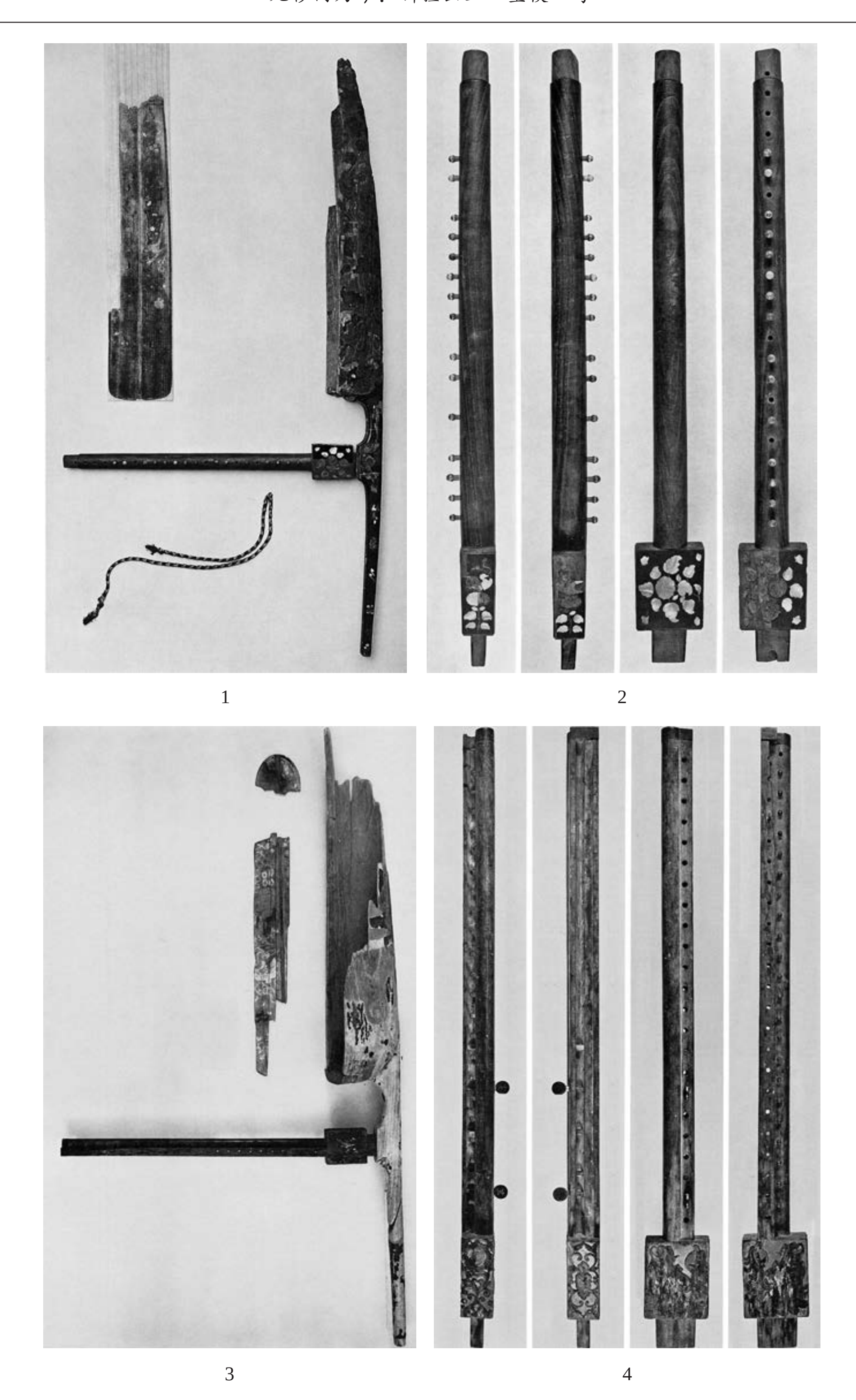


3　　4

图二一　中国文献与图像材料中所见竖箜篌

1. 新疆吐峪沟 20 窟不鼓自鸣乐器图局部（9 世纪） 2. 甘肃敦煌莫高窟 172 窟不鼓自鸣图局部（唐）

3. 山东济南神通寺伎乐石刻基台北 8 号箜篌乐伎（唐） 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小箜篌（清）



1 2 3 4

图二二　日本正仓院箜篌

1. 螺钿槽箜篌　2. 螺钿槽箜篌軫部四面　3. 漆箜篌　4. 漆箜篌軫部四面

总结上述的“源”与“流”，在西亚、埃及、中亚、日本等地所出土的箜篌实物中，都存在调弦的装置；而西亚、埃及、希腊、中亚、中国的图像（或文献）材料中，箜篌也存在调弦的迹象，调弦方式大致可分以下四类。

（1）弦系于弦轸上，弦轸卯插入弦杆，以类似现代的木制弦轴式轸旋转调弦。此类见于埃及箜篌实物（图一七，1～3）、埃及壁画（图一八，1、2、3右侧）、中国文献（图二一，4）、日本正仓院实物（图二二，2）。此种调弦方式，在弦杆上会有孔洞，也会有木制弦轴伴随箜篌出土。

（2）以絛轸（或结合鋲）的方式紧弦。见于西亚巴比伦与亚述浮雕（图一六，2～4）、埃及箜篌实物（图一七，4）、埃及壁画（图一八，3左侧）、中国图像材料（图二一，2、3）、日本正仓院实物（图二二，1）之中，这种紧弦方式是用将弦系于絛轸、再将絛轸系于弦杆的方式进行调音，因此，弦杆上遗留的应是絛轸遗迹，而非琴弦痕迹。弦杆上会伴有鋲孔与鋲（图一七，4；图二二，1）。

（3）琴弦系于一环状（即拉文格林所指“圆圈”）装置之上，通过转动圆环调音。见于西亚巴比伦与亚述浮雕（图一六，1）、希腊陶器彩绘（图一九），这一方式从图像上来看并不十分确切，如中国新疆吐峪沟壁画所见箜篌局部（图二一，1），可能是由于艺术创作，这类细节经过了处理。而唯一的实物——中亚巴泽雷克箜篌（图二〇）则很可能是采用皮带进行调音。此种调音方式在弦杆上不会遗留琴弦的痕迹，而会遗留此“环状物”的痕迹，如巴泽雷克弦杆上的皮带残迹。

（4）弦系于弦轸上，弦轸通过丝织物与弦杆固定，通过转动弦轸调弦，与第一类类似，但弦轸与弦杆的连接方式不同。见于西亚乌尔城遗址的出土实物（图一四，1、2）与乌尔王陵出土乐器的附板图案（图一五，1、2）。此种调琴方式会有弦轸伴随箜篌出土，也可能会留下丝织物痕迹（图一四，1）。

通过梳理箜篌的流传与形制可以发现，无论采用哪种调弦方式，都会留下相应的痕迹。然而，出土于我国新疆的19件箜篌却无一存在此类痕迹。既然中国的竖箜篌源于西方，为何传入我国后，箜篌的形制反而倒退，失去了弦轸呢？退一步而言，即使新疆出土的箜篌并非源自西亚，但作为一件拨弦乐器，没有定音、调音的装置也是无法想象的。

溯源穷流，都无法寻得能够与新疆出土的箜篌相似之物，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当时当地，人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调琴方式，或选择了特殊的材质作为调弦装置；然而，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墓葬中出土的此类器物并非实用乐器。

四、新疆箜篌：随葬明器与宗教法器

严格地来说，没有弦轸装置的“箜篌”同样能够弹奏，但乐音绝不会动听，音域窄，音量小，曲调单一且无固定的音调，仅仅是一种简易的“发音体”，不可能当作乐

器使用。

针对新疆出土的箜篌，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疑问：怎么使用？谁来使用？为何使用？当然，如果对第一个问题“怎么使用”的认识出现偏差，之后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量。若此“箜篌”非乐器之用，那么就可能是作为随葬明器或祭祀用器而存在。结合出土箜篌的情况，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有助于认识此类箜篌的相关信息。

（一）谁来使用？

1. 鄯善洋海墓地：贵族或萨满巫师

公元前7世纪的鄯善M90：12所属的墓葬中，有两位死者，其中木床上为一名45～55岁的男性，西南角还有一名30岁的女性，女性的骨骼堆放在一起，疑为二次葬或坐姿葬，显然，墓主应为这位男性。与箜篌同出一件木盆和一件草编篓，其中木盆装有捣碎的大麻籽叶，位于西南角女性尸骨旁，盆应为臼，经长期使用底部变薄；而草编篓则盛满绿色大麻叶片和籽种，位于东南角墓主人头侧[51]。由于大麻在洋海的这批墓葬中并非常见，因此，我们并无充足理由证明当时的人有广泛吸食大麻的传统，那么这座墓葬的墓主身份就有两种可能：①贵族或统治者；②巫师。

第一种可能的身份即为贵族或统治者。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地，与箜篌共出的器物中，还包含了吸食大麻的烟具，格里亚兹诺夫指出，此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墓主人应属部落首领及夫人[52]。而鄯善洋海墓地与此情况相似。

第二种可能的身份则是巫师。大麻具有麻醉、止痛、致幻的效用，而萨满教中巫医不分，很可能使用大麻来为病人麻醉止痛，或是作为萨满“脱魂和附体”而通神的方式。《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记述：

> 一种神灵临时感召的表现方式是神树或神苗的应用……在乌干达，术士为了得到神的感召，用烟斗猛烈抽吸烟草，直至如醉如狂程度，这时他的高昂激动的言谈，被人们相信是神通过他说出来的谕言。印尼爪哇东北的马都拉岛上，准备接受神灵附体前的女巫坐在香炉前面，吸入烟气，渐渐陷入昏迷状态，面容歪扭，猛烈痉挛，尖声叫喊，据说这时神灵已降附在她身上[53]。

这种行为失控、意识错乱的状态，和吸食大麻的症状可谓如出一辙。《神农本草经》载：

> 麻贲，味辛平。主五劳七伤，利五藏，下血，寒气，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54]。

麻贲即带壳的大麻仁，可见这种见鬼、狂走、通神明、轻身的使用反应也早已被古代先民认知。鉴于该墓葬中的大麻不仅有叶片和籽种，还有木盆中捣碎的成品（甚至位于木盆位置的跪姿女性似乎正是在辅助墓主研捣大麻），应可作为萨满巫师收集、加工大麻以治病或通神的证据。同时，这批墓葬中还发现了死后颅骨穿孔习俗[55]，这也许也和巫师作法有关。

当然，这两种可能性在鄯善墓地中也许并不相互排斥，萨满巫师在社会中本身就拥有较高的地位与特殊的影响力。

鄯善墓地的另一件箜篌 M263：1 所属墓葬则盗扰较为严重，暂未发现可参考的出土器物的背景信息。

2. 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特殊职能人员

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且末箜篌 M14N：27、M14J、I：20 同属 M14，这是一座 19 人丛葬墓，4 名男性成人，11 名女性成人，2 名儿童，2 名性别不明[56]。M14 中随葬品种类繁多，零散分布在各墓主身边，应属其私有物品。出土时，M14N：27 位于成年女性 N 身旁，M14 J、I：20 被放置在女孩 I 和中年女性 J 两个个体的胸部，这两件箜篌显然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或职能的女性的随葬品。

且末 M2：105 所属墓葬也被严重盗扰，丛葬墓中有 27 人，多残缺；箜篌与木箭、木弓、钻木取火器、木纺轮、木鞭杆、木拐杖、木罐等共出，推测其情况应与 M14 类似，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或职能的墓主的随葬明器。

3. 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拜火教教徒或祭司

吉尔赞喀勒 M14：2 所属墓葬中有 5 人（3 男 2 女），随葬品丰富，有木制火坛和钻木取火的工具，且有燃烧过的痕迹；仅在 M14 中出土了作为引火木棍的柳树枝条，成排数以几十计。同时，该批墓葬地表的东方一侧有大面积黑白石条带、尸骨曾短时间暴露于地表，软组织被处理干净后随即入葬、出土了象征火文化的随葬品，多种证据都指向了墓主也许信奉拜火教[57]。而且仅有 M14 中出土了箜篌和大量的引火工具，可能也昭示了 M14 在这批墓葬中的特殊地位。鉴于阿姆河宝藏的金片上出现了拜火教祭司手持引火棍的形象[58]，那么这座包含了大量引火棍的墓葬，安葬的甚至可能是拜火教祭司。

（二）为 何 使 用?

既然大麻的存在昭示了墓主的特殊身份，那么此时乐器的使用就带有一种象征性的寓意了。对一个无轸的简易“发音体”来说，被置于一个神圣化、阶级化的墓葬之中，很可能是作为随葬的明器或巫师的法器来使用的。

1. 明器

作为随葬的明器，乐器在此的意义主要是其象征性，而不在于是否能发出动听的乐音。《礼记·乐记》：“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59]可见，乐器在古先民眼中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意味。无独有偶，《周礼·春官》中小师、视瞭、磬师、笙师、镈师等章节多次记述了以乐器随葬的习俗，“大丧，廞其乐器。及丧，奉而藏之。大旅，则陈之”[60]。指出了在大丧时需要陈设（乐官）所掌管的乐器，到下葬的时候奉送这些乐器到墓穴并葬入椁中，达到事死如生、祈佑逝者安宁、生者太平的目的。

生死有别，幽明两界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明器与人器不同，《礼记·檀弓下》言：

>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61]。

用人器不仁，因而准备明器，“备物而不可用”，反映了面对死亡的务实态度。《荀子·礼论》也提到了明器的虚拟性：

> 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斫，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而不用也。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62]。

因此，箜篌本身“琴弦张而不和”的构造缺陷与“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的本质不约而同，“貌而不用”是也。

2. 法器

无论是鄯善墓地 M90 中的萨满巫师所用，还是吉尔赞喀勒墓地中的拜火教教徒或祭司使用，“箜篌”在此也可能是一种用以超度、祭祀及作法的法器。它只能弹奏简单的音节，奏乐的功能被淡化，仅仅作为一个发音的法器被巫师使用，作为道具来营造气氛。此时的箜篌作为法器的作用并不同于真正意义的乐器，《周易·系辞上》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3]此时的“道”附于“器”，如同宗教象征意义依附于具体器物而存在一样，与器以藏礼、物以载道的思想有相似之处。达文波特指出，

圣与俗的区别就在于器物的艺术附加值，所有的仪式器物都是受托于特定事件，艺术化的器物并非一般化的类型；每一件法器都是独一无二的，区别于日常生活器物[64]。结合西亚、埃及、希腊等地的箜篌实例，新疆出土的箜篌已不属于角形乐器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箜篌应已具备了一定的构造与形制（如调弦装置），因此，新疆墓中所见箜篌也许是彼时通行箜篌的“简易版”，作为“非一般化的仪式用器”用于祭祀或丧葬之中。

另一个可能的案例来自于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的 M53：2。因为发掘资料暂未发表，暂时无法获知更多信息，但从已有零星材料看，箜篌的琴颈旁侧及底侧均装饰波浪纹，两侧各有一个钻木取火留下的圆孔，被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不具备乐器的功能，是钻木取火残留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可能和“拜火”的宗教信仰有关[65]。但因暂无完整的出土背景材料，这件箜篌究竟是废弃后作为其他工具使用，抑或是制造之初即作为宗教“法器”来使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佐证。

新疆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中西的重要枢纽，出土于此的“箜篌”，在西域墓葬文化的语境中，表现出了明器或法器的“非乐器”倾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真的将“箜篌”用于宗教仪式，则萨满教和拜火教均用此作法器，这是否存在着某种借鉴或影响关系？不止于此，包括其他冠以“乐器”之名的古代遗物的定位与文化嬗变，值得我们更多关注。

注　　释

［1］ 世本八种·孙冯翼集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1．

［2］ 世本八种·茆泮林集本·世本论述补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90．

［3］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4．

［4］ 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8：378．

［5］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80．

［6］ 后汉书·志十三·五行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72．

［7］ 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59．

［8］ a．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1（1）：99～166．

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A］．新疆文物教研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下）［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1737～1765．

［9］ 2014 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报告中，对箜篌材质的描述变更为“梧桐整木”，有别于 2003 年的原报告，未有说明，可能因混淆“胡桐”（胡杨之别称）与“梧桐”致误，此处仍以原报告“胡杨”为准。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3（1）：89～136，161～176．

［11］ 同［10］．

［1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A］．新疆文物教研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下）［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1765～1783．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5（2）：229～268．

［14］ a．贺志凌，王永强．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J］．中国音乐，2018（04）：117～122．

b．王永强，党志豪．新疆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考古新发现［J］．西域研究，2011（02）：134～137．下同．

［1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且末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发掘简报［A］．新疆文物教研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资料汇编（中）［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738．

［16］ a．王博．新疆新发现的箜篌［A］．吐鲁番学新论［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b．谢瑾．中国古代箜篌的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7：34．

［17］ 〔德〕汉斯·希克曼，〔伊拉克〕苏比·安韦尔·拉辛德，〔美〕瓦尔特·考夫曼著．王昭仁，金经言译．上古时代的音乐——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的音乐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60．

［18］ a．〔日〕冈本彰一．箜篌雜考［A］．宁乐一五．续正仓院研究［C］．1932．载于岸边成雄．箜篌的渊源［A］．东洋音乐学会编．唐代的乐器［C］．东京：音乐之友社，1979．

b．〔日〕田边尚雄．关于南仓楼上保存的箜篌［A］．正仓院乐器调查报告［C］．日本：帝室博物馆学报第二．载于岸边成雄．箜篌的渊源［A］．东洋音乐学会编．唐代的乐器［C］．东京：音乐之友社，1979．

以上均转自贺志凌．新疆出土箜篌的形制渊源探究［J］．中国音乐学，2006（1）：43～51．

［19］ 〔日〕林謙三．東アジア楽器考［M］．カワイ楽譜，1957．钱涛孙，译．东亚乐器考．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220．

［20］ 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340～349．

［2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209．

［22］ 乐声．中国乐器大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09．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348．

［24］ a．〔美〕Lawergren B.The Spread of Harps Between the Near and Far East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A. D. / Evidence of Buddhist Musical Cultures on the Silk Road [J].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995:233～275.

b.〔美〕Lawergren B.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Early Chinese Qin-Zither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3: 79 ~ 109.

[25] 王子初．音乐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58，159．

[26] 贺志凌．新疆出土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

[27] 谢瑾．中国古代箜篌的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7．

[28] 何芳．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J］．新疆艺术，1998（2）：14 ~ 19．

[29] 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J］．文物，2003（2）：56 ~ 61．

[30] 王建林．龟兹箜篌渊源与结构研究［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4（2）：20 ~ 24．

[31] 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J］．文物，1999（7）：50 ~ 60．

[32]〔美〕Lawergren B．古代箜篌的方方面面［J］．乐平秋译．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28（3）：142 ~ 153．

[33] 同［26］．

[34] 管子简释［M］．济南：齐鲁书社．1996： 417．

[3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第二十五·春官·大宗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42 ~ 845、897．

[36] 童忠良等．中国传统乐理基础教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29．

[3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J］．文物，1989（1）：1 ~ 14．

[38]《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39]〔英〕Bosworth C. E.,〔塔吉克斯坦〕Asimov. M. 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V-Part Two*.［M］．刘迎胜，译．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588 ~ 590．

[40] 同［17］：83，160．

[41] 文字及附图来源，下同．

a.〔德〕Besseler H.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 · II/2 · Mesopotamien* [M], VerlagfuerMusik Leipzig, 1984．转自日译版．ハインリヒ·ベッセラー，マックス·シュナイダー監修．人間と音楽の歴史·第2シリーズ古代音楽·第2巻メソポタミア［M］．東京：音楽之友社，1985．

b．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Report of the Trustees 1966 ~ 1969* [M], London:British Museum, 1969.

[42] 同［39］．

[43] 4件均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参见大都会博物馆公开数据库．Harp [EB/OL].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7-12-28]. https://www.metmuseum.org/search-results#!/search?q=harp．

[44]〔德〕Besseler H.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 · II/1 · Ägypten* [M], VerlagfuerMusik Leipzig, 1975. 转自日译版．ハインリヒ·ベッセラー，マックス·シュナイダー監修．人間と音楽の歴史．第2，シリーズ古代音楽．第1巻，エジプト［M］．東京：音楽之友社，1986：130，131．

［45］〔德〕Besseler H.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II/4·Griechenland* [M], VerlagfuerMusik Leipzig, 1970．转自日译版．ハインリヒ·ベッセラー，マックス·シュナイダー監修．人間と音楽の歴史．第2，シリーズ古代音楽．第4巻［M］．東京：音楽之友社，1985：112，113．

［46］同［39］．

［47］a.Rudenko S.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图版 Musical instrument from barrow 2. a kind of harp．

b．〔美〕Lawergren B．谢瑾，译．巴泽雷克的古代竖琴［J］．音乐研究，2004（2）：94～101．

c．〔德〕Heinrich Besseler.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II/9·Zentralasien* [M], VerlagfuerMusik Leipzig, 1970．转自日译版．ハインリヒ·ベッセラー，マックス·シュナイダー監修．バッハマン，W．編．人間と音楽の歴史．第2，シリーズ古代音楽．第9巻中曲アジア［M］．東京：音楽之友社，1993：50～53．

d. M. П. 格里亚兹诺夫，O. И. 达维母，K. M. 斯卡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塚［J］．考古，1960（7）：63～69．

［48］图像来源自：

a．王子初，霍旭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158．

b．郑汝中，董玉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134．

c．周昌富，温增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52．

d．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乐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9402．

［49］〔日〕林謙三．東アジア楽器考［M］．カワイ楽譜，1957．钱涛孙，译．东亚乐器考．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226．

［50］a．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の楽器［M］．日本経済新聞社，1967：原色图版六，单色图版九三～一一〇．

b．岸辺成雄．天平のひびき：正倉院の楽器［M］．東京：音楽之友社，1984：42，43．

c．袁荃猷．谈竖箜篌［J］．音乐研究，1984（4）：39～44．

［51］同［8］．

［52］M. П. 格里亚兹诺夫，O. И. 达维母，K. M. 斯卡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塚［J］．考古，1960（7）：67．

［53］〔英〕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1，162．

［54］吴普等述．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54．

［55］同［8］．

［56］同［10］．

［57］同［13］．

［58］Dalton O. M.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With Other Examples of Early Oriental Metal-work* [M],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64.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

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15（2）：249.

［59］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 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62.

［60］ 郑玄注，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卷第二十五·春官·大宗伯［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03，904.

［61］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 礼记正义·卷九·檀弓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1.

［62］ 荀况著，杨倞注. 荀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39.

［63］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 周易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60.

［64］ Davenport, William H.Two kinds of value in the Eastern Solomon Islands [A].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106.

［65］ 同［14］.

A Study of Jade Artifacts of the “Konghou” Type Unearthed in Xinjiang

Zhang Yidan

Abstract: As of 2018, there are nineteen jade artifacts of the “konghou” type found in Xinjiang Province,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with the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depicted in murals and described in literature. However, all of these so-called “konghou” have an obvious defect: they lack tuning pegs. “Konghou” lacking devices for fixing pitch lose their basic function as plucked instruments. The tuning system of early harps in West Asia, Egypt, Greece, or Central Asia and its later development in Japan for example, provide further support that the nature of “konghou” found in Xinjiang is debatable. Combined with the unearthed context, literature and ethnology, we can further infer that the “konghou” without tuning pegs unearthed from these tombs should not be classified a musical instrument.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for an alternative tuning method, this article considers jade artifacts of the “konghou” type unearthed in Xinjiang as funerary or ritual objects.

Keywords: Konghou; fixing pitch; tuning; funerary; ritual

蒙古国布尔干省布雷杭盖苏木宝拉格陶勒盖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1]
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2]
（1. 呼和浩特，010020；2. 乌兰巴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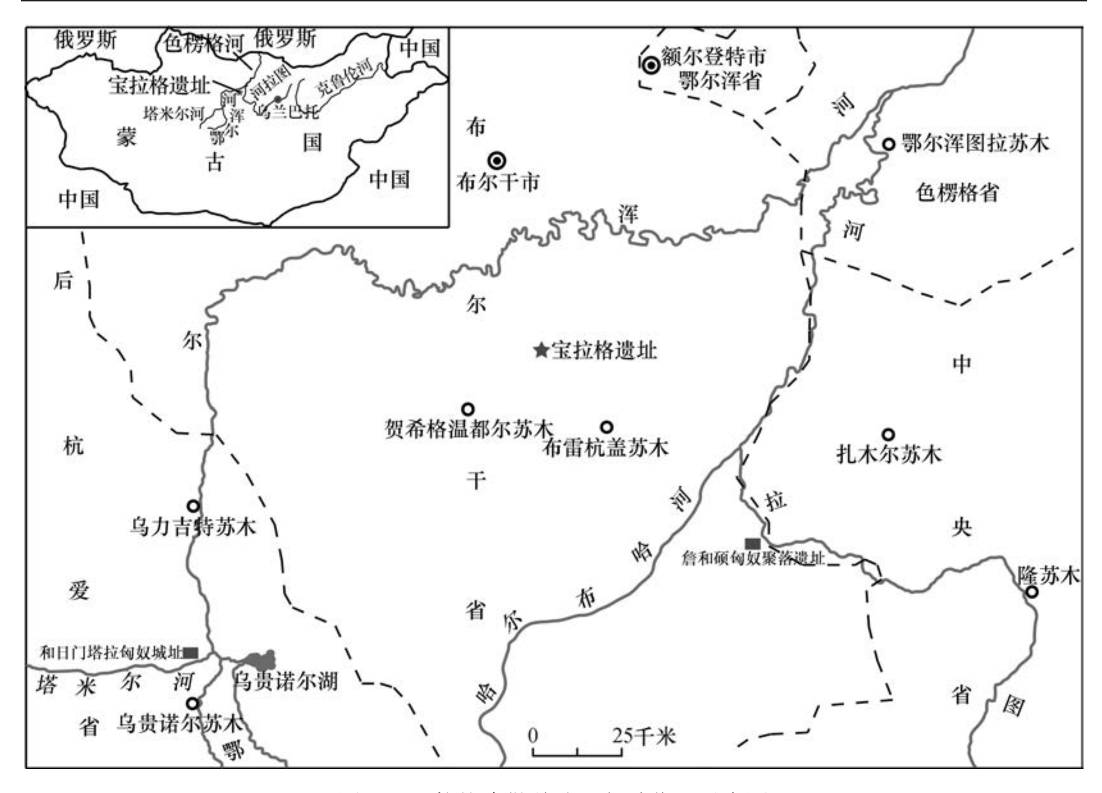
内容摘要：2015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布尔干省布雷杭盖苏木境内的宝拉格陶勒盖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祭祀台基、砖窑、葬马坑等遗迹，其中葬马坑出土了马具、铁矛等随葬品。初步推测这批遗存的年代为突厥、回鹘汗国时期，为蒙古国相关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蒙古国；宝拉格陶勒盖遗址；突厥时期；回鹘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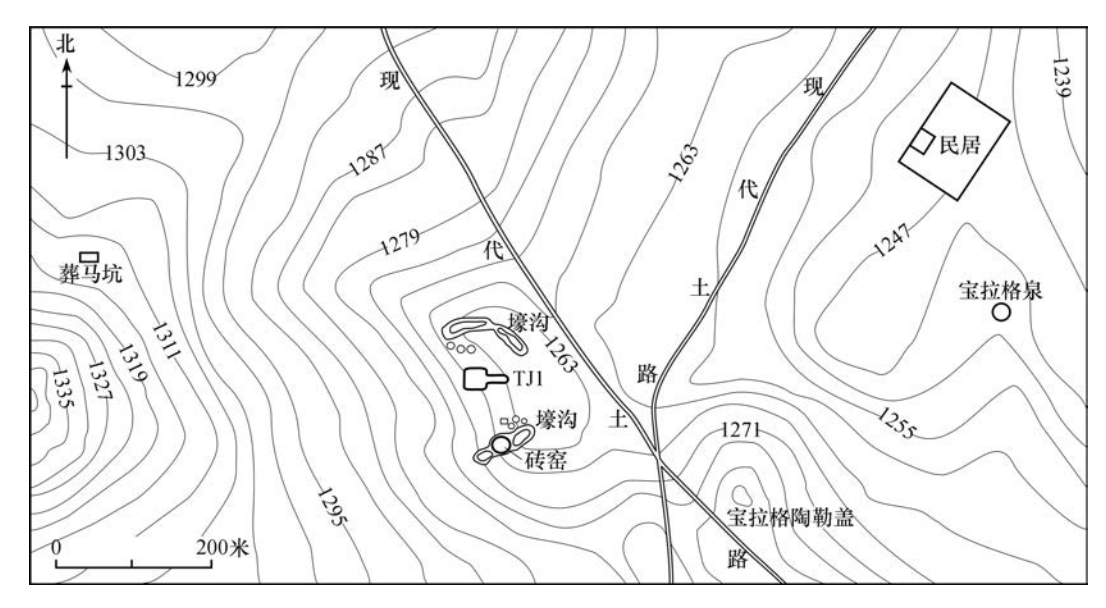
宝拉格陶勒盖遗址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布雷杭盖苏木境内，东南距苏木政府所在地约 26 千米，北距省府布尔干市约 50 千米（图一）。

遗址坐落在一处东向开口的山谷中，北、西、南三面被丘陵环绕。山谷东口外有一条名为肖布特的小河，河水由西南向东北流淌，继而折向北注入鄂尔浑河。河谷东岸，距离遗址东北约 3 千米处为肖布特海日罕圣山，该山为当地的著名地标。遗址所在山谷南侧与西侧的丘陵阴坡上被大面积森林覆盖，主要有樟子松、白桦、黑桦等。北侧的谷地间土壤肥厚，为黑褐色栗钙土，目前被开垦为农田，主要作物为油菜、马铃薯与大麦。山谷东南侧浑圆的小丘陵为宝拉格陶勒盖，丘陵北坡下有泉眼，名为宝拉格泉，系当地人畜饮水的重要水源，遗址因此而得名（图二）。

该遗址最早被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前馆长、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 A. 奥其尔教授发现。2014 年 7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2015 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祭祀台基 1 座、砖窑 1 座、葬马坑 1 座，共计发掘面积 1023 平方米。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宝拉格陶勒盖遗址行政位置示意图



图二　宝拉格陶勒盖遗址周边环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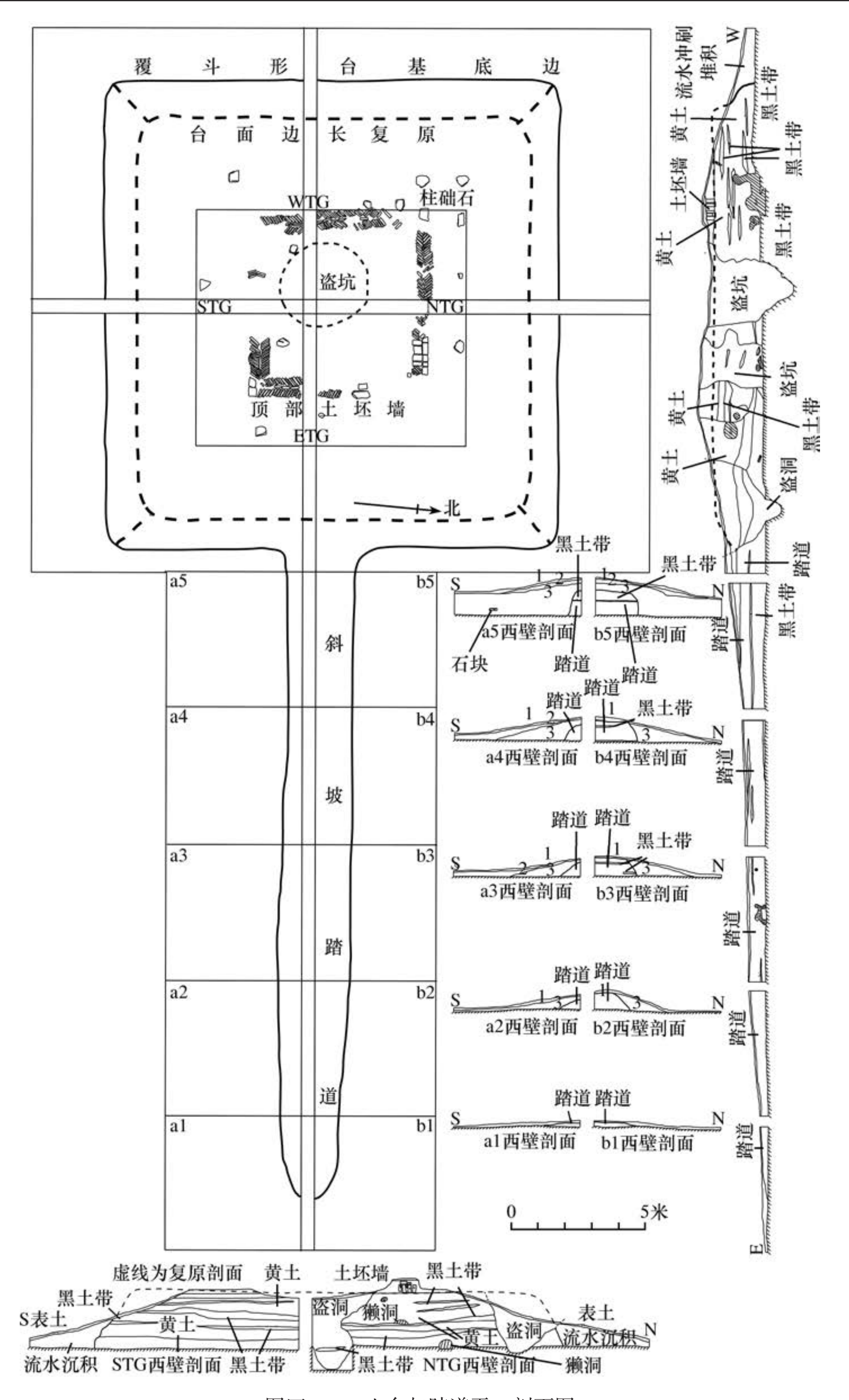
一、祭祀台基

祭祀台基（编号 TJ1）发掘前，土台呈覆斗形，坐西朝东，朝向为 84°，位于山谷中心处，台体东侧居中延伸出一条土垄（图三）。土台顶部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48°22′46.87″，东经 103°41′22.93″，海拔 1272.39 米。土台现存高度约 2.5 米。基底呈圆角方形，发掘前底边长 23 米。顶部不甚平整，平面大致也呈方形。顶部可见多处盗坑，最大的一处位于中央，呈圆形锅底状，开口直径 3.27 米，发掘前深 0.9 米。东侧土垄长 25 米，宽 5 ~ 7 米，东低西高，高 0.1 ~ 1.5 米。土台南北两侧各有一道壕沟。土台与南侧壕沟相距 72 米，与北侧壕沟相距 57 米。南侧壕沟长 78 米，北侧壕沟长 116 米，开口最宽均为 11 米。地表未发现陶片等人工遗物。发掘前根据遗址所在地形与遗迹地表形制等初步判断，该土台为一处带封土与墓道的大中型墓葬。



图三　祭祀台基（南—北）

2015 年 6 月 28 ~ 8 月 21 日，通过布探沟与探方，平、剖面相结合发掘揭露，发现该处土台遗址并非墓葬，而是一座带有踏道的覆斗形台基（图四）。土台为平地起建，系用黄色土与褐色土堆筑而成，土层薄厚不均。发掘后，基底基本呈圆角方形，东西长 17.2、南北长 16.9 米。土台顶部平整，平面呈圆角方形，边长约为 14.5 米。台面居中位置有一周土坯垒砌的矮墙遗迹，垒砌方法为人字形立砌，矮墙平面基本呈方形，东



图四　TJ1 土台与踏道平、剖面图

西长 7.5、南北宽 7 米。土坯规格为 38 厘米 × 28 厘米 × 6 厘米（图五）。台面上的土坯墙四角分别放置扁平石块，根据石块的形状和位置推测系柱础石（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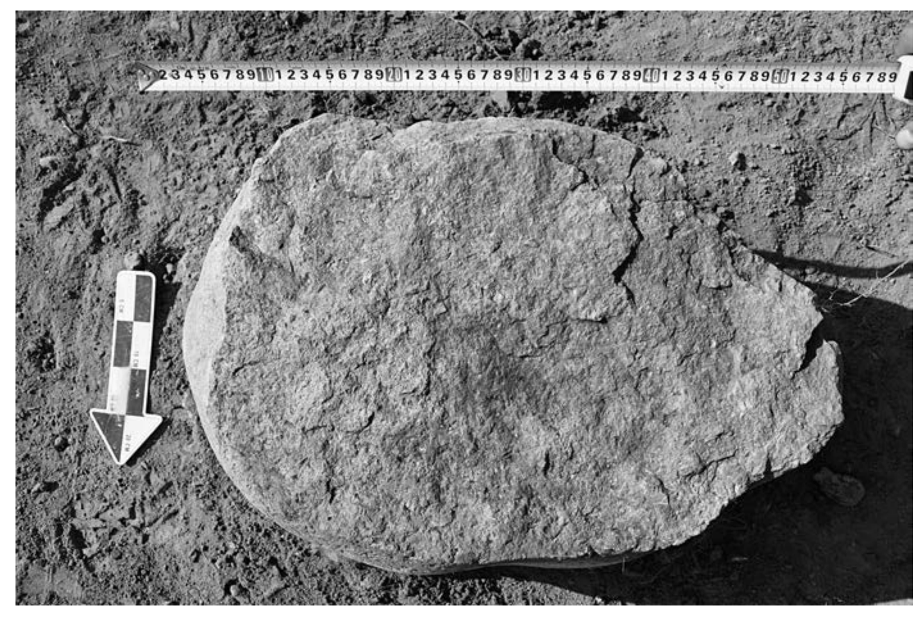
台面顶部中央的盗坑最深为 3.16 米，底部打破生土，上层堆积内出土晚近藏传佛教擦擦 1 件及大量的现代生活废弃物，据当地牧民反映，该处盗坑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土垄用黄色土堆垒而成，土层中夹杂褐色土，推测应为长斜坡形踏道，长 24.1 米，横截面为梯形，基底宽 2.5 米，顶宽 1 ~ 2 米，高 0.1 ~ 1.5 米。推测台基南北两侧的壕沟应由于为堆垒土台取土而形成。



图五　人字形立砌土坯墙

二、砖　　窑

砖窑（编号 Y1）位于台基南侧壕沟的西端，发掘前发现地表有一处凹陷区，其中有细碎的红色砖屑分布。经布方发掘，揭露出一座保存较好、坐西朝东的砖窑址。该窑址由窑室、窑门、窑外操作坑等组成（图七）。



图六　柱础石



图七　砖窑（Y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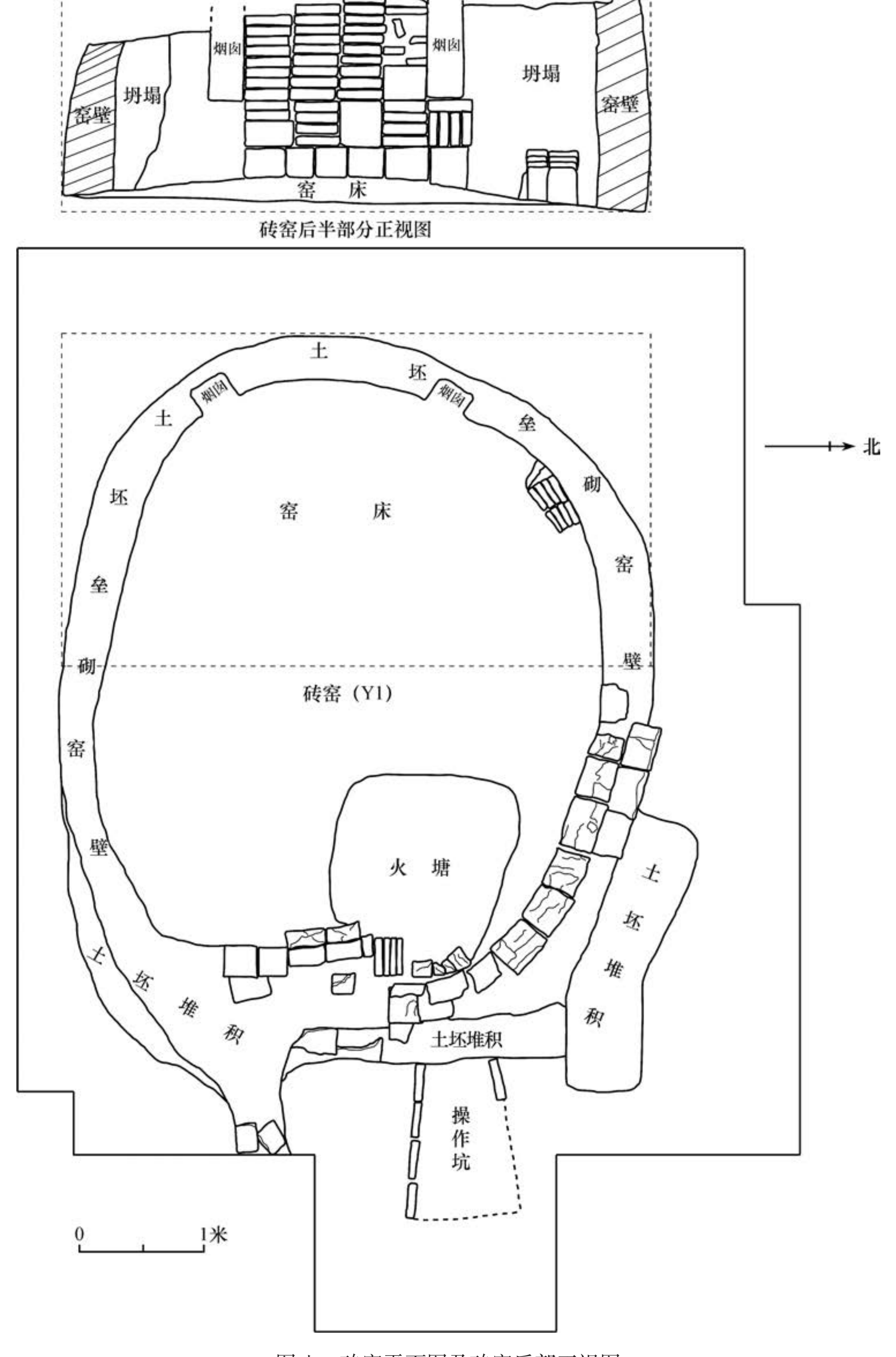
窑室建于低于地表的土圹内，用土坯垒砌窑壁和券顶。窑室平面呈椭圆形，东西径 4.5、南北径 4.1、窑壁厚 0.4 ~ 0.7 米。窑室内前方，窑门入口处有火塘，平面近椭圆形，长径 1.6、短径 1.4、深 0.4 米，内部填满灰黑色草木灰，遗留大量木炭屑。窑床位于窑室后半部，窑箅已经坍塌，形成 0.15 米厚的黑灰色土堆积。烟囱位于窑室后壁的两侧，宽 0.3 米，烟囱底部离窑床 0.75 米。窑墙保存情况较差，高 1.15 ~ 1.85 米。门内北侧保存较好，保留了 20 层土坯垒砌的窑壁。第 14 层向内摆放 3 ~ 5 厘米，以上开始向内逐渐收进起券，推测该窑应为馒头形。门内南侧保留了 11 层平砌的土坯，高 1.5 米，土坯因为烧砖时的高温烤炽已氧化成砖红色。窑壁西南部宽约 2 米的窑壁坍塌，残高 1.45 米。窑门正对的西壁，保留了 13 层土坯，窑壁残高 1.8 米（图八）。

窑壁的多数土坯并未错缝垒砌，土坯间用厚 2.5 ~ 4 厘米的泥土黏结糊缝，局部泥土可见手指抹痕（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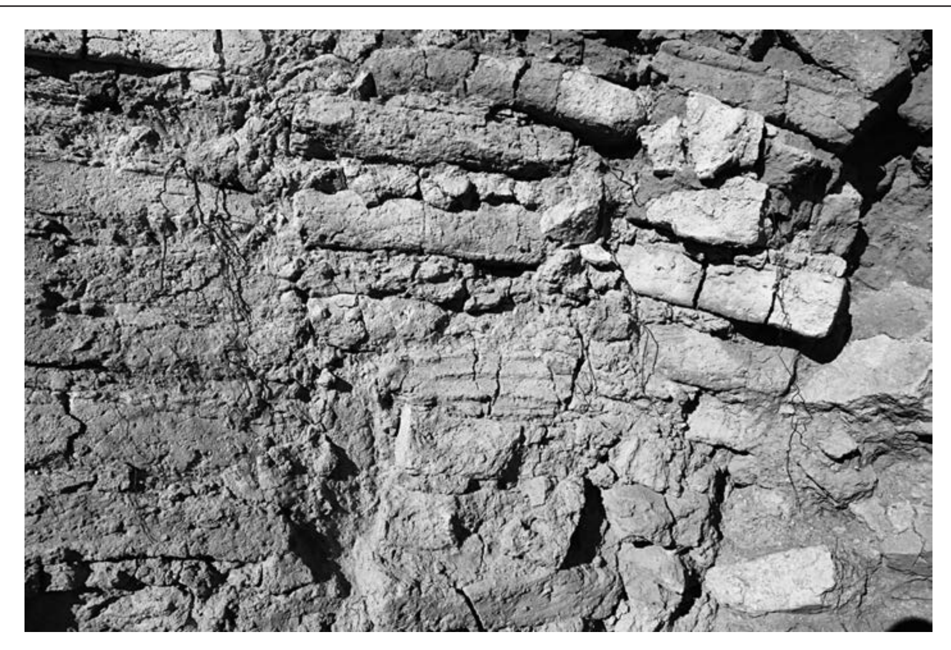
窑门位于窑室的东北方向，拱形券顶门，宽约 0.75、高约 1.8 米，门内填满了倒塌的土坯和熟化而成的残砖（图一〇、图一一）。

操作坑位于窑门外，平面呈长梯形，长 1.3、宽 0.66 ~ 0.94 米，内填草木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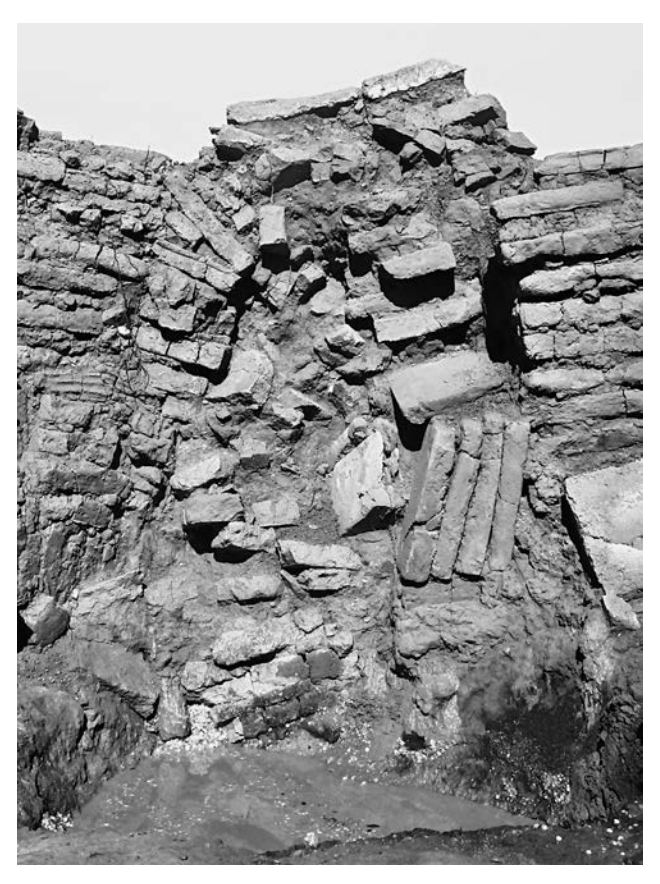
窑内出土的砖规格不一，可能为几种模具托坯而成，大多为 38 厘米 ×28 厘米 ×6.5 厘米，这些砖的规格与土台顶部的土坯规格相同。此外，还有 37.5 厘米 ×26 厘米 ×7 厘米、35 厘米 ×23 厘米 ×6.5 厘米、35 厘米 ×24.5 厘米 ×6 厘米、34.5 厘米 ×22.5 厘米 ×6 厘米等形制。大多数的砖正面有手指纹，背面有草痕，可能系直接放在草地上托成。部分砖的正面还刻划花纹与符号（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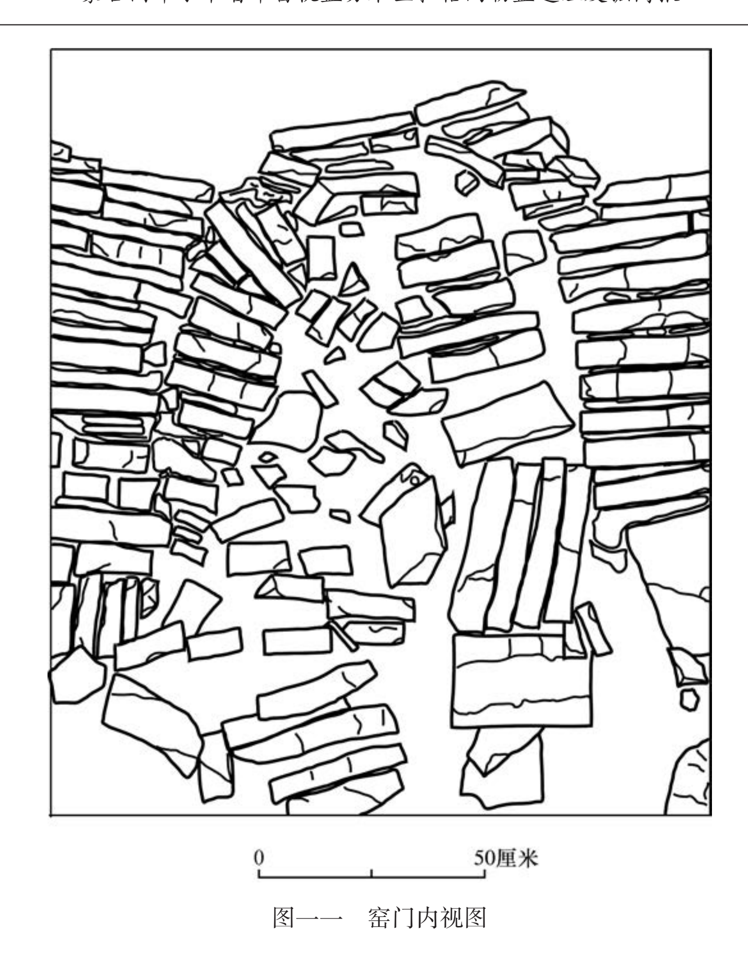
图八 砖窑平面图及砖窑后部正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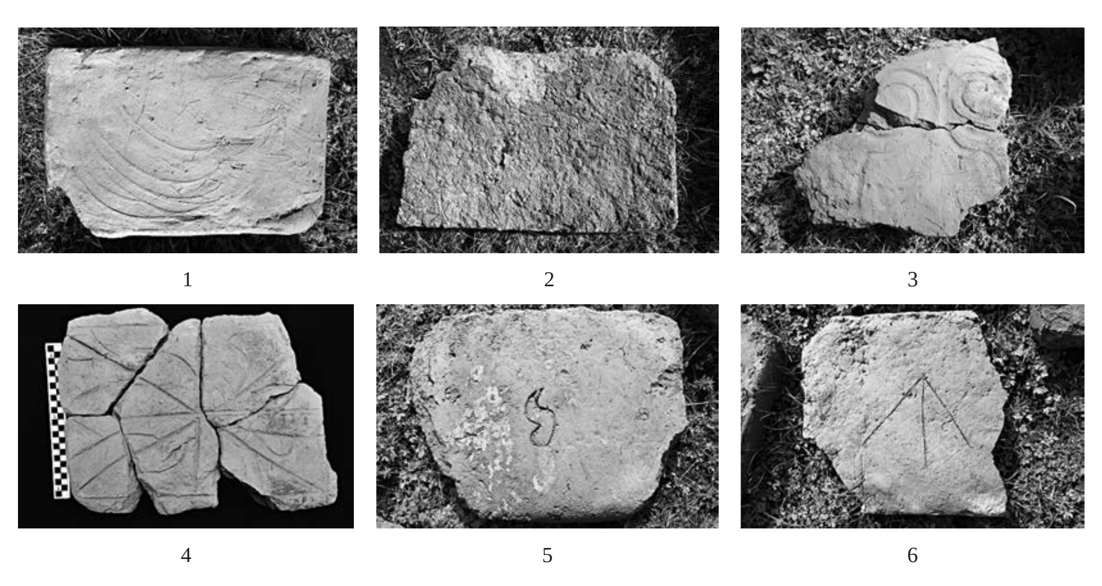
图九　砖窑窑壁泥土上的手指痕



图一〇　窑门内视照片



图一一　窑门内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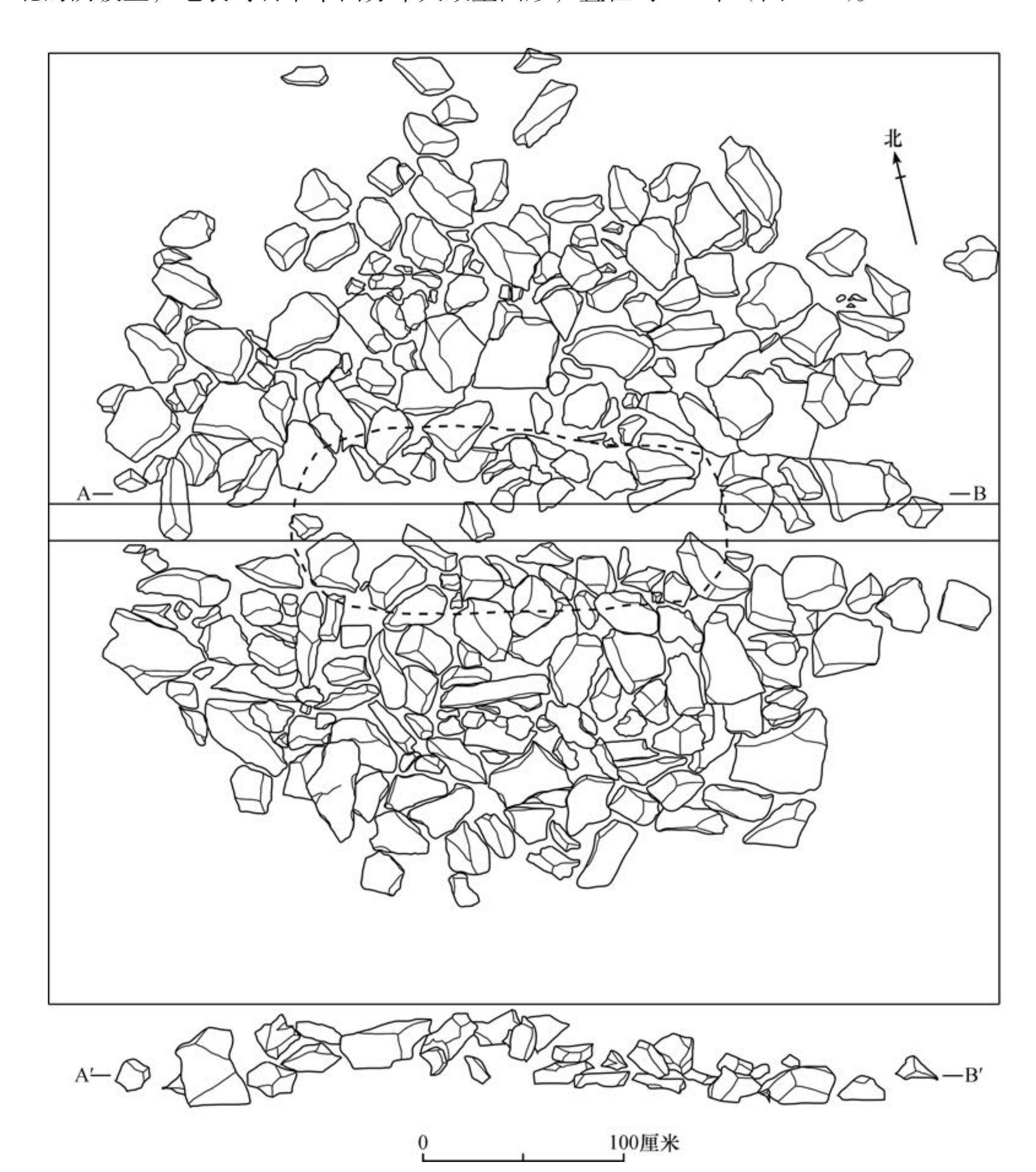
图一二　砖上的图案及刻划符号

1. 手指纹　2. 草纹　3. 涡纹　4. 花卉纹　5. 鸟纹　6. 箭头符号

三、葬　马　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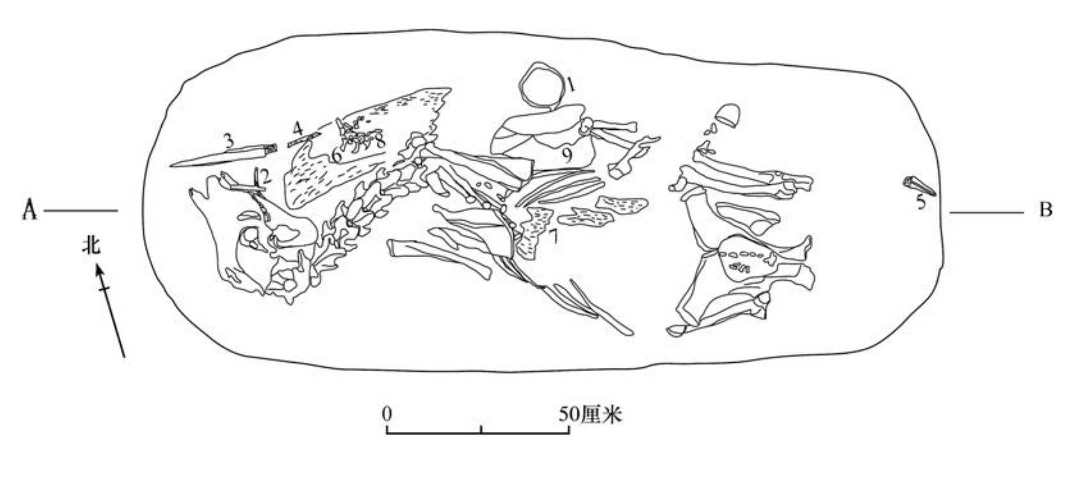
1. 葬马坑的位置及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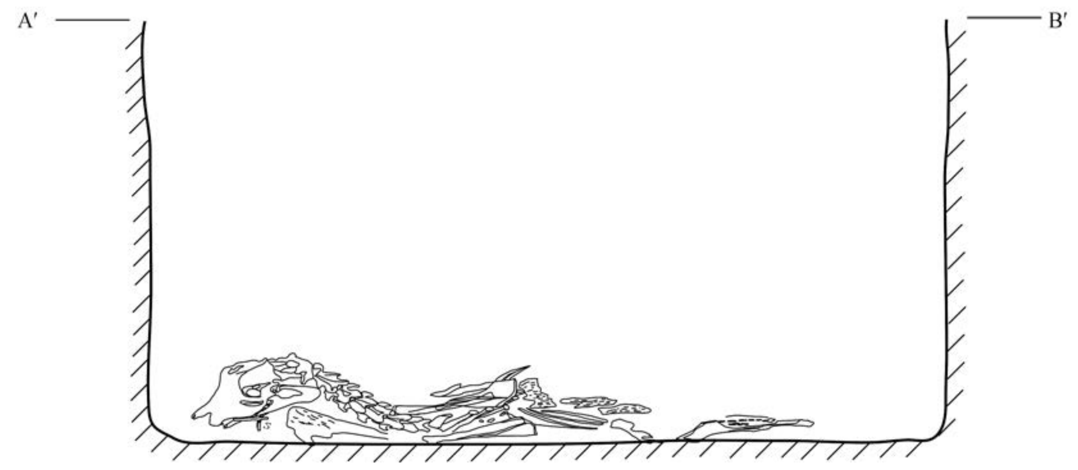
经调查发现，围绕山谷的丘陵顶部有较多石堆遗迹分布。为了解其性质内涵，选择距台基（TJ1）东北约 500 米处较小的一座进行发掘。该处石堆遗迹坐落在一处朝向东北的阴坡上，地表封石堆平面分布大致呈圆形，直径约 4.3 米（图一三）。



图一三　葬马坑地表封石堆平、剖面图

将封石堆清理完毕，出露平面为圆角长方形的花土。将花土清理干净，仅见一具完整的马骨，因此命名为葬马坑（编号 K1）。葬马坑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平底，坑长 2.15、宽 0.9、深 1.05 米。坑内填土较松软。马体左侧卧，头西尾东，长 1.95、宽 0.8 米，头向 285°。马口内有铁马衔和骨马镳。马头右侧有 1 件铁矛头，銎内有木柄残迹。马胸下垫有 1 块石头。马背上有木马鞍残迹及铁甲 7 片。马右腹侧有 1 件铁马镫。墓葬东壁有铁器 1 件，疑为矛的尾銎。复原铁矛全长约 2.12 米。此外，还有殉牲羊的椎骨、肋骨和肢骨等（图一四）。





图一四　葬马坑平、剖面图

1. 铁马镫　2. 铁马衔与骨马镳　3. 铁矛头　4. 矛柄残迹　5. 铁矛尾銎　6. 木头残迹
7. 木马鞍残迹　8. 羊骨殉牲　9. 石头

2. 出土随葬品

马镫　1 件，K1：1。铁质。镫环呈马蹄形，宽 14、高 13.8 厘米。镫底踏板宽 2.4 厘米。镫环上部镫柄连接镫穿，镫柄长 1.2 厘米，镫穿残，或为方形，宽约 4 厘米，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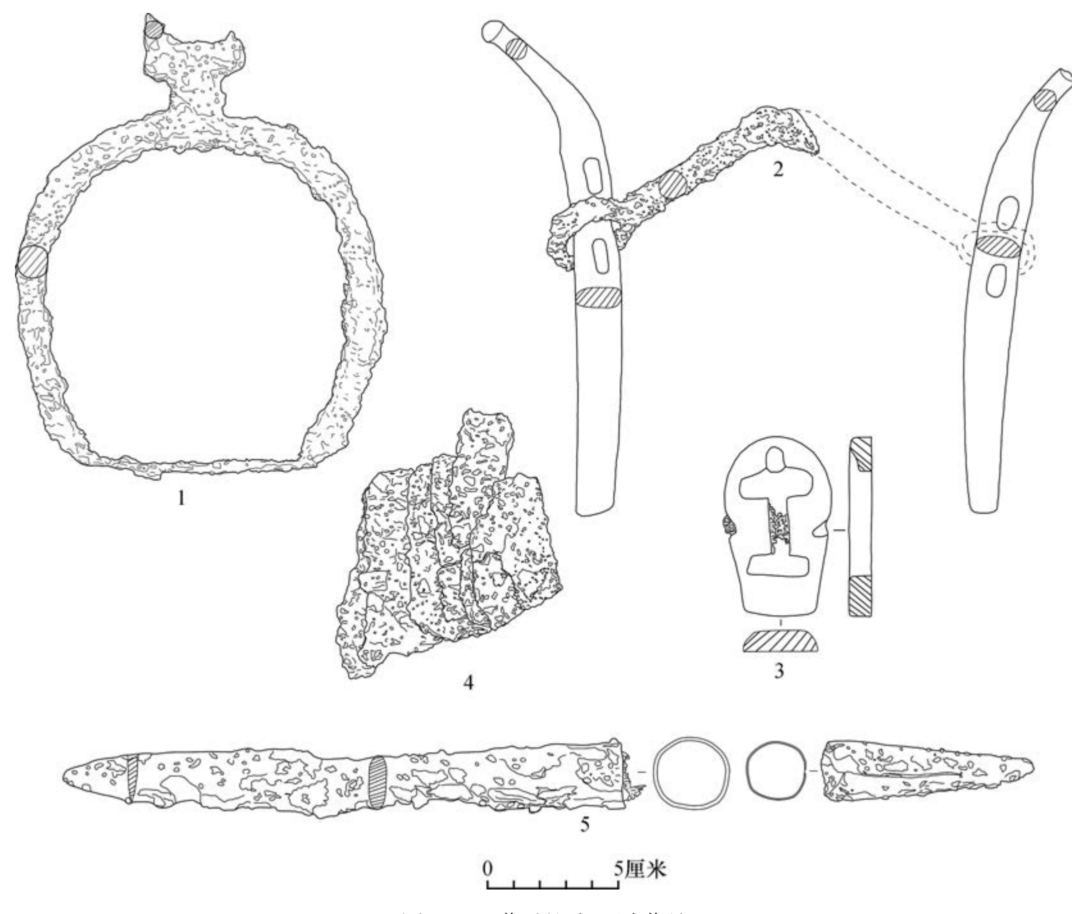
详（图一五，1；图一六，1）。

马衔与马镳　1件组，K1：2。马衔为铁质，仅发现左侧半部分，残长10.5、圆环部（穿马镳）直径3.3厘米。马镳2件，骨质，左侧镳长18.5、宽1.7厘米，上端为蘑菇形圆突，下端较平，中段有两孔，孔间有马衔磨损的凹痕并沁有铁锈，孔长1.4、宽0.6厘米。右侧镳长16.8、宽1.8厘米，上端截面为圆形，下端截面为圆角方形，中段有两孔，孔间有磨痕，上有铁锈，孔长1.3、宽0.6厘米（图一五，2；图一六，2）。

肚带扣　1件，K1：3。骨质，一端圆，另一端平，长6.7、最宽3.9厘米，中间镂空，有铁质物穿过，留有铁锈（图一五，3；图一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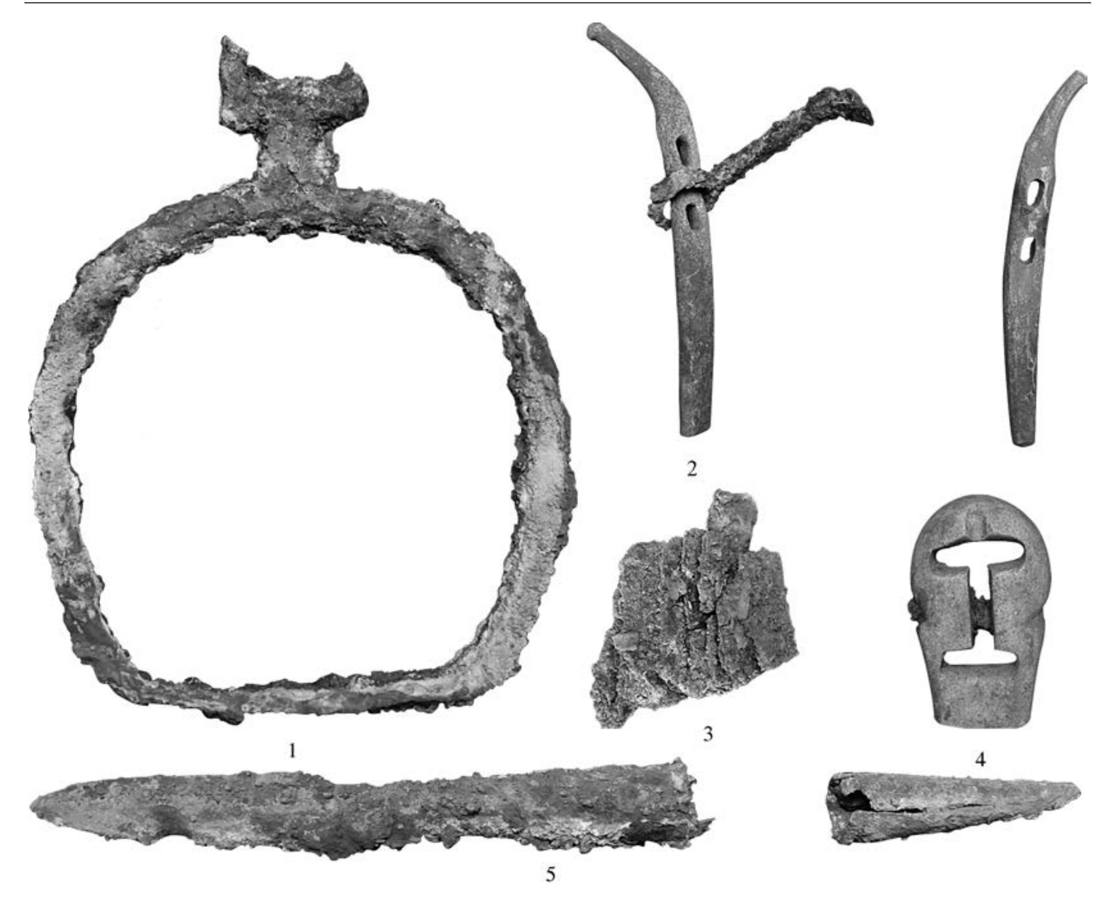
甲片　1件组，K1：4。铁质。共7片，最长8.4、宽2.5厘米，锈蚀严重，边缘可见连缀的小孔（图一五，4；图一六，3）。

铁矛头与尾鐏　1件组，K1：5。矛头总长26.5、刃部长14、最宽处3、最厚1厘米。銎长12.5、銎口直径3厘米，内留有木柄残迹。尾鐏，长9.7、銎口直径2.7厘米。矛的木柄已经残朽，全长约2.12米（图一五，5；图一六，5）。



图一五　葬马坑出土随葬品

1. 铁马镫　2. 铁马衔与骨马镳　3. 骨肚带扣　4. 铁甲片　5. 铁矛头与尾鐏



图一六　葬马坑出土随葬品图版

1. 铁马镫　2. 铁马衔和骨马镳　3. 铁甲片　4. 骨肚带扣　5. 铁矛头和尾鐏

四、结　　语

（一）年　　代

宝拉格陶勒盖遗址 TJ1 和 Y1 除了土坯与红砖之外，未发现其他古代人工遗物，缺乏直接的年代证据。但二者具有紧密相关性，应为同一时期。只能通过与已明确年代的资料进行对比，以判定其年代。TJ1 与 2012 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前杭爱省浩腾特苏木查干朝鲁图土台遗迹形制、结构较为相似，均由土台和踏道等部分组成，建筑夯层具有明显的回鹘时期夯层的特征[1]。

K1 通过葬马习俗及马镫形制可推断其相对年代。葬马习俗在突厥时期比较流行，一人一马埋葬形式比较常见，单独的葬马坑在蒙古国、俄罗斯阿尔泰等地也多有发现[2]。马镫是明显的年代标形器，有蹬柄的马镫，总体上经历了蹬柄由长变短，到蹬穿与蹬环连为一体的大致发展过程[3]。因此，宝拉格遗址 K1 所出的马镫是 7 ~ 9 世纪比较流行的形式，大约为突厥、回鹘汗国时期。

（二）性质与内涵

宝拉格陶勒盖遗址TJ1发掘前的形制与曾被发掘的布尔干省仆固乙突墓[4]、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5]等在外形上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性质不同。初步推测TJ1或为一座亭式建筑台基，用途可能与祭祀有关。

通过对Y1内部烧结程度的观察，Y1应该出产了数量较多的砖，但是这些砖的去向和用途不明，耐人寻味。中蒙联合考古队发掘了数年的"四方形遗址"（贵族高等级墓地），发现了地下砖室墓和地上包砖台基等建筑[6]这是蒙古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砖室墓，为回鹘时期。但是在"四方形遗址"并未发现砖窑遗迹，即便在著名的回鹘都城哈拉巴拉嘎斯古城附近也未发现砖窑遗迹。此前，蒙古国境内仅在哈拉和林城址发现了大规模的砖窑遗址[7]。因此，我们推测Y1生产的砖极有可能还是为了就近建造地下墓穴之用，只是我们受工期和技术限制等原因并未找到，给此次发掘留下遗憾。

TJ1、Y1和K1的年代范围大致相同，我们还不能断定前二者和后者在性质内涵上存在关联。但此次发现刷新了蒙古国以往的考古资料，为突厥、回鹘时期考古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附记：本次发掘中方领队陈永志，蒙方领队A. Ochir。中方参加人员有萨仁毕力格、程鹏飞、丹达尔、赵建；蒙方参加人员有昂哈巴雅尔、策仁宾巴、参巴。蒙古国国立大学、乌兰巴托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考古发掘工作。

遗址周边环境测绘：丹达尔
器物绘图：程鹏飞　策仁宾巴
执笔：萨仁毕力格　程鹏飞　丹达尔　陈永志
A.Ochir、B.Ankhbayar、H.Tserenbymba

注　释

［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 2012年度中蒙合作考古调查与发掘［J］. 201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总第9期（内部刊物）：22～28.

［2］В. Д. Кубарев.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кенотафы Боротала [A].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5, 136～148.

［3］Г. Эрэгзэн, Л. ищцэрэн, Худгийн Халзангийн Олдворын Холбогдох Он Цаг ба Жужаны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суудалд [A]. Археолүг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XXXIV [C], 2014 о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64～273.

［4］А. Очир, С. В. Данилов, Л. Эрдэнэболд, Ц. Цэрэндорж,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п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он: 17.

［5］ a. Очир А., Эрдэнэболд Л., Харжаубай С., Жантегин Х.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M]. УБ., 2013он: 15.

b. 阿. 敖其尔，勒. 额尔敦宝力道著，萨仁毕力格译. 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J］. 草原文物. 2014（1）：15～23.

［6］ 塔拉，陈永志，宋国栋，岳够明，阿. 敖其尔，策. 奥德巴特尔，勒. 额尔敦宝力道，巴. 昂哈巴雅尔. 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一号墓园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7］ Ханс-Георг. Хюттель, Уламбаяр Эрдэнэбат: Хар Балгас ба Харахорум-Орхоны хөндий дэх хожуу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сууршмал хоёр хот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он: 55.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Baolaga Tolgoi Site in Bleihangga Sumu, Bulgan Province, Mongolia

Inner Mongolia Museum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Abstract: In 2015,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was formed by the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to excavated the Blagiin Tolgoi site in Buregkhangai Sum, Bulgan Aimag, and to find the remains of a sacrificial platform, a brick kiln and horse-burial pit. In the burial, a horse gear, iron spears and other funerary articles were unearthed. At this preliminary stage,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se remains belong to the Turkic and Uighur period. This provided important data for the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Mongolia.

Keywords: Mongolia; Blagiin Tolgoi site; Turkic period; Uighur period

关于辽河下流地区辽代州县城的分布

高桥学而

（日本博多女子高校，福冈）

内容摘要：2013 ~ 2014 年，笔者在当地老师们的帮助下，有幸访问了中国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市、开原市、昌图县及西部康平、法库、新民等各县，并考察了位于阜新市的各个辽代遗迹。本文以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并推进了辽代古城研究考察的冯永谦老师为首的诸多先行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根据，同时这也是这两年实地考察成果的一部分，在研究辽河流域各城址的同时着重关注其分布特征，并对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一些说明。

关键词：辽河下游；辽代；城址；分布特征

一、绪　　言

2013 ~ 2014 年，笔者在当地老师们的帮助下，有幸访问了中国辽宁省北部的铁岭市、开原市、昌图县及西部的康平、法库、新民等各县，并考察了位于阜新市的各个辽代遗迹。本文以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并推进了辽代古城研究考察的辽宁省文物工作队冯永谦老师为首的诸多先行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根据，同时这也是这两年实地调查成果的一部分。笔者在研究辽河流域的各城址的同时着重关注其分布特征，并对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一些说明。

二、调查的各个城址

此次共调查辽代古城 6 座，分别为：

（1）奉集堡古城：集州故城；

（2）八面城：韩州故城；

（3）四面城：安州故城；

（4）康平县小塔子古城：祺州故城；

（5）石佛寺古城：双州故城；

（6）辽滨塔村古城：辽州故城。

三、调查所得的古城时代问题

关于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地区的各个州县城，在《辽史·地理志》里有对其建城或者设立时间的记载，从诸多先行者的学术研究论证中可以看出这些记载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现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地区的辽代塔址列举如下（表一）。此外，在表一中还加入了《辽史·地理志》关于这些州县建置的描述。

表一　辽河流域的砖塔、塔址

名称	州县	所在地	时 期	《辽史》关于建城的记载	备考
塔东村古塔址	不明	昌图县泉头镇	咸雍年间以后（1065 年～）	—	
小塔子塔址	韩州	昌图县三江口镇	辽代	圣宗	20 世纪初一部残存
崇寿寺塔	咸州	开原市老城镇	乾统年间（1101～1110 年）	圣宗开泰八年（1019 年）	
古塔寺遗迹	—	开原市八棵树镇	—	—	
塔子山遗迹	—	开原市威远堡镇	—	—	
四野地遗迹	—	铁岭县镇西堡镇	—	—	
元通寺塔	银州	铁岭市银州区	辽圣宗以后?	渤海国	
高尔山塔	贵德州	抚顺市	大安四年（1088 年）	—	
高尔山东塔	贵德州	抚顺市	—	—	
七星山塔	双州	沈阳市沈北新区	咸雍十年（1074 年）	太宗时	1931 年倒塌损坏
无垢净光舍利塔	沈州	沈阳市皇姑区	重熙十三年（1044 年）		
沈阳旧城外白塔	沈州	沈阳市旧北关	乾统八年（1108 年）		
陈相屯塔山塔	集州	沈阳市苏家屯区	重熙十四年（1045 年）	渤海国	
白塔堡塔	沈州	沈阳市白塔堡镇	辽代后期		日俄战争时破坏
小塔子塔	祺州	康平县郝官屯镇	辽代	太祖	し n
塔山遗迹	—	康平县西关屯蒙古族满族乡	—	—	

续表

名称	州县	所在地	时 期	《辽史》关于建城的记载	备考
辽滨塔村塔	辽州	新民县公主屯镇	乾统十年至天庆四年（1110～1114年）	太祖	
五龙山塔址	—	法库县丁家房镇	辽代中期?	—	
塔子山遗迹	—	法库县丁家房镇	—	—	
辽阳白塔	东京	辽阳市白塔区	辽代后半期	太祖	
塔湾塔	—	辽阳县甜水乡	辽代中后期	—	

通过上述各塔的建塔时间，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建于重熙年间及其以后的。在此对兴建于其他地区或者修缮年代明确的辽塔进行确认后，可以得知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清宁二年，1056年）、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塔（大安五年，1089年）、朝阳北塔（重熙十三年，1044年）、庆州白塔（重熙十六年，1047年动工；大康六年，1080年维修；乾统五年，1105年修缮）的修缮时间确实都是重叠的。虽然很难从零星的资料中得知其具体时间，但可以通过建塔时间推测出，作为本文研究地区的各个州县城至少在11世纪下半叶发挥了它的作用。

四、辽代山城的分布和考察

下面尝试着对此地区的交通路线进行探讨。虽然现在辽河流域是广阔的平原，但是一般认为，此地区现在的景观与本文提到的辽代的情形不是完全一样的。特别是在沈阳北郊的石佛寺以南的下辽河平原地区，不仅是辽河干流，连其支流也是复杂蜿蜒的。众所周知，在曲折之中，有众多沼点、交通困难的地方，即被称为“辽泽”的地方。这一景观持续到了民国初期。张士尊指出，辽泽南北300里①、东西200里。由于受到辽泽的限制，自古以来连接辽西和辽东中心的干线大概有三条，即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沿着辽泽的北部向北迂回，中路横跨辽泽，南路沿着辽泽的南部向南迂回。由于直线距离最短的中路横跨辽泽，所以给迁徙带来了很多困难。由肖忠纯对此路线的历史变迁进行的考察可知，在隋唐以前是以南路为主的，到辽金元三代变成了以横跨辽泽的中路为主。根据肖忠纯的观点，此中路在辽代时，出辽阳府后西行，经过位于现在辽阳市西南唐马寨古城的唐马寨，在相当于北镇市高山子城的独山馆，从辽阳府先南下，而后再与西行的南路汇合。肖忠纯还指出，在辽代以后，虽然中路经过了整修，但辽泽的存在，州县的设置，特别是军事方面，对形成由州县城构成的防御线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① 1里=500米。

此路线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此路线上发现了辽代的山城。直到现在，作为辽代的山城仍引人关注的是，位于辽严州城的燕州城，以及处于山脚下、位于贵德州的高尔山城（北关山城）、张楼子山城等高句丽山城被再利用的事例。在下面列举的山城城址中，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辽代以前的遗物。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辽代的山城城址都是位于法库县，具体如表二所示。

表二　辽代的山城城址

名称	位置	平面形态	周长	备注
小古城子山山城	大孤家子镇方石力子村	椭圆形	470 米	
大古城子山山城	距上揭古城 1.5 千米	长方形	300 米	
北城子山山城	十间房乡马家沟村	不规则长方形		
南城子山山城	据上揭古城 3 千米	半圆形		
八虎山山城	四家子乡红砂地村	钵卷式不规则形	3430 米	
平顶山山城	三面船镇李家房申村	方形	400 米	
马鞍山城	叶茂台镇石力子村	方形		

据推测，上述 7 处山城都在辽代时发挥了作用。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平面呈起伏不规则形状，外围轮廓长达 3430 米的八虎山山城，还是平面为长方形，外周长度仅有 300 米的大古城子山山城。这些山城的大小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无论是作为军事策略要地，还是作为监视所，随着今后资料的累积，应该都可以进行分析。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路的延长这一点，也就是说是作为牵制要道的地点而被设立。

此外，想要论述关于横渡辽河的金军进攻路线，《金史》中有关于天庆七年（1117 年）12 月的记载，秦晋国的王淳都元帅遇到金军后，战于蒺藜山，但是战败了，金最终攻下显州这样的记述。另外，关于第二年的情形，则有“双州、懿州、通州、祺州、辽州相继败于金”此类的记录。据罗显明的观点，蒺藜山即位于现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哈达户稍镇章古台山。据《金史》记载，在位于北镇市的显州沦陷的第二年，设立于辽河流域的双州、懿州、通州、祺州、辽州都被金攻克了。关于它们的位置除了通州不明确以外，其他的四州城都是位于辽河及辽河以西的州城。

综上所述，本文就沿辽河分布的辽代州县城，对辽河东面从防卫这一军事侧面的视点来阐述它们的重要性。据《辽史》的记载可知，这次实地考察的各个古城址所在的州县城，它们基本上都隶属于北女直兵马司。《辽史》的《百官志》指出了北女直兵马司位于辽州，据《辽史 · 地理志》的记载其下设辽州、棋州、韩州、双州、银州、同州、咸州、肃州。其中，同州相当于开原市中固镇新屯村古城，肃州相当于昌图县马仲河镇古城。在确认它们的位置时发现，它们是沿辽河呈南北方向分布的。在这里要注意是，黑龙江的拉林河，还有分布于吉林省第二松花江沿岸被称为“辽金古城”。之前，王永祥和王宏北曾对位于黑龙江金代古城的分布，建造方法和分布规则、特征，修建时间进

行了概括。其中，尤其关注于集中分布在拉林河右岸的古城城址。他们从前后相隔 5 ~ 10 千米的十七处位于拉林河右岸的古城遗址的事实上推测出，这些城址曾作为水上运输和河岸边的地面路线的重要交通干线。他们并指出，这些古城遗址构成了对抗位于拉林河对岸的辽军防线。这些沿岸的古城，无一不是面朝拉林河而建的，并且城门的开口方向与河流呈反方向。从这些事例可以推测出，这些古城的时期为金史所记载的金对辽战争以前。张英还关注到了，分布于第二松花江中下游的前郭、扶余、榆树、农安、德惠、九台、舒兰七个地区，以及从渤海国至清代的 106 处古城遗址的分布。张氏认为第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辽金古城遗址的集中分布可以理解为辽代中后期针对女真族的政策的三次对抗。圣宗太平六年的"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黄龙府请建堡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还有道宗清宁四年的"城鸭子，混同江二水间"等的记载可以理解为，是其对抗女真族政策的一环。其中更需关注到，这些遗址中处于清宁年间的宁江州可理解为，是在辽末道宗、天祚帝时期为对抗女真族而建造的。

根据辽河流域的各个州县城，以及与其相邻的各个州县城间的距离进行确认，最远的是银州与双州，二者相距了 55 千米；最近的是原州与渭州，二者相距不到 10 千米。虽然众多资料中并未标明辽代州城之间的距离。在此想要提一下迁移了四次州治的韩州，据段一平对韩州的州治进行的考察可知，第一韩州城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浩坦古城（即城五家子古城），第二韩州城若是以为避开风沙而迁移的白塔寨为前提进行考察的话，最初它迁移了 41.2 千米，随后从白塔寨到八面城的第三次迁移距离为 35.7 千米。最终迁至作为第四韩州城的偏脸城，迁移距离为 28.5 千米。从狭义的认知范围来看，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而迁移州治的事例，有位于辽宁省的辽代州县就有建州这一事例，建州迁移州治是由于大凌河的泛滥。第一建州木头城子古城与第二建州黄花滩古城之间的距离为 15.4 千米。另外，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川州也是一样的。从作为第一川州的八家子古城到第二川州的黑城子古城之间的距离有 49.5 千米。当然根据定居在州内的以农耕民为主的州民的多少，其管辖领域的空间规模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不考虑各个州县各自情形的情况下进行论证，或者以少数的事例来追求平衡，都是无法认定其有效性的。但是，这些州县的移动距离为推测州的管辖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资料。以这些州城之间的距离作为参考，来确认作为本文探讨对象的州城间距离时，或许可以发现各州县城之间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概括我们这次探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发现辽河流域的州县城及其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从东到西越过拉林河及第二松花江，直至辽的腹地为建造辽河最大的防御线提供了自然环境，在与辽泽的存在的重叠之下，可以发现州县城的距离很接近。另外，可以确认与拥有绵长的外部轮廓线的山城同时存在的数处监视哨所，还有在今后的调查中可以期待的东西很多，瓮城、角楼、护城河、羊马城等明显地显示出浓重的防御功能要素，可以看作是这些州县性质的表象之一。

在我们这次实地考察的州县之中，作为康平县祺州故城的小塔子古城，据前文提到

的冯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其进行的实地调查可知，日俄战争时，日军在此地设立了粮草仓库，而在隔着辽河对面的昌图县金家镇则驻扎了俄国军队。于是他尝试对此进行确认，根据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编著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的第十卷中的记载可知，奉天会战之后由隶属于第三军的步兵第二十五战队等组成的渡边支队，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4月6日到达小塔子，不仅建了阵地，还在辽河上架起了军桥。另外，Мишиченко中将所指挥的骑兵团的一组小分队有进出金家镇的迹象。关于渡边支队建阵地的具体情况，虽然从本文中无法得知除此以外的更多信息，但是也许可以理解这些情报是作为传达当地一部分情况的证据。此外，前文提到的作为双州故城的石佛寺古城，在日俄战争时驻扎了俄国军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47年的解放战争中，当林彪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接近四平，并且显示出了南下的势头之时，当时在在沈阳进行防御的国民党的廖耀湘的指挥下，新三军、新六军还利用了承担七星山防御军事的古城墙，建造了很多的碉堡。可以很容易地窥测出，靠近辽河、作为附近一带制高点的七星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的一个侧面。

可以认为以上的事例证明了在展开军事作战时，即使在近代战争中，河川也具备较高的利用性。尤其是小塔子古城以及石佛寺古城，尽管辽河流向发生过数次改变，但是无论是在日俄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又或者是追溯到遥远的辽金初期，其河岸占地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

从上京会宁府向西，穿过拉林河及第二松花江，接下来的大河是纵贯了南北的辽河。辽河，特别是穿过了东辽河，北面从科尔沁草原持续至天山、林东。通过从南边过来的路穿过法库外，进入了与彰武、阜新相连的契丹腹地。包含这次未曾实地考察到的州县城在内，以及沿着辽河分布的各个城郭都是与上述砖塔的修建时期重合的。由此可以推测有可能它们都是在辽代后期，特别是辽兴宗以后的11世纪后期，为了与同一时期兴起的辽河东方的女真势力抗衡而修建的。

参考书目

（元）脱脱·辽史. 卷十七·本纪第十七·圣宗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元）脱脱·辽史. 卷九十八·列传第二十八·耶律俨［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补正——初迁白塔寨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85（4）：211，212.

段一平. 韩州四治三迁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80（2）：189～193.

冯永谦. 法库县文物志［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冯永谦. 辽东京道失考州县新探——辽代失考州县辩证之一［A］.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一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202～235.

郭松雪. 从城址和墓葬窥探法库［J］. 中国地名，2013（4）：78，79.

金殿士. 辽、金肃州及清安县故址考［J］. 地名义刊，1986（4）：10～12.

辽史·卷四十六·志第十六·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北女直兵马司，在东京辽州置.

陆军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三十七八年日露战史．第十卷（东京偕行社，1914 年），本文 1258 页中的第十二篇：满洲军的整备，第五十一章：兵力的整顿，其二：四月的情况，其三：关于开原、昌图及三眼井附近先进部队的战争．
罗显明，李秀梅．辽代徽州城和辽金大战蒺藜山地址考［A］．辽金史研究［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24～234．
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松花江地区一九八一年文物普查简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1）：28～32．
王永祥，王宏北．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J］．辽海文物学刊，1988（2）：36～45．
武家昌．韩州州治二迁之地“白塔寨”考［J］．北方文物，1986（1）：45，46．
肖忠纯．古代“辽泽”的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1）：106～114．
肖忠纯．古代文献中的“辽泽”的地理范围及下辽河平原辽泽的特点、成因分析［J］．北方文物，2010（3）：93～97．
肖忠纯．辽河平原主干线路的历史变迁［J］．东北史地，2009（6）：59～64．
肖忠纯．论古代“辽泽”的地理分界线作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5）：100～104．
张士尊．辽泽：影响东北南部历史的重要地理因素［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1）：22～27．
张英．第二松花江中、下游段七县辽金古城概述［J］．博物馆研究，1985（2）：42～49、52．

Liao Period Walled Cities in the Liao River Basin

Takahashi Gakuji

Abstract: In 2013 and 2014, with the help of local archaeologists, I was able to visit Liao period site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sites are distributed the municipalities of Tieling, Kaibei, Kaiyuan and Changtu, and in the counties of Kangping, Faku, Xinmin, etc. Additionally, I had the occasion to visit Liao dynasty sites in Fuxin Cit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led by the archaeologists' team of the Liaoning Province Archaeological Office, headed by Feng Yongqian, who studied of Liao period sites since the 1960s, as well as on other previous scholarship. This research is the result of my own two-years field visit. This paper covers several ancient cities located in the Liao River basin, focusing on their distribution, and proposes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the Liao River basin; Liao period; cities; distribution

北京凤凰岭辽代上方寺遗址探略

赵立波[1]　李冀洁[2]

（1.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100084；2. 雍和宫管理处，北京，100007）

内容摘要：上方寺遗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一座辽代的中小型寺院遗址。寺院坐西朝东，主体面积约5000平方米，三重大殿沿中轴线一字排列。“上方”指寺院的位置较高。寺院建立年代不晚于辽穆宗应历十年（960年），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该寺占据重要地位，明末寺院进行过一次重修，清末寺院衰落，可能为道家占据。该寺僧人曾重点修学《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圆觉经》等佛经。上方寺遗址及相关遗迹对于北京西山地区的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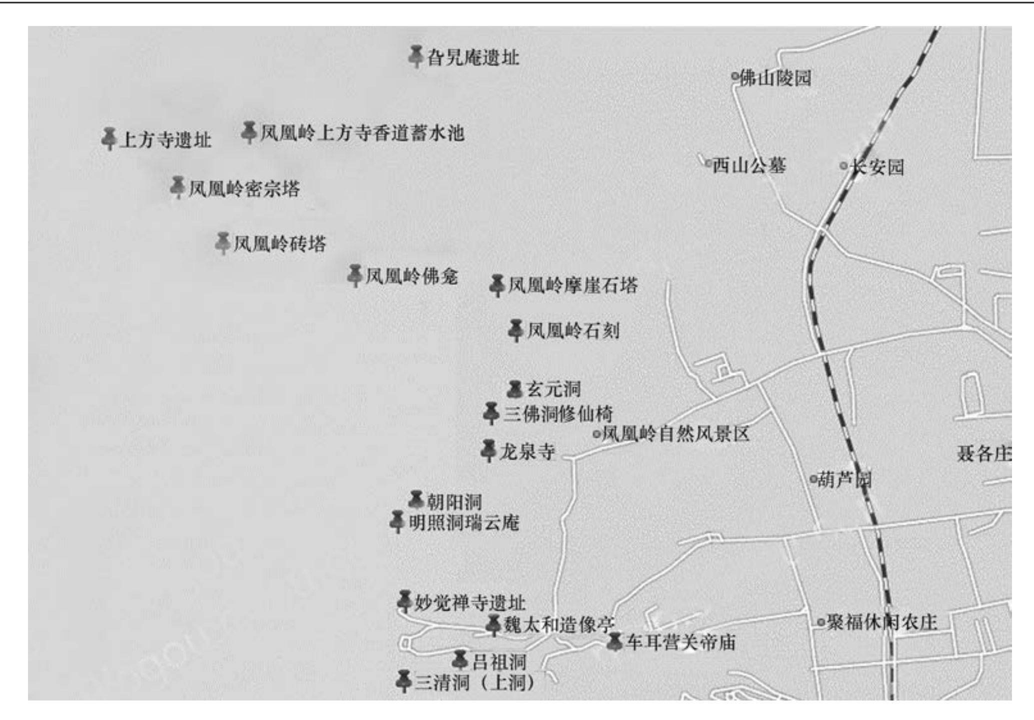
关键词：上方寺遗址；辽代；佛教

上方寺遗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苏家坨镇大西山东麓的凤凰岭景区，东距台头村5千米。凤凰岭景区面积为10.62平方千米，其自然环境优美，密林曲径，野趣天成；又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释、道、儒等遗址众多，文化积淀丰厚；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素有“京西小黄山”之美誉。进入凤凰岭景区，沿北线攀登约3小时，可至上方寺遗址（图一）。

史料中关于上方寺的记载甚少，导致其面貌及演变不甚明了。应大西山文物保护开发利用项目的需要，笔者曾作为调查人员赴上方寺展开考古调查，获得了一些一手资料。本文将结合史料和考古调查所得，对上方寺遗址进行初步研究。

一、“上方寺”探名

我国有多处上方寺，如北京凤凰岭上方寺、房山上方寺、天津蓟县上方寺、江苏兴化上方寺、泰州上方寺等。“上方”可指方位之“上方”，亦可指天上、上界，此外，住持居住的内室也称上方。那么，凤凰岭上方寺究竟为何意？据《妙峰香道考察记》载：“上方寺下面2里处有下方寺。”[1]如此看来，上方寺是与下方寺相对而言，指方位之上下。



图一　上方寺遗址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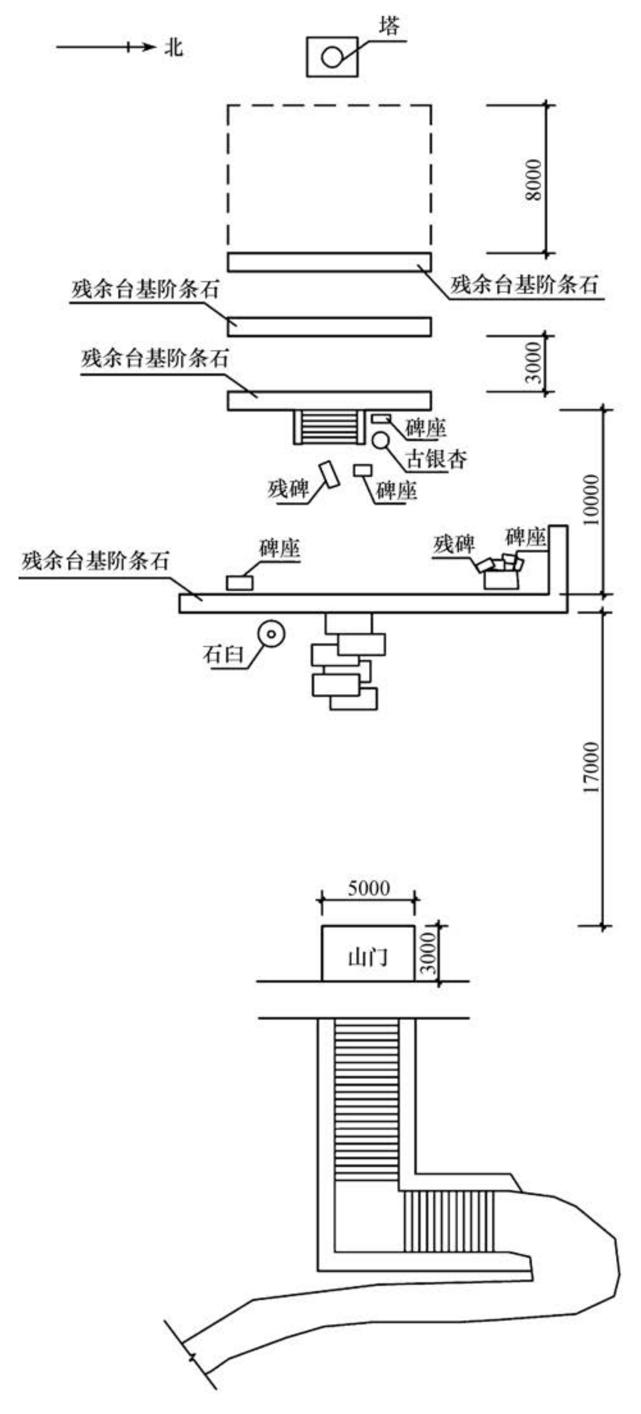
上方寺香道蜿蜒于危崖陡坡之上，沿途有多处古迹，如搁衣庵遗址、摩崖石塔、观音菩萨阴凉石、十八盘和三道门等，并有摩崖石刻多处。《光绪昌平州志》收录孙繁祉《上方寺》诗曰："蜡屐响空林，宵来草色侵。登盘千级险，寺隐一枝深。古貌僧初定，迴峰日半阴。流泉生屋底，谁不涤尘襟。"[2]由诗句可知，诗人脚着蜡屐攀登，蜡屐叩击石阶，在空寂的山林发出清脆的声音。古寺隐匿于山林之中，攀爬需登"千级险"，可见其位置之高。当地还有"五云托上方"[3]之说，"五云"指的是五座带"云"字的古刹。这说明上方寺是与下方寺相对而言，指方位之上下。

总之，凤凰岭上方寺的"上方"二字，指寺院所处位置较高，与之对应的，是位于其下方 1 千米处的"下方寺"。

二、遗址现状

上方寺遗址坐落于凤凰岭景区北线最高点的山巅凹地中，坐标为北纬 40°06′46.1″，东经 116°04′17.9″，海拔 643 米。上方寺依山势而建，整体坐西朝东，前低后高，面积约 5000 平方米。遗址三面环山，环境清幽（图二、图三）。从遗址现状判断，上方寺原有殿三重。大殿后尚存元代覆钵式花岗岩佛塔一座，石塔仅存方形基座、金刚圈部分及覆钵式塔身下半部分（图四）。

现将主要遗迹、遗物情况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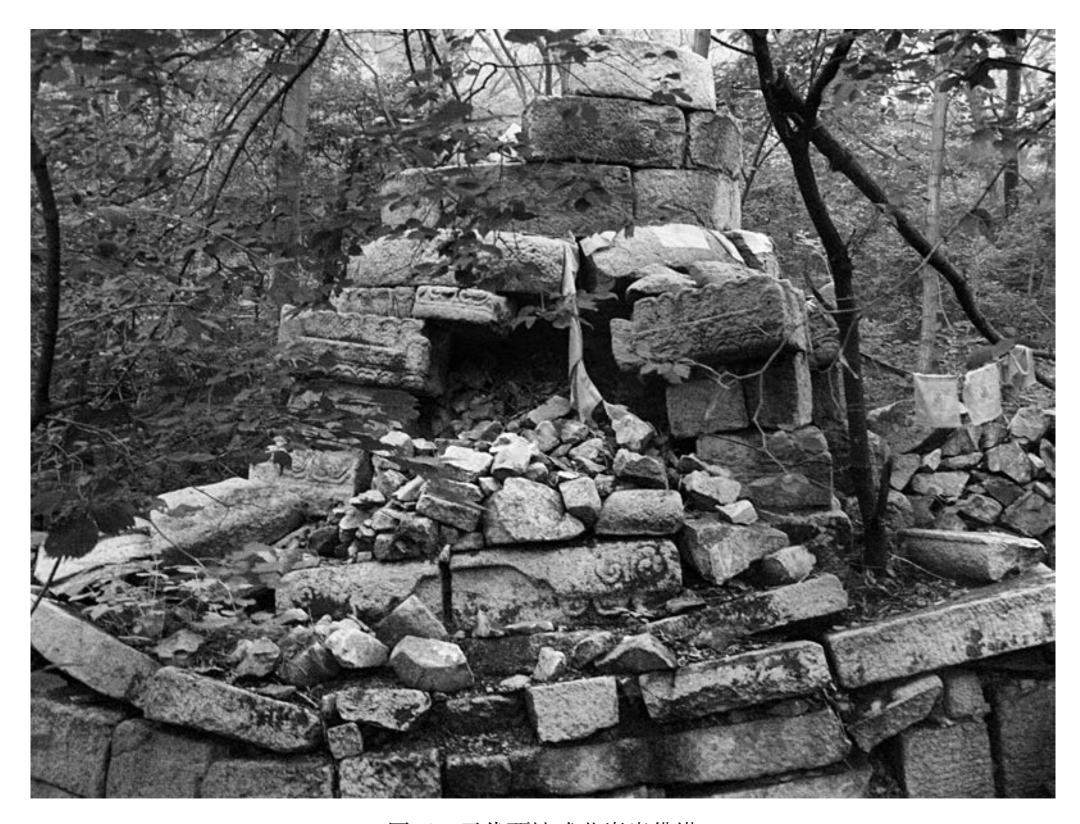


北
塔
8000
残余台基阶条石
残余台基阶条石
3000
残余台基阶条石
碑座
古银杏
残碑
碑座
10000
碑座
残碑
碑座
残余台基阶条石
石臼
17000
5000
山门
3000

图二　上方寺遗址平面图



图三　上方寺遗址现状



图四　元代覆钵式花岗岩佛塔

1. 明天顺八年《圆觉经》碑

遗址的一层台基下有一块残损的石碑（图五），高 1.5 米，宽 0.7 米，厚 0.12 米，右下角已残。此碑一面刻楷书《圆觉经》经文，另一面受摆放位置限制无法查看。现将所见碑文转录于下，并试加标点。脱字之处，用“□”表示。标“/”号者，为原碑文一行之末。小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据经文所补。



图五　明天顺八年《圆觉经》碑

《圆觉经》/ 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华），/ 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 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 / 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华相，/ 亦不可说。一切诸□□（如来），从于本 / 因地。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 大明天顺八年九月吉日立。

此碑为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 年）所立。《圆觉经》，全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为佛教大乘经典，对华严宗、禅宗、密宗、天台宗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内容是

佛为文殊、普贤等十二位菩萨宣说如来圆觉的妙理和观行方法，强调一切万法皆含摄于圆觉妙心。本经一卷，其中佛为十二位菩萨演说之部可分为十二章，碑文所录经文即出自第一章《文殊师利菩萨章》，但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曰：

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华，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遣，是则名为净觉随顺。

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华，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4]。"

经对比，碑文省略了"知虚空者，即空华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后面的内容，又从偈颂中选取了两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

在《圆觉经》碑的周围，散落着石磨盘、石臼等生产生活工具，具体年代不详。

2. 清道光二十三年《天尊普右道济浮生》碑

遗址的一层台基上有一棵银杏树，直径约一米多，需二人合抱。银杏树南侧卧有一螭首碑，碑残高 0.6 米，宽 0.65 米，厚 0.2 米。碑额题"万古不朽"，碑身书：

"天尊普右 / 道济浮生 / 清道光二十三年"

清道光二十三年为 1843 年。"天尊"为道教术语，道教信徒用其尊称地位最高的神仙（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碑证明，清道光年间，有道人在此修行，佛寺转为道观亦未可知。

3.《八关斋戒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残碑

台基上另有一石碑基座，上有长方形凹槽，正面刻"上方寺"三字，刻字为倒立状态，可知此基座是被后人倒立在台基上。基座上置一残碑，一面书：

"……坐卧高广……往观听……所烧煮……故现受……在人间……诸苦略……戒要……遇真……"

另一面刻有：

"……闻尽……所空灭……合十方……佛……议……修……是……利益"

碑身两面分别为八关斋戒和《楞严经 ·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中的部分经文。八关斋戒具体内容为：①不杀生；②不盗；③不非梵行；④不妄语；⑤不饮酒；⑥不着香

华鬘，不香油涂身；⑦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观听；⑧不坐卧高广大床。八关斋戒之后的“所烧煮”等文字，因遗失内容过多，无法考证其出处。

“闻尽……合十方”对应的《楞严经 ·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经文是：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5]。

从残存碑文判断，原碑满行应为 28 字。后半部的“议……利益”亦无从查找出处。

在寺后崖下，有两口石井，井水与井口相齐，称为满井。因景区将其划入防火区域，设铁栅栏阻隔，故未能亲自踏查。寺西高岗之上有一殿堂遗址，俗称法台，今仅存崇祯二年（1629 年）《重修上方寺》碑记，其碑文曰：“上方寺者，横卧，普庵祖师禅院也。基于妙峰之下，创于胡元之日……”[6]所谓“横卧”者，当是指上方寺坐西朝东的建筑朝向；“普庵祖师”者，或指南宋高僧普庵祖师。普庵（1115 ~ 1169 年），名印肃，号普庵，临济宗十三世子孙，俗姓余，江西宜春人，有《普庵印肃禅师语录》三卷行世。然普庵祖师驻锡宜春慈化寺，并未到过上方寺。碑文所录“普庵祖师禅院”，也许是普庵祖师法脉传至此寺，抑或碑文所指另有其人，此处尚需存疑；“创于胡元之日”者，辽时寺名“上方院”，颇疑至元季，寺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甚至重建，并更名为“上方寺”，始令明人误以为寺院创建于元代。

三、相关遗迹

在上方寺遗址周围，分布着一些与其相关的遗迹，有蓄水池、摩崖碑记、元明佛塔等，这些遗迹属于整个上方寺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复原上方寺的整体面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上方寺东南有一小山冈，其上并排凿方、圆形蓄水池各一；山冈西立面上，有摩崖碑记：“上方院　应历十年十月十日”。碑记为线刻碑形，碑首圭形，身为长方形，下有榫，框内刻文字。该题记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碑形摩崖石刻，证明至迟在辽穆宗应历十年（960 年），上方寺就已经建立。契丹人崇拜太阳，喜东向，史料记载其“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7]。上方寺的建筑朝向与北京戒台寺、西山大觉寺、大同华严寺等辽代寺院相似，均为坐西朝东，符合辽代契丹人东向朝日的建筑格局。根据摩崖碑记，上方寺在辽时名上方院，但笔者未查到上方院的相关史料。

上方寺香道主峰顶亦有一圆形蓄水池，巨石凿刻而成，砂岩石质，内壁刻连珠纹。直径 1.44 米，深 0.97 米，东侧 30 米有飞来石，西侧为山涧。

（2）寺北山坡上有五层六角密檐式砖塔一座，东北向，建于大蒙古国中统年间（1260

~ 1264 年），高约 9 米，每面宽 1.4 米。须弥座式塔基，上承三层砖砌仰莲，塔身倚柱雕成五层六角密檐式小塔，构思精巧，玲珑别致。塔身正面镶嵌汉白玉塔铭，字迹已漫漶不清，仅能辨认出中统年号；其他各面为砖雕窗扉，窗格为“卍”字纹饰拼接而成，塔刹为复瓣莲花形砖雕宝顶。该塔今称玲珑塔，海淀区文物部门曾于 2003 年对其进行修缮。

（3）从凤凰岭景区的飞来石塔向西南下山，可达明代密宗塔。此塔为覆钵式花岗岩石塔，坐西朝东，高 6.1 米。塔基平面呈折角须弥座式，塔身正面原有塔铭，今已无存。塔西侧石壁上刻“上方寺　弥宗塔”，可知此塔原称“弥宗塔”。

上方寺东南的蓄水池为何做成一方一圆，众说纷纭，或曰为僧人沐浴所用，或曰僧人淘沙滤金所用，皆缺乏明确材料支持；上述元、明二塔则均为僧人墓塔[8]。

四、结　　语

上方寺建于辽代，其建筑坐西朝东，是一座典型的辽代寺院。寺院始建年代暂无从考证，根据摩崖碑记，其建立年代不晚于辽穆宗应历十年（960 年），建立之初名为“上方院”。寺名“上方”指所处位置较高。

上方寺具有较明显的中轴线，大殿沿中轴线一字排列。辽金寺院的规模远不及隋唐宏大，寺院配制也不复杂。这一时期的寺院模式“虽然仍然有多种的形式，但以一组中轴线上布置的主要殿堂，辅以两侧的斋厨、僧舍、库厩的小型或中型寺院却较为多见”。[9]上方寺的建筑规模，在当时属于中小型寺院。

上方寺遗存的几块重要的石碑，反映了僧众的修行生活和寺院的变迁。《八关斋戒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残碑年代虽不能确定，但它无疑是古代僧人及居士修行的重要见证；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 年）的《圆觉经》碑说明，明中期的上方寺僧人曾十分重视《圆觉经》这部典籍的修习；崇祯二年（1629 年）《重修上方寺》碑则告诉我们，上方寺在明末经历了一次重修，人们树碑以纪念此事；迨至清末，上方寺似乎衰落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天尊普右道济浮生》碑这一道家思想石碑的出现，证明道教曾介入乃至占据了上方寺旧址。

上方寺遗址有大蒙古国中统年间至明代的密檐式砖塔和覆钵式石塔，佛塔形制的转变体现了当时北京地区佛教思想的传播流变。中统元年（1260 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领天下佛教徒。上方寺密檐式砖塔建于中统年间，它仍是汉地佛塔的传统形制，说明此时藏传佛教尚未对上方寺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元代和明代，上方寺均出现了覆钵式石塔，说明藏传佛教已在该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上方寺遗址及周围的石磨盘、石臼、井和蓄水池等，是僧众生产生活必不可缺的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上方寺香道及其沿线和周边的遗迹众多，它们与上方寺的关系如何，有待将来开展更多的调查研究。

最后，上方寺遗址未经清理发掘，所得资料十分有限，上方寺的历史变迁、寺院建

筑及僧众生活仍存在许多谜团，有待继续研究。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推动上方寺乃至北京西山地区佛教史的研究。

附记：本文承蒙海淀区文化委员会及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同仁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注　释

[1] 常华等．妙峰香道考察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1．
[2] （清）缪荃孙、刘万源．光绪昌平州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514．
[3] 政协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昌平文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政协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2002：66．
[4] 佛教十三经·圆觉经［Z］．北京：中华书局，2010：45，46．
[5] 佛教十三经·楞严经［Z］．北京：中华书局，2010：163．
[6] 同［2］：11．
[7]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4：888．
[8]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23．
[9] 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995．

A Study of the Liao Dynasty Site of Shangfangsi in Fenghuangling, Beijing

Zhao Libo　Li Jijie

Abstract: The Shangfangsi Site is located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It is a medium to small-sized temple site dating back to the Liao Dynasty. The temple is oriented on a west-east axis, looking east, occupying an area of about 5,000 square meters. The three main halls are arranged along the central axis. “Shangfang” (literally “high position”) means that the temple is located at a relatively high elevation. The temple was established no later than the tenth year of Liao Muzong (AD 960).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ibetan Buddhism was practiced at the temple. The temple was rebuil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ntered a period of dec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when Taoist practice took over. The monks focused on Buddhist scriptures such as a chapter of the Surangama Sutra (Guanshiyin pusa ergen yuantong zhang) and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Yuanjue jing). The temple ruins and other related sites are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west of Beijing.

Keywords: Shangfangsi Site; Liao Dynasty; Buddhism

回鹘墓园对辽陵的影响

——兼谈辽祖陵四号建筑的年代

刘 阳

（南开大学博物馆，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蒙古国境内回鹘墓园的发现和确认，为探讨北方草原文化对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资料。回鹘墓园选址于开阔的山谷之中，辽代第一座帝陵亦依高山深谷而建，开创了有辽一代极具特色的山城式陵园。至于辽晚期的庆陵，不仅在选址标准上与回鹘墓园更加接近，而且其方形台基及“一主两配”式的祭祀建筑更是与回鹘墓园的享堂如出一辙。以方形台基为线索，该研究进一步对祖陵四号建筑的年代进行了考察，认为该建筑的年代应在辽统和年以后，是按照皇帝规制营造的祭祀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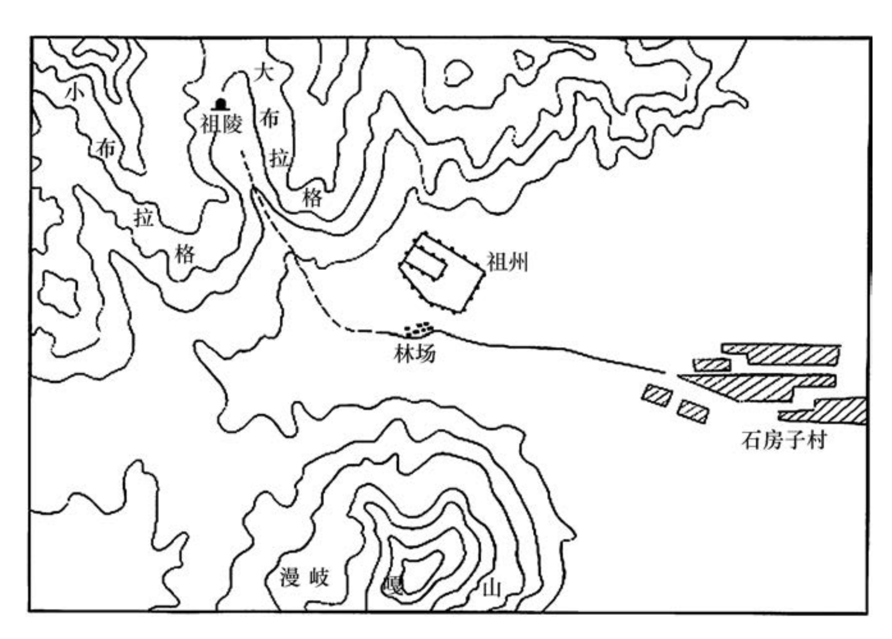
关键词：四方形遗址；回鹘墓园；祖陵；庆陵；祭祀建筑

“四方形遗址”是蒙古高原上较为特殊的一类遗址，其名称是蒙古国学者在尚未了解其具体性质而根据其形制命名的。近些年，随着中蒙联合考古工作的开展，确认了所谓“四方形遗址”其实是墓园，族属为回鹘，具体年代应属回鹘汗国时期（754～840年）[1]。回鹘墓园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回鹘社会丧葬礼仪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探究北方草原文化对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本文即拟以回鹘墓园为线索，重新审视辽代陵寝制度，探讨回鹘墓园对辽陵的影响。

一、回鹘墓园对辽祖陵的影响

辽祖陵（图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坐落在口袋形山谷之中，四面环山，在山脊的低洼处垒砌石墙，形成了封闭性的陵园[2]。从我国陵寝制度的发展史来看，辽祖陵选址于山谷之中，可谓史无前例。为免于地下水侵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高敞”就成了墓地选址的重要条件，至于秦汉，墓地对“高敞”的追求，不仅已经形成了民间的礼俗传统，更是上升为秦汉帝陵选址的重要标准[3]。进入唐代，唐太宗赞叹九嵕山“孤耸环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4]，昭陵选址就此确定，开唐代因山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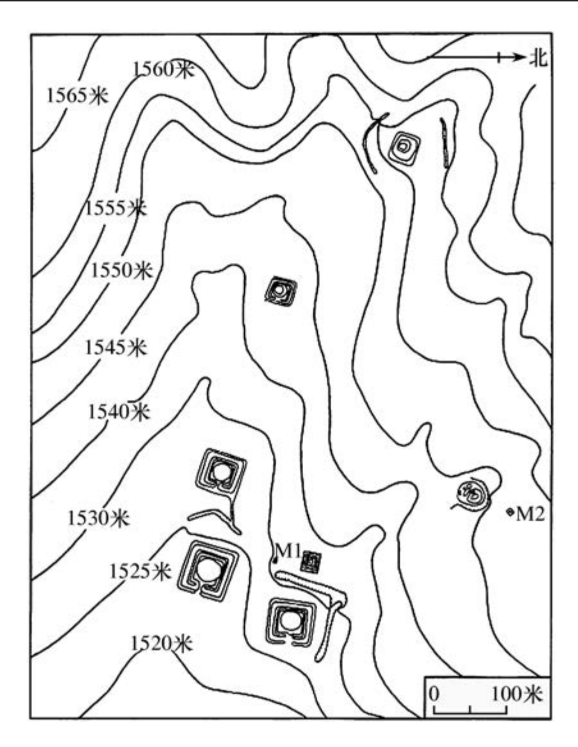
陵之先河。以后唐诸陵所因之山，虽有群山环绕，但也大都呈“孤耸”之态，其墓室所因之山俱为陵区的制高点。皇陵追求“高敞”“孤耸”之势，既可凸显皇陵的独特和威严，又可兼顾避免地下水侵蚀的实际功用。可辽祖陵却反其道而行，选址于多面环山的山谷之中，其玄宫位于陵园内最北部一条山岭的东端[5]，并非陵园的制高点。



图一 辽祖陵航测图

辽祖陵独特的择址方式，在中原帝王陵墓中确无先例，但如将考察范围扩大，可发现蒙古国境内的回鹘墓园亦依山谷而建。近些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共计 40 座方形墓园，这些墓园均坐落在杭爱山脉与鄂尔浑平原交接处的东西走向的山谷中，很可能是回鹘可汗或贵族的家族陵区[6]。例如，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的赫列克斯浩莱山谷，属于杭爱山脉东段与鄂尔浑河谷相接之处的边缘地带，其东侧为宽阔平坦的鄂尔浑河谷。山谷为东西向，东西长 2180 米，南北宽 1200 米，在山谷坡地即谷底有 7 座回鹘墓园和少量蒙元时期的墓葬[7](图二)。据此可知，远在契丹人营建辽祖陵之前，回鹘人就已经在山谷之中大量营建墓园了，那么辽祖陵选址于山谷之中，是不是因受回鹘墓园的影响呢？如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可发现以上推断是有根据的。

从文化渊源来看，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回鹘强盛之时，“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8],《旧唐书·契丹传》也记载：“契丹旧用回鹘印。”[9]随着回鹘汗庭西迁，其旧地为契丹所占，有大批回鹘人进入契丹社会并发挥着重要作用[10]。西迁后的回鹘，反过来向辽称臣纳贡，“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11]。契丹也在辽上京南门之东设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12]。因此，契丹深受回鹘文化影响实属必然，诸多学者已在契丹的



图二　赫列克斯浩莱山谷的回鹘墓园

族源传说[13]、宗教信仰[14]、语言文字[15]、职官制度[16]、楼居习俗[17]等方面论述了回鹘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

从祖陵的营建背景来看，祖陵营建的最高负责人皇后述律平就是回鹘人[18]。《辽史·外戚传》记“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19]，那么她对回鹘的葬俗应该不会陌生。《旧唐书·回纥传》记载：“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20]与之相似，辽太祖下葬时，述律后亦“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21]。不仅如此，述律后还利用人殉旧俗，排除异己，对于政见不同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即杀之”[22]。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辽祖陵采用回鹘墓园的选址标准，也是述律后抬高回鹘后裔一系在辽的地位，加强自身统治的手段。

考古资料也可证明，契丹人对回鹘墓园是非常熟悉的。蒙古国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5号墓园的东北围墙角内侧和东南围墙角外侧堆积着大量的草木灰土，该灰土层叠压于围墙及围墙倒塌的土堆积之上，灰土中包含许多碎砖块和契丹篦线纹、篦点纹陶片。这些现象表明，早在辽代，墓园围墙和部分建筑已经出现坍塌，契丹人曾在墓园附近游牧生活，甚至举行过一些祭祀性的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生活垃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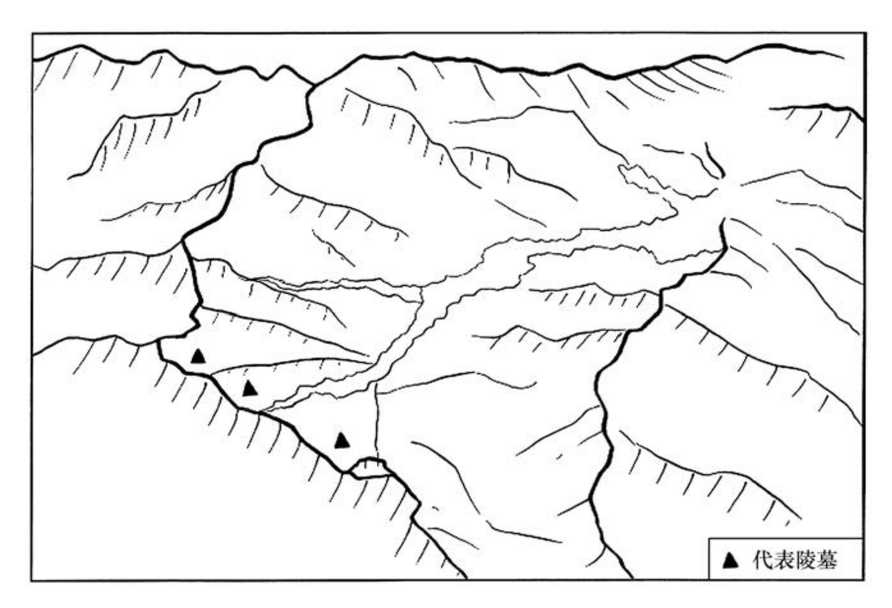
可见，无论是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参考近年的考古资料，都可旁证上文的推断，即契丹人于山谷中营建祖陵，应是受回鹘墓园择址标准之影响。

二、回鹘墓园对辽庆陵的影响

庆陵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是圣宗之永庆陵、兴宗之永兴陵、道宗之永福陵的统称或俗称[24]，也是辽代营建的最后三座帝陵。相比于祖陵，回鹘墓园对庆陵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陵墓的选址上，更体现在祭祀建筑的形态上。

（一）庆陵的选址

可能是出于其特殊的营建理念，祖陵所在的山谷高峻而封闭，加之以石墙来封堵山脊的低洼处，使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庆州三陵所在的山谷[25]（图三）则更加开阔、平缓，且没有用石墙对山谷进行封闭，也没有将山谷分隔为南北两个陵区，从而使庆陵不仅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也完全保留了山谷的自然形态。这种开放性的选址方式和对山谷本身形态的保留，使得庆陵的选址条件与回鹘墓园更加接近，因为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回鹘墓园所在的山谷，地势也都比较开阔和平缓，在山谷外即是开阔平坦的河谷地[26]。



图三　庆州三陵航拍图

在陵区分布上，庆州三陵分布在相邻的三座山谷内，按照方位可称之为东陵、中陵和西陵，三陵各自有独立的陵门、神道和陵前建筑群。庆陵利用山谷自身天然的地理界限来别亲疏、分陵区，这种既相对集中又各自独立的陵区划分方式，是与回鹘墓园不谋而合的。例如，在蒙古国杭爱山脉东麓的胡拉哈山谷、浑地壕莱山谷、乌布尔哈布其

勒山谷均有回鹘墓园[27]（图四），而以上三座山谷自南而北，相邻而列，与庆州三陵的分布形态非常相近。可见，无论是在单个陵墓的选址，抑或是多个陵墓之间的排列与分布，庆陵都与回鹘墓园极其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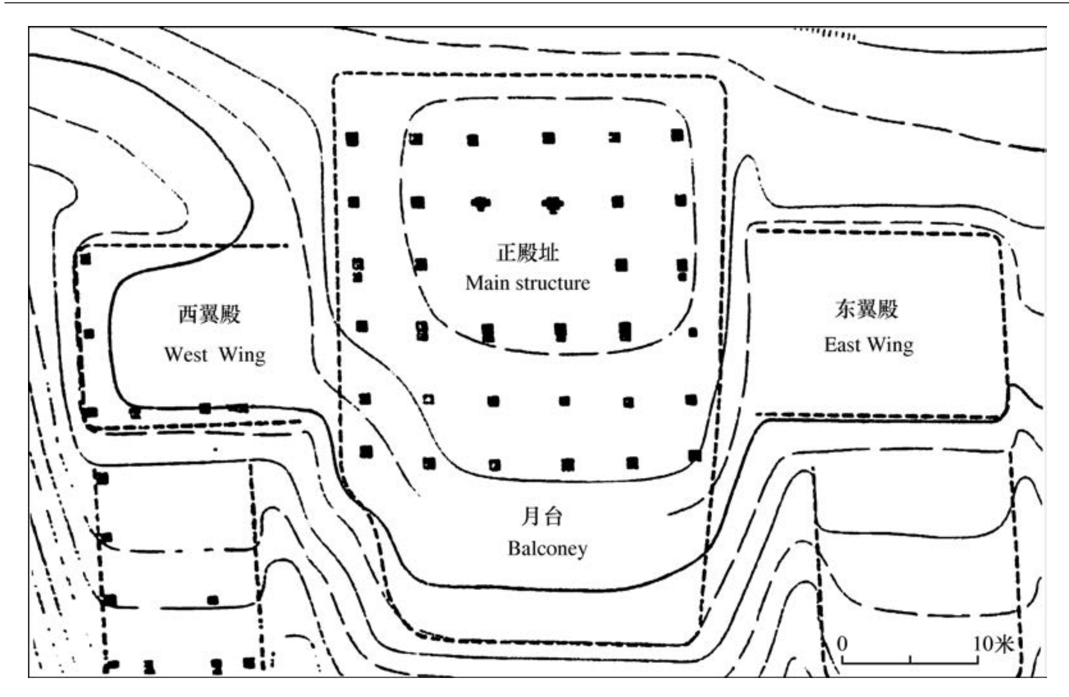


图四　胡拉哈山谷、浑地壕莱山谷、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卫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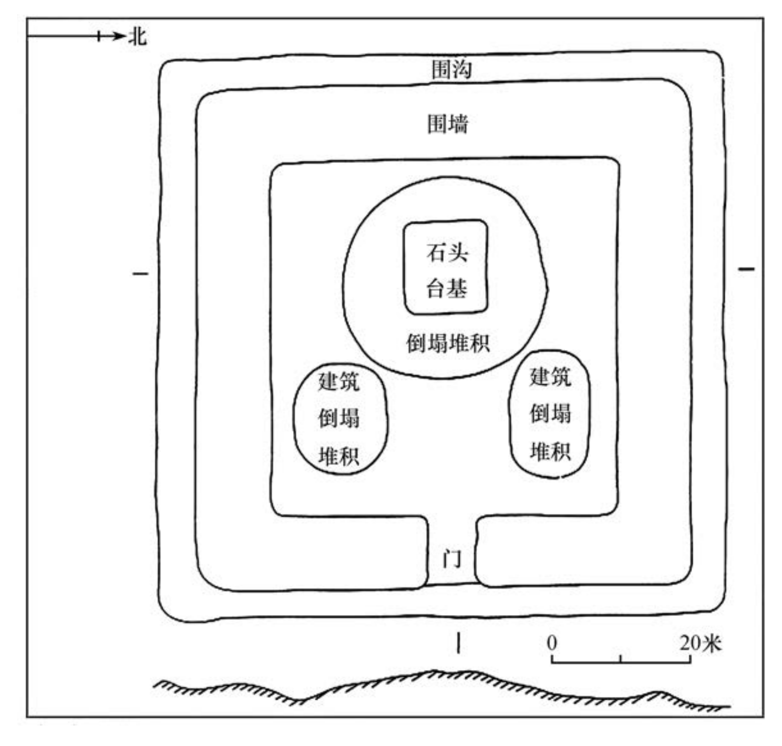
（二）庆陵的祭祀建筑

庆州三陵祭祀建筑的规制基本相同，玄宫前均有规模宏大的“前殿址”，“前殿址”面朝东南，包括“正殿址”、东西翼殿、南门和用于围成封闭空间的廊房。发掘结果显示“正殿址”的台基上曾有面阔五间、进深五间、边长24米左右的正方形木构建筑（图五）[28]。需要指出的是，自汉魏以来，无论是宫殿或是宗庙、宗教建筑的平面都由方形渐渐转变为长方形[29]，辽陵亦不例外。在庆陵方形平面的“正殿址”出现之前，被认为是辽陵具有“献殿”性质的祖陵甲组建筑[30]、怀陵M1和M2前的祭殿址[31]、显陵偏坡寺一号基址和乾陵琉璃寺遗址中部院落大型建筑基址[32]，其建筑平面均为长方形。因此，庆州三陵突然出现三座方形建筑平面的“正殿址”，必有其特殊的渊源，这种渊源可能与回鹘墓园有关。

目前发现的回鹘墓园，以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五号墓园（图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该墓园坐西向东，围墙平面为正方形，边长65米，东墙正中有门址。1号建筑台基是墓园的中心建筑，平面为方形直壁，台基边长约为16米，正中央部位夹藏一座大型的砖砌墓，墓室正上方的台基顶部残存圆形建筑墙体，直径约8米。另有2、3号建筑台基分别对称分布于1号台基东南和东北部，平面均为长方形，东西长约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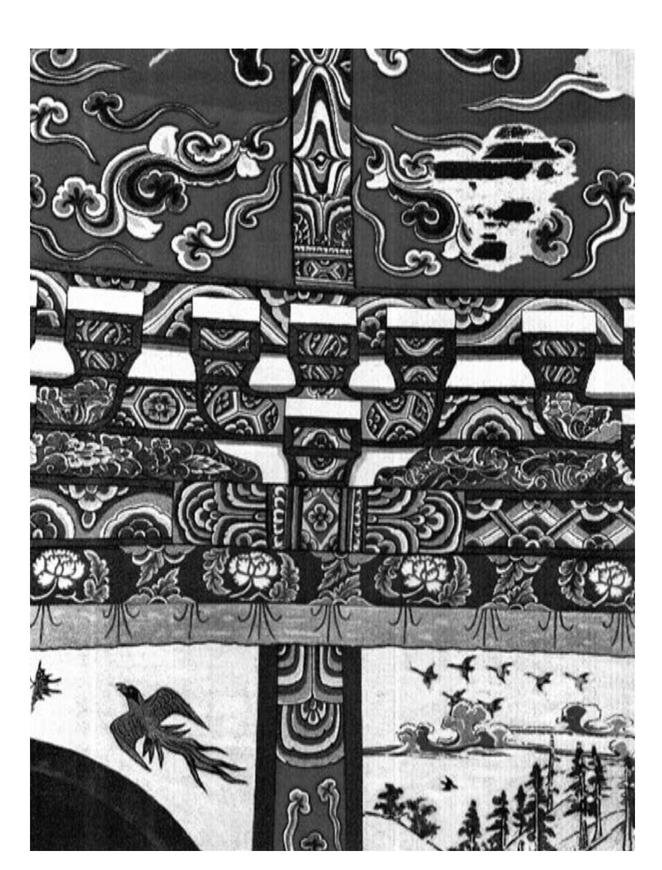
图五　庆东陵“正殿址”及其翼殿



图六　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五号墓园

米，南北宽 10 米，面阔三间，进深一间，2、3 号建筑台基应为 1 号建筑台基的配殿[33]。在已公布的资料中，1 号建筑台基上的圆形建筑残体，是目前回鹘墓园中所发现的唯一可识别出建筑平面的享堂遗迹。其实，绝大多数回鹘墓园的中部发现了享堂台基遗址，台基形状大致可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但其上的享堂则存在着更多种结构和样式[34]。从空间利用和视觉效果来看，无论是方形台基还是圆形台基，其上享堂的建筑平面只能是方形或圆形，而不太可能是中原最常见的长方形。以上认识从倒塌的享堂建筑遗迹中也可得到证明，因为无论是方形台基或是圆形台基，覆盖在其上的建筑堆积多呈圆形，而不是长方形或明显的椭圆形。

也就是说，回鹘墓园享堂的形制与中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而进一步向前追溯，可发现早在突厥可汗和贵族的陵园中，就出现了不同于中原的方形平面的祭祀建筑遗址。譬如，在突厥毗伽可汗的陵园中部发现了边长 16 米的正方形祭祀建筑基址，阙特勤墓园中部和后部各发现一座方形平面的祭祀建筑基址，边长分别为 13 米和 10 米[35]。如此看来，借用方形的台基来营造区别与中原的祭殿，是突厥、回鹘以来游牧民族墓园建设中的惯用手法，其目的，无非是依靠祭殿的平面形式及空间布局来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身份认同。



图七　庆东陵玄宫中室的建筑纹样

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亦非常重视其陵寝建筑的民族特色，庆陵东南向的陵园、圆形的墓室以及以四季捺钵为主题的壁画都是契丹文化因素的体现，即使是在壁画中表现汉式宫殿时，也刻意在铺作层下做出一披帷幕，营造出一种通过毡帐的开口向外而见到了四季捺钵风景的视觉效果（图七）[36]。可见，即使在汉化程度颇深的辽圣宗时期，契丹人依然保持着其建筑的民族化特征。因此，在庆陵出现方形平面的“正殿址”并非偶然，应是为了强调其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身份认同，这也是对回鹘墓园方形享堂台基的一种创造性继承。

至于庆陵“正殿址”上祭祀建筑的形制到底如何，姑且可根据蒙古人在哈剌和林城

西南区营造的“万安宫”做一些推想。“万安宫”主殿平面呈方形，边长为 41 米，从一些学者所绘复原图来看，宫殿中央有高耸的楼阁，其屋面形制为四角攒尖，整座建筑呈现出两层屋檐，外形看起来比较接近一些拂庐类帐幕[37]。我国魏晋以来的古代宫殿建筑中，方形平面及攒尖式屋顶很少被使用，即使是有限的几个案例，如故宫“中和殿”“交泰殿”，也都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后裔入主中原时建造。因此，同样是方形建筑平面的庆陵“正殿址”，采用类似攒尖的屋顶应该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以上也仅仅是一种推测，真正的情形到底如何，还需新资料来进一步证明。

在祭祀建筑的组合形式上，回鹘墓园亦对庆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文所述，在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五号墓园中，位于中心的方形享堂台基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分别有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配殿，三座建筑共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祭祀建筑。这种方形主殿址两侧各置一座长方形配殿的组合形式，亦不见于它处，只有庆陵“正殿址”与其如出一辙，甚至连配殿的形制都同为进深三间、面阔一间，唯一的区别是庆陵“正殿址”两侧的配殿与主殿直接连为一体，气势更加恢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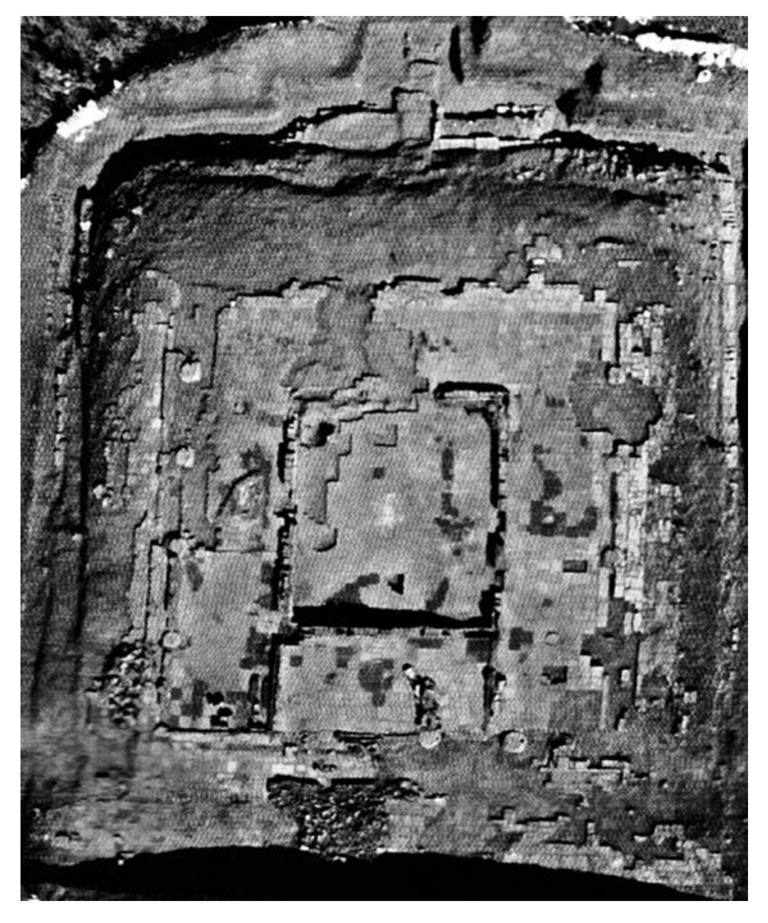
综上可知，无论是庆陵“正殿址”本身的形制，抑或是其组合形式，均可见到回鹘墓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未曾出现在庆陵之前辽代诸陵的祭祀建筑之中。

三、辽祖陵四号建筑的年代

辽祖陵四号建筑（图八）是祖陵一号陪葬墓的祭祀建筑，位于一号陪葬墓东南的山岭之上，平面呈方形，东西进深 24.7 米，南北面阔 23 米，进深和面阔均为五间[38]。关于一号陪葬墓的墓主，已有学者指出其为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39]，但让人疑惑的是，被认为与祭祀太祖直接相关的祖陵甲组建筑 A 基址，东西长 14 米，南北进深 18 米[40]，其上的房址 J1 面阔也不过三间，规模远逊于祖陵四号建筑。陪葬墓的祭祀建筑在规模上竟然远超主墓，这似乎不合逻辑，但考察耶律李胡的生平，或可为我们解开疑惑。

《辽史 · 宗室列传》载：“穆宗时，其子喜隐模范，辞逮李胡，囚之，死狱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统和中，追谥钦顺皇帝。”[41]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 ~ 1012 年），耶律李胡被追封为皇帝，那么其陵寝是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制？祖陵一号陪葬墓采用五室的玄宫，等级低于庆州三陵的七室玄宫，可能是由于李胡下葬在前，追封在后，玄宫不便开启，便保持着下葬时规制未变。但地表的祭祀建筑则可进行重修，如果祖陵四号建筑构建于李胡被追封后，按照当时皇帝的规制重新营建，那么其规模大于辽早期的甲组建筑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参照考古资料，将祖陵四号建筑与庆州三陵的“正殿址”进行对比，可发现祖陵四号建筑与庆陵的“正殿址”毫无二致：从位置上来说，四号建筑位于祖陵一号陪葬墓东南，“正殿”亦位于庆州三陵东南；从建筑平面来看，二者均近似正方形；从规制上



图八　辽祖陵四号建筑基址

来看，二者都是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甚至连建筑基址的边长都在 24 米左右。据此可证明，祖陵四号建筑应和庆陵“正殿址”属同一类型、同等级的建筑，而即使是庆陵中年代最早的永庆陵“正殿址”，也应为辽兴宗初年所营筑，所以祖陵四号建筑也不会是与一号陪葬墓同时期的辽早期建筑，应是辽统和以后，按照当时皇帝的规制重新营建的祭祀建筑。

注　释

［1］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等．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 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57.

［2］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等．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14.

［3］a．王子今．说“高敞”：西汉帝陵选址的防水因素［J］．考古与文物，2005（1）.

b．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J］．中原文物，2010（5）.

c. 焦南峰、马永嬴. 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 考古，2011（11）.

［4］（宋）王溥.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5：395.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J］. 考古，2009（7）.

［6］中蒙联合考古队等. 蒙古浩腾特苏木回鹘陵园遗址发掘有重大收获［N］. 中国文物报，2007-11-02.

［7］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 蒙古国后杭爱省赫列克斯浩莱山谷 6 号回鹘墓园发掘简报［J］. 文物，2016（4）.

［8］（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 246·唐纪六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56：7967.

［9］（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 199·契丹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4.

［10］a. 王日蔚. 契丹与回鹘关系考［J］. 禹贡，1936（8）.

b. 李符桐. 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A］. 李符桐论著全集（第 2 册）［C］. 台北：学生书局，1992：263 ~405.

c. 王民信. 契丹外戚集团的形成［A］. 契丹史论丛［C］. 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73 ~ 87.

［11］（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 26·高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6.

［12］（元）脱脱. 辽史·卷 37·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41.

［13］a. 杨富学. 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J］. 历史研究，2002（2）.

b. 杨军. 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14］a. 王小甫. 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04（4）.

b. 康建国、李月新. 辽朝宗教文化现象刍议［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社会科学版），2011（1）.

［15］a. 厉鼎煃. 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2）.

b. 杨富学. 回鹘文源流考辨［J］. 西域研究，2003（3）.

c. 杨富学. 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J］. 民族语文，2005（1）.

［16］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439 ~ 443.

［17］任爱君. 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1997（2）.

［18］a. 蔡美彪. 辽史外戚表新编［J］. 社会科学战线，1994（2）.

b. 刘景岚. 论辽淳钦皇后述律氏［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c. 张碧波. 契丹与回纥族源文化异同论［J］. 西北民族研究，1999（1）.

d. 康建国. 糯思回鹘身份说新证［J］. 兰州学刊，2009（12）.

［19］（元）脱脱. 辽史·卷 67·外戚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027.

［20］（后晋）刘昫. 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5202.

［21］（元）脱脱. 辽史·卷 71·后妃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200.

［22］（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 13·太祖述律皇后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9.

［23］塔拉等. 蒙古国后杭爱省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 5 号墓园发掘［N］. 中国文物报，2009-10-23.

［24］ 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3）.
［25］ 同［2］：134.
［26］ 同［1］：26.
［27］ 同［1］：15.
［28］〔日〕田村实造等．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的调查报告Ⅰ［M］．京都：京都大学座右室刊行会，1953：113～119.
［29］ 刘庆柱．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J］．考古与文物，1999（6）.
［30］ 同［5］.
［31］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32］ 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试掘［J］．考古，2016（10）.
［33］ 同［23］.
［34］ 同［1］：28.
［35］ 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8.
［36］ 同［28］：101.
［37］ 阿拉腾敖德．蒙古族建筑的谱系学与类型学研究［D］．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8］ 同［5］.
［39］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J］．考古，2016（10）.
［40］ 董新林等．辽代祖陵陵寝建筑初现端倪［N］．中国文物报，2004-11-26.
［41］（元）脱脱．辽史·卷72·列传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3.

The Influence of Mausoleum between the Uighur and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Age of No. 4 Building of Zuling Mausoleum

Liu Yang

Abstract: The discovery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Uighur mausoleum in Mongolia provided new data for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on the ancient cemetery system in China. The Uighur mausoleum is located in an open valley.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in Liao dynasty was also built according to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valleys, which created a mountain city cemetery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iao dynasty. As for the Qingling mausoleum in the late Liao dynasty, they are not only closer to the Uighur mausoleum

in terms of site selection criteria, but also have square foundation and “one main body and two matching” sacrificial buildings, which are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enjoyment hall in the Uighur mausoleum. Taking the square foundation as a clue,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age of the building no.4 of Zuling mausoleum, and believed that the age of the building should b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later, and it was a sacrificial building buil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emperor.

Keywords: Square site; The Uighur mausoleum; Zuling mausoleum; Qingling mausoleum; Sacrificial buildings

岭北金界壕考略*

长　海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呼和浩特，010010）

内容摘要：在蒙古高原东北部有一条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的界壕遗址，全长约 780 千米。这道界壕不见于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因此在很长时间不为世人所知。自 19 世纪中叶发现至今，对其年代、目的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迄今未有定论。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及结合利用 Google 地图，对这道界壕的位置、走向、结构特征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

关键词：金界壕；边堡；修筑时间

在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有一条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的界壕遗址。它东起呼伦贝尔根河左岸支流库力河畔的上库力村，西端止于蒙古国肯特山东南麓鄂嫩河源附近的沼泽地中。这条界壕是金代早期为防御辽契丹贵族残余势力或北部蒙古诸部南下侵扰而修筑的巨大军事防御工程。因其分布于大兴安岭之北，故此我们将其命名为“岭北金界壕”，以示与大兴安岭以南金代漠南、岭南界壕区别。由于这条界壕不见于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又地处北部僻远地区，因此长期以来很少人注意这一道界壕。

一、岭北金界壕的调查与研究概况

岭北金界壕在近代为世人所知，距今也不过一百六十余年。1852 年俄国地理学家、探险家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在满洲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后，将这条界壕称为“成吉思汗边墙”[1]；1897 年屠寄受清政府委托总纂绘制《黑龙江舆图》并附图，称这道界壕为“金源边堡”[2]；1922 年张家璠所著《呼伦贝尔志略》称这条界壕为“兀术边壕”[3]；1930 年俄国人阔尔马左夫所著《呼伦贝尔》一书中认为这道界壕是“拓跋鲜卑的国界”[4]；1932 年出版的《黑龙江志稿》附图中将这道界壕标注为“兀术长城”[5]；1941 年出版的《历代长城考》所附地图上将这道界壕标注为“汉光

---

* 该文章发表于《草原文物》2013 年第 1 期，是在《初析岭北金界壕修筑时间考》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

禄城”[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岭北界壕并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1975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对呼伦贝尔地区的岭北界壕进行普查，普查结束后写了一篇考古报道[7]。1973年春和1980年夏，景爱等同志对中国境内呼伦贝尔段界壕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了界壕的位置、走向、结构以及其附近的边堡遗址，并连续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8]。1977～1987年，米文平、冯永谦等学者先后5次对呼伦贝尔段岭北界壕进行考古调查，并发表了《岭北长城考》[9]。从2007年开始，国家对长城资源开展了调查，运用GPS定位仪获取了金界壕的经纬度坐标、墙垣的长度等数据，加深了对岭北金界壕的具体位置、走向、结构、布局等感性认识[10]。

二、岭北金界壕构筑特点

（一）岭北金界壕的位置及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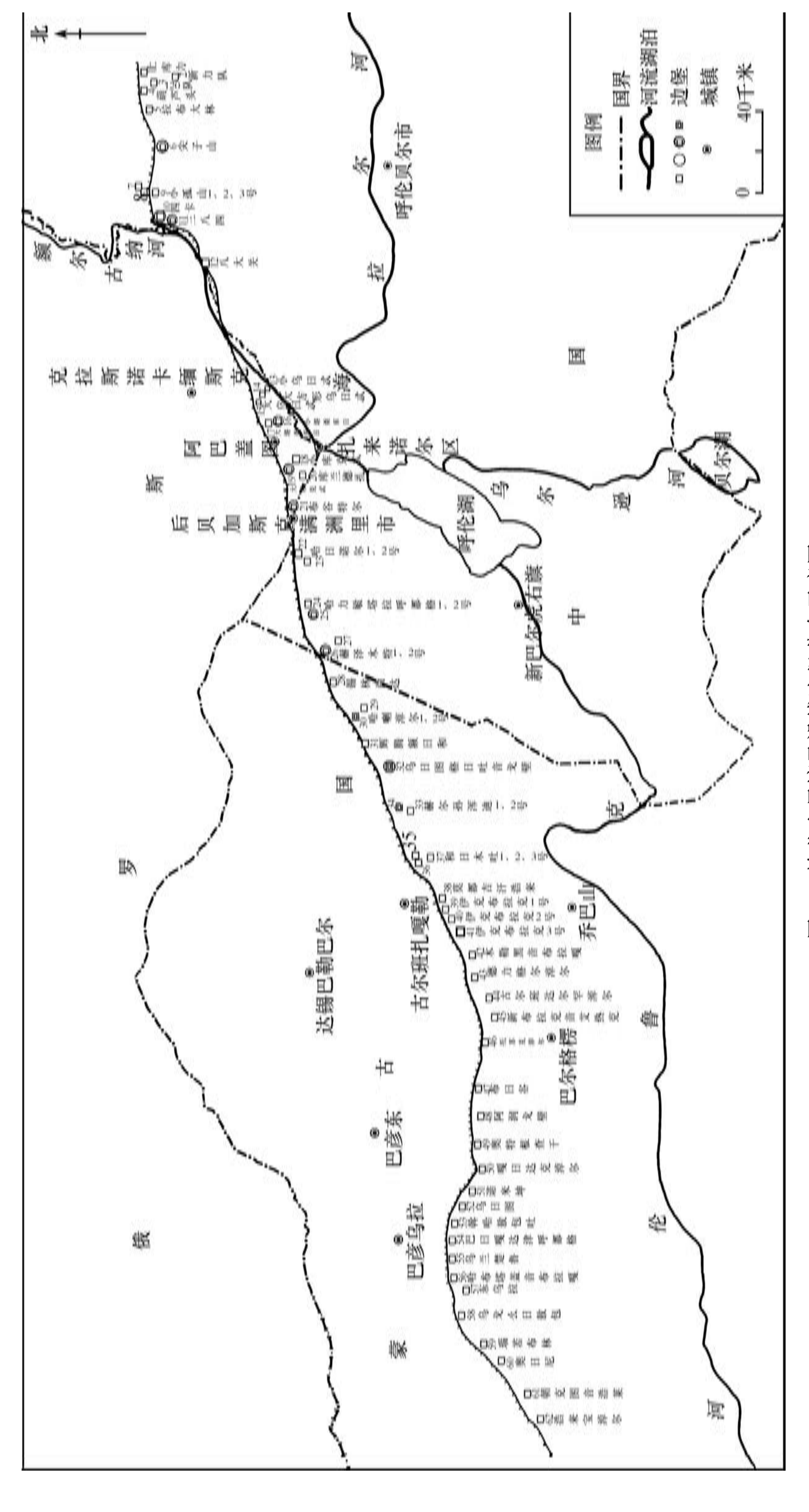
岭北金界壕，主要分布于漠北草原东部地区，即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蒙古国东方省、肯特省以及俄罗斯赤塔州中南部地区。东端为根河左岸支流库力河西岸约3千米处的沼泽中。地理坐标为北纬50°14′48.80″，东经120°19′51″。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前伸，沿着根河左岸由东向西经过拉布大林、黑头山镇，至四卡后，折而沿额尔古纳河南岸西南行，至红山嘴处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俄罗斯赤塔州。界壕又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达外贝加尔斯克附近又转入中国满洲里境内（满洲里市政府西北8.1千米处中俄边境35号界碑），界壕继续向西南方向穿过新巴尔虎右旗，至哈日诺尔湖北岸处（635号中蒙界标）出境进入蒙古国东方省内，又向西南方横穿东方省乔巴山、古尔班扎嘎勒、色尔格楞、巴彦东、巴彦乌拉苏木，再西南向伸入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至巴彦阿达尔嘎苏木的西侧，三河之源的沼泽地，肯特山山脉南麓。其终止处为北纬48°23′44.15″、东经111°27′45.95″。岭北金界壕全长780余千米，沿线保存下的边堡共62座。其中在中国呼伦贝尔市境内长260千米，保留了19座边堡；蒙古境内长约410千米，沿线有边堡34座；俄罗斯境内长约110千米，发现了9座边堡（Google地图上搜集）（图一）。

（二）岭北金界壕结构与边堡

岭北金界壕的形制结构简单，由以墙壕结合的主体设施及其辅助边堡组成，是金代修筑界壕的雏形阶段。

1. 界壕墙壕

岭北金界壕主体设施由墙、壕沟组成。其筑法是平地挖掘壕沟，在挖掘过程中所取出之土，均堆积在壕内侧夯筑墙体，从而形成由墙壕结合的一道双障防御线。掘壕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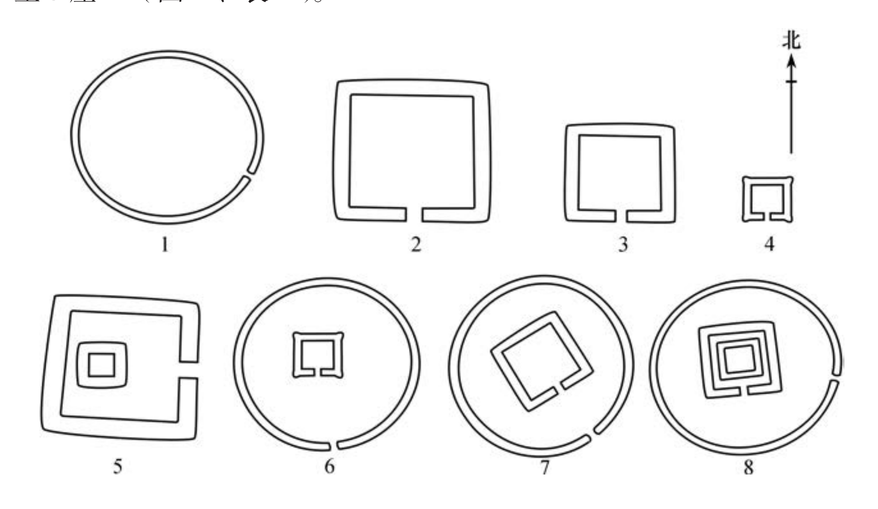
图一　岭北金界壕及沿线边堡分布示意图

以防御战马冲越。掘壕取土在内侧筑墙，更加阻止了骑兵前进。

据考古调查所见，岭北金界壕的墙基 5 ~ 6 米宽，壕底 8 ~ 10 米宽，现存深度 0.5 ~ 1 米。其结构均为单线墙壕，墙体外侧未设有马面（表一）。

2. 边堡

岭北界沿线的边堡功能是，为前沿指挥机关以调遣士卒、部署战斗、保证供给等，其作用与历代长城的障城一样。我们利用 Google 地图现已在岭北界壕沿线发现边堡 62 座。这些边堡城墙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墙筑堡。东南或南墙中部开一门。墙体上无马面、角楼、瓮城（Bc 部分边堡门外设置瓮城，四角有角楼）等附属设施。依据边堡形状差异、规模大小大致可分 A、B、C、D 四种类型，其中 A 型 8 座、B 型 43 座、C 型 2 座、D 型 9 座[11]（图二、表二）。



图二　岭北金界壕边堡分类示意图

1. A 型　2. Ba 型　3. Bb 型　4. Bc 型　5. C 型　6. Da 型　7. Db 型　8. Dc 型

A 型　形状呈圆形，直径一般为 150 ~ 170 米，大者达 200 米，小者 100 米。外侧挖土，内侧推土。东南部开一门，宽一般 10 米。此类堡分布在东起根河往西至克鲁伦河下游谷地乔巴山市附近（岭北界壕中东段）的界壕内侧 2 ~ 4 千米内，每座边堡间相隔 20 ~ 30 千米。现已发现 8 座，其中在我国境内 1 座，俄罗斯境内 3 座，蒙古国境内 4 座。

B 型　形状呈方形或长方形。根据规模大小分为 Ba、Bb、Bc 三亚型。

Ba 型　呈近方形，边长 90 ~ 110 米，在东墙中部开宽 10 米门。此类边堡在界壕沿线共发现 3 座，其中在我国境内 1 座，俄罗斯境内 1 座，蒙古国境内 1 座。

Bb 型　边长 50 ~ 70 米，在东墙或南墙设一门。此类堡均分布在界壕线墙体内侧 1 ~ 3 千米，每座边堡间相隔 8 ~ 10 千米，在界壕沿线共发现 14 座，其中在我国境内 4 座，蒙古国境内 10 座。

Bc 型　边长 30 ~ 50 米，分布于界壕线内侧的 0.5 ~ 4 千米处。大部分边堡无角楼、瓮城，仅部分边堡门外带瓮城，四角筑有角楼，南墙或东墙设一门，宽 4 ~ 6 米。此类堡数量最多，在界壕沿线共发现 24 座，其中在我国境内 7 座，俄罗斯境内 2 座，蒙古国境内 17 座。

C 型　形状呈“回”字形。均为 Ba 型内设 Bc 型组合型边堡，内外边堡不在一个中轴线，门均设在东墙。外堡边长 125 米，内堡边长 30 米。此类边堡数量较少，分布于平坦草原地区，在蒙古国境内发现 2 座。

D 型　形状呈圆套方，似铜钱式平面形式。在直径 100 ~ 170 米 A 型堡内设 Bb 型、Bc 型或 C 型堡的组合型堡。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河附近。现发现了 9 座，其中在我国境内 5 座、俄罗斯境内 3 座、蒙古境内 1 座。

（三）岭北金界壕总体特征

根据这条界壕的所处的地理形势、结构布局、形状特征来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1）在地形选择上：由于起止两端均是沼泽地，通行不便，不利于战斗行动，故无需设边堡。岭北界壕从东端开始沿着根河走向，北以根河为天险，每隔 10 ~ 20 千米建边堡，至额尔古纳河之后，沿河流走向，由于河水深、流急，故未建边堡。在离开额尔古纳河以后，界壕又沿着克鲁伦河中上游，在平坦草原上穿行，故每隔一段便修筑边堡。这表明界壕以内边堡的分布配置，充分考虑到地理条件，有天险可以利用的地段，尽量少建边堡，且堡间隔距离较远；没有天险可以利用的大草原上，边堡则间隔距离较近，以便于相互援助。多数边堡设置在界壕内侧且间隔适当距离，少数设在界壕外侧的山冈上或制高点上。

（2）在边堡兴建早晚关系上：A 型、Ba 型堡保存状况差、数量较少，分布在额尔古纳河和克鲁伦河中游地区的界壕沿线地区；Bb 型、Bc 型堡数量多、保存情况较好，有些 Bc 型堡附属防御较齐全。这 A、B 型堡分布在整个岭北界壕沿线；C、D 组合型堡，数量较少，结构复杂，分布空间上与 A 型、Ba 型堡重复。从边堡的保存状况和形制布局可以断定，这些边堡不是同一时间修筑，首先修筑的是 A 型、Ba 型堡；其次为 Bb 型堡；最后修筑的是 Bc 型堡。岭北界壕和其附属边堡经历了三次修筑（缮）的过程。第一次为修筑界壕的同时修筑 A 型、Ba 型边堡，也就是根河支流库力河河畔往西延续至克鲁伦河下游谷地附近。其中形状独特的 A 型仅发现在岭北线，与其他线路边堡有所不同，圆形堡很显然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这与当地呼伦贝尔草原塔塔儿部有密切的联系，应是金朝和塔塔儿共同的杰作。第二次修筑时完缮原来的界壕，并向西修筑了 Bb 型新堡。将界壕延伸至乌勒吉河源头与额尔古纳河源的沼泽地中，就是岭北界壕的西端。修筑 Bb 型堡时，有些沿用原边堡，并其内建新边堡成了现在的 C、D 型边堡。

但大多数边堡放弃原A型边堡，另选新址。经两次修界壕基本完成岭北界壕军事防御工程。第三次，修缮整个线界壕、边堡，并补筑Bc型新堡。前两次修筑是基本完成防御工程，第三次是修缮界壕，补增边堡，三次修筑（缮）间隔时间不会太长[12]。

（3）在形制结构上：岭北界壕作为防御北边游牧骑兵侵扰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其建造水平和防御力比之岭南界壕相对较差，形制、结构、规模上属于早期雏形阶段：界壕防御工程规模小，墙低、壕浅，且无马面；边堡布置较随机，数量少，分布密度低，且防御设施单薄，边堡墙上无马面、瓮门，部分有角楼和护城壕，有较特殊的铜钱式平面形式，此类型具有早期军事边堡的特征[13]。

三、岭北金界壕修筑年代探析

在金界壕相关问题研究领域中，岭北金界壕的断代问题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自从19世纪中期，俄国人克鲁泡特金在中国境内发现“成吉思汗边墙”之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这道界壕的断代问题。在外国学者中，日本学者均认为其为辽代所筑，蒙古和西方学者多沿用俄国人的旧说，均称为“成吉思汗边墙”。蒙古国部分历史学者也根据《蒙古秘史》“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栏住”[14]的记载，认为界壕为蒙古帝国窝阔台汗时期修建。

国内学术界主要流行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界壕为辽代所筑，另一观点认为界壕为金代修筑。景爱《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时代》《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探索》[15]两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他提出：“关于边壕的时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这是辽代为防御乌古迪烈部的侵扰，保护克鲁伦河、哈拉哈河、海拉尔河流的农牧经济而修建的一道军事工程。”[16]张泰湘、徐俐力、孙秀仁先生赞同此观点，都认为岭北金界壕是辽代所筑。但是米文平、冯永谦等学者认为是金代所筑。米文平《金代呼伦贝尔诸部及界壕》中，明确认为“其（岭北界壕）年代为金初与蒙古战争的防御设施”[17]。李丕华《蒙古高原边墙考》认为岭北金界壕是“泰州都统婆卢火在1135年前主持修筑的”[18]。由以上两种说法可以看出，对岭北界壕的断代仍不能有肯定的结论，并且修筑目的更为模糊，需要继续深入研讨。

据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它是金初为了防御耶律大石东征复辽而修筑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

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朝后，与北宋建立海上之盟联合灭辽，1125年金灭辽朝，1127年金又灭北宋。形成了北起外兴安岭，东到大海，西北到西北蒙古草原，西与西夏接壤，南以淮河、秦岭与南宋为界的大金国。在金朝不断强大的同时，游牧于西北蒙古草原的诸部族也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侵扰金的边疆。尤其是1124 ~ 1130年，耶律大石[19]控制漠北之后，直接威胁了金朝后方的安定。

耶律大石于1123年和金军战于奉圣州（今涿鹿），兵败被俘，后逃奔夹山（今武

川县附近）。后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置北、南院官属，北至可敦城。利用原有的军事政治中心可敦城[20]（土剌河河畔）作为驻地，召集边地七个州城和塔塔儿、蒙古、克烈亦惕、弘吉剌、蔑儿乞惕、乃蛮等十八部王众，宣告“消灭敌人，恢复疆土”。之后，《金史》上也详细记载耶律大石的漠北军事活动，《金史·粘割韩奴传》载：“太宗二年（1124年），辽挞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二行。功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1125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1129年），泰州婆卢火奏：‘大石（耶律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牧群，宜列屯戍。’昭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21]

这一段史料给我们泄露了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1124～1129年，与泰州都统婆卢火对立的耶律大石，在漠北的军事势力逐渐强大，并与西夏交往，给金朝以掣肘之忧。并且更可怕是，他的部众顺着克鲁伦河逐渐靠近女真人的“金源内地”，给金朝西北边境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金天会七年（1129年），婆卢火得知辽耶律大石已接近边界时，他向皇帝请求“列屯戍”，但太宗认为若以二营之故发兵，必会惊扰草原清部，当下只应谨慎侦察敌情。“列屯戍”意味着要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沿界壕、边堡等军事工程驻扎屯田戍边。

由此可以推断，天会七年（1129年）以前在泰州婆卢火的筹划和主持下，在金国西北边部，已经修筑了一道军事防御工程。此道界壕是用来防御耶律大石东征复故土，其功用十分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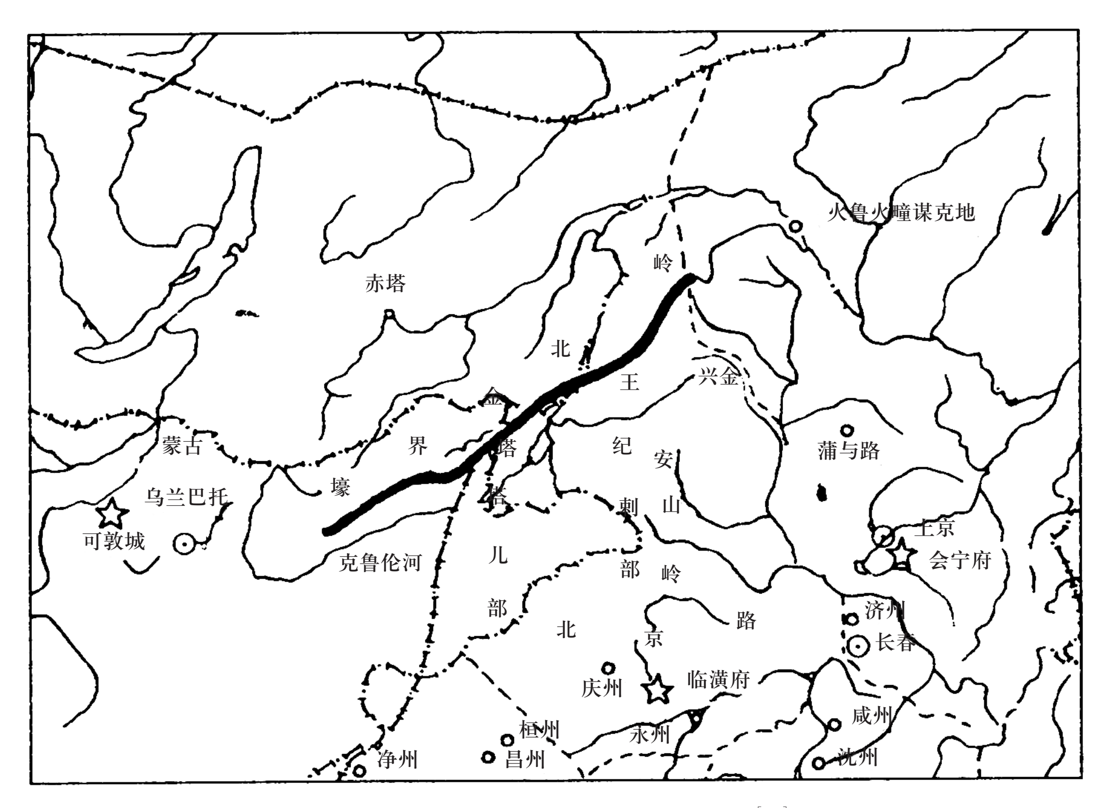
那么，婆卢火对岭北金界壕的修筑工程何时开始施工，何时竣工？

婆卢火于天辅五年（1121年）任泰州都统后，对随同迁徙的诸猛安谋克进行妥善的安置后，次年（1122年）十二月又率军投入灭辽战场。据《金史·婆卢火传》载：“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22]之后，天辅七年（1123年）四月，金太祖命习古乃、婆卢火护送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金源内地”，同年十一月，婆卢火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征讨迭刺叛乱。《金史·婆卢火传》载：“婆卢火、石古乃讨平之，其群官率众降者，就使领其所部。”[23]天会七年（1129年）征讨迭剌叛乱之后，婆卢火再也没返回战场，《金史》也无关于他的记载，直到金天会七年（1129年）《金史》里记载，婆卢火向金太宗上奏知辽耶律大石已接近北边之事。天会八年（1130年）“泰州婆卢火守边屡有功，太宗赐衣一袭，并赐其子剖叔。八年，以甲胄所赐所部诸谋克”[24]。由此可以判断，从天会二年（1124年）开始，婆卢火组织其管辖的猛安谋克军民，进行浚壕筑墙，至天会七年（1129年）胜利竣工。

其实，《金史》卷24《地理志》序言中已明确指出岭北金界壕是婆卢火所浚。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之壤地封疆……北自蒲与路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历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

北。”[25]对描述金朝疆域形势的“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一句，应如何理解？诸多学者认为“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是指大兴安岭东麓金东北路界壕。但李丕华在《东北史地》2004 年第 3 期上发表的《蒙古高原边墙考》文中，首次提出：“《金史·地理志》序言中所说的界壕是指泰州都统婆卢火在今呼伦贝尔草原西北部修筑的这道 700 余千米的古代边墙，而并非大兴安岭东麓东北起自嫩江右岸那道边墙。”[26]

《金史·地理志》序言里的“婆卢火所浚界壕”这一描述显然是指金朝的西北界，从金早期的疆域范围上考虑，金代最早的“北边”，在蒲与路（今克东县境）之北三千多里的“火鲁火疃谋克地”，即外兴安岭某地（今属俄罗斯境）。接着“右旋入”至“婆卢火所浚界壕”再西经临潢（今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金山（今大兴安岭），跨庆（今巴林右旗东北部的白塔子）、桓（今正蓝旗黑城子古城后迁四郎古城）、抚（今张北境）、昌（今太仆寺旗九连城古城）、净（今城卜子古城）州之北。用一连串地名为坐标，来表示戍“边线”。由此可知，“婆卢火所浚界壕”就是金初为防御西北游牧民族的戍守之“边”（图三）。



图三　金国初期疆域及岭北金界壕分布图[27]

金灭辽后，招服草原各部。当时与金朝相邻的北部、西北部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部族主要有塔塔儿、蒙古、汪古部、弘吉剌、合塔斤、山只昆等，统称“鞑靼”。其中居

住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一带的强大的塔塔儿部，企图借金的势力霸占草原，从而最先与金朝建立臣属关系，担负金岭北界壕的戍防任务。

塔塔儿和蒙古有世仇，蒙古部经常来骚扰金北边。游牧在斡难河、克鲁伦河、土剌河及其源头不尔罕山中心的蒙古诸部，在合不勒汗、俺巴孩汗、忽图剌汗等相继领导下，结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他们同塔塔儿部一向交恶，互借仇怨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金朝利用这个矛盾，支持、挑动塔塔儿攻打蒙古部。成吉思汗曾祖俺巴孩汗、伯祖斡勤巴儿合黑都被塔塔儿人所执送金处死。

忽图剌汗即位之后，为报仇雪恨与金国和塔塔儿"连战十七次"，与塔塔儿部的阔湍巴剌合及札里不花"打了十三次仗"，与金直接对战四次。第一次，（1135 年冬）"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馨奉诏往征之"[28]。第二次，天眷二年（1139 年），金熙宗"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今大兴安岭）"[29]。第三次，金皇统三年（1143 年），"蒙古复叛金，金主亶（熙宗）奉命讨之"[30]。第四次，金军征讨蒙古，始于金皇统六年（1146 年）。同年八月，"领汴京行台尚书省事萧博硕诺（《大金国志》作萧保寿奴）与蒙古议和，割西平河（今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伦贝勒[31]（《国志》作敖罗孛极烈）为蒙古国王，蒙人不肯"。十一月，宗弼"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绍兴十七年（1147 年）三月，蒙古与金人始和，岁遗牛羊米豆帛绢之属甚厚。于是蒙古鄂伦贝勒乃自称祖元皇帝，建元天兴。金人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32]

由于蒙古部人天生彪悍，其骑兵具备相当强劲的越野和越障能力，岭北界壕的单靠墙壕防线，丝毫阻挡不了大规模骑兵攻击，故经常被突破。1135 年金朝与蒙古战争爆发后，蒙古骑兵已经跨越了岭北界壕的军事防线追袭到金上京会宁府西北。战争结束后，金朝"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予蒙古，证明了岭北界壕失去了抵挡蒙古骑兵的防御功能。金朝把军事防线从克鲁伦河和额尔古纳河一带的界壕军事防线向南退，塔塔儿和弘吉剌部居住地内侧、大兴安岭东麓再加"遣精兵分据要害"，以防范北部蒙古。

四、岭北金界壕的防御作用

岭北界壕是金王朝建造的地理位置最偏北的军事防御工程，它贯穿于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东方省和肯特省、俄罗斯赤塔州。岭北界壕的修筑形成了以金上京会宁府为防御中心的西北边疆第一道军事防线，其最初的修筑目的是阻扼耶律大石东征复辽的军事行为。1135 年蒙金战争爆发后，岭北界壕经常被突破，便成为反复争夺的多事

之地。虽然此时的金界壕是单墙单壕形式，且边堡数量较少，但它防御线的长度和边堡的布局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岭北界壕的修建，使金朝发源的龙兴之地上京会宁府的防御压力得到很大缓解，尤其对金朝初期西北疆域的开拓、屯田戍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表一　岭北金界壕分布一览表

分段界壕名称	位置	走向	形制、规模	备注
中国额尔古纳市段岭北界壕	额尔古纳市南部	东起上库力村西，沿着根河南岸至额尔古纳河东岸四卡南侧后进入陈巴尔旗。大致呈东西走向，长80千米	土筑墙体，基宽约10米，顶宽约2米，残高约0.52米，壕堑宽5～6米，深约1米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中国陈巴尔虎旗段岭北界壕	陈巴尔虎旗北部	东由额尔古纳市进入，沿额尔古纳河右岸向西南延伸，至红山嘴北越过俄罗斯塔尔州境内。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60千米	土筑墙体，基宽7～10米，残高0.2～1.5米。壕堑5～6米，深0.3～1米	
中国满洲里市段岭北界壕	满洲里市北部	由俄罗斯赤塔州进入满洲里市北部，横贯满洲里市北部，向西进新巴尔旗。大致呈东西向，长约50千米	土筑墙体，基宽8～10米，残高0.4～1.8米，壕堑宽5～6米，深入0.3～1米	
中国新巴尔旗右旗段岭北界壕	新巴尔旗右旗北部	由满洲里市进入，经哈日诺尔湖北岸向西，进入蒙古国东方省内，大致呈东西走向，全长约70千米	土筑墙体，基宽8～10米，残高0.3～2米，壕堑宽5～6米，深度0.2～1.1米	
俄罗斯境内的岭北金界壕	赤塔州中南部	由东而西方向穿越赤塔州中南部，全长约110千米		参见Google地图
蒙古国境内岭北金界壕	东方省和肯特省的东北部	由中国境内出去，经东方省古尔班扎嘎勒、色尔格楞、巴彦东、巴彦乌拉苏木再西南向伸入肯特省瑙若林苏木，至巴彦阿达尔嘎苏木的西侧，三河之源的沼泽地。基本上呈东西走向。蒙古境内长约410千米	墙体宽5～8米，残高0.5米左右，壕堑宽4米	详见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表二　岭北金界壕沿线边堡一览表[33]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1	上库力	额尔古纳市上库力乡西南 5.2 千米		56 米 ×56 米	南 55 米	岭北金界壕东端第一边堡	中国	北纬 50°14′57.07″ 东经 120°24′19.56″
2	新力队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新力屯西南 1.0 千米		35 米 ×35 米		上库力边堡西南 18.6 千米	中国	北纬 50°04′59.76″ 东经 120°22′09.75″
3	120 队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 120 队东北 5.7 千米		35 米 ×37 米	西北 7.3 千米	上库力边堡西南 9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0′59.16″ 东经 120°19′54.40″
4	葫芦头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葫芦头村西北 3.1 千米		35 米 ×35 米	西北 1.18 千米	120 队边堡西北 12.6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2′20.80″ 东经 120°09′31.03″
5	拉布大林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西		50 米 ×50 米			中国	待查
6	尖子山	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西南 22.4 千米		直径 110 米 / 56 米 ×56 米	0 米	葫芦头边堡西南 20.63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1′04.51″ 东经 119°52′17.38″
7	小孤山 1 号	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东北 3.6 千米		40 米 ×40 米	南 1.7 千米	尖子山边堡西北 19.24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3′59.20″ 东经 119°36′45.62″
8	小孤山 2 号	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东北 3 千米		97 米 ×87 米	南 900 米	小孤山 1 号边堡西南 0.8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3′36.00″ 东经 119°36′28.12″
9	小孤山 3 号	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东 2.5 千米		45 米 ×45 米	北 160 米	小孤山 2 号边堡西南 1.03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3′01.72″ 东经 119°36′22.40″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10	四卡（库克多博卡伦）	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西 14.5 千米		直径 102 米 /53 米 × 50 米	0 米	小孤山 3 号边堡西南 17.05 千米	中国	北纬 50°12′20.60″ 东经 119°22′04.80″
11	三八四	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四卡村南 10 千米		外圆不清，方边长 28 米			中国	待查
12	八大关	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乌兰础鲁嘎查西北 64.6 千米		55 米 × 55 米	西北 73 米	四卡边堡西南 32 千米	中国	北纬 49°58′57.20″ 东经 119°05′08.44″
13	小乌日忒	凯拉斯图伊镇西南 15 千米		30 米 × 27 米	5.4 千米	八大关边堡西南 66.73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44′30.80″ 东经 118°14′07.46″
14	大方形乌日忒	凯拉斯图伊镇西南 14 千米		110 米 × 110 米	4 千米	小乌日忒边堡西北 3.3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46′08.90″ 东经 118°12′59.76″
15	大乌日忒	凯拉斯图伊镇西南 13.8 千米		直径 158 米	2.21 千米	大方形乌日忒西北 1.67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47′02.14″ 东经 118°12′37.78″
16	小塔桑库日	阿巴盖图伊镇东北 8.1 千米		直径 150 米	3.5 千米	大乌日忒西南 15.96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43′16.13″ 东经 118°0′27.70″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17	大塔桑库日	阿巴盖图伊镇东北 8.8 千米		直径 150 米 /50 米 × 50 米	216 米	小塔桑库日西北 4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45′20.50″ 东经 117°59′37.26″
18	小库克忒	阿巴盖图伊镇西南 10.7 千米		45 米 × 45 米	600 米	大塔桑库日边堡西南 23.64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38′35.00″ 东经 117°42′51.00″
19	大库克忒	阿巴盖图伊镇西南 11.1 千米		直径 150 米 / 60 米 × 60 米	225 米	小库克忒边堡 0.43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38′40.86″ 东经 117°42′27.06″
20	库兰德扎	库兰德扎镇南 2.5 千米		直径 200 米	4.8 千米	大库克忒边堡西南 8.88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35′13.50″ 东经 117°37′21.24″
21	布谷特尔	后贝加尔斯克镇 8.8 千米		直径 150 米 /57 米 × 55 米	0 米	库兰德扎边堡西北 13.66 千米	俄罗斯	北纬 49°38′38.30″ 东经 117°42′40.88″
22	哈日诺尔 1 号	新巴尔右旗呼伦镇五三嘎查西北 3.6 千米		31 米 × 30 米	西北 3.16 千米	布谷特尔边堡西南 25.2 千米	中国	北纬 49°36′0.00″ 东经 117°6′52.00″
23	哈日诺尔 2 号	新巴尔右旗呼伦镇五三嘎查西北 3.6 千米		直径 160 米	西北 4.8 千米	哈日诺尔 1 号西南 1.69 千米	中国	北纬 49°35′6.89″ 东经 117°7′01.06″
24	哈力敏塔拉呼都格 1 号	新巴尔右旗达赉东苏木达石莫格嘎查西北 32.53 千米		60 米 × 52 米	南 2.41 千米	哈日诺尔 2 号边堡西南 25.27 千米	中国	北纬 49°33′43.76″ 东经 116°46′09.72″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25	哈力敏塔拉呼都格 2 号	新巴尔右旗达赉东苏木达石莫格嘎查西北 32.53 千米		直径 150 米 / 35 米 ×35 米	南 2.91 千米	哈力敏塔拉呼都格 1 号边堡西南 1 千米	中国	北纬 49°33′23.90″ 东经 116°45′31.20″
26	赫泽木特 1 号	新巴尔右旗达赉东苏木呼伦诺尔嘎查西北 48.21 千米		直径 170 米 /41 米 ×41 米	西北 1.96 千米	哈力敏塔拉呼都格 2 号边堡西南 22 千米	中国	北纬 49°29′10.70″ 东经 116°28′27.85″
27	赫泽木特 2 号	新巴尔右旗达赉东苏木呼伦诺尔嘎查西北 46.84 千米		32 米 ×30 米	西北 3.37 千米	赫泽木特 1 号边堡 0.28 千米	中国	北纬 49°28′26.40″ 东经 116°29′21.25″
28	锡林尚达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154.6 千米		40 米 ×40 米	0.5 千米	赫泽木特 2 号边堡西南 14.9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28′19.78″ 东经 116°16′57.76″
29	哈喇淖尔 1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136 千米		直径 160 米	3.4 千米	锡林尚达边堡西南 18.68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21′41.26″ 东经 116°05′12.34″
30	哈喇淖尔 2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136 千米		125 米 ×125 米 /60 米 ×60 米	3.2 千米	哈喇淖尔 1 号边堡南 46 米	蒙古国	北纬 49°21′47.28″ 东经 116°05′12.52″
31	辉腾额日和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122.4 千米		50 米 ×50 米	0.7 千米	哈喇淖尔 2 号边堡西南 14.3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19′10.71″ 东经 115°53′57.10″
32	乌日图格日吐音戈壁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109.4 千米		直径 174 米 / 60 米 ×60 米 / 30 米 ×30 米	0.7 千米	辉腾额日和边堡西南 15.1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13′12.15″ 东经 115°45′32.18″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33	赫尔孙浑迪 1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92 千米		直径 160 米	0.8 千米	乌日图格日吐音戈壁边堡西南 22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09′47.46″ 东经 115°28′05.62″
34	赫尔孙浑迪 2 号边堡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92 千米		125 米 ×125 米 /30 米 ×30 米	0.7 千米	赫尔孙浑迪 1 号边堡西南 17 米	蒙古国	北纬 49°09′50.35″ 东经 115°28′10.52″
35	和日木吐 1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76.3 千米		33 米 ×30 米	0.41 千米	赫尔孙浑迪 2 号边堡 22.8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9°05′45.74″ 东经 115°10′18.63″
36	和日木吐 2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76.3 千米		56 米 ×55 米	0.45 千米	和日木吐 1 号边堡南 50 米	蒙古国	北纬 49°05′42.80″ 东经 114°10′16.76″
37	和日木吐 3 号	东方省乔巴山苏木东北 75 千米		直径 150 米	0.7 千米	和日木吐 2 号边堡东南 800 米	蒙古国	北纬 49°05′15.15″ 东经 115°10′24.73″
38	莫都吉汗浩来	东方省古尔班达吉嘎拉苏木东南 17.2 千米		48 米 ×48 米	1.64 千米	和日木吐 3 号边堡西南 24.3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9′27.19″ 东经 114°52′29.20″
39	伊克布拉克 1 号	东方省古尔班达吉嘎拉苏木南 17.5 千米		直径 150 米	350 米	莫都吉汗浩来边堡西南 2.52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9′25.83″ 东经 114°50′25.26″
40	伊克布拉克 2 号	东方省古尔班达吉嘎拉苏木南 18.3 千米		41 米 ×40 米	100 米	伊克布拉克 1 号边堡西南 1.8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9′02.48″ 东经 114°49′06.69″
41	伊克布拉克 3 号	东方省古尔班达吉嘎拉苏木南 18.3 千米		96 米 ×95 米	西北 1.96 千米	伊克布拉克 2 号边堡 3.08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7′26.15″ 东经 114°48′18.78″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42	木勒黑音布拉嘎	东方省巴彦东苏木北 13.7 千米		57 米 ×53 米	620 米	伊克布拉克 3 号边堡西南 22.0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1′20.35″ 东经 114°32′44.93″
43	德力格尔淖尔	东方省巴彦东苏木西北 15.58 千米		42 米 ×42 米	0 米	木勒黑音布拉嘎边堡西南 10.91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0′10.26″ 东经 114°24′0.40″
44	古尔班达尔罕淖尔	东方省巴彦东苏木西 21.1 千米		45 米 ×45 米	246 米	德力格尔淖尔边堡西南 11.5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6′39.84″ 东经 114°16′13.78″
45	新布拉克音艾热克	东方省色尔格楞苏木北 19.7 千米		57 米 ×50 米	北 178 米	古尔班达尔罕淖尔边堡西南 9.2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5′14.04″ 东经 114°08′58.80″
46	托苏克淖尔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102 千米		43 米 ×43 米	北 101 米	新布拉克音艾热克边堡 12.9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7′18.85″ 东经 113°58′53.87″
47	布日合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81.7 千米		57 米 ×54 米	162 米	托苏克淖尔边堡西 22.0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8′29.86″ 东经 113°00′59.34″
48	阿润戈壁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70.4 千米		43 米 ×40 米	北 20 米	布日合边堡西南 13.58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7′37.90″ 东经 113°29′57.98″
49	奥特根查干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92.1 千米		55 米 ×55 米	北 30 米	阿润戈壁边堡西 13.2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8′03.28″ 东经 113°19′09.30″
50	嘎日达克淖尔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51.6 千米		44 米 ×42 米	北 32 米	奥特根查干边堡西南 11.8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7′03.18″ 东经 113°09′35.78″
51	诺米坤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42 千米		60 米 ×60 米	北 15 米	嘎日达克淖尔边堡西北 11.1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9′06.45″ 东经 113°01′02.35″
52	乌日图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33.7 千米		43 米 ×41 米	27 米	诺米坤边堡西北 9.14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1′26.85″ 东经 112°54′26.15″

续表

编号	边堡名称	地理位置	平面示意图	长、宽 / 直径	相距界壕	边堡间距	所属国家	GPS 坐标
53	斡哈敖包吐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27.6 千米	□	54 米 ×52 米	55 米	乌日图边堡西北 8.5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3′17.00″ 东经 112°48′03.00″
54	巴日嘎达津呼都格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25.63 千米	□	43 米 ×42 米	295 米	斡哈敖包吐边堡西 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3′25.28″ 东经 112°40′41.52″
55	乌兰楚鲁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东南 17.8 千米	□	54 米 ×45 米	329 米	巴日嘎达津呼都格边堡 8.8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3′19.04″ 东经 112°34′04.21″
56	哈布塔盖音布拉嘎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南 12.8 千米	□	38 米 ×36 米	154 米	乌兰楚鲁边堡 9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2′53.71″ 东经 112°26′0.27″
57	东乌拉	东方省巴彦乌拉苏木南 17.5 千米	□	50 米 ×48 米	39 米	哈布塔盖音布拉嘎边堡 8.9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50′19.25″ 东经 112°19′47.22″
58	乌戈么日敖包	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西北 20 千米	□	56 米 ×58 米	北 1.12 千米	东乌拉边堡西南 10.41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9′53.56″ 东经 112°11′18.30″
59	瑙若布林	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西南 8.7 千米	□	40 米 ×40 米	西北 146 米	乌戈么日敖包边堡 13.37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43′32.60″ 东经 112°00′52.51″
60	奥日尼	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西南 8.1 千米	□	70 米 ×65 米	0 米	诺尔布林边堡 13.31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38′35.15″ 东经 111°54′15.25″
61	朝克图音浩莱	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西南 28.3 千米	□	45 米 ×45 米	西北 527 米	奥日尼边堡西南 20.18 千米	蒙古国	北纬 48°31′36.90″ 东经 111°41′39.00″
62	浩来宝淖尔	肯特省瑙若布林苏木西南 42.7 千米	□	45 米 ×40 米	862 米	朝克图音浩莱边堡西南 13.83 千米（西端边堡）	蒙古国	北纬 48°27′43.21″ 东经 111°32′04.76″

注释

［1］［俄］B·B·包诺索夫．张泰湘、吴文衔译．北满考古学史［J］．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1991：182．

［2］屠寄．黑龙江舆图［M］．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套色本，第36～38图。

［3］张家璠．呼伦贝尔志略［M］．上海：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2．

［4］阔尔马左夫．呼伦贝尔［M］．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9：16．

［5］张伯英．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附图．

［6］寿鹏飞．历代长城考［M］．北京：龙门书店影印版，1987：16．

［7］张泰湘、郝思德．呼伦贝尔草原考古研究的新收获［J］．北方论丛，1979（5）．

［8］a．景爱．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探索［A］．历史地理（第3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89，190．

b．景爱．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时代［J］．社会科学战线，1982（1）．

［9］米文平、冯永谦．岭北长城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0（1）：101．

［10］2007年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时，呼伦贝尔市的殷焕良、哈达等同志对岭北金界壕进行考古调查．

［11］丹达尔．金界壕沿线边堡类型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10～13．

［12］马彦明．“金界壕北线”之异议［J］．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1）．

［13］解丹．金长城空间规划布局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113～115．

［14］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20．

［15］同［8］．

［16］同［8］b．

［17］米文平．金代呼伦贝尔诸部及界壕［J］．黑河学刊，1991（4）：553．

［18］李丕华．蒙古高原边墙考［J］．东北史地，2004（3）：55．

［19］耶律大石（1087～1143年），字重德，西辽政权的建立者，军事统帅．

［20］关于可敦城的位置，大多数学者认为青陶勒盖古城是辽代之镇州即可敦城，但部分学者也认为和日木·登吉古城是镇州古城（可敦城）．

［21］（元）脱脱．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37．

［22］（元）脱脱．金史·卷71·婆卢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8．

［23］同［22］：1939．

［24］同［22］：1939．

［25］（元）脱脱．金史·卷24·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9．

［26］李丕华．蒙古高原边墙考［J］．东北史地，2004（3）：58．

［27］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2．

［28］（清）长顺等．吉林通志·卷 20·金石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9］（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3［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30］王国维．萌古考［A］．观堂集林［C］．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即忽图剌汗．

［32］（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96［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33］a. Andrei V. Lunkov, Artur V. Khrinskii, Nikolai N. Kradin. The Frontier Fortification of the liao Empire in Eastern Transbaikalia［J］． The Silk Road，9（2011）：104 ~ 121．

b. 马彦明．“金界壕北线”之异议［J］．中国长城博物馆，2013（1）：40，41．

c.〔蒙古〕勒·恩尔顿宝力道提供的“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讲座内容等资料，并结合 Google 地图绘制表格．

A Study on the Boundary of the Jin State

Chang Hai

Abstract: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 ancient trench runs across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with a total length of about 780 kilometers. This structure is not clearly recorded in written history, so that it has escaped scholarly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dating and purpose of the structure have been the object of debates since its discover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no conclusions available so far.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authors referees to the location, orient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oundary carefully, combining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the help of satellite imagery.

Keywords: Jin state；borders；dating

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若干问题研究*

杨建林[1]　武俊生[2]　甄自明[3]

（1. 包头市文物局，包头，014010；2. 乌海市博物馆，乌海，016000；3. 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鄂尔多斯，017010）

内容摘要：内蒙古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是宁夏河东长城的一部分。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简要介绍了这段长城的现状及修筑简史，重点探讨了鄂托克前旗头道边与二道边西端交汇点、头道边的历史属性，乌海明长城的北端止点及其与秦长城的关系，鄂尔多斯西部明代烽火台的属性等。

关键词：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

内蒙古境内的明长城，按其分布，大体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分布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南部，是明代山西镇、大同镇所辖长城的一部分。第二段分布在鄂尔多斯东南、乌海市北流黄河东岸、阿拉善盟贺兰山东南麓，是明代宁夏镇所辖长城的一部分。其中鄂尔多斯—乌海的这段明长城在大的地理范围上属宁夏河东地区，可以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通过历年来研究者的实地踏查及全国长城资源调查，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的分布走向、保存现状等基本情况已经弄清楚了[1]。学者在宁夏河东长城的修筑历史及今址考订、营堡营建等研究方面也大量涉及了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成果可观[2]。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比如，鄂托克前旗西南部头道边与二道边西端交汇点、头道边的历史属性，乌海明长城的北端止点及其与秦长城的关系，鄂尔多斯西部明代烽火台的属性等。本文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西南部、鄂托克旗西部及乌海市海南区北流黄河东岸一带，全长约 100 千米。这段长城的分布地带，在大的地理区域上属于宁夏河东地区，为了论述方便，以下将这一地域称为宁夏河东地区。在明代，这里的长城归宁夏镇管辖，分别是宁夏东路后卫、中路灵州和北路平虏营所辖长城的一部分，主要防御在明朝中后期兴起的河套蒙古。

* 本文得到“2017 年度包头市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资助。

一、长城概况

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大体可分为特布德段和巴音陶亥段两部分。特布德段分布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东起自特布德嘎查南部，西行经二套子村西、上水坑村南、刺湾村南、芒哈图村南、小滩子村西，然后向西进入宁夏灵武市横城乡，由东南向西北延伸。这段长城有头道边、二道边之分，两边并行。二道边在北，全长 31 千米，多为夯土墙，少量为堆土墙。墙体最高 4、最低 0.3 米，多数为 0.5 ~ 3 米；底部最宽 8、最窄 2 米，多数为 4 ~ 7 米；顶宽 0.3 ~ 2 米。沿线有敌台 13 座。二道边在历史上称为“河东墙”。明成化十年（1474 年）宁夏巡抚都御史徐廷章、总兵官范瑾首次修筑[3]。弘治时，宁夏巡抚张贞叔、王珣在“河东墙”外添挖了 4.4 万眼“品”字形坑[4]。弘治后期，时任宁夏巡抚的王珣和刘宪计划增筑“河东墙”，将旧边墙帮筑高厚，边堑挑浚深阔，但是没有获得三边总制秦紘的支持，改而依秦紘之意修筑固原内边[5]。正德初年，陕西三边总制都御史杨一清帮筑“河东墙”，后由于民夫哗变及宦官刘瑾弄权，杨以疾乞退，工程半途而废。据王仁芳考证，杨一清只修好了横城堡往东至红山堡 30 或 40 里[6]。

头道边在南，为现今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省界线，全长 52 千米，全部为夯土墙。墙体最高可达 10、最低 0.5 米，多数为 2 ~ 5 米；底部最宽 17.5、最窄 8 米，多数为 9 ~ 13 米；顶部最宽 4、最窄 0.5 米，多数为 0.6 ~ 3 米。沿线有敌台 221 座。头道边的修筑起于嘉靖年间。嘉靖十年（1531 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东起花马池西至横城堡挑挖了一条壕堑，全长 160 里，时人称为“深沟高垒”[7]，此为头道边之雏形。嘉靖十五年（1536 年），继王琼后任三边总制的唐龙按照杨一清的模式，维修了兴武营及延绥干沟一带的边墙，实际上是对前人修筑的边墙进行了维护[8]。嘉靖十五年（1536 年），因兴武营一带 70 余里的边墙修筑不坚，总制刘天和上书朝廷策划加固[9]。第二年，沿边墙内外挑挖壕堑各一道，长 53 里 2 分，深 1 丈 5 尺，阔 1 丈 8 尺[10]。同年，刘天和又奏从横城至南山口（今陕西省定边县城附近）筑堤垒一道，与这一带不断修筑的壕墙并行，构成重险[11]。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544 ~ 1546 年），张衎任陕西三边总制期间，从花马池至安定堡（今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安定堡村），沿原旧墩铺空内奏筑增添敌台 263 座，帮筑 417 座[12]。此后直至万历年间，还在陆陆续续的修复，头道边最终形成。

巴音陶亥段分布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黄河东岸，南起农场一队，经农场二队、一棵树村、农场三队、巴音陶亥村、巴音陶亥镇、东红村、绿化一队、农场六队、农场七队、四道泉二队、四道泉六队，至大桥村止，大体呈东南—西北走向。这段长城全长 17 千米，均为堆土墙，墙体低矮，高不足 2 米，宽度为 3 ~ 8 米，墙体上不见敌台等设施。沿线有烽火台 4 座。这段长城的前身是成化十五年（1479 年）宁夏巡抚贾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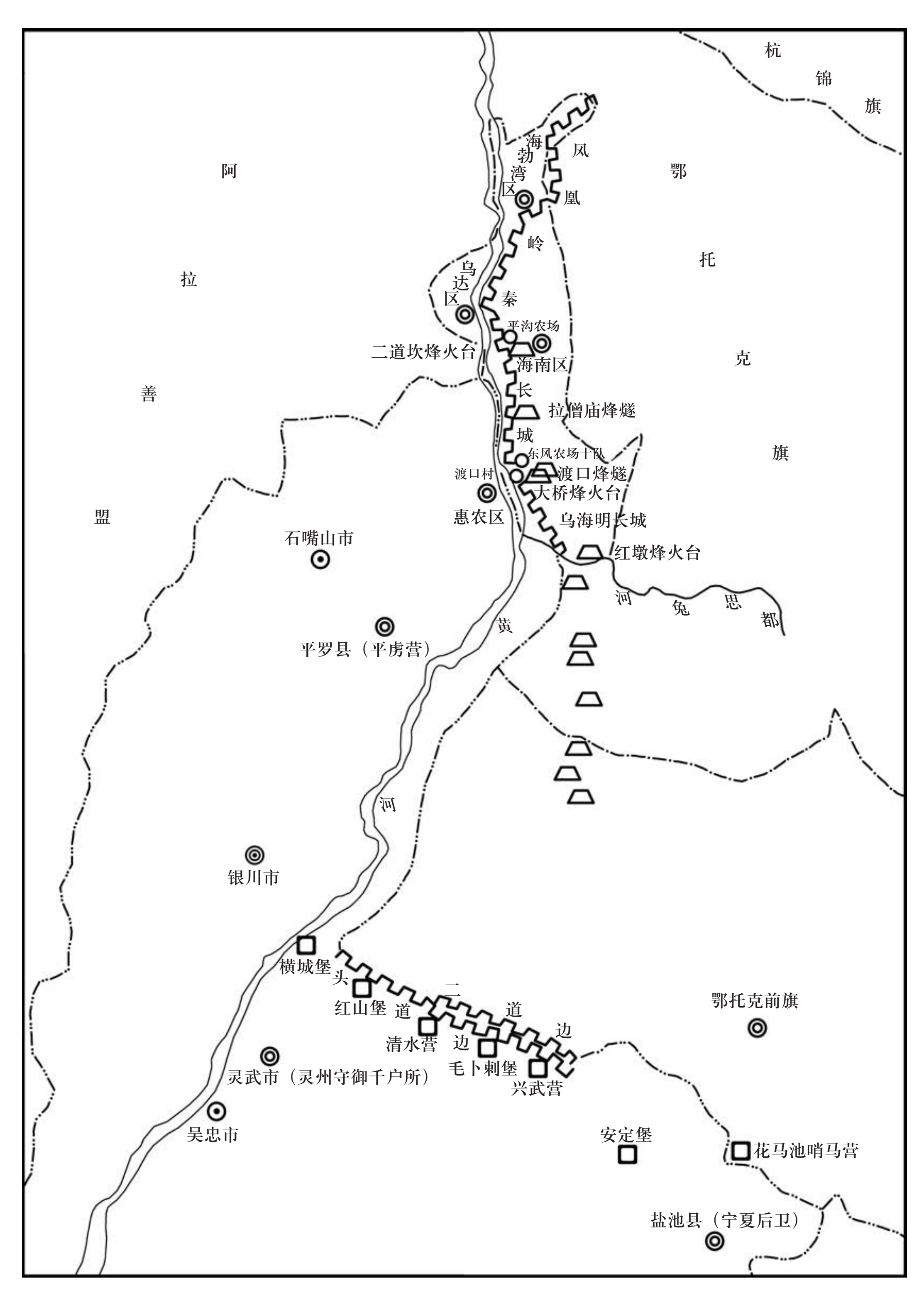
主持修筑的“沿河边墙”。它位于宁夏横城以北黄河东岸，南与“河东墙”相接，全长185里，沿线有墩台18座，后增加到36座，主要防止河套蒙古势力趁冬季河水结冰之际，渡河攻掠宁夏镇城等地。这道边墙因沿线原有墩台18座，又称“十八墩边墙”或“沿河十八墩”[13]。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沿黄河东岸修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14]。实际是修复了旧有的“沿河边墙”，因其主要分布在宁夏原陶乐县境内，而且构筑简单，只是一道低矮的土墙，所以后世称为“陶乐长堤”。巴音陶亥段明长城便是“陶乐长堤”的北端部分。

另外，在鄂托克前旗西北、鄂托克旗西南、乌海市红墩一带发现了一列南北走向的明代烽火台，应该是正统年间宁夏总兵官史昭所筑烟墩遗存。正统元年（1436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奏请在花马池筑立哨马营，并增设烟墩一直连到哈剌兀速马营[15]。花马池哨马营即花马池旧城，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北大池北侧。哈剌兀速，《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黑水河，在城东。蕃名哈剌兀速，西流注入黄河。”[16]宁夏镇城（今银川市区）以东，河东边外一带，西流注入黄河的河流，当是都思兔河无疑。那么，史昭增设的烟墩，应该是东起北大池，向西一直连到了都思兔河。鄂托克前旗西北、鄂托克旗西南、乌海市红墩一带发现的这列烽火台，在分布及走向上可与史昭修筑的烟墩对应，而且乌海市的红墩烽火台位于都思兔河北岸，或是这路烟墩最北端的一座（图一）。

二、对鄂托克前旗头道边历史的再认识

对于鄂托克前旗的头道边，普遍认为是嘉靖十年（1531年）王琼所修的“深沟高垒”[17]。这一点值得商榷。史籍明确记载，王琼修筑的“深沟高垒”“堑，深、广皆二丈；堤垒，高一丈，广三丈。沙土易圮处，则为墙，高者二丈余有差，而堑制视以深浅焉”[18]，可见它以挖沟为主，垒高才1丈（约3米），只在沙土易圮的地方修筑2丈（约6米）多高的墙体。这与今天所见到的普遍高2～5米、最高可达10米的头道边相去甚远。

另外，王琼在其名作《北虏事迹》之后附了一幅当时的宁夏边防图，名为“设险守边图说”，里面介绍说“定边营南山口起西北至宁夏横城旧墙止，开堑共二百一十里，筑墙十八里”[19]，根据图中所示，筑墙在定边营一带，从定边营往西至清水营开堑，从清水营往西穿过河东旧墙直至黄河东岸挖沟。很明显，王琼构筑“深沟高垒”时，在定边营附近、定边营往西至清水营、清水营再往西至黄河这三段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其中以清水营往西至黄河这一段标准最低，只挖了一道沟。前面已介绍，杨一清在正德初年帮修了从横城堡至红山堡的“河东墙”。那么，20多年后王琼挑挖壕堑的时候，这段墙体应当还比较高大，所以从清水营（红山堡东约18千米即清水营）往西继续沿用杨一清帮筑后的“河东墙”，清水营往东，放弃“河东墙”，挑挖新边。后来随着唐龙、刘天



图一　鄂尔多斯—乌海明长城分布图

和、张衎等人的不断增修、帮筑，基本形成了兴武营至清水营一带今天头道边的样子。

由上分析可见，将头道边称为“深沟高垒”很不合理，真正的“深沟高垒”或被头道边延续利用，或已淹没于风沙之中，至今遗迹甚少。其实用文献中提到的“横城大边”来称呼头道边，似更妥当一些。“横城大边”这个名称在文献中大概最早出自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 年）的《皇明九边考》，在该书卷八《宁夏镇·保障考》中提到，刘天和沿黄河东岸修筑的长堤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这里的大边是相对于河东以南直至固原境内的数条内边而言的，因其起于横城堡，故名横城大边墙。王琼挑挖“深沟高垒”后，河东地区在防守上基本放弃了“河东墙”，之后唐龙、刘天和等人的边墙建设主要沿着王琼的“深沟高垒”进行的，最后形成“横城大边”，所以今天的头道边基本是“横城大边”的遗存。

三、鄂托克前旗头道边与二道边西端交汇点的新认识

学界以往一直认为鄂托克前旗头道边与二道边相交于兴武营[20]，艾冲更是给出了理由，认为“深沟高垒”“其中红山堡至兴武营仍帮筑旧‘河东墙’，而由兴武营向东南另筑新墙，经安定、高平诸堡接东关门墙，再经盐场堡而达定边营”[21]。调查发现，头道边与二道边其实相交于清水营。清水营在兴武营西面，二者相差 30 多千米。在清水营至兴武营之间，头道边与二道边并行分布，间距在 200 米之内，最近处只有 25 米，过兴武营往东，二者逐渐分离，越往东离得越远。

头道边与二道边西端交汇点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深沟高垒”与“河东墙”关系的问题。因为头道边是在“深沟高垒”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前甚至将二者直接画上了等号；二道边则是“河东墙”。王琼在挑挖“深沟高垒”时，西段借用了“河东墙”，那么，他从哪里开始借用“河东墙”，哪里就是头道边与二道边的西端交汇点。上文在引用王琼《北虏事迹》时已经分析，王琼在挑挖“深沟高垒”时，从清水营往西借用了杨一清帮修加固后的“河东墙”，从清水营往东重新勘查线路，修筑新边。那么，头道边与二道边的西端交汇点就应该在清水营，这与实地调查相符。

四、对乌海明长城的新认识

对乌海明长城进行探讨，源于对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东风农场十队至平沟农场的一段长城性质的认定。这段长城南起东风农场十队，经雀儿沟三队、雀儿沟二队、向阳农场，北至平沟农场，全长约 19 千米，初次调查沿线有 4 座烽火台，由南向北依次为渡口 2 号烽火台，拉僧庙 1 号、2 号烽火台和二道坎烽火台。在这段长城的南边是明长城，北边是凤凰岭秦长城，三者基本呈南北一线分布。在 2007 ~ 2008 年的明长城资源调查中，将这一段长城及沿线烽火台认定为明长城，主要原因是在它的最北端平沟农

场发现了明代二道坎烽火台，那么二道坎烽火台往南的这一段长城及烽火台也应该是明代的，也即乌海明长城的北端点在平沟农场。《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及《乌海文化遗产》均采纳了上述观点[22]。

经之后开展的秦长城资源调查，以及数次复查、比对、论证，确认东风农场十队至平沟农场的这段长城是凤凰岭秦长城的一部分，而且东风农场十队是凤凰岭秦长城的最南端。这段长城沿线原来认为是明代烽火台的渡口 2 号烽火台、拉僧庙 1 号烽火台均为秦代的烽燧，分别命名为渡口烽燧和拉僧庙烽燧；拉僧庙 2 号烽火台应是拉僧庙 1 号烽火台围墙的一部分；二道坎烽火台确为明代烽火台。

（一）乌海明长城的北端

乌海明长城北端的确定，这个问题的探讨至关重要。

从文献分析来看。前文已介绍，乌海的这段明长城是“沿河边墙”和“陶乐长堤”的孑遗。关于“沿河边墙”，明代人杨一清在一份奏疏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灵州横城以北，西抵黑山营，系宁夏通贼紧关要路。虏贼见我边防严备，既不能入花马池，必将从此而入，踏冰过河，东西任其寇掠……宁夏横城北黄河东岸旧有边墙一百八十五里，壕堑一道，高厚深阔悉如花马池一带城堑之数，自南而北，有长城十八墩，后守臣恐稀疏，每墩空内，添设一墩，共见在墩台三十六座。墙里套内地方，又设石嘴、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与河西黑山营镇远关相对，每年于黑山营屯聚人马，阻遏虏骑，以为宁夏北门锁钥。”[23]这是正德元年（1506 年）杨一清计划帮修“沿河边墙”时，通过实地勘察和访查询问取得的材料，可信度比较高。从中可以看出，“沿河边墙”的北端，也即其第十八墩正对着河西的镇远关。镇远关是明代宁夏“旧北长城”上的一座重要关口，一度为宁夏北境之锁钥。其南五里有黑山营，屯兵储粮，是镇远关的后方保障。后镇远关和黑山营俱废弃，宁夏北境防线内撤至平虏城北的“北关门”墙。关于镇远关的地望，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应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偏北一带[24]。

至于“陶乐长堤”，文献记载虽然比较简略，但是也可从刘天和修边的初衷看出端倪。刘天和修筑“陶乐长堤”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宁夏北境的防线北推到镇远关一带，以恢复对河西平虏城至镇远关间的故土的控制。在黄河东岸顺河修筑“陶乐长堤”，是为了加强河西的防御。那么，“陶乐长堤”的北端必然与河西的镇远关相对，也即与“沿河边墙”的北端相倅或重叠。

经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沿河边墙”及“陶乐长堤”的北端基本相同，当在今宁夏惠农区对面的黄河东岸。这里也即是乌海明长城的北端。

从实地调查材料来看。无论“沿河边墙”，还是“陶乐长堤”，都是宁夏北长城的一部分，其南与宁夏东长城相连，向西过河与宁夏“旧北长城”相接，以在宁夏北境构成一道闭合的长城防线。那么，若确定了宁夏“旧北长城”的分布地域，也可大体断定

“沿河边墙”及“陶乐长堤”的北端。经许成等人调查：“这段旧北长城的走向，计始于红果子沟口北侧，向东行进，过包兰铁路，到石嘴山市四中，经下营子公社宝马东、尾闸公社下庄子到达黄河西岸，长 15 千米。目前这段长城的遗迹，在石嘴山市四中至红果子沟口一段保存尚好。”[25]石嘴山市四中及下庄子均在惠农区靠南一点。那么，黄河东岸的“沿河边墙”及“陶乐长堤”也应在这一带折向黄河西岸。

再从实地调查的乌海市明长城走向来看，由南自宁夏平罗县过都思兔河进入乌海市海南区境内，然后顺黄河东岸向北延伸，至巴音陶亥镇渡口村折向黄河河堤后消失。这里有一座烽火台，叫大桥烽火台。渡口村正对着河西的惠农区城区。那么，这里便是“沿河边墙”“陶乐长堤”及今天乌海明长城的最北端，大桥烽火台就是十八墩中的第十八墩。

（二）孤悬在外的明代二道坎烽火台

既然乌海明长城的北端在渡口村，那么，为什么在其北 20 千米的地方，凤凰岭秦长城沿线又出现了一座明代二道坎烽火台？在上文引用的杨一清的奏疏中，提到了石嘴、暖泉二墩。杨一清说，在墙里套内地方，又设石嘴、暖泉二墩瞭守。从中可以获得两个信息：其一，石嘴、暖泉二墩与十八墩及后来的三十六墩不同，它们孤悬在外，是负责瞭守的烽火台；其二，它们在墙里套内。“墙里”应指在“沿河边墙”以里，“套内”则指在河套内。“沿河边墙”紧挨着北流黄河东岸修筑，其里（西）便是黄河，没有修筑烽火台的必要。那么这两座烽火台会不会跨过黄河，建在了河西呢？杨一清在奏疏中还说，“沿河边墙”修好不久便因蒙古人的争夺而放弃了。蒙古人在争夺时，先夺得石嘴、暖泉二墩，后占领的沿河边墙及沿线的十八墩[26]。前面已讲，蒙古人是从东来的，应该是先争夺“沿河边墙”外的据点，进而再争夺“沿河边墙”和十八墩。而且曾做过明代陕西三边总制的王琼在记述一次进入宁夏的蒙古人败退的时候说：“六月初二日，贼由镇远关渡河，石嘴墩入套。”[27]是说，蒙古人在败退的时候，从镇远关渡过黄河，自石嘴墩进入河套。镇远关在河西，那么石嘴墩一定在河东，而且过了石嘴墩便进入河套蒙古人地界了。艾冲认为，文献中的“墙里套内”应该改为“墙外套内”[28]。这个观点比较可信，因为只有这样，石嘴、暖泉二墩才有存在的必要，也才会成为“沿河边墙”的前哨。

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二道坎烽火台孤悬于“沿河边墙”及十八墩之外，形体高大，构筑精细，周围带有三重围墙，具备前沿哨所的条件，应该就是石嘴、暖泉二墩之一。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还说：“镇远关、黑山营，对河之东为山嘴墩，南至横城，旧有墙堑长一百八十五里，墩台三十六座，皆年长废弃不能守。”[29]王琼记载的是嘉靖时期的事，此时“沿河边墙”已经废弃。但是王琼提到了一座山嘴墩，说它在镇远关、黑山营对面。前已介绍，镇远关正对着十八墩的第十八墩。现在又出来了一座山嘴墩。只能做两种猜测：①十八墩的第十八墩就叫山嘴墩；②山嘴墩是石嘴、暖泉二墩中石嘴墩的误写。如果是第二种，说明石嘴墩离第十八墩不远，那么孤悬在北的二道坎烽火台便是暖泉墩。

从二道坎烽火台往南至大桥烽火台之间，还有两座烽火台，分别为拉僧庙烽燧、渡口烽燧。这两座都是秦代烽燧，拉僧庙烽燧在大桥烽火台北 16 千米，渡口烽燧离大桥烽火台极近，在其北 1.6 千米。石嘴、暖泉二墩可能对其中的某一座有沿用。如果石嘴墩离第十八墩不远的话，就能确定渡口烽燧便是石嘴墩。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拉僧庙烽燧形体高大，周围有围墙的痕迹，形制上远大于此地其他秦代烽燧，明代沿用的可能性更大。

（三）实地调查所见之乌海明长城与秦长城的差别

从长城的材质及构筑方式来看。宁夏河东一带的明长城均为土筑，乌海明长城为堆土墙，呈垄状，比较低矮。而秦长城多为石墙，由于坍塌破坏，痕迹不太明显。东风农场十队往北至平沟农场的这段长城多数为石墙，在形态上更接近凤凰岭秦长城。更为关键的是，在东风农场十队往北至平沟农场的长城沿线，以及渡口烽燧、拉僧庙烽燧附近采集的陶片、瓦片，具有秦时特征。

由此可知，乌海明长城在渡口村向西跨过黄河，进入河西。东风农场十队往北至平沟农场的这段长城是它北部凤凰岭秦长城向南延伸的一部分。而且，在东风农场十队，它有一个向西折的趋势，说明它从这里跨过黄河进入河西。

（四）乌海明长城的兴废

根据以上的梳理，可以对乌海明长城及明代宁夏北境边防的兴废做简单推论。明前期，宁夏的防线靠北，后来慢慢内收，最后干脆放弃了河西的黑山营和镇远关，退而防守平虏城及“北关门”墙。在河东，起先修筑了“沿河边墙”及十八墩（三十六墩）以与河西的“旧北长城”衔接，后来河东墩军经常被蒙古人掳掠，先是石嘴、暖泉二墩被迫放弃，最后“沿河边墙”及十八墩（三十六墩）被废弃，只在河西筑立 15 座墩台守护瞭望，防冬不防夏[30]。正德初年，杨一清计划修复“沿河边墙”，由于民夫哗变及刘瑾陷害，愿望未能实现。嘉靖九年（1530 年），王琼新修“北关门”墙，镇远关、黑山营、“旧北长城”、“沿河边墙”被彻底放弃。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 年），刘天和短暂控制了河西的故土，在河东修筑了“陶乐长堤”，以防卫河西。不久，明朝再次将宁夏北境防线南撤至平虏城，“陶乐长堤”也失去了初始的意义，再加上它本来就修筑简单及常年的河水冲刷和风沙掩埋，大半处于荒废状态。

注　释

［1］　a．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b．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c．许成，马建军．宁夏古长城［M］．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d．甄自明．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初探［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1）.

［2］ a．王仁芳．明代修筑河东长城的新认识［J］．宁夏社会科学，2011（5）.

b．杨建林．宁夏河东长城考［A］．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c．冯晓多．宁夏河东地区明代边墙与屯堡的变迁［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3）.

d．冯晓多，贾玉玺．明代宁夏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设置时间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7（5）.

e．黄龙程．花马池故城考［J］．万里长城，2013（2）.

［3］（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19.

［4］（明）胡汝砺撰．弘治宁夏新志．宁夏历史方志翠编（第二函）［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36.

［5］（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575，576.

［6］ 王仁芳．明代修筑河东长城的新认识［J］．宁夏社会科学，2011（5）：112.

［7］ 同［3］.

［8］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3776，3889.

［9］ 同［8］：4007～4010.

［10］ 同［3］：20.

［11］ 同［5］：2629.

［12］ 同［5］：2022.

［13］ a．明宪宗纯皇帝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3470，3471.

b．同［5］：1099.

［14］（明）魏焕．九边考［A］．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256，257.

［15］ 明英宗睿皇帝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0436.

［16］ 同［3］：14.

［17］ a．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268.

b．同［1］c：156.

［18］ 同［3］：248.

［19］ 单锦衔辑校．王琼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7.

［20］ a．华夏子．明长城考实［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247.

b．陈育宁．宁夏通志（古代卷）［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247.

［21］ 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3.

［22］ a．同［1］a：350～361.

b．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乌海文化遗产［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21～132．
［23］ 同［5］：1099．
［24］ a．吴忠礼．平虏所、平罗县和石嘴山市［J］．共产党人，2007（13）：51．
b．许成．宁夏境内明代长城遗迹［A］．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23．
［25］ 同［1］c：128．
［26］ 同［5］：1099．
［27］ 同［19］：79．
［28］ 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9．
［29］ 同［19］：79．
［30］ 同［5］：1099．

Research on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in Ordos-Wuhai in Inner Mongolia

Yang Jianlin Wu Junsheng Zhen Ziming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in Ordos-Wuhai is the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extending into Ningxia Province ‘east of the river’. Based on field survey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in Ordos-Wuhai is here briefly introduced. This article then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int area of Etuokeqian’s “great border”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its “secondary border”.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in in Wuhai and the Ming Dynasty beacon towers located west of the Ordos region are also investigated.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 Dynasty Great Wall and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in Wuhai.

Keywords: Ordos; Wuhai;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惠远老城调查、勘探与研究

任　冠[1]　郝园林[2]

（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2.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内容摘要：惠远老城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本文整理了近年在惠远老城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的成果和收获，结合文献史料和卫星影像，厘清了老城的营建和扩建过程，对惠远老城的整体规模和形制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考证，并绘制了惠远老城复原平面图。

关键词：惠远老城；调查；规模；形制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基本上实现了对新疆的全面控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任命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初驻绥定城，由于城垣规模较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在伊犁河北岸营建新城，置伊犁将军衙署，乾隆赐名“惠远”，即今惠远老城。

同治五年（1866 年），回民起义军攻占惠远城，同治十年（1871 年），惠远城又被沙俄侵占。由于长年战乱的破坏，加之伊犁河水患严重，惠远城被逐渐废弃。清政府收复伊犁后，于光绪八年（1882 年）开始筹建惠远新城，至光绪十九年（1893 年）竣工，翌年伊犁将军移驻惠远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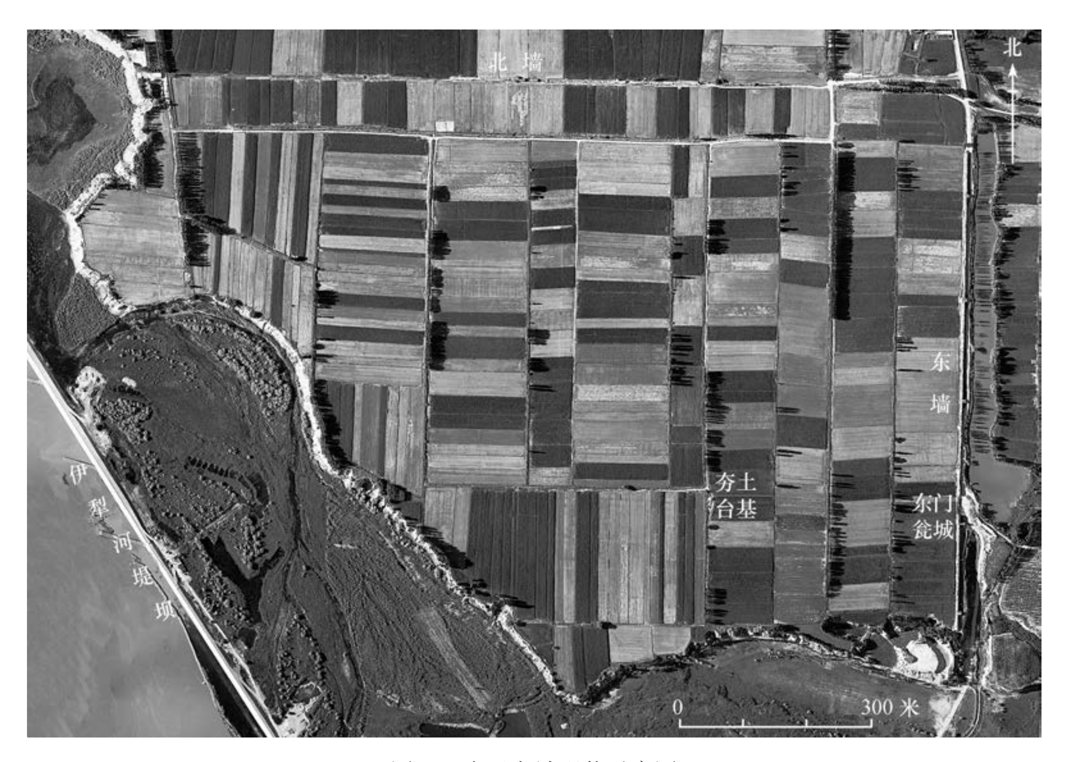
惠远老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惠远镇老城村南，地理坐标（城址东北角）为北纬 43°56′34.94"、东经 80°56′3.05"，海拔 573 米；惠远新城位于老城西北约 5 千米，即今惠远镇所在，地理坐标（城内钟鼓楼）为北纬 43°59′32.83"、东经 80°54′21.51"，海拔 594 米。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6 ~ 7 月，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和霍城县文物局的支持配合下，由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负责，我们围绕惠远新、老古城遗址先后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目前惠远新城保存较完好，形制较清晰，而惠远老城西南部已完全坍塌，保存情况较差，故学界对惠远老城的研究长期存在空缺，有鉴于此，调查和勘探工作均以惠远老城为重点。通过田野工作，基本摸清了惠远老城的规模和形制，并对城址的布局结构和营建过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调查与城址现状

2016 年 9 月 2 ~ 7 日，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合作，对惠远老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结合清代绘制的老城地图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 Corona 卫星影像，测量记录了老城城墙、城门、瓮城、护城河及内部夯土台基等遗存的保存情况和地理坐标，确定了北门、将军衙署等主要遗存的大体范围，并采集了部分有代表性的遗物。

惠远老城地处伊犁河北岸的河谷阶地上，西南部已被河水冲毁，形成近 20 米高的断崖。城址内外均已开垦为耕地，目前地表保存了北墙和东墙的部分墙体，东门瓮城墙体及城内 1 座夯土台基（图一）。



图一　惠远老城现状示意图

城墙为分段夹夯而成，土墙无包砖，由于雨水、灌溉的侵蚀破坏，坍塌情况较为严重。现存墙体厚 3.5 ~ 3.7 米，高 3 ~ 4.5 米，夯层厚 8 ~ 12 厘米。

北墙保存情况较差，自冲沟断崖至城址东北角约 1250 米，现存墙体残长约 610 米。由于农田开垦和兴修水渠，北门及瓮城早年已被拆毁，经钻探基本确认北门基址所在位置。现墙体上保留了 3 座炮台，最东侧 1 座尺寸较大，面阔约 15、进深约 5、高约 4.5 米，其余 2 座规格基本一致，面阔约 5.8、进深约 3.8、高约 4.5 米，炮台间距约 156 米。北墙外护城河已平整为农田，通过钻探可知河道宽约 11、深约 2.5 米，距北墙墙体约 21 米。

东墙保存状况稍好，残长约 750 米。偏南处保留了东门及瓮城遗迹，门道豁口宽约 30 米，内侧建有登城踏道，外侧瓮城残存 2 段墙体，宽约 2.5 米，根据墙体情况判断为马蹄形瓮城。东墙上保留了 4 座炮台，规格与北墙略有不同，面阔约 5.8、进深 4.4 ~ 4.6、高约 4.5 米，间距同样约 156 米。东墙外保留了一截护城河，已被当地居民扩宽为鱼塘，现存长约 630、宽 20 ~ 35 米（图二）。



图二　东墙及护城河现状（由北向南）

城内偏东南处保留了 1 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 5.8、南北宽约 5.4、残高约 3.3 米，夯层厚 8 ~ 10 厘米，台基底部有晚近居民挖凿的窖穴。通过钻探，在台基南北两侧均发现夯土墙基址，宽 6.6 ~ 6.8 米，距地表深 0.8 ~ 1.1 米，分别向南北两侧延伸。

城内地表散落了大量的建筑构件、陶瓷残片和少量的铜钱及金属器，年代均为清代中晚期（图三）。

二、考古勘探

2017 年 6 月 17 ~ 7 月 4 日，为配合“惠远新、老古城遗址——老城遗址城墙加固工程”，受霍城县文物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组织勘探队对惠远老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主要围绕老城北门及瓮城、北墙及外侧护城河、将军衙署、城夯土台基及周边区域等地点展开，勘探总面积共计约 35000 平方米（图四）。



图三　惠远老城采集遗物标本



图四　惠远老城勘探情况示意图

1. 北门及瓮城

北门及瓮城早年由于农田开垦，曾被当地居民使用炸药炸毁，破坏较为严重，根据勘探情况，仅能判断其位置与大体范围，难以确定具体形制规格。

在北门及瓮城范围内勘探发现一片夯土基址，东西长约 23、南北宽约 22、深约 1.4 米，夯土厚 0.3 ~ 0.5 米。该区域具体地层堆积如下。

第 1 层：耕土层。土质松散，呈灰褐色。深 0 ~ 0.3 米。含植物根系，炭渣、砖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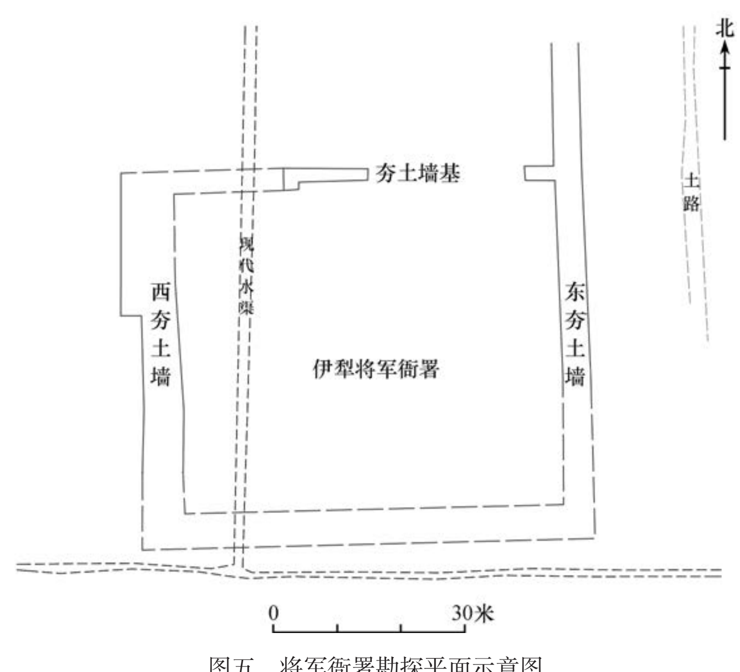
第 2 层：扰土层。土质松散，呈深灰褐色。深 0.3 ~ 0.9 米。含砖瓦碎块、炭渣、白灰渣等，部分区域夹杂大量红烧土块，该层即北门和瓮城遭到破坏后形成的堆积。

第 3 层：夯土层。土质紧密，呈黑褐色，有明显分层状况。深 0.9 ~ 1.4 米。含草木灰、炭粒等，该层即北门和瓮城尚未被破坏的基址。

第 3 层以下为黄褐色沙土（生土），土质松软纯净。

2. 将军衙署

在将军衙署范围内，勘探发现两道较宽的南北向夯土墙基址和一道较窄的东西向夯土墙基址，由于北部农田正在灌溉，无法进入开展勘探，故衙署北侧边界目前无法确认（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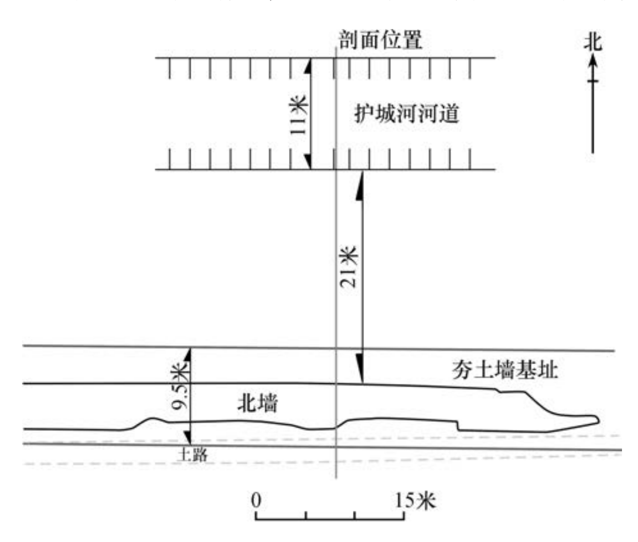
图五　将军衙署勘探平面示意图

东夯土墙基址南北长约 80、宽约 4.5 米，距地表深 0.4 ~ 0.5、夯土厚 0.5 ~ 0.6 米；西夯土墙基址南北长约 60、宽 6 ~ 8.5 米，距地表深 0.5 ~ 0.8、夯土厚 0.3 ~ 0.5 米。东、西两墙间距约 65 米，南端距现代水渠约 5 米，根据两道夯土墙的规格和位置，判定其为伊犁将军衙署外墙。东、西夯土墙南端向北约 50 米，发现 1 道东西向的夯土墙基，墙体宽 2 ~ 3.5 米，偏东有约 25 米的豁口，推测其可能为衙署内部的院墙。

通过勘探，基本确认了将军衙署的确切位置及衙署南部的大体界线，并可判断其内部应为多进院落式结构。

3. 北墙及外侧护城河

为摸清老城城墙及护城河剖面情况，在北墙中段偏东处进行了南北向解剖（图六）。



图六　北墙及护城河勘探平面示意图

经勘探确认，北墙外侧护城河宽约 11、深约 2.5 米，护城河南岸距北墙夯土墙基约 17.5 米，距现存北墙墙体约 21 米，河道内堆积包含 3 层，具体地层情况如下（图七）。

第 1 层：耕土层。呈灰褐色，土质松散。深 0 ~ 0.3 米。含植物根系、炭灰渣、少量砖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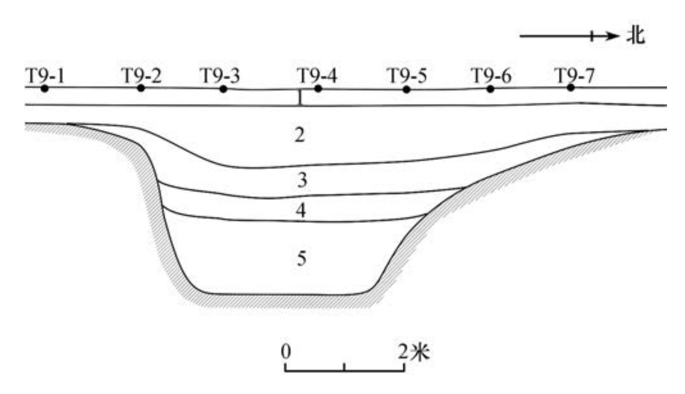
第 2 层：扰土层。土质松散，呈深灰褐色。深 0.3 ~ 1.3 米。含植物根系、炭粒等。

第 3 层：淤积层。土质松软，呈灰褐色。深 1.3 ~ 1.8 米。含木屑、草木灰、砖瓦碎块等。

第 4 层：淤积层。土质松散，呈浅灰色。深 1.8 ~ 2.2 米。含细沙、淤积土和少量炭粒等。

第 5 层：淤积层。土质松软，呈黄褐色。深 2.2 ~ 3.5 米。含少量炭粒、淤积土等。

第 5 层以下为浅褐色生土，土质稍硬，较纯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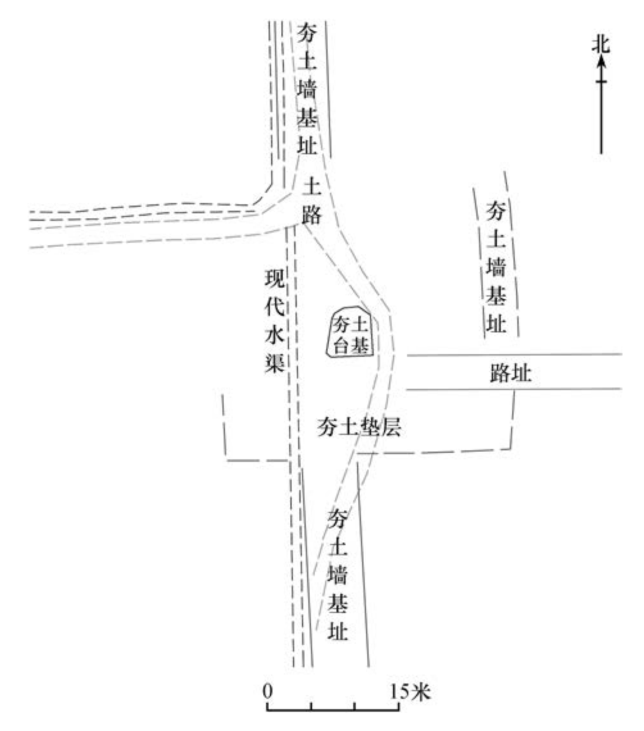
图七 北墙外侧护城河剖面示意图

北墙夯土墙基宽约 9.5 米，由于雨水冲刷侵蚀和农田耕种等因素，墙体北侧破坏程度较为严重，北侧墙基距现存墙体约 3.5 米，南侧墙基距现存墙体约 1.8 米，自墙基底部至墙体顶部高 4 ~ 5.2 米。

4. 夯土台基及周边区域

根据考古调查，推测城内夯土台基为惠远老城初建时东门所在，为进一步摸清初建东墙和东门的位置、规模和形制，在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

经勘探发现 5 处遗迹现象，包括夯土墙基址 3 处、夯土垫层 1 处、路址 1 处（图八）。



图八 夯土台基及周边区域勘探平面示意图

夯土台基北侧的夯土墙基址宽约 6.6 米，距地表深 0.8 ~ 1.1 米，现存厚度 0.5 ~ 0.6 米，向北 40 米处仍继续延伸；夯土台基南侧的夯土墙基址宽约 6.8 米，距地表深 0.5 ~ 0.9 米，现存厚度 0.4 ~ 0.9 米。根据上述两处夯土墙基址的位置和尺寸，可以判定其为老城初建时东墙墙体。

夯土台基东侧约 15 米处发现另一道夯土墙基址，大体呈南北走向，宽约 5、长约 19 米，距地表深约 0.4 米，厚约 0.5 米。根据其位置和尺寸，判断为老城初建东门瓮城墙体。

夯土台基以南至夯土墙基址之间，发现了一片夯土垫层，东西宽约 36 米，深 0.3 ~ 0.6 米，厚 0.3 ~ 0.8 米，土质较紧实，呈黄褐色及黑灰色花土，含少量炭渣及砖渣，判断为老城初建东门基址的南部。

夯土台基东南发现一条东西向路址，宽约 4.3 米，距地表深约 0.4 米，厚 0.1 ~ 0.15 米，叠压在瓮城城墙基址和东门夯土垫层之上，土质坚硬，呈灰黑色。根据道路位置、走向及层位关系判断该道路应为老城扩建后城内街道，与初建东门和瓮城并非同一时期遗存。

三、营建规模

惠远老城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由于贸易繁华和人口增加，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历经扩建。虽然目前城址仅残存东北部，但结合调查、勘探的情况和相关文献史料，可较为清晰地还原出城址的营建规模。

《西域水道记》载：“（惠远）城成，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五十八年，将军保公宁于城东展筑二百四十丈，共一里三分三厘有奇，新旧城共十里六分三厘。”[1]

按清代营造尺核算，惠远老城初建时周长一千六百七十四丈九里三分，约 5356.8 米，向东扩建后，周长十里六分三厘，约 6124.8 米。故“展筑二百四十丈”，实指南北两道城墙向东扩建的总长度，即两墙各东扩 120 丈（384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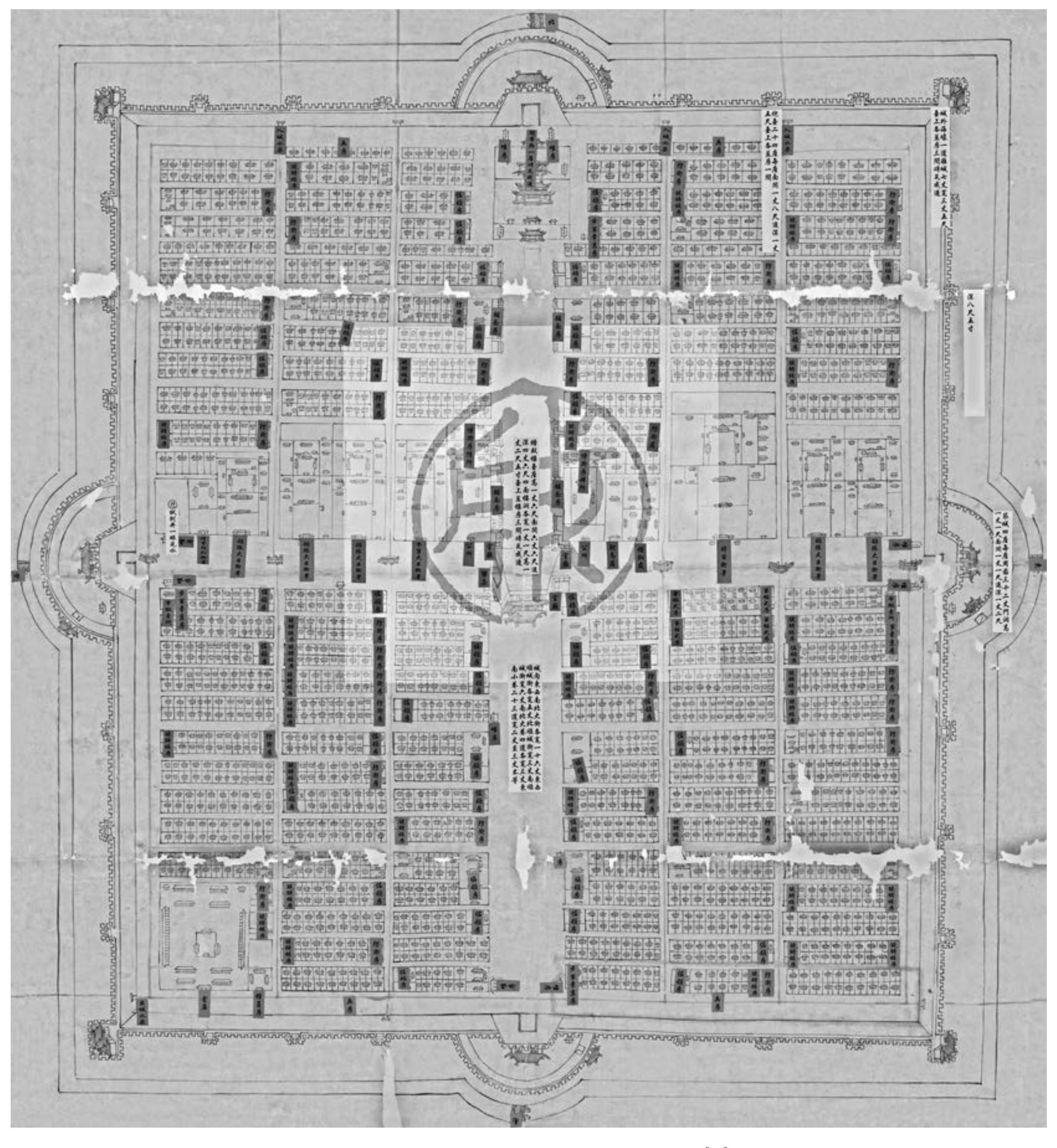
现存东门与城内夯土台基基本处于同一纬线上，两者距离为 384 米，正合东扩 120 丈之数。在夯土台基南北两侧钻探发现了宽 6.6 ~ 6.8 米的夯土墙基，根据其位置和尺寸，判断应为初建时东墙之所在，因此可以证实夯土台基即为惠远老城初建时东门基址所在，并非以往认为的钟鼓楼基址。

北墙上现存最东侧炮台与初建东门和东墙处于同一经线上，面阔约 15、进深约 5、高约 4.5 米，可以确定该炮台应为惠远老城初建时东北角台，扩建后改为炮台，故其尺寸规格明显大于其他各处炮台。

确定了初建东门和东北角台位置后，结合钻探确定的北门位置，可测得北门中心点至初建东北角台外端约 672 米，合 210 丈，初建东门中心点至东北角台外端约 667 米，

合 208 丈。参考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惠远老城平面图（下文简称“乾图”，图九），惠远老城初建时为规整的四门十字街对称布局。因此可以计算，惠远老城初建时北墙长约 1344 米（420 丈），东墙长约 1334 米（417 丈），周长约 5356 米（1674 丈），调查实测的数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故惠远老城初建时平面近正方形，东西长约 1344 米（420 丈），南北宽约 1334 米（417 丈），周长约 5356 米（1674 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向东扩建 384 米（120 丈），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728 米（540 丈），南北仍宽 1334 米（417 丈），周长 6124 米（1914 丈）。



图九　乾隆三十一年惠远老城平面图[2]

四、形制结构

“乾图”中较详细地绘制了惠远老城的平面布局，并记载了护城河、城墙、城门、街道及主要建筑的情况。结合考古工作和各类卫星影像资料，对图中所载内容进行分析考证，可以还原惠远老城的形制结构。

1. 护城河

惠远老城外侧开凿一周护城河，“乾图”记载：“城外海壕一道，离城七丈，宽三丈五尺，深八尺五寸”，即宽 11.2、深 2.72 米，距城墙 22.4 米。根据对北侧护城河的钻探，河道宽约 11、深约 2.5 米，南岸距现存北墙墙体约 21 米，与“乾图”中记载基本吻合。

2. 城墙

“乾图”中并未标明惠远老城城墙尺寸，《西域水道记》和《西陲总统事略》均记载老城城墙高“一丈四尺”[3]，即 4.5 米，根据实际测量，现存城墙墙体高 3 ~ 4.5 米，厚 3.5 ~ 3.7 米，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四面城墙初建时各修炮台 6 座，合计 24 座，“乾图”记：“炮台二十四座，每座面阔一丈八尺，进深一丈五尺，台上各盖房一间”，即面阔 5.8、进深 4.8 米。北墙上除初建东北角台改建的炮台外，另 2 座面阔约 5.8、进深约 3.8 米，东墙现存 4 座炮台面阔约 5.8、进深 4.4 ~ 4.6 米。主要是冬季西北季风和农田开垦的破坏，北侧炮台侵蚀坍塌情况较东侧更为严重。

惠远老城扩建后新增炮台情况文献中并无记载，查询 20 世纪 70 年代的 Corona 卫星图（图一〇），可以看到北墙扩建部分新筑炮台 2 座，加上原东北角台改建的炮台，



图一〇　惠远老城 Corona 卫星图

共计 3 座。南墙扩建部分已被伊犁河冲毁，实际情况不详，但根据北墙情况推测，可能同样增建 3 座炮台。故扩建后南北两墙各 9 座炮台，东西两墙仍各为 6 座，合计 30 座。

关于角台的尺寸，文献中并无详细记载，仅“乾图”中注：“台上各盖房三间，砖瓦成造。”城址初建时的东北角台面阔约 15、进深约 5 米，从面积上来看，符合“盖房三间”之说。

3. 城门

惠远老城四面各开一门，分别为“东景仁、西说泽、南宣闿、北来安”[4]。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扩建后，原东墙被拆除，原东门“旧城楼为阁，供奉魁星”[5]，故城内现存夯土台基应为初建时东门城楼基址，扩建后改为供奉魁星的阁楼。

四门外均修有马蹄形瓮城，“乾图”中载：“筑城四座，每座周圆三十二丈，门洞高一丈一尺，面阔一丈一尺，进深一丈二尺”，即 4 座瓮城弧长约 102 米，门洞高约 3.5、宽约 3.5、深约 3.8 米。

目前城门破坏情况较为严重，北门曾因农田开垦被当地居民炸毁，东门也仅残存 2 段瓮城墙体。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城址周边尚未开垦农田，北门和东门保存较完好，从 Corona 卫星图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出门址和瓮城的结构。瓮城均为马蹄形，东门瓮城向南开门，北门瓮城向东开门，对卫星图中瓮城进行测量，弧长约 102 米，与“乾图”所载尺寸可相互印证。

4. 街道

惠远老城始建时呈四门十字街布局，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连通四门。“乾图”中对城内街道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载：“城内东西、南北大街各宽一十六丈，东西顺城街各宽五丈，北顺城街宽三丈，南顺城街宽六丈，南北大巷四道各宽三丈，东南小巷二十三道，宽二丈至三丈不等。”即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宽约 51.2 米，紧邻城墙的顺城街宽 9.6 ~ 19.2 米，4 条南北向大街宽约 9.6 米，均匀分布在南北干道两侧，23 条东西向街巷宽约 6.4 ~ 9.6 米，其中东西干道北侧 10 条，南侧 13 条。

从 Corona 卫星图中可以看到，扩建后老城东部新增 2 条南北向大街，东西干道北侧增设 3 条东西向街巷，其余基本为扩建前东西向街巷的延伸，南北各 13 条，共 26 条对称分布。

惠远老城内沿顺城街和南北向大街，有贯穿全城的水渠。洪亮吉曾在诗文中描述：“五月天山雪水来，城门桥下响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画开。四月以后，即引水入城，街巷皆满，人家间作曲池以蓄之，至八九月始涸。”[6]根据“乾图”所绘，初建时老城共设水门 7 处。由于地势北高南低，4 处引水入城的水门均开于北墙，与 4 条南北大街相对，2 处引水出城的水门开于东、西两墙南角，另 1 处引水出城的水门开于南墙，与中央大街西侧南北向大街相对。扩建区域水渠修建情况目前尚难以考订。

5. 主要建筑

惠远老城干道交汇处有 1 座钟鼓楼，据“乾图”记载：“高一丈六尺，面阔六丈六尺，进深四丈六尺，四面楼洞各宽一丈一尺，高一丈二尺五寸，台上盖楼房三间，砖瓦成造。”即面阔约 21、进深约 14.7、高约 4 米。根据卫星影像和实地调查，钟鼓楼所在区域如今已被伊犁河冲毁。利用 Corona 卫星图测量，钟鼓楼基址东西长约 20、南北宽约 12 米，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城内主要衙署机关成排修建于东西向干道北侧，包括将军衙署 1 所，参赞大臣衙署 1 所，锡伯营、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惠宁城满营等领队大臣衙署 5 所，理事同知衙署 1 所[7]。将军衙署所在区域目前地表散布较多的建筑构件等遗物，调查过程中钻探发现有约 4.5 米宽的夯土墙基址，基本可以确定衙署的位置和范围。

根据“乾图”所绘，城内修建了关帝庙，位于北门内干道之上。除此之外，田卫疆通过《钦定新疆识略》《伊江汇览》《伊江集载》等文献考证了万寿宫、关帝庙、八蜡庙、城隍庙、祠堂、刘猛将军庙、社稷坛、龙王庙、先农坛、风神庙、火神庙、文昌宫、魁星阁、节孝祠和喇嘛寺等多处庙宇的大致方位[8]。经调查确认，城内现存夯土台基即是魁星阁基址，其他庙宇仅通过文献记载尚难确定具体位置。

除上述衙署和庙宇外，城内西南角修建了仓库，临近西门开凿了一口水井，钟鼓楼以北中央干道两侧有铺面房，其他区域多成排修建营房，用于屯兵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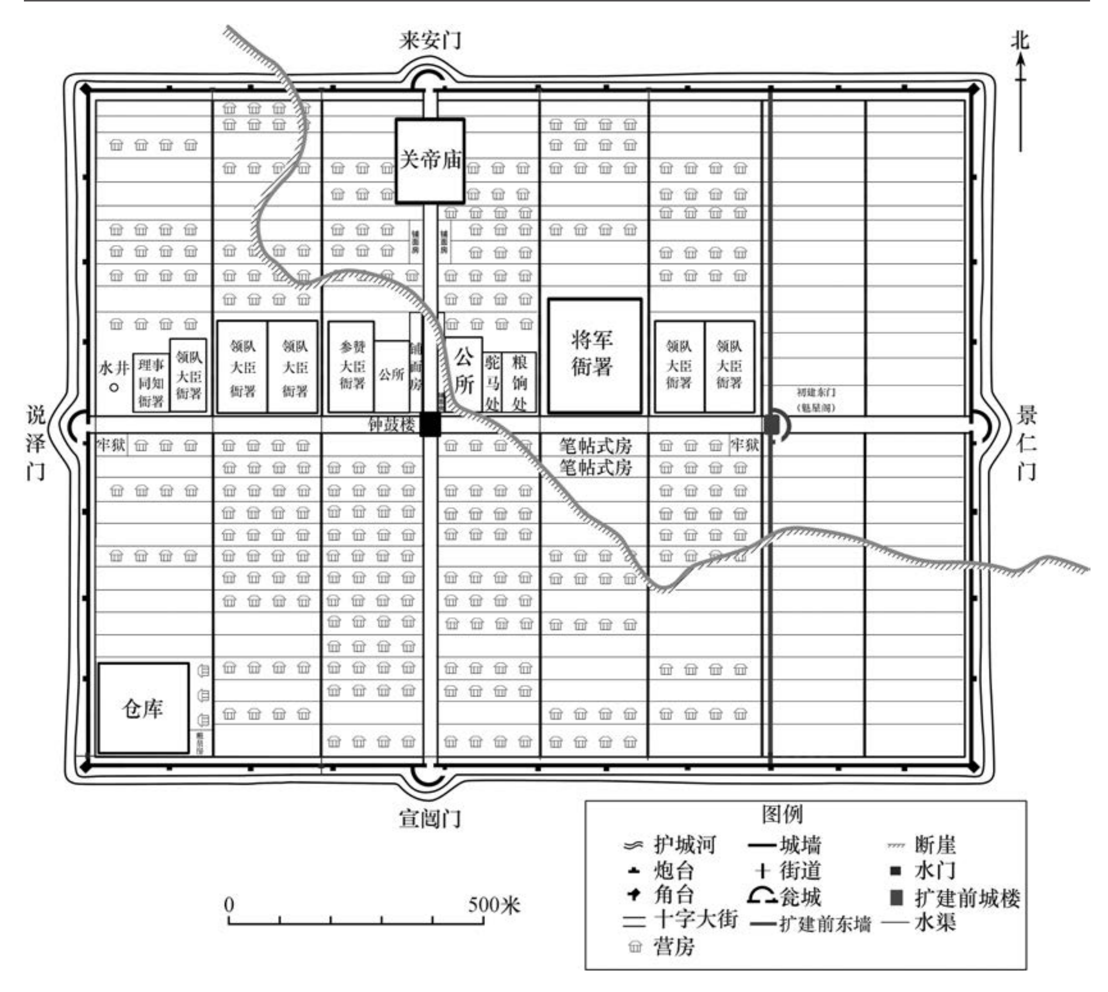
6. 小结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大体还原出惠远老城的形制结构（图一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初建时南北宽约 1334、东西长约 1344 米；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扩建后，南北仍宽 1334、东西增至长 1728 米，城内现存夯土台基即是初建时东门城楼基址，后改为魁星阁。城开 4 门，均建有马蹄形瓮城，筑炮台 24 座，扩建后增至 30 座，外修一周护城河，并开 7 道水门，通水渠进城。除东西、南北 2 条干道呈“十”字形分布外，街道主要包括 8 纵 28 横。钟鼓楼位于初建时城址的中心位置，现已被伊犁河冲毁，各处主要衙署成排修建于东西干道北侧，北门内修有关帝庙，仓库位于西南角，并于西门内开凿水井，城内空间主要用于修筑营房，驻扎军队。

五、结　　语

惠远老城自营建至废弃，沿用百余年，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的驻地，也成为当时新疆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见证了祖国边疆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进程。

由于缺乏系统的考古工作，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惠远老城的保存现状、城址的扩建情况、城内夯土台基等遗迹性质认定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利用考古调查掌握



图一一　惠远老城复原平面图

的一手资料，结合各类文献史料和卫星影像，本文重新梳理和考订了惠远老城的布局结构，解决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带一路”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惠远老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开展考古工作、还原老城的营建形制，仅是研究的开端。希望通过本文，可以推进对惠远老城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的考察，并为探讨惠远老城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西交流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供切实可信的依据。

注　　释

[1]（清）徐松．西域水道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241，242.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正月）.

[3] a．同［1］.

b．（清）松筠．西陲总统事略［M］．北京：中国书店，2010：71.

［4］　同［1］：242.

［5］　同［3］b.

［6］　（清）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A］．蕉轩随录：续录·卷1·出塞诗［C］．北京：中华书局，1995：495，496.

［7］　（清）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4［A］．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636.

［8］　田卫疆．清代伊犁惠远城建史初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on the Huiyuan Site

Ren Guan　Hao Yua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Huiyuan Site in the past two years. Combining newly available archaeological data,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atellite imagery,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process of the Huiyuan site can be clarifie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he Huiyuan site. Based on this study, a ground plan of the Huiyuan site was reconstructed.

Keywords: Huiyuan site; survey; structure; shape

蒙古地区岩画研究的最新成果

巴图宝勒德[1] 著　特尔巴依尔[2]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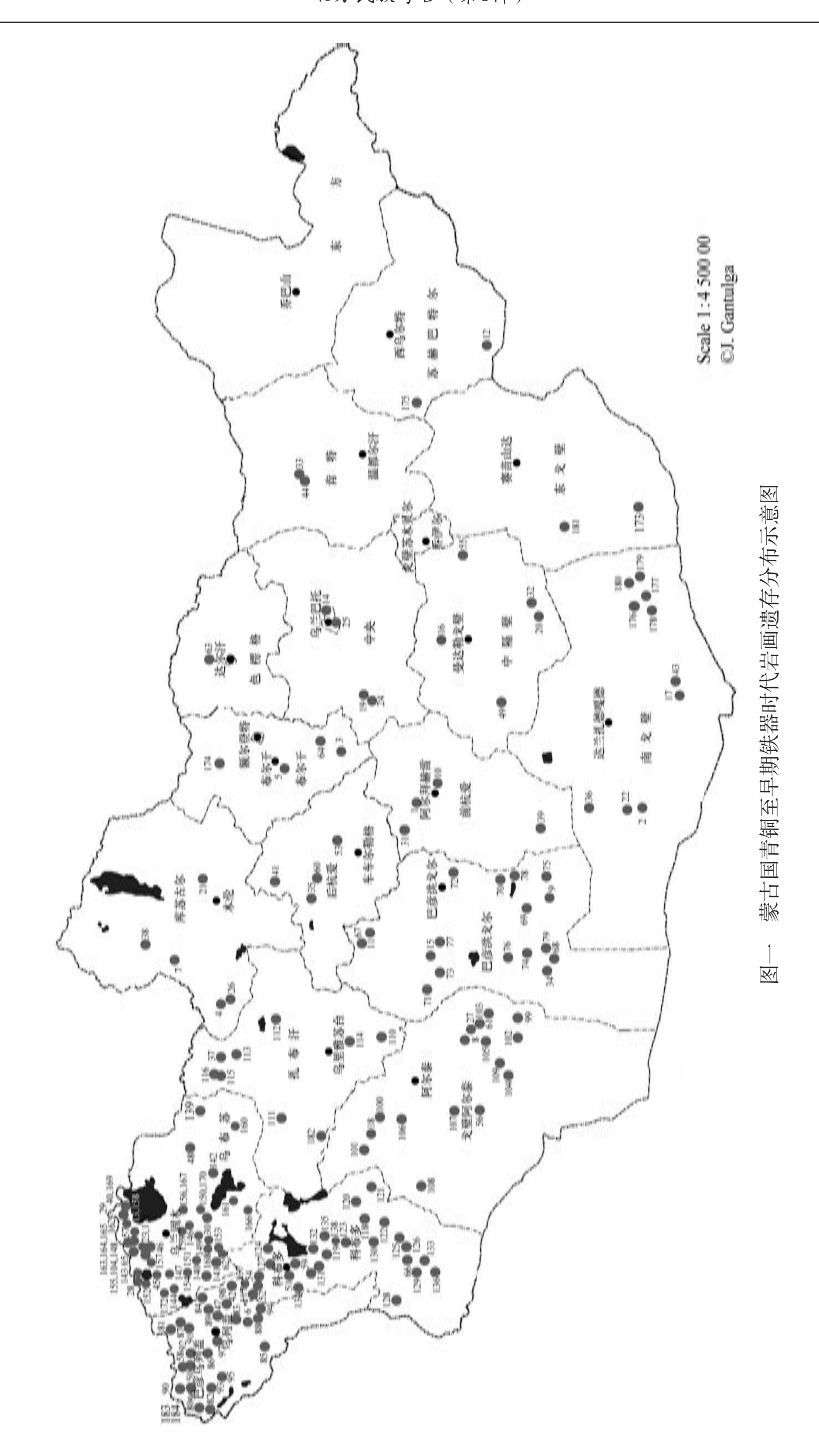
（1.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乌兰巴托；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岩画是蒙古地区独特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年来调查中，在蒙古地区发现了600余个岩画地点，并且每年的地点数量都在增加。2017年，蒙古和俄罗斯联合考察队调查了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苏苏木查干萨拉遗址，并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岩画。阿尔泰山脉中较早的岩画图案有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猛犸象、鸵鸟和犀牛等动物形象。在更新世末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当山坡和洞穴中的冰层开始融化时，古代定居者从温暖的平原迁移到高原。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位于岩石高原旁边，可能与一条古老的河流有关。沿岸的岩石上发现了大量的岩画。我们在26块岩石找到了近百幅图案。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的岩画中的大多数表现形式是人脸、鹿和马。这些形象与古代定居者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有关。哈布查嘎图遗址位于南戈壁省布尔干苏木。哈布茨嘎图遗址的岩画表现了蒙古帝国时期贵族的形象。巨石上描绘了贵族、女王以及侍者，形象地表现出他们的发型、帽子、衣服和他们坐的椅子等。每年的实地调查都会发现许多岩画遗址。很明显，通过系统的区域调查，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考古遗址，尤其是岩画遗址。蒙古地区发现了众多岩画，却很少有人研究。正是如此，需要我们努力收集材料并继续发现和记录新的岩画遗址。

关键词：岩画；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

蒙古是众多古代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岩画遗存汇集地之一。根据近几年在蒙古国进行的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600余处岩画遗存，不仅如此，每年的考古调查也不断有新的地点被发现（图一）。

本文主要介绍近几年在蒙古国新发现的岩画遗存及研究成果。这些岩画的分布地点分别是：苏和巴特尔省额尔德尼察汗苏木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阿尔善特格，南戈壁省布尔干苏木哈布茨嘎图阿木，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苏苏木查干萨拉、小维古尔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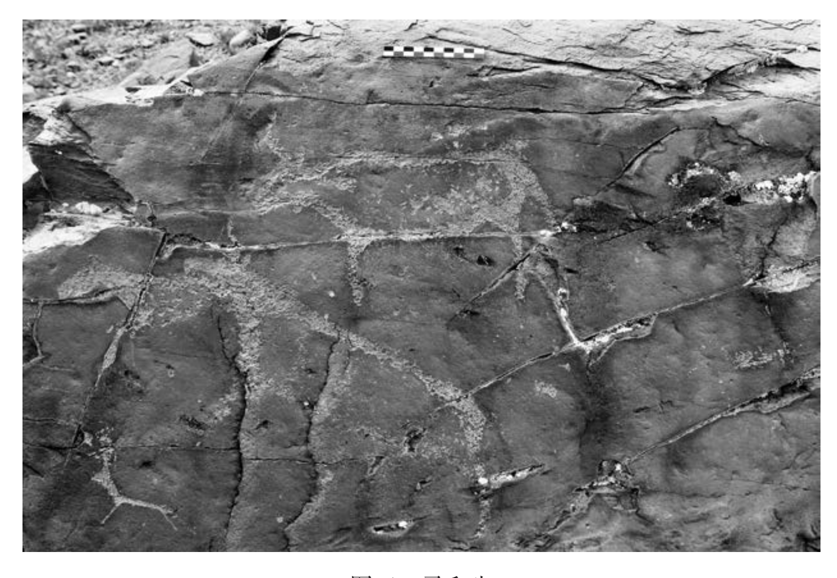
图一　蒙古国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岩画遗存分布示意图

一、查干萨拉、小维古尔河岩画

首先介绍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苏苏木查干萨拉、小维古尔河岩画遗存的最新调查和研究，2017 年蒙俄联合岩画调查队在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苏苏木查干萨拉、小维古尔河的岩画遗存再次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中他们发现石器时代有关的岩画遗存。阿尔泰山区最古老的岩画是生存于旧石器中晚期的猛犸象、鸵鸟、马、牛、犀牛等动物图案为主的岩画（图二、图三）。



图二　猛犸象



图三　马和牛

更新世晚期或旧石器晚期气候开始变暖，山顶和河谷地区的冰川开始融化的同时，人类可能正从低海拔气候相对温和地区逐渐向高原寒冷地区迁徙。这一时期生存在草原森林等植被茂盛地带的麋鹿、盘羊、北山羊、野牛、马等动物的图案应属石器时代岩画的图案。古代环境学的研究显示，青铜时代之前的阿尔泰山区的气候条件与这一时期的气候条件相符合。

查干萨拉和小维古尔河岩画遗存中的猛犸象与牛、马等图案出现在更新世河岸边的大岩石上，而青铜时代的岩画基本是在半山腰海拔较高的岩石上大量出现。旧石器时代岩画的主要特点为动物侧面图。整体用敲击法在岩石上敲击出线条来呈现，动物的腿部和尾巴是用两根细线条来表现，腹部被刻划得较大，头部呈上仰状。还有另一些特点，比如动物头部被整体敲凿，身体其他部位用线条描绘，或只敲击出头部，其他部位不完整。

查干萨拉和小维古尔河岩画遗存里的马图案在俄罗斯乌科克高原也有发现，这表明阿尔泰山脉属石器时代的刻划艺术分布区之一[1]。

二、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

这一处岩画遗存为蒙古国考古研究中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文物点，包含了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岩画。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位于苏和巴特尔省额尔德尼察汗苏木地区古代河谷两岸。沿河谷两岸的大块岩石表面分布着大量的古代岩画，我们在26块大岩石上找到了近百幅图案[2]。

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里的人脸图案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人脸图案相似，如中国阴山地区的人脸图案（图四）。中国学者从象征学的角度将人脸图案不仅解释为远古时代对神灵和鬼神的崇拜，这些崇拜也象征着对太阳、月亮和星空的崇拜，他们还把这种崇拜虚拟为人[3]。

这一处岩画图案主要以人脸为主，还有鹿、马等动物的图案（图五）。岩石上刻划人脸的这种形式与古代人群的信仰、世界观以及某种礼仪相关。首先，这些与萨满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萨满不仅崇拜飞禽走兽，还崇拜祖先和神灵，学者认为从这一刻起萨满做法使用的面具上就开始绘有人的五官图案。现代的萨满面具上也绘人的嘴、鼻子、眉毛等图案，这与岩画上刻划的人脸图案非常相似。萨满认为他们戴上面具时，祖先的灵魂就会附在他们身上。这有可能是从古代传承至今，所以有依据认为人脸岩画绝不是偶然现象[4]。

蒙古国戈壁及东部地区也发现了与古代人群信仰有关的岩画，比如人脸、太阳和月亮图案，并且比起其他地方更多，这足以证明这一区域是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期至青铜时代具有独特文化习俗的区域。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地点新发现的人脸图案非常独特，年代约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



图四　吉尔格楞图—阿德根—希热岩画中的人脸岩画



图五　马

三、阿尔善特格印章图案的岩画

阿尔善特格遗址位于苏和巴特尔省额尔德尼察汗苏木中心以北 70 千米处（图六）。

此处岩画点由三块大岩石组成，目前情况是与其他岩石一样均散落在地面上，未做任何保护措施。阿尔善特格岩画图案与匈奴时期印章图案有关，尤其是匈奴贵族印章图案[5]（图七、图八）。



图六　阿尔善特格岩画总体情况

与此相似的印章图案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高勒、科布多省雅曼乌苏和哈尔嘎特草原等地岩画中也有发现与此相同的图案。此外，在诺彦乌拉、高勒毛都匈奴贵族墓也出土过相似的图案。不仅如此，蒙古中央省特日勒金—朵尔布金陶片表面、布里亚特朵尔根遗址、中国陕西省大保当墓葬等遗存中出土的图案都与匈奴贵族相关，这一发现无疑是对匈奴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学者认为这些印章图案正是匈奴贵族即挛鞮或虚连题部落印章图案[6]。

四、哈布茨嘎图岩画

这处岩画点位于南戈壁省布尔干苏木哈布茨嘎图阿木，是刻画蒙古帝国时期日常生



图七　印章图案的岩画



图八　印章图案的岩画

活状态中比较独特场景的一组岩画。描绘的内容有坐在凳子上的王公贵族及为他们服务的佣人们穿戴的帽子、衣服，以及周围摆设的马扎凳等图案，这些都与蒙古时期其他地方发现的石人、山洞遗址、陵墓壁画及馆藏在其他国家绘画中的常见图案很相似。此类岩画点目前在蒙古国首次发现，它的发现对研究蒙古古代历史有着重大意义[7]。

通过最近几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许多新的岩画遗存，如果在蒙古国进行区域调查，将会发现更多的考古遗存，尤其是更多的岩画遗存。蒙古国虽然有很多岩画遗存，但真正能用于学术研究的很少，这是因为蒙古国岩画分布区域越来越广，岩画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

注　　释

［1］ Д.Цэвээндорж, Н.Батболд. Монгол-Оросын хамтарсан хадны зур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2017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M].ТАХГБСХ.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2］ Ц.Төрбат, Н.Батболд, Д.Батсүх. Жаргалантын адгийн ширээ, Рашааны тээг ба Чулуут голд хийсэн хадны зур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J].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2016.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тал 243 ~ 247.

［3］ У.Эрдэнэбат. Хахуулийн голын хадны зураг [J].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VI) XXVI, fasc. 3.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8, тал 32 ~ 56.

［4］ Н.Батболд. Монголын говийн бүсийн хадны зур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M].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4, 184 тал.

［5］ Ц.Төрбат, Н.Батболд, Д.Батсүх. Жаргалантын адгийн ширээ, Рашааны тээг ба Чулуут голд хийсэн хадны зур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J].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2016.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тал 245, 246.

［6］ Ц.Төрбат, Д.Батсүх, Н.Баярхүү. Хүннүг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тамгууд люаньди овгийн тамга болох нь [J].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XXXII, fasc.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2, тал 136 ~ 161.

［7］ Т.Идэрхангай, Д.Цэнд, Б.Амгаланбат, Э.Даваахүү. Хавцгайтын амны хадны зураг дахь Монгол гүрний үеийн өвөрмөц дүрслэлийн тухайд [J].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XXXVI, fasc. 23.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тал 317 ~ 330.

Current Research on Petroglyphs in Mongolia

N. Batbold

Abstract: Petroglyphs constitute a large part of the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of Mongolia. During survey, 600 locations were found which contain petroglyphs in Mongolia, and the number of site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In 2017, a Mongolian and Russian joint expedition surveyed the site of Tsagaan salaa, Baga Oigur, Bayan-Ulgii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new

petroglyphs attributed to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he earliest petroglyphs in the Altai mountains contain animal pictures such as mammoth, ostrich, and rhinos that lived in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At the end of Pleistocene and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when ice layers on mountain slopes and in caves began to melt, ancient settlers moved from the warm plains to higher plateaus.

Jargalantyn Adgiin Shiree rock is located on a rocky plateau next to a cave which was probably related to an ancient river. Rocks along its shore display a large number of petroglyphs. We recorded more than a hundred pictures on 26 rocks.

Most representations in Jargalantyn Adgiin Shiree's petroglyphs are of the human face, deer and horse. These figures are related to the sancient settlers'religious beliefs and worldview.

The site of Khavtsgaityn am is located in Bulgan soum, Umnugobi aimag. The paintings in Khavtsgaityn am represent a scene of the nobility from the Mongol Empire period. Nobles, queens, their attendants, hairdress and hats, clothes and chairs are depicted on the monoliths.

Every year, field survey reveals more sites with petroglyphs. It is clear that with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more archeological sites can be found, especially petroglyphs.

Among the numerous sites with petroglyphs known in Mongolia, very few are being researched. An effort is needed to gather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and continue the work of collecting and recording new evidence.

Keywords: Petroglyphs; Mongolia; Paleolithic

蒙古国东南部的综合纪念建筑与考古景观 *

约书亚·怀特[1] 著　张　倩[2]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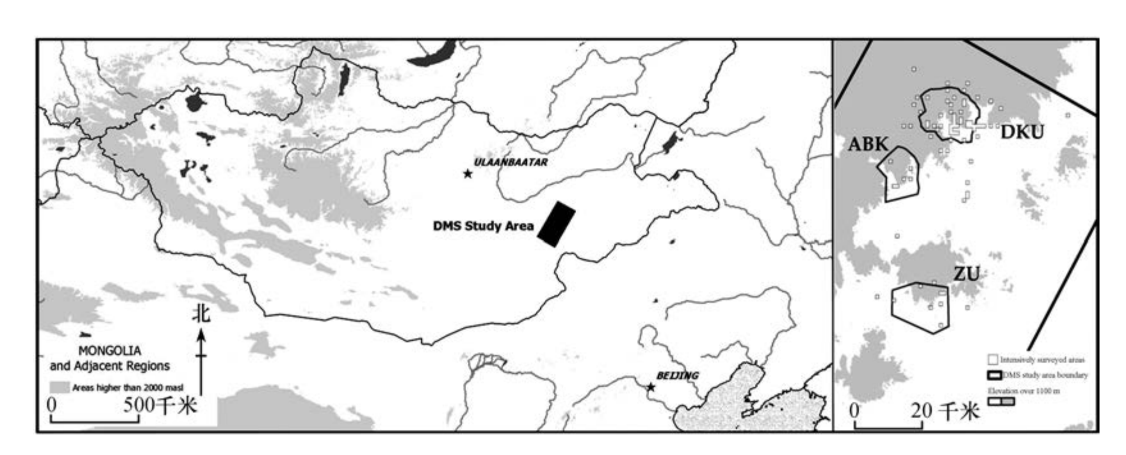
（1. 英国阿伯丁大学考古系，阿伯丁；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本文将对近年来在蒙古国苏赫巴特尔省开展的“蒙古国东方省研究”项目（简称 DMS 项目）进行介绍。DMS 项目涵盖了一系列的田野工作，包括跨全新世的调查、发掘和地质考古研究。近期我们在德力格尔汗山周围进行了调查，主要致力于青铜时代的居住遗址、墓葬及纪念建筑的研究，其中我们尤为关注的是综合纪念建筑，这种大型建筑不仅包含了各类纪念建筑，而且利用相关的附属建筑，从而创造出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化景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青铜时代权力的彰显、区域身份认同的觉醒及政治集团的萌芽。

关键词：苏赫巴特尔省；DMS 项目；青铜时代；纪念建筑

青铜时代的欧亚大陆是世界上考古材料较丰富的地区之一。从广阔的草原到山区，人群的大规模迁徙留下了众多精致的金属制品和丧葬纪念建筑[1]。本文重点介绍在蒙古国东南部发现的早期丧葬纪念建筑遗存，这些遗存与乌兰朱和的丧葬传统息息相关[2]。

位于蒙古国东南部的苏赫巴特尔省和东戈壁省内的戈壁地区（图一），是一片半干



图一　DMS 项目研究总区域及重点研究区

* 原文发表于第三届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方考古与欧亚文明。

旱的草原区，如今以马匹和金属资源而闻名于世。在远古时期，它的南边是有着成熟的农耕聚落和早期国家的黄河北部流域，北边是灌溉充沛、林木茂盛的杭爱高地和克鲁伦河谷地，这片区域孕育了历史上的草原帝国和遗存丰富的铁器时代。

在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等地开展的大量的考古工作使得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闻名遐迩，也使得宏观区域序列被确立[3]。近年来，DMS 项目和其他学者[4]的研究认为戈壁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古人类，可能不仅采用了全新世中期常见的狩猎—采集适应性策略来解决生存需求，而且做出了选择以顺应宏观区域发展趋势。本文致力于探讨社会和政治条件、技术状况或类型模式在多大程度上界定了欧亚大陆青铜时代[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早期青铜时代的探讨始于对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经典现象的探讨。在早期青铜时代之后，蒙古国进入晚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大约公元前 3200 ~ 前 2300 年），也就是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晚期或末期[6]，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了青铜时代代表性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结合肖像研究可以看出长久的联系和区域等级[7]，精英阶层在长期的交换体系中管理力度不断加强[8]，宏观区域内有规律的丧葬形制和传统[9]，承载着丰富信息的纪念性建筑如石板墓等表明了定期的迁徙和共有的建筑形制[10]，以及历史上为人熟知的游牧经济的形成[11]。在我们对此进行探讨的同时，有关这些文化现象的诸多问题仍悬而未解。

一、蒙古国东方省研究项目的研究方法

DMS 项目是一项正在蒙古国东南部开展的科研项目，包括区域调查、发掘、民族考古和古环境研究（图一），研究区域总面积达 7000 平方千米，覆盖了多样的草原环境，从盐湖盆地到干旱的沙地高原、草原以及岩石遍布的山脉，它们在严酷的周边环境中形成了较为富饶的区域。在此区域范围内，我们选中了一片总面积为 520 平方千米的独特区域进行专门研究，并集中调查了其中的 97 平方千米，这片区域环境类型多样，包含了所有类型的纪念建筑及其他建筑遗址，并且发现了小至 2 平方米的遗物分布区域。如此便提供了除最稀有的地区类型以外的所有遗址类型，也使得我们能够将纪念建筑与聚居模式相结合。

该项目初始阶段的成果笔者已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 2015 年第三届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中国北方考古与欧亚文明上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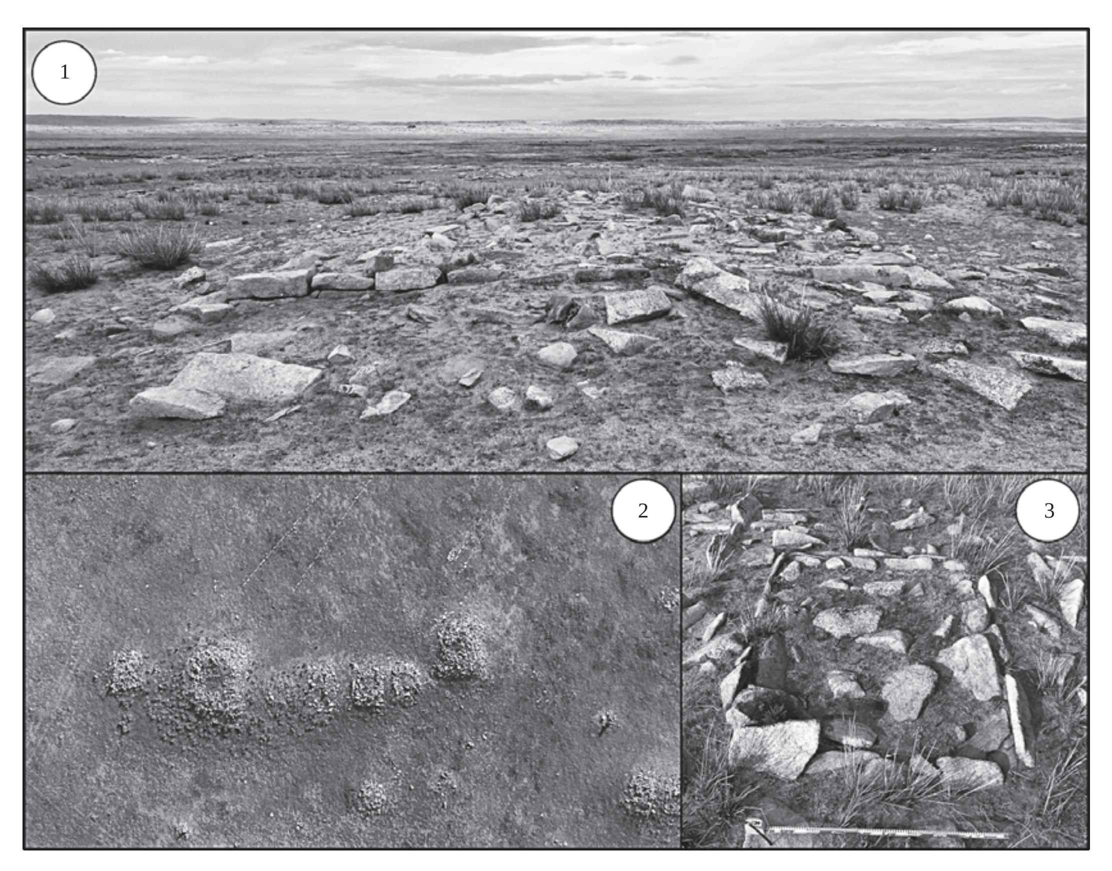
二、乌兰朱和类型纪念建筑

对纪念建筑的研究也是对地方建构和社会空间形成的研究[12]，这不仅包括丧葬

纪念建筑和墓葬，也包括一系列的相关建筑。在戈壁地区，所有的纪念建筑都具有相同的元素和建筑技术，这使得它们构成了一种可以被广泛理解的建筑风格。本文将介绍一系列的墓葬和非墓葬纪念建筑，它们反映了当地的社会行为和共同的区域意识形态。

乌兰朱和文化的实物材料均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3]，也同时显示出先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狩猎—采集者文化和紧随其后的青铜时代文化的特征，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其存在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14]。然而，同欧亚大陆其他相似的考古学文化一样[15]，学者更偏向于将乌兰朱和文化与后一阶段文化的相似之处联结起来，而不是与前一时期文化的联结，他们认为这些处于过渡期的文化属于早期青铜时代，而非旧石器时代末期。鉴于此，我们将该时期视为奠基时期，它为晚期铁器时代成熟的区域政体和传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门和纳文[16]根据墓葬的发掘情况对乌兰朱和的丧葬传统进行了定义。DMS 项目已经记录了 500 多座该类墓葬及数百种相关特征。在重建东南部戈壁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景观时，我们重点关注了以下三种纪念建筑（图二）。



图二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墓葬链

（译者注：1、2.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　3.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链）

（1）第一种，墓葬本身是长方形的石头结构，低矮的封石堆中间有一个较浅的墓坑。封石堆的边沿是一道由若干层扁平石板精心垒就的矮墙，高约 40 厘米。矮墙的侧面斜靠着许多竖直的扁平石板（图三）。这些墓葬长 1.4 ~ 13.5 米，平均值为 4.8 ± 2 米，方向统一为北偏东（77° ± 26°）。墓主人呈俯身直肢状，这种丧葬传统见于遍布戈壁地区的不同类型但结构相近的纪念建筑中［17］。有一些墓葬在其南部或东部几米开外处竖有高约 1 米的未经装饰的石柱。极少数的石柱顶部会留下了粗糙的塑形痕迹。众多墓葬呈链状排列，一组一组的长方形墓葬较长的一边几乎相接。通常来说，链条的一端是这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并且任何一组墓葬都不会超过九座［18］。根据已经发掘的墓葬来看，埋葬在这些相关联的墓葬中的人可能是一群相似的人（大多是年龄相仿的男性），也可能是不同的人（成人和儿童）。在这两种情况中，每个墓葬链都是在 1 ~ 2 个世纪或更短的时间内建成的，这一点说明在聚落中有持续纪念逝者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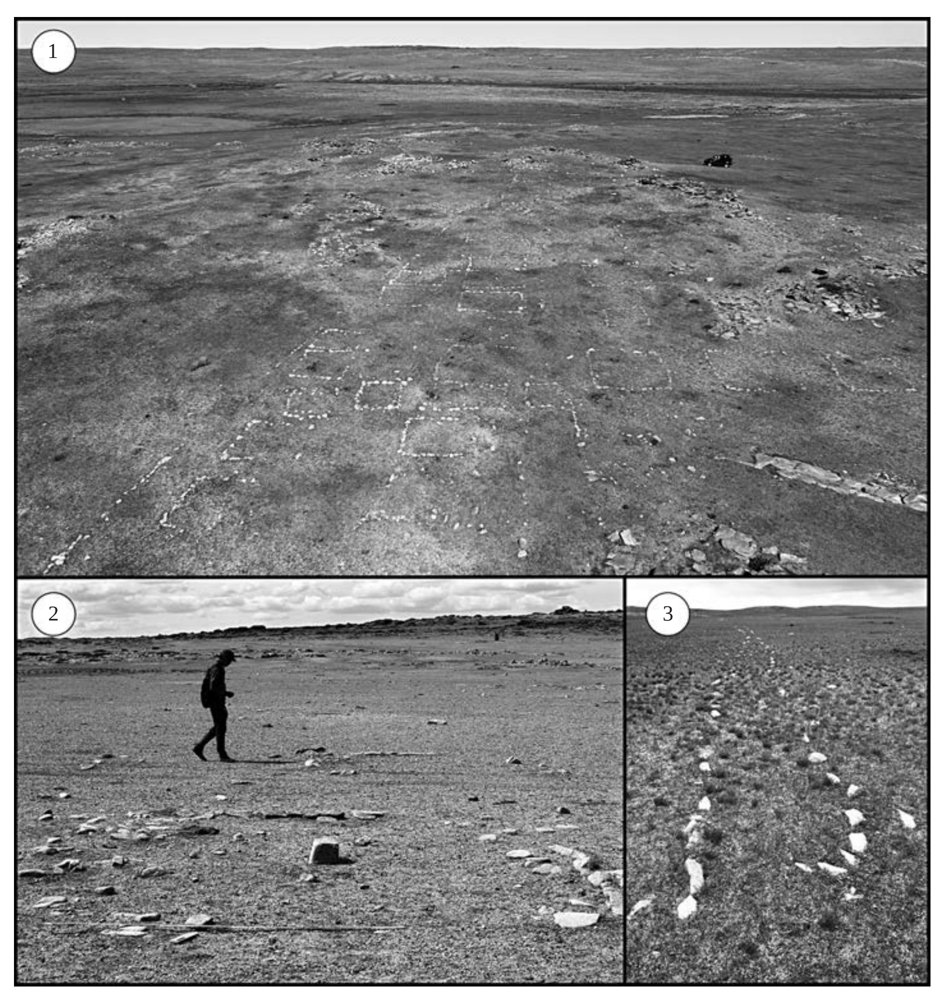


图三　乌兰朱和大型墓葬：石板矮墙侧面有石板斜靠

除了这些已经得到确认的丧葬纪念建筑外，还发现了一些相关建筑（图四），依据它们与墓葬的联系我们可以推测其年代。这些建筑由一道石头围成长方形，它们比墓葬大一些，长边长 6.2 ± 1.6 米，平均面积是 34.3 平方米，石围的短边通常有一个朝南的开口。在阿尔泰地区也发现了相似的建筑，它们和戈壁地区的乌兰朱和墓葬属于同一时期。

长方形石围的西侧长边附有一条小路，中心位置有时竖立一根立方形的石柱。在主封石堆的开口处也有两行这种立方形的石柱向南延伸，每行由 2 ~ 3 块石柱构成。这些建筑有时单独出现，但更多的是数座并排呈长列出现，有时长数十米的直立石柱看起来似乎垂直于封石堆的开口。

（2）第二种，神秘的建筑呈长射线状，石头在地表排成列，一些是成对的线条与另一纪念建筑交汇，一些是单独的线条且末端微微弯曲。DMS 项目发现了 9 处拥有此种特征的建筑，它们的朝向与地形无关，均一致，呈东北—西南向，现有平均长度为



图四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的地表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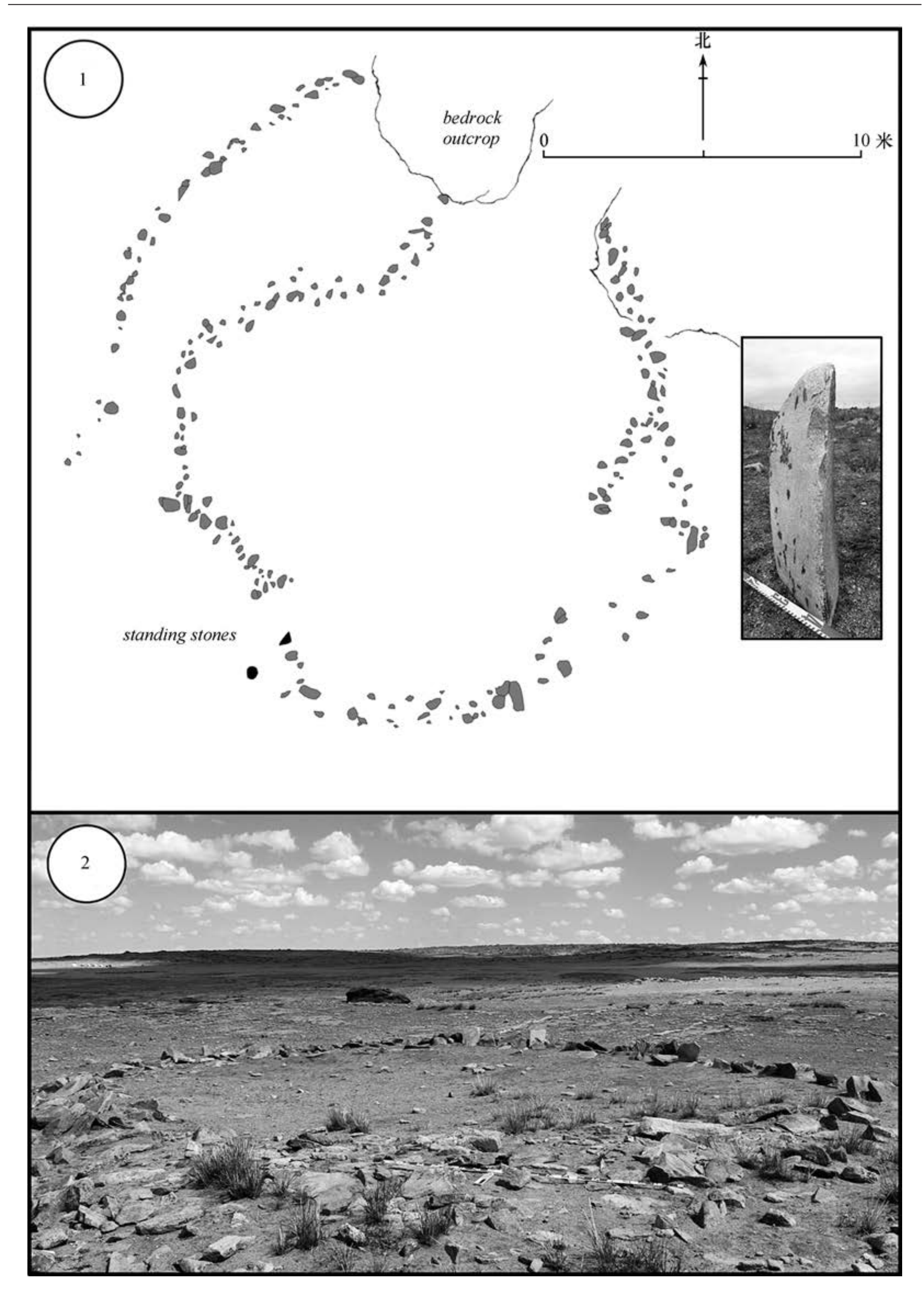
（1、2 为方形封石堆，2 的中心为一立方形石柱，3 是一组平行排列的石头）

121 ± 33 米。大多数此种建筑的东端有 1 座墓葬，但是有 3 座建筑的两端未发现明显的墓葬特征。虽然长射线建筑和墓葬并非同时建造，但由于射线状的排列方向和墓葬的轴线平行，使两者连在了一起。

（3）第三种，纪念建筑由竖立的扁平石头或者石板围成圆圈状（图五），这些石板和墓葬封石堆周边的石头一样。DMS 项目发现了 45 处此种纪念建筑，它们的周边环境多种多样，其中的 2 处已经发掘结束。圆形石圈的直径为 10.3 ± 3 米，无其他特征和人工制品。有迹象表明在一些残存的此种建筑或圆形石圈的空地上，可能存在固定的进出通道。

圆形石圈又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圆形石圈靠近或连接稍大的墓葬（样本数为 35），这种直接和圆形石圈连接的大墓葬比一般墓葬大得多（长 7.3 ± 1.9 米，t=−5.74，p<0.0001）。大墓葬和圆形石圈



图五　乌兰朱和圆形石圈纪念建筑

（1. 圆形石圈有第二圈弧线，北部有一岩石和立石标记了通向石圈内部的急转弯道路　译者注：2. 乌兰朱和类型圆形石圈纪念建筑）

也可能单独出现。圆形石圈不仅见于有多座墓葬的大型遗址，而且亦发现于有 3 ~ 4 座墓葬的中等规模墓葬群。

第二类圆形石圈没有相连的墓葬（样本数为 7），但是在其北部的 1/4 圆中一般会有一块露出地表的天然岩石。长方形封石堆和圆形石圈南部敞开、北部封闭，这说明还有另一条共同的轴线，其包含的可用空间可能曾有人居住过。

第三类是一种更大更精致的圆形石圈，拥有清晰的弧形出入通道（样本数为 3）。这些通道有些是通向石圈和墓葬的急转弯入口，有些是连接石圈内露出地表的立石，这表明其指向石圈的内部空间。在已经发现的 3 处此类石圈中，其中 2 处的弧形通道朝向或直接连着以前的湿地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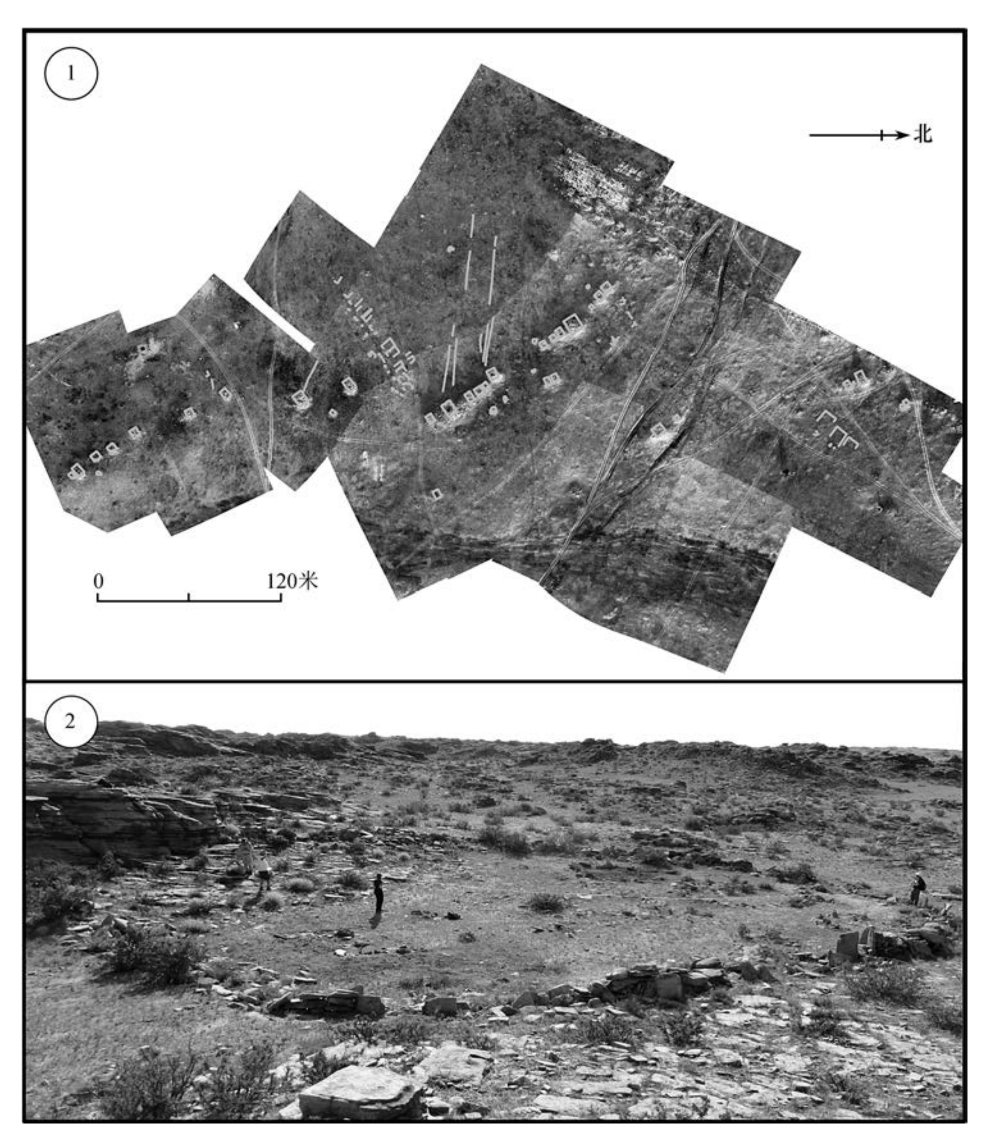
综合纪念建筑周围和内部的石头排列及结构将地表空间加以划分，其作用可能是通过将人们安排在不同区域内，以此来构建社区政治。各个空间都有固定的朝向和进出通道，参与人员和观礼人员之间有明确的区分，由此推测这些圆形石圈对于组织墓葬周边的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圆形石圈是对最初建造的墓葬的进一步投资扩建，目前我们并不了解其作用。在最初建造的墓葬周围建造一系列的墓葬，会产生高额的初始费用，并不是必须或并不需要这样做，然而他们选择了扩建，因此可以推断出墓主人是显赫家族的核心成员。

扁平石板矮墙是该区域甚至是广大戈壁地区墓葬的关键元素[19]，它们仅发现于墓葬中，一些墓葬中的石板有偏移，这些组成元素将 DMS 项目中的纪念建筑遗存与一系列跨区域的行为意义和传统联系在一起。这些较高的相似性说明了其区域认知相同、将当地景观纪念化和政治化[20]的方式一致。每种纪念性元素通常单独出现，没有附属元素，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每种元素都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一列立方形的石柱、一个圆形石圈或者一块单独竖立的石柱都可以唤起人们对整个相互关联的元素综合体和社会关系的记忆。

三、综合纪念建筑

乌兰朱和的建筑师们证明了他们不但能精确地重造各种风格的特定元素，而且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纪念建筑和纪念元素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更为宏大的纪念建筑。我将从上述大型纪念建筑入手来进行探讨。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数百米长的射线形建筑是乌兰朱和人纪念传统的一部分，同时，墓葬综合体也是由这些小部分构成（图六）。所有的这些一起组成了综合纪念建筑，它们不但是更大的集聚遗址[21]，而且是依照特定的关联规则建立的连贯整体。我们对这些形式的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比如对跨越空间的东西向过渡的叙述，如何进出纪念区、南部开口以及北部立石。就像大型纪念建筑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样，湿地也具备人为组织特征。大型纪念建筑通过和其相连的大石排、通道和墓葬链与湿地产生联系。这种建筑系统说明过去的人正在超越仅有墓葬

一类的纪念建筑，也在超越对以往纪念建筑形式的精准复制，从而创造了一种既具有情境性的、与当地景观相呼应的，又具有普遍性的、遵循文化和宇宙规律的纪念建筑体系。人们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位置的各种看法，通过综合纪念建筑得以固化。综合纪念建筑是政治观念的产物，它们耗费了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劳动。



图六　德力格尔汗山的综合纪念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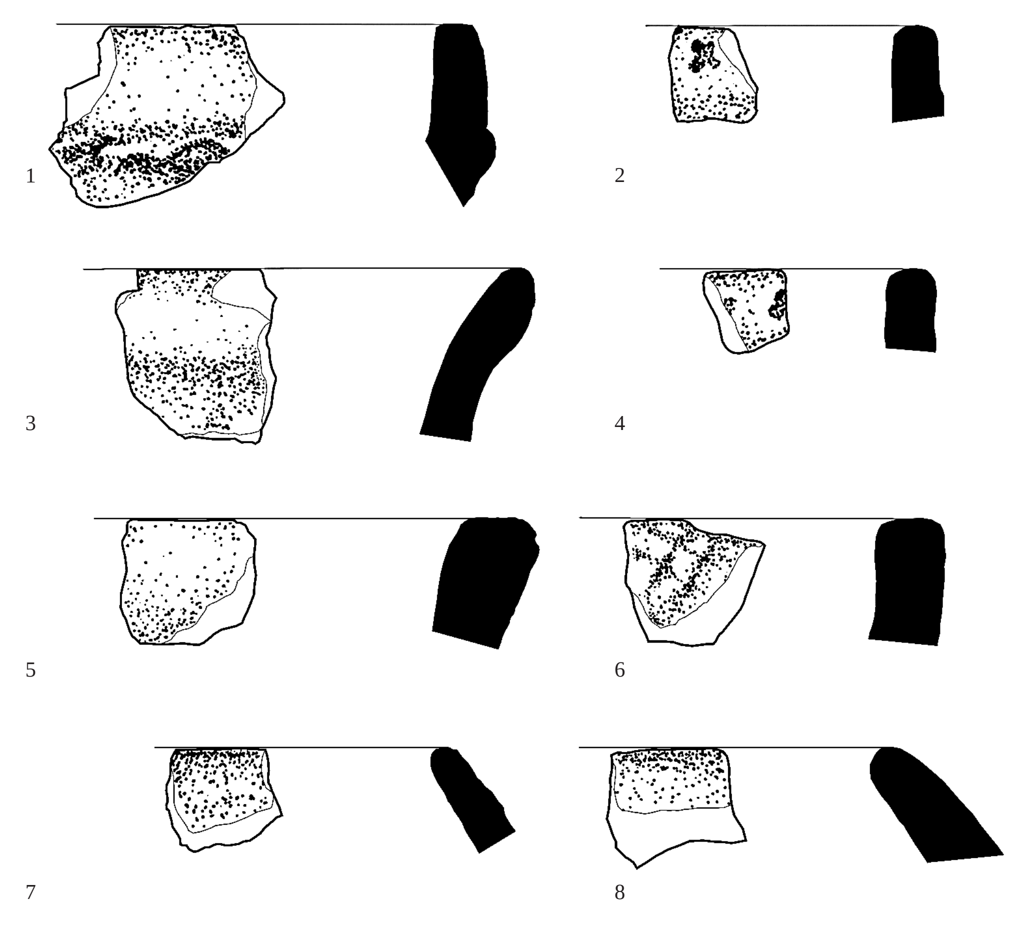
（1. 一墓葬群，附有矩形封石堆和西北偏西向长射线；

2. 一大型圆圈，西南部有一入口，北部竖有一立石）

四、居住遗址

与丰富而详尽的纪念建筑遗存相比，有关乌兰朱和居住遗址的材料只是一些散落

的打制石器和陶器。在这些散落的遗物中发现了一种具有点状纹饰的红色薄壁陶器（图七），此外，还发现了基于石器工业而产生的薄刀片、小薄片及边角料。这些规整的石器、陶片与乌兰朱和墓葬中发现的遗物属同一种类型[22]。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不仅包括散落在地表的上述遗物，还包括大口三足鼎，足呈锥形空心状[23]。尽管这些复杂的石头纪念建筑和散落的物质文化遗存息息相关，但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谷地发现的大型遗址中并未发现任何该类型建筑（与 Jia et al.'s 2017 对比）[24]。这种石器工业属于广义的东亚细石器传统，其分布的准确区域和年代划分尚待考证，也是基于这一点，陶片是判断地表散落物为乌兰朱和时期遗存的主要识别物。陶片散落区的面积为 2 ~ 7558 平方米，平均面积约为 1000 平方米（样本数为 71）。在这些遗物散落区发现的遗物大小、保存状况相似。遗物散落的中值密度是每 11.8 平方米一件器物，约 25% 的遗物都是碎小的陶片。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遗址是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或临时居住场所，可能是欧亚大陆和东亚大部分地区一群使用陶器的典型狩猎—采集者在转换住址过程中遗留下来的[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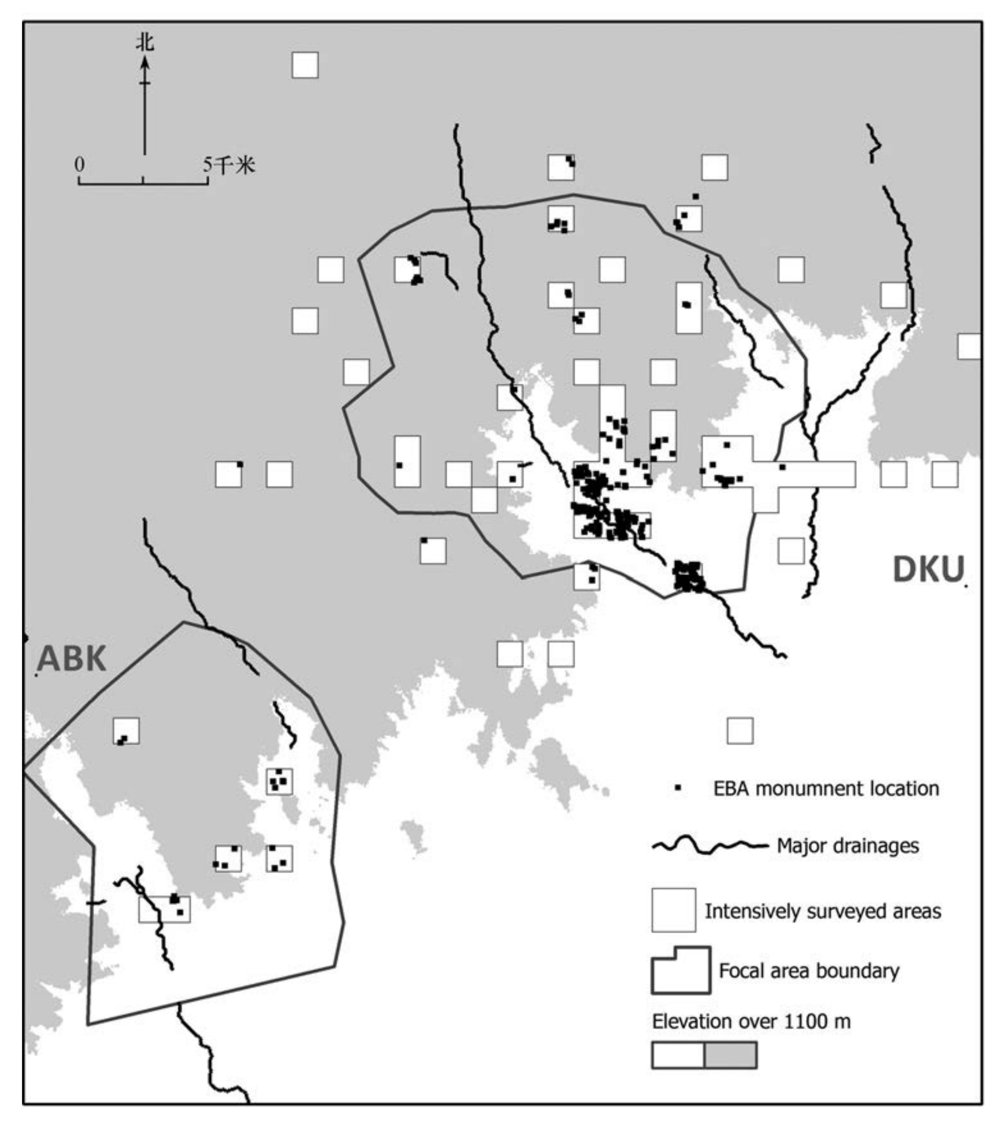


图七　全新世中期到晚期的陶片

（6 是网格纹陶片，见表一；2 和 4 陶片上有较深的四叶形凹痕；

除了 3 是一片精制光滑的红陶外，其他均较粗糙，表面未经加工处理）

景观背景对于这一时期的居住模式至关重要。在以前的湿地边缘、浅沟顶部、断壁边缘、北面和东面十分隐蔽的山脊顶部及俯瞰湿地的山顶或平台上都发现了人工制品。这一模式与后来的居住区域选址明显不同，后者多位于河间地带，而很少选择视野开阔的山顶和湿地边缘。最大的遗物分布区位于水源丰沛的德力格尔汗山山脉。在这一区域，丧葬纪念建筑以溪流河道和湿地为中心轴而建（图八）。其中有一群独特的、规模较大的遗物分布区，位于较为隐蔽的地方或靠近湿地的高地，面积约超过 2500 平方米（样本数为 5），这些遗址的分布和位置的选择表明其生业模式为狩猎—采集[26]，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该区域或其他地区的游牧经济[27]。



图八　DKU 区域中密集的纪念性建筑
（其聚集在主要的排水区附近，东北部是德力格尔汗山山脊）

五、年　　代

DMS 项目依据建筑与出土遗物的类型、放射性碳测年法及文物与纪念建筑之间的地层关系来建立年代体系。通过对乌兰朱和及其他相关的俯身墓葬或形制相似的墓葬进行放射性碳测年（表一），我们发现这些纪念建筑不论结构大小，其年代均集中于公元前 3400 ~ 前 3100 年。在一些遗址中，直接对陶器中的碳进行测年，其所得到的结果要早于纪念建筑遗存的年代。结合该地区长期的打制石器工业传统，说明纪念建筑是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开始出现在该物质文化传统中。该时期末期出现了一种相似的重叠，即晚期的乌兰朱和墓葬和晚期的纪念建筑形制共存。基于目前的背景情况来看，墓葬群集中出现在公元前 3400 ~ 前 3100 年的中期，而带有相连圆形石圈的墓葬则贯穿于整个纪念建筑现象的始终。

表一　放射性碳测年

年代		^{14}C 测年 BP/ 年	校正年代 95.4% BP*/ 年	与 DKU 区域的距离 / 千米	材料	实验码	资料来源
全新世早中期陶片的年代							
南戈壁省	各种早期陶器遗存（包括网格纹陶片）	各异	8010 ~ 5090	400 ~ 550	陶器	各异	Janz et al 2015
扎拉山遗址早期遗存	地层	6990 ± 30 to 5910 ± 30	7850 ~ 6650	60	骨 陶器	UGAMS 22331-22334	Odsuren et al 2015, Janz et al. 2017
乌兰朱和类型的人工制品分布区							
DMS 项目 650 号	单一时期陶片散落区	3550 ± 25	3962 ~ 3775	0	陶器	UGAMS 28409	
南戈壁省	与乌兰朱和类型相似的串链	各异	4973 ~ 1450	400 ~ 550	陶器	各异	Janz et al 2015
扎拉山遗址晚期遗存	地层中的动物材料与其他文化材料	3230 ± 25 2580 ± 25	3495 ~ 3382 3759 ~ 2706	60	陶器 骨	UGAMS-22328, 22329	Odsuren et al. 2015, Janz et al. 2017
乌兰朱和类型及相关的纪念建筑群							
钱德曼山墓地	与乌兰朱和类型相似的墓葬群	各异	从 3489 ~ 3271 到 3353 ~ 3249	120	骨	OS68952-68955, OS68271, AA100847, AA100860 AA100861 AA100863 AA100870 AA100876	Amartuvshin et al. 2015

续表

年代		^{14}C 测年 BP/ 年	校正年代 95.4% BP*/ 年	与 DKU 区域的距离 / 千米	材料	实验码	资料来源
钱德曼山墓地 33 号	由 5 座墓葬组成的墓葬链（包含在上面的钱德曼山墓地）	3092 ± 52	3450 ~ 3190	120	骨	AA100870	Amartuvshin et al. 2015
乌兰朱和遗址墓葬链 1 号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链	3101 ± 30 ~ 3015 ± 28	从 3497 ~ 3228 到 3336 ~ 3042	5	骨	IAAA103368-103371	Tumen 2013
乌兰朱和遗址墓葬链 2 号	乌兰朱和类型墓葬链	3127 ± 29 ~ 3006 ± 30	从 3825 ~ 3251 到 3395 ~ 2711	5	骨	IAAA33072-103374	Tumen 2013
DMS 项目 657a 号	有圆形石圈的乌兰朱和类型墓葬	2930 ± 30	3170 ~ 2970	0	骨	UGAMS 28309	
DMS 项目 657c 号	在相同的乌兰朱和类型墓葬里出土的马的遗存	2880 ± 25	3070 ~ 2925	0	牙	UGAMS 28310	
DMS 项目 019d 号	在卫星土丘石板墓里出土的马科类动物牙齿	2760 ± 25	2925 ~ 2781	0	牙	UGAMS 28307	

* 所有校正和年代范围均通过 OxCal 在线版本 4.3 版本和 IntCal13 校正曲线进行年代校正，网址：https：//c14.arch.ox.ac.uk/oxcal/OxCal.html 。

六、环境背景和应对方式

初步的地质考古田野调查发现公元前 6000 ~ 前 4000 年，东南部戈壁地区的湿地和植被的覆盖范围远比如今广大。约公元前 4000 年以后，该区域的降雨量发生了变化，侵蚀加剧，植被亦发生了转变。这一点从岩石嶙嶙的山地裸露出来的及填充在排水谷地的沉积物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这些过程在该区域创造出一种和今日类似的景观。有证据显示，在这段时期和约公元前 4000 年后景观急剧变化后的数个世纪中，该区域都有居住的痕迹[28]。尽管陶器和石器工业在这种环境转变中始终保持着一致性，但在德力格尔汗山的山谷中并没有发现早于乌兰朱和类型的纪念建筑。最早的此类建筑出现于约公元前 3500 年后不久，它直接矗立在裸露的多岩山地上或分布在排水谷地。

七、讨　　论

戈壁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是纪念性社交空间，而非由冶金技术或家养动物定义；这

些空间是政治关系交替变换的竞技场[29]。其中有一些纪念性空间非常庞大。这些综合纪念建筑展示了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社会组织的规模及人类的地位。公元前 4000 ~ 前 3000 年前，东南部戈壁地区的人类社会正在适应环境、区域网和社会等级的变化。新社会最明显的考古现象就是开辟了新的纪念性场所。戈壁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纪念性场所的开辟、社会等级的分化，而不是金属制造。

DMS 项目研究的是公元前 2000 年前的部分戈壁地区，这一区域丧葬传统随处可见。它们在丧葬传统方面的共性表明定期的交换[30]，维持着人们之间长期稳定的联系，从而促进了统一的发展，也使一些丧葬传统得以保持[31]。然而，区域变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悖，但这也证明了更大规模的文化变化和一些社会成员的迁移[32]。三足鼎和磨制石斧的出现从北向南地唤醒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唤醒了 450 千米以东的位于草原湿地边缘区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新石器时代遗址[33]。

DMS 项目将青铜时代的文化现象——纪念建筑、食物生产、冶金和骑马术划分为单独的元素，并依据不同的年代和环境背景对这些元素进行排序。生存手段的主要变化，如从物质文化和定居地点中可见一斑，畜牧业兴起于纪念建筑大量出现之前，而纪念建筑的大量出现早于青铜器和骑马术（表一）[34]。从全新世中期以来，居住遗址和包括墓葬在内的普遍的物质文化具有一种延续性，这说明业已建立的聚落开辟了纪念性建筑，从而形成了当地的传统。这片戈壁地区缺乏大型的金属器，因此，纪念建筑的精确性及关键元素的精准复制愈加重要。尽管这种精确性仍然是该地区后期纪念建筑的重要特征，但它是青铜时代纪念建筑最早出现的特征之一。

旧石器时代末期物质文化和陶器风格的共性[35]证明了现存的区域网络，为物质文化风格、社交模式的交流提供了新渠道，这些交流体现在建筑、金属器及家畜饲养等方面。在时代稍晚的蒙古东南部戈壁地区，以及此时蒙古的北部地区、朝鲜半岛上发现了轻便的人工制品，证明了存在着精英阶层、流动性及与其他聚落之间的联系[36]。在一个新兴的等级制度模式中，通过纪念建筑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个人和家族成员的纪念，从一系列可称之为“失败”的家族纪念建筑中可以看出来，它们通常独占一座大型墓葬，并拥有附属石圈，周围再无任何后期兴建的附加建筑。这些纪念建筑可能是为了颂扬或巩固一些没落家族。

克里斯蒂安森和拉尔森[37]强调制度化是欧洲青铜时代复杂社会的基础。这些制度由精英阶层、反抗者共同创造、完善和具体化。通过对东南部戈壁地区早期纪念建筑遗存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纪念建筑形制、规模的相似性体现了制度的结构性、重复性。第一座长期使用的家族纪念建筑宣扬了新生政治阶层的权力，反映了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些区域性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公元前 2000 年的东北亚地区，青铜时代精英文化几乎影响了这片区域内所有的社会[38]。尽管草原上的聚落都广泛地参与了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社会政治变革，但每个区域内的社会秩序均显示出不同的地方风格。

附记：感谢蒙古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鼎力相助，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得DMS项目顺利开展。感谢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为现阶段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拨款编号RZ-249831-16）。感谢萨拉·普拉格和维多利亚·威尔森为本文提供插图。最后，我们要向德力格尔汗山地区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热情好客，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注　释

［1］ a. Hanks B.Archaeology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Mongolia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0 (39): 469 ~ 486.

b. Chernykh E. N., Sarah Wright.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J]. *Slavic Review*, 1992, 52 (4): 335 ~ 904.

c. Shelach G.*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M].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2009: 1 ~ 224.

d. Anthony D. W.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 BCE [A].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C].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In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94 ~ 113.

e. Koryakova L., Epimakov A.*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M].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 ~ 408.

f. Simpson S. J., Pankova S.*Scythians, Warriors of Ancient Siberia* [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7: 1 ~ 322.

［2］ Tumen D., Khatanbaatar D., Erdene M. Bronze Age Graves in the Delgerkhaan Mountain Area of Eastern Mongolia and the Ulaanzuukh Culture [A]. *Asian Archaeology 2* [C]. Peking: Science Press, 2013: 40 ~ 49.

［3］ a. Kiselev S.V. “Afanas’evskie” Kurgany u Sel Sydy i Tesi [J]. *Sovetskaia Arkheologiia*, 1937 (11): 71 ~ 94.

b. Legrand S.The Emergence of the Karasuk Culture [J]. *Antiquity*, 2006, 80 (310): 843 ~ 858.

［4］ a. Janz L., Odsuren D., Bukhchuluun D.Transitions in Palaeoecology and Technology: Hunter-Gatherers and Early Herders in the Gobi Desert [J].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17, 30 (1): 1 ~ 80.

b. Amartuvshin C., Batbold N., Eregzin G., et al.Archaeological Sites of Chandman Khar Uul [Чандмань Хар Уульин Археологійн Дурсгал] [M].Ulaanbaatar: Munkhiin Useg, 2015.

c. 同［2］.

［5］ a. Kristiansen K., Larsson T.B. *The Rise of Bronze Age Society; Travels,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 464.

b. Kohl P. L.*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M].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7:

1 ~ 322.

c. 同［1］c.

d. 同［1］b.

［6］ a. Honeychurch W.*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M]. New York: Springer, 2015: 1 ~ 321.

b. 同［1］a.

［7］ a. Jacobson E.*The Deer Goddess of Ancient Siberia* [M]. Leiden: E.J. Brill, 1993: 1 ~ 320.

b. Volkov V. V.*Olennye Kamni Mongolii [Deer Stones of Mongolia]* [M]. Ulan Bator [Moscow]: Izd-vo An MNR, 2002: 48.

c. Fitzhugh W. W. The Mongolian Deer Stone-Khirigsuur Complex: Dating and Organization of a Late Bronze Age Menagerie [A].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C]. Bonn: vfgarch. press uni-bonn, 2009: 183 ~ 199.

［8］ 同［6］a.

［9］ a. Erdenebaatar, D.Asgatyn Dorvolzhiin Bulsh [Slab Burials of Asgat] [J]. *Studia Archeologica, Instituti Historiae Academiae Scientarum Mongolici Tomus XIII, Fasc,* 1992: 1 ~ 8.

b. Hao S.（郝思德）.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哈乌拉石板墓 (Stone Tombs of Xinba’erhuyouqi, Inner Mongolia) [J]. 北方文物 , 1988 (4): 1 ~ 8.

c. Törbat T., Giscard P.-H., Dunbüree B.First Excav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in the Mongolian Altai [A].*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C].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09: 221 ~ 230.

［10］ a. Wright J.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Khirigsuur Monuments in the Lower Egiin Gol Valley, Mongolia [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7, 26 (3): 350 ~ 365.

b. Houle J.-L.Investigating Mobility, Territori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Late Bronze Age: An Initial Perspective from Monuments and Settlements [A].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C]. Bonn Contributions on Asia Archaeology 4.Bonn: vfgarch.press uni-bonn, 2009: 117 ~ 148.

c. Liu W.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Sacrificial Rituals in the Eastern Altay Mountains [J]. *Eurasian Studies*, 2014 (2): 1 ~ 28.

d. Tsybiktarov A. D. Khereksury Buriatii, Severnoi i Tsentral’noi Mongolii [Khirigsuurs of Buriatiia and Northern and Central Mongolia] [A]. *Kul’tury i Pamiatniki Bronzovogo i Rannego Zheleznogo Vekov Zabaikal’ia i Mongolii [Cultures and Monuments of the Bronze and Early Iron Age of Zabaikal’e and Mongolia]* [C]. Ulan-Ude: Nauka, 1995: 38 ~ 47.

［11］ a. Makarewicz C.A.Winter Is Coming: Seasonality of Ancient Pastoral Nomadic Practices Revealed in the Carbon (Δ13C) and Nitrogen (Δ15N) Isotopic Record of Xiongnu Caprines [J].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15, 9 (3): 405 ~ 418.

b. Makarewicz C.Xiongnu Pastoral Systems: Integrating Economies of Subsistence and Scale [A].

Xiongnu Archaeology —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Central Asia [C]. Bon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Archaeology 5.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181 ~ 192.

c. Taylor W.Horse Demography and Use in Bronze Age Mongolia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7, 436: 270 ~ 282.

［12］ a. Bradley R. *Altering the Earth: The Origins of Monuments in Britain and Continental Europe* [M]. Monograph Series 8.Edinburgh: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1993: 203, 204.

b. Kuper H.The Language of Sites in the Political Space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72, 74 (3): 411 ~ 425.

c. Osbourne J.F.Monuments and Monumentality [A]. *Approaching Monumentality in Archaeology* [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1 ~ 474.

［13］ 同［2］.

［14］ a. 同［2］.

b. 同［4］b.

［15］ a. Shishlina 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Age Nomadism on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 [M]. Moscow: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999: 1 ~ 253.

b. 同［1］d.

［16］ a. 同［2］.

b. Navaan D. *Dornod Mongolyn Khurliin Ue [The Bronze Age of Eastern Mongolia]* [M]. Ulaanbaatar: Academy of Sciences, 1975.

c. 同［6］a.

［17］ a. 同［2］.

b. Kovalev A.A., Erdenebaatar D.Discovery of New Cultures of the Bronze Age in Mongolia 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A].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C]. Bonn: vfgarch.press uni-bonn, 2009: 149 ~ 170.

c. Ma J.The Survey of Slab Burials in the Yinshan Mountains [J]. *Eurasian Studies*, 2017 (5): 54 ~ 84.

［18］ 同［2］.

［19］ a. 同［2］.

b. 同［17］b.

c. 同［17］c.

［20］ Bauer A. M.Produc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Monuments, Labor, Water and Place in Iron Age Central Karnataka [A]. *The Archaeology of Politics* [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83 ~ 113.

［21］ a. Bemmann J., Brosseder U., Gantulga J. O., et al.Bioarchaeoloigcal Research o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 Cemetery of Maikhan Tolgoi, Upper Orkhon Valley, Central Mongolia [A]. Акту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лог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C]. Иркутск: Изд-во «Оттиск», 2015: 188 ~ 199.

b. Miyamoto K., Adachi T., Amgalantgus T., et al. *Excavations at Bor Ovoo and Khyar Kharaach Sites: The Second Report on Joint Mongolian-Japanese Excavations in Outer Mongolia* [M]. Fukuoka: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Kyushu University, 2017: 1 ~ 77.

[22] 同 [2].

[23] a. 同 [2].

b. 同 [2] b.

[24] a. Jia P.W., Betts A., Cong D., et al.Adunqiaolu: New Evidence for the Andronovo in Xinjiang, China [J]. *Antiquity*, 2017, 91 (357): 621 ~ 639.

b. Jordan P., Zvelebil M. *Ceramics Before Farming : The Dispersal 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 Eurasian Hunter-Gatherers* [M].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6: 1 ~ 589.

c. Lee G.-A.The Transition 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in Prehistoric Korea [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 (52): S307 ~ S329.

[25] 同 [24] b.

[26] a. Binford L.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1 ~ 509.

b. Gamble C. S., Boismier W.A. *Ethno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bile Campsites* [M]. Ethnoarchaeological Series 1. Ann Arbor: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1: 1 ~ 420.

c. Mithen S. *Hunter-Gatherer Landscape Archaeology: The Southern Hebrides Mesolithic Project 1988 ~ 1998* [M].Cambridge: Ma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0: 1 ~ 651.

[27] a. Simukov A. D. Труды о Монголии и Для Монголии (Works about Mongolia and for Mongolia) [M].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7.

b. Linduff K.M. The Emergence and Demise of Bronze-Producing Cultures [A].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C].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In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619 ~ 646.

[28] 同 [4].

[29] a. Johansen P.G.Practicing Social Difference, Producing Social Space: The Political Architectonics of Iron Age Settlement Places [A]. *The Archaeology of Politics* [C].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1: 188 ~ 220.

b. DeMarrias E., Castillo L. J., Earle T., et al.Ideology, Materialization, and Power Strategies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6, 37 (1): 15 ~ 31.

[30] Makarewicz C.A., Winter-Schuh C., Byerly H., et al.Isotopic Evidence for Ceremonial Provisioning of Late Bronze Age Khirigsuurs and Horses from Diverse Geographic Locals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8 (476): 70 ~ 81.

[31] a. Honeychurch W., Amartuvshin Ch.Timescapes from the Past: An Archaeogeography of Mongolia

[A]. *Mapping Mongolia: Situating Mongolia in the World from Geologic Time to the Present* [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195 ~ 219.

b. Wright J.The Honest Labour of Stone Mounds: Monuments of Bronze and Iron Age Mongolia as Costly Signals [J]. *World Archaeology*, 2017, 49 (4): 547 ~ 567.

[32] a. Frachetti M. D. *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 ~ 207.

b. 同 [11] c.

c. 同 [6] a.

[33] a. Dorj D. Neolithic Burials and Dwellings in Eastern Mongolia [N]. *Izvestiya Akademii Nauk Mongol'skoy Narodnoy Republiki*, 1969: 34 ~ 53.

b. Séfériadès M.L.An Aspect of Neolithisation in Mongolia: The Mesolithic-Neolithic Site of Tamsagbulag (Dornod District) [J].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004 (31): 139 ~ 149.

[34] 同 [11] c.

[35] a. 同 [4] b.

b. Janz L.Fragmented Landscapes and Economies of Abundance: The Broad-Spectrum Foraging Revolution in Arid East Asia [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6, 57 (5): 537 ~ 564.

[36] a. Hsu Y.-K., Bray P. J., Hommel P., et al.Tracing the Flows of Copper and Copper Alloys in the Early Iron Age Societi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J]. *Antiquity*, 2016, 90 (350): 357 ~ 375.

b. 同 [27] b.

[37] 同 [5] a：8 ~ 14.

[38] a. Liu L., Chen X.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sity Press, 2012: 1 ~ 498.

b. 同 [1] c.

c. 同 [6] a.

d. Kim J.-Il.The Growth of Individual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Korean Bronze Age, Interpreting the Symbolic Structure of the Korean Bronze Age in Mid-West Korea [J].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2004, 7 (1): 31 ~ 60.

参考书目

Mearns R. Territoriality and Land Tenure among Mongolian Pastoralists: Vari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J]. *Nomadic Peoples*, 1993 (33): 73 ~ 103.

Macro-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in Southeastern Mongolia

Joshua Wright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recent fieldwork by the Dornod Mongol Survey (DMS) in Sukhbaatar Aimag, Mongolia. The DMS encompasses a range of field research including survey, excavation, and geoarchaeology spanning the Holocene. Our recent work ha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abitation sites and mortuary and spatial monuments of the Bronze Age around the hills of Delgherkhan uul. Particular focus has been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cro-monuments', large structures that use both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ir component monuments and additional linking structures to create designed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his we see the enactment of power, emergence of regional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ollectives in the Bronze Age.

Keywords: Sukhbaatar Aimag; DMS; Bronze Age; macro-monuments

神兽的化身：巴泽雷克文化马饰研究

马丽娜·奥斯尔·嘎莉雅耶娃[1]著　常　璐[2]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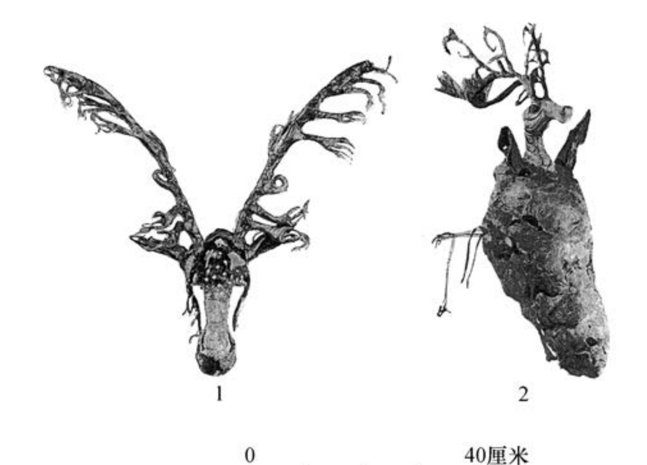
（1. 俄罗斯科学院塔塔尔斯坦分院考古研究所，喀山，420012；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研究象征神话中的鸟兽的马头饰面具。由于长期霜冻，有机材料制作的马头饰面具得以保存在戈尔诺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中。作者将这些马头饰面具分为两类，并讨论了它们的功能特点。

关键词：墓冢；动物风格；马头饰面具；欧亚草原；巴泽雷克文化

在巴泽雷克文化富有的皇家墓葬中，马匹通常配有异常精致的富有仪式性的挽具。因此，在很多此类墓冢中，这些马匹身上仍然保留着像面具一样的头饰。

这些像面具一样的头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①装饰着整个野生动物角的，如山羊角或者鹿角（图一，1）；②装饰着野生或者传说中的鸟兽的小型头部雕塑（图一，2；图二）。



图一　巴泽雷克 M5 出土马面具

1. 带有野生动物角的马面具　2. 带有野生或传说中的动物头形状饰物的马面具

（Rudenko，1953 年，第 109 页，表 71）



图二　巴泽雷克 M1 出土马面具

（Soloviev，2003 年，图 22）

下文将对巴泽雷克墓冢中马匹的面具头饰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分区域讨论巴泽雷克文化的两种马面具和墓葬年代。

一、第一种类型

饰有整个野生动物角的马的头饰面具：通常为一只山羊或一头鹿。

（一）西部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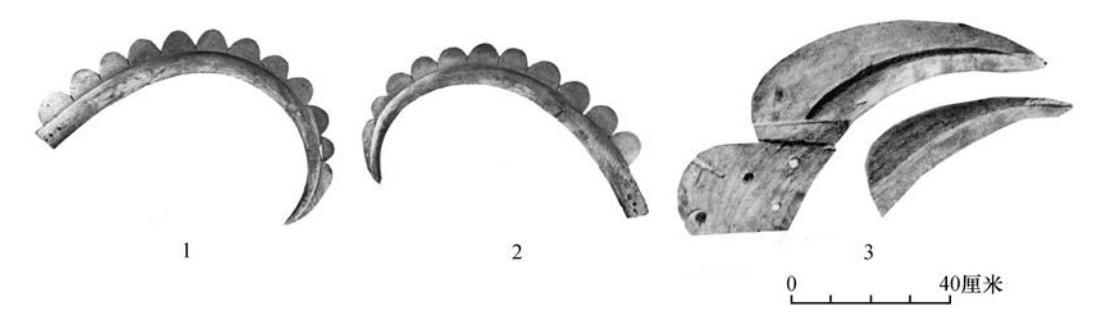
（1）巴沙达尔 M2。墓主为一位 60 ~ 65 岁的男性和一位 40 岁的女性，陪葬了 14 匹马[1]。其中 1 匹马的挽具保存得尤为完好，即出土于墓室东北墙壁处的二号马，它发现于最东边，离它的主人最近。这匹马的挽具是由青铜制成的，其中颊上有青铜饰和当卢覆有金箔；马勒带子上全部覆有不对称的玫瑰样青铜装饰。这匹马的胸带饰有和马勒上一样的牌子，并为此配有 33 个组件。马鞍由红色薄毡制成，并装饰了覆有金箔的木质秃鹰小雕塑：两个较大的雕塑置于前端，另两个较小的置于末端。马鞍表层由 56 个方块以棋盘状构成，其中一些是从黑色马驹的皮上切下来的，剩下的是从红色毛毡上切下来的；其中红色方块上缝了覆有金箔的木质十字。巨大的青铜带扣腰带也被完整保存下来了，上面带了 1 个母扣。在马头部分发现了一柄鞭把，上面装饰着 3 个大小依次递减的覆有金箔的木质狼头；鞭子本身饰一条螺旋形金质缎带，鞭尾有一条编织的金质缎带。显然，这匹马的挽具十分奢华。

但这也并不是 1 匹普通的马。根据此遗址的发掘负责人介绍，这匹马还有 1 件装有一对公山羊角的皮质头饰。这对角长 46 厘米，由几片木头黏合而成，覆有几片金质薄片；其内部覆有实心银制薄片，外部饰有半圆凸起，象征每年丰收。这对角底部有两个孔，用以将其固定在马的头饰上。

（2）图尔根 M1。墓主是一位 40 ~ 48 岁的男性，陪葬了 8 匹马[2]。这 8 匹马的挽具均被置于北侧小木屋的内墙和外墙之间。盗墓者将马的配具移到墓室内，取走了上面的金饰后胡乱地将其弃置在这里。

木角在盗墓者挖掘的隧道中被找到了，在 S.I.Rudenko 对此隧道和墓室中复原的文物描述中，他并没有指出是否所有的角都是在隧道里被找到的。然而，他在对马的装备的描述中指出，至少有 8 对木角，即它们的个数和马的数目对应，但是实际上在这座墓中成套马具的数量远远超过马的数量。因此，这些发现品中的 28 个圆形当卢和 73 个马鞍配件意味着马鞍的数量不少于 18 个。S.I.Rudenko 没有对任何一个角或者它们的大小进行详细的描述，尽管从照片来看，它们大多是以碎片状被保存了起来（图三）。这些角有两种，第一种有实心结节，第二种有内部被掏空的空心结节。第二种中有 2 对角有附加的配件，其中一对上的隆起饰 1 个雕刻而成的角，由鹿皮制成，

带着 6 个半圆形的长钉以及 1 个垂直摆放的耳朵；另一对角的结节上有一些狮子的侧面雕像，看起来就像是正在从结节尖端往底部爬。其中的 1 个角上还剩 10 个狮子雕塑，另一个角上只剩 2 个雕塑的残片。在从图尔根 M1 发现的这些皮质头饰中，只有 2 个头饰的当卢上还留存着用来固定木角的皮质套筒。还有 2 个套筒是由鹿角雕刻而成，用来插入木角的末端。



图三　图尔根 M1 出土马面

1、2. 木角　3. 木角碎片

（Rudenko，1960 年，表 6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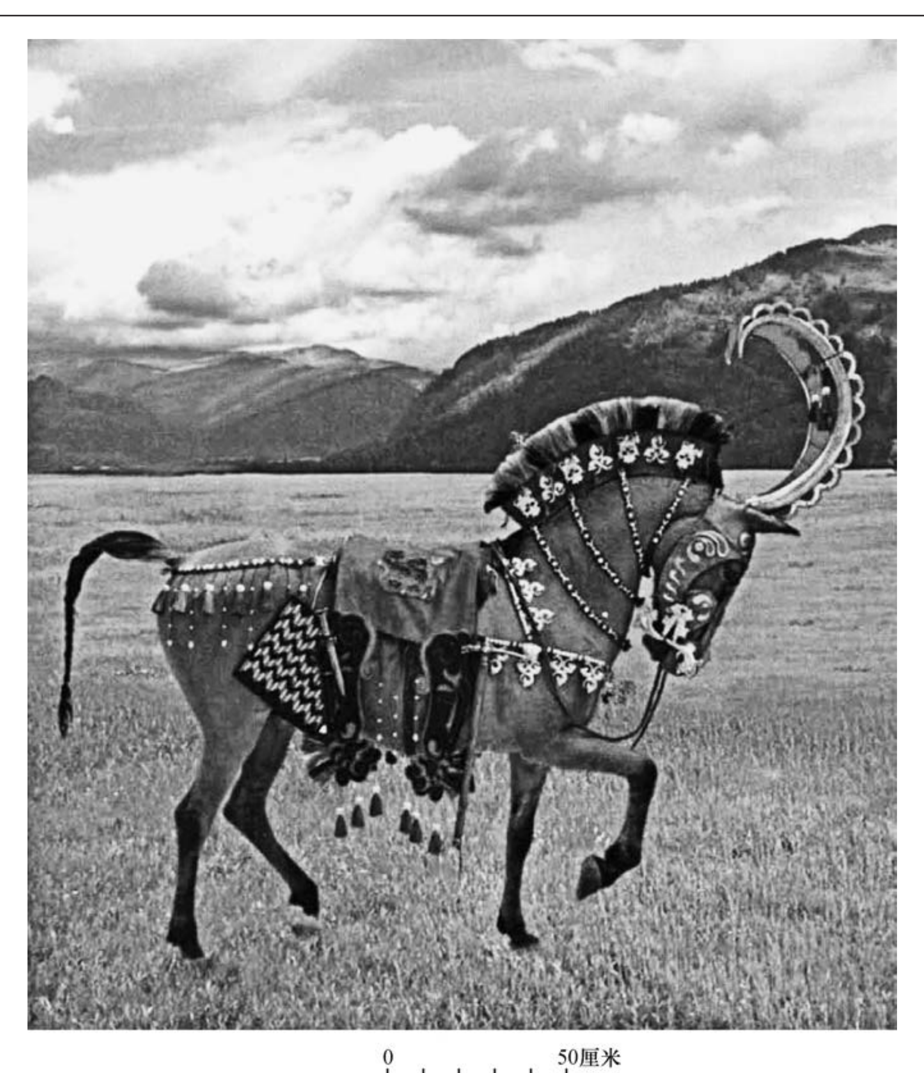
（3）波莱尔 M11。墓主为一位年轻的男性和一位年长的女性，陪葬有 13 匹马，其中 3 匹带有山绵羊角的头饰和面具。鉴于此座坟墓的相关资料还未公布，对其的描述皆根据还未发表的著作上的插图（Samashev 等，2002 年）。这些马被分置于两层，较低的一层上有 7 匹种马的遗体。其中一匹发现于最东部的一排，它的头饰上有山羊角；它的鬃毛被放在盒子里（图四）。在上层 6 匹种马的遗骸中，有 2 匹的头饰面具饰山羊角，它们是置于最东部第一排的 3 匹马最中间和第二排最中间的 2 匹马。这些木角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和巴沙达尔 M2 发现的完全一样。位于底层的马和位于上层第一排的马都是用这一类角装饰。第二类为上层第二排的马头部装饰的角，其大小和第一类相同，但是它们很光滑且没有半圆形结节。

因此，只有中央区域的墓冢中的马面具用盘羊（即山绵羊）角装饰。它们出土于早期墓冢，如巴沙达尔 M2 和图尔根 M2，以及稍晚的波莱尔 M11，并且有证据表明，它们和巴泽雷克 M2 年代相当。

（二）东部区域

巴泽雷克 M1。葬 2 人，陪葬了 10 匹马，其中 8 匹分为两排摆放，每排 4 匹，剩下 2 匹马被置于西墙边，马头朝北[3]。其中 2 匹有头饰面具，1 匹饰现实比例的鹿角（第一种类型），另 1 匹戴尖顶饰，尖顶的形状类似带角和翅膀的虎头（第二种类型，图二）。

那匹戴有毛毡制成的头饰面具、配鹿角的马被安排在第一排，它的外观最精美。它的角由皮革制成，尾巴和鬃毛装在箱子里。它的头饰在一项专门的研究中已被讨论[4]。



图四　波莱尔 M11 出土马面具复原
（Samashev，2007 年，图 4）

根据碳同位素证据表明，M1 的年代是所有巴泽雷克墓冢中最早的。在此座墓中发现的遗物中同时含有这两种类型的马的面具绝不只是一个巧合，在更晚一些的墓冢中都只有第二种的马面具。

二、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饰小型尖顶的马的头饰面具，尖顶形状为野生或传说中的鸟兽的头部。这种类型的头饰面具仅发现于巴泽雷克文化的东部区域，即 M1、M2、M3 和 M5 中。

东部区域

（1）由毛毡制成的头饰面具，饰有一个带角带翼的虎头状的尖顶，它属于巴泽雷克M1中第二排的一匹马。这匹马的外观明显比同排的其他马精美。除了一副马鞍和一副马勒之外，这匹马还拥有一副面具和一个用来盛放马鬃和马尾的箱子。因此，它的装备和第一排中戴鹿角面具的马相似。它们面具皮革部分的形式和鼻子部位的平面老虎形象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前一个面具中，老虎的形状是从一块蓝色毛皮上切下的，而第二个面具中的老虎形象则是由皮革制成。面具的顶部是一个带角带翼的老虎雕塑。

（2）由毛毡制成的头饰面具，带着一个形似公山羊头和一只鸟的尖顶，它发现于巴泽雷克M2。这个面具的设计，马的鼻口位置是镂空的，同时又覆盖着鼻子上部和侧面，正如一顶波德诺夫卡帽子。马的两耳间有一个毛毡制的套管，顶端附有一个极为逼真的毛毡制的山羊。山羊头上又装饰着一个毛毡制的鸟的小雕塑，根据S.I.Rudenko的描述，这是一只雄鸡。

（3）由皮革制成的头饰面具，上面饰一个鹿头状的木制尖顶，鹿头上有分叉的皮革制鹿角。它出土于巴泽雷克M5。面具所属的这匹马也有一个红色皮革制的箱子，用来存放鬃毛。由厚皮革制成的面具外面有一层薄皮革，将马的鼻口完全遮盖起来，并由带子固定。面具上为眼睛、鼻孔和嘴留了小孔。它的顶部被制成一个逼真的鹿的木制雕塑，上有皮革制成的分叉鹿角冠冕。"鹿头的底部已经破损，稍低一点的边缘部分也不见了，破裂的部分因被一捆结实的皮带束着而得以保存。"[5]

（4）巴泽雷克M3的遗物包括2个木制的传说中的神鸟头，它们可能是马的头饰面具上的顶部装饰品。

在巴沙达尔M2、波莱尔M11和巴泽雷克M1中，每一排都有一匹戴角或者顶尖头饰面具的马，即每一匹这样的马都带领着同组的几匹马。这就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即戴面具的马是头领，并且引领着仪式队伍。巴泽雷克M5中的一副带有顶部饰品面具上发现了穿戴和修复的痕迹，这表明这些面具在被放进墓穴之前已被多次使用。葬礼仪式是它们最后一次被使用。

这些具有丰富装饰的马面具由多种材料制成。它们极高的艺术特质和工艺使得它们成为斯泰基—西伯利亚地区的动物风格的范例。当前的对马的头饰面具的研究表明，在巴泽雷克文化的东、西两个地区，马都被装扮成有蹄动物：在西部地区，它们的造型都模仿山绵羊，在东部则是象征鹿。这一有趣的特征很可能反映了宗族的不同。

大量的研究都确凿地表明，在异教信仰中神祇都是动物，且无一例外是野生动物。早在1969年，在发表关于布尔索伊 · 贝尔斯基库尔干墓葬调查的相关资料的时候，S.S Sorokin就指出讨论巴泽雷克M1发现的马面具上或者动物形式样品上画的是哪种鹿没有必要，因为在异教信仰中真正具有重要性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物种，而是这个在神话中带

冠冕的野生有蹄动物形象[6]。同样的观点受到了 A.V.Grach 的支持，这两位学者都引用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认为突厥民族有一个特殊的术语“bura”，这个词在古代用以指代有蹄动物和有角动物，后来经过转变，也用来指代家养牲畜[7]。L.L. Barkova 发表的有关巴泽雷克 M1 的带角马头饰的专著中也引用了这一资料[8]。D.V.Cheremisin 也在他的著作中做了一项致力于巴泽雷克墓冢中饰有角的马面具的详细的综合性语义学研究。他仔细地追溯了研究此问题的各种方法的学术史，引用了突厥—蒙古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就马的装扮的含义给出了一个更近一步且更为详细的解释。他提出，马的装扮是一头神话中的野生有蹄动物和一只家养牲畜的结合，它属于一个结合了自然和人类世界的神圣的国度[9]。

因此，马常被用来构造神话中的动物的形象。在一些情况中，要求神话动物拥有现实比例的体型，于是马的整个身体都要被装饰：马的尾巴和鬃毛会被装进一个特殊的箱子中，头部则戴装饰着鹿角或是山绵羊角的面具。在其他情况中，只有马头戴着装饰，被用作标准的小型神话动物抬起的头，比如有角的老虎、鸟或者鹿。从使用神话动物的整个肖像到只使用它的头部，这一转变可被看作是从它的自然模型到部分抽象的进化。这样的假设也是可能的，即这些形象反映了神话动物的等级——它们中间最重要的都是以现实比例作以表现，而较低等级的则是以简化版呈现。可以肯定的是，马的装扮受到了古代神话的影响，而它的起源可能既是宇宙论的，又是人种基因学的，即与世界的起源或是部落超自然的起源等有关。面具包含着附加的形象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一观点，比如面具上那个趴在马鼻边上的老虎雕像毫无疑问地承载着其他重要的信息。

关于带着头饰面具入葬的这些马，应该承认它们在仪式进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即代表神话动物。这些马本身并未被视作神祇，但是它们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被视作是人间和神界的中介。

对巴泽雷克成套马勒的审视使得区分日常用的马勒和仪式用的马勒成为可能，它们的功能不同；前者用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而后者则被用在仪式上，包括葬礼上装饰马匹。

因此，根据以上引用的证据，可以假设巴泽雷克有两种成套的马勒：一种是没有木制或铜质饰品的朴素且实用的马勒，其装饰也是简单实用的风格；另一种是奢华精美的用于仪式的马勒，带有精雕细琢的、覆有金箔的木质饰品。仪式队伍伴随着贵族们的葬礼，作为队伍的一部分的马则戴着它们装饰富丽的成套马勒成为陪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普通人的节俭朴素的葬礼，葬礼上的马匹都披戴着它们日常的马勒，马勒主要是由金属、带扣和皮带构成。无论在贵族的墓中还是在平民的墓中，都很少陪葬由贵重金属（如青铜）制成的更为宝贵的实用性或非宗教性的成套马勒。

马被装扮成神话动物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诸如葬礼、游行等仪式的一部分，在这些仪式中，它们被当作是鲜活的模型和标准，用以代表野生或者神话中的鸟兽的神秘形象。墓葬中装饰华丽的成套马勒也是对墓主社会地位的彰显。墓葬中陪葬的马匹的数量是皇家墓冢的标志之一，数量最大的马匹陪葬出现在拥有极高社会等级的逝者墓冢中。

人们只能假设历史上存在过一些仪式游行，或者其他活动，里面有披戴着仪式挽具、具有仪式作用的马匹，但是现有的考古证据还不能对此进行重构还原。然而，有关这一课题的民族志资料十分丰富，覆盖的范围也很广，从现代巴伐利亚一年一度的圣·乔治节马匹游行，到卡尔梅克乌尔萨节中首酿马奶酒品尝仪式，对马的献祭都有所体现。

注　　释

[1] Rudenko S. I. *Cultur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entral Altai in Scythian time* [M]. Moscow; Leningrad: an SSSR, 1960. 359 p. (Руденко С.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Л.: АН СССР, 1960. 359 с.)

[2] 同 [1].

[3] Rudenko S. I. *Culture of the population of Mountain Altay in the Scythian time* [M]. Moscow; Leningrad: an SSSR, 1953. 401 S. (Руденко С.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Л.: АН СССР, 1953. 401 с.)

[4] Barkova L. L. Horsehead mask from the first Pazyryk Kurgan [J]. *ASGE*. 1999. No. 34. S. 97 ~ 101. (Баркова Л. Л. Конская маска из первого Пазырык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АСГЭ. 1999. № 34. С. 97 ~ 101)

[5] 同 [3].

[6] Sorokin S. S. Great Berel tumulus (Full publication of the excavations 1965 and 1959). *Culture and art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M]. Leningrad: GOS.The Hermitage, 1969: 208 ~ 236. (The works of PoE; Vol. 7). [Сорокин С. С. Большой Берельский курган (Полное изд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ов раскопок 1965 и 1959 гг.)//Куль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Л.: Гос.Эрмитаж, 1969. С. 208 ~ 236. (Труды ГЭ; Вып. 7)].

[7] Grach A. D. *Ancient nomads in Central Asia* [M]. M.: Nauka, 1980. 255 p. (Грач А. Д. Древ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в центре Азии. М.: Наука, 1980. 255 с.)

[8] 同 [4].

[9] Cheremisin D.V. On the semantics of masked, horned horses from Pazyryk mounds [J]. *AEAE*. 2005. № 2 (22). P. 129 ~ 141.

参考书目

Samašev Z. S. Die Fürstengräber von Berel. *Im Zeichen des goldenen Greifen. Königsgräber der Skythen* [M]. München; Berlin; London; N.Y.: Prestel Verlag, 2007. 340 s., 2007. S. 132 ~ 138.

Solovyov A. I. the Weapons and armor. *The Siberian weapons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middle ages* [M]. Novosibirsk: Infolio-Press, 2003. 223 p. (Соловьев А. И. Оружие и доспехи. Сибир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от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д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нфолио-Пресс, 2003. 223 с.)

The Disguise of Horses as Mythological Beasts in Pazyryk Culture of the Gorny Altai

Maria Ochir Goryaeva

Abstract: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equine headdress masks representing mythological beasts and birds. Due to permanent frost, equine headdress masks made of organic materials were well preserved in the burial mounds of the Pazyryk culture in Gorny Altai. The author groups them into two types and discusses thei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kurgans; animal style; equine headdress masks; Eurasian steppes; Pazyryk culture

中国与罗马帝国

——公元 1 ~ 2 世纪罗马与远东往来的考古学证据

劳伦斯·包默尔[1] 著　付承章[2] 译

（1. 日内瓦大学古典科学部，日内瓦；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

内容摘要：中国与罗马帝国在公元 1、2 世纪的联系已在近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叙利亚沙漠城市巴尔米拉和在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欧罗普斯发现的丝织物，是目前地中海沿岸仅有的能够证明这两大帝国之间联系的物质遗存。那么在另一个方向上（自西向东）的物质遗存呢？本文试图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回顾。从年代上讲，本文首先集中探讨了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器物流入中国的证据是稀少且间接的。之后是罗马帝国的早期和中期，这一阶段的一些物质遗存主要是罗马玻璃器。最后，本文简要回顾了在巴尔米拉发现的一块丝绸残片，证实了中国工匠们对西方图像的了解。

关键词：中国；罗马帝国；往来；公元 1 ~ 2 世纪；丝绸

中国与罗马帝国在公元 1 ~ 2 世纪的联系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1]。一些史学研究对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这两大帝国的结构和功能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2]。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沿岸出土的物质遗存表明，罗马与中国的联系目前仅限于在叙利亚沙漠城市巴尔米拉（Palmyra）和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os）发现的丝织物。而在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则极少有类似的发现，原因在于潮湿的气候不利于丝织品的保存。那么在另一个方向上（自西向东）的物质遗存呢？本文试图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以用西方语言写成的文献材料为主要依据，借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回顾。

尽管在古代拉丁或希腊文书中涉及中国的少之又少，但一些中国的文献（《魏略》《后汉书》）却记录了一些罗马与中国社会的直接联系。这些文献同时证明了帕提亚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出于经济利益，试图控制、甚至切断这些直接联系（如有可能）。与此同时，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勾勒一个更加清晰的画面，即虽然这些直

接联系是十分罕见的，但一些考古遗存可以让我们对所交易商品的类型，以及地中海与远东地区的古代贸易规则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一、希腊风格输入品

从理论上讲，在公元前 4 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 3 世纪，地中海与远东地区进行直接商品贸易的概率要大得多。这得益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 336 ~ 前 323 年）马其顿王国的迅速扩张。他将希腊文化带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向南则直至印度河流域。在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Babylon）之后，马其顿王国迅速分解为几个独立王国。东部地区被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公元前 312 ~ 前 281 年）及其继任者统治。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罗马开始了在西面对马其顿王国的征服（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而东部地区则相继被新兴的贵霜帝国、粟特人、帕提亚人及后来的斯基泰人所控制[3]。

与此同时，仅有极少数的考古遗存能够证明希腊化国家与远东之间的早期联系，如在中国不同遗址中出土的 1 组 6 件银碗，以及几件类似的青铜碗。它们主要是出自西汉时期的皇家墓葬[4]。两个保存完好的例证分别是 2010 年在江苏省大云山 1 号墓发现的 1 件银碗[5]，以及 1979 年在山东省发现的 1 件银碗[6]。尽管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来自于希腊化波斯的舶来品已经被中国工匠们所效仿，但卢卡斯.尼克尔（Lukas Nickel）已根据工艺特征对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即它们应为本地产品，但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7]。同样的解释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南方横枝岗出土的 1 件玻璃碗上[8]。这件器物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化时代晚期或罗马帝国早期来自于黎凡特（Levant）地区的舶来品，但它更有可能是当地产品[9]。

通过西北地区的一些希腊化时代晚期的发现，尤其是在新疆地区，我们能够勾勒出一个更加清晰的画面。一个重要发现是 1983 ~ 1984 年出土于山普拉墓地的挂毯残片，展示了一个正吹着战号的半人马形象，以及接近真人大小的、带有强烈马其顿文化色彩的贵族武士[10]。这块残片的时代究竟是公元前 3 世纪还是公元前 2 世纪尚无定论，但有可能出自阿富汗的 Aï Khanoum 宫殿，它在约公元前 145 年遭到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后来我们在 1 座约公元前 1 世纪的墓葬中，发现这块挂毯被添加到了一条裤子上。

新疆西北部的新源县在 1983 年出土了 1 件十分有趣的青铜人像[11]，高约 40 厘米。它表现的是一个下跪的武士，身穿短裙，头戴弗里吉亚式或者更有可能是马其顿风格的头盔。这件公元前 4 世纪或公元前 3 世纪的本土造像，表明这一地区当时已对西方盔甲有所了解。

这里有必要提及在蒙古出土的一些西方舶来品。它们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代晚期或罗马帝国早期。首先要提到的是 1 件十分精美、直径仅 7.5 厘米的碗，它是用蓝地白彩玻璃制作而成的[12]。这件碗出自后杭爱省（Arkhangai）温都尔乌兰（Undur-

Ulaan）的高勒毛都（Gol Mod）2 号墓。另外，在中央省（Tuv）的诺颜乌拉（Noyon Uul）墓葬中出土了 1 件银徽章饰，上面描绘了狄奥尼索斯（Dionysus）与一个女祭司跳舞的场面，毫无疑问是希腊化的风格[13]。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在这一时期，器物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即便我们并不清楚其中原因何在。

这些西方造型在这一时期就已部分为人所知，在一些仿其他质地的玉器上也有体现。例如，1 件用白玉雕刻而成的高足杯，上面还有一点绿色，其时代为公元前 221 ~ 前 206 年[14]。这件 1976 年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杯子可以追溯到 1 件地中海式的玻璃高足杯上，但其外部的装饰是战国风格。而在临潼出土的一些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兵马俑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有一些西方的影响，有一些人物在细节上与希腊—罗马式雕像的结构特征十分接近[15]。

一些关于帕提亚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一时期得以体现，在张骞呈给汉武帝（公元前 141 年 ~ 前 87 年）的报告中，包含了对帕提亚银币的描述："帕提亚的钱币是银制的。钱币上有国王的头像。一旦国王去世，钱币上的头像即变为其继任者。"[16]这份报告是 1976 年在灵台发现的，很可能由 274 个直径约 5.5 厘米的小铅饼组成。在稍凸的一面有龙纹，而在凹面则有一排仿希腊铭文、用奇幻字母写成的环形文字[17]。在其他个别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的类似遗物[18]。在纽约的展览图录上，这些铅饼被用来和汉代铜钱作比较，上面有对帕提亚钱币文字的粗略描述（希腊语）"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 ΑΡΣΑΚΟΥ ΕΠΙΦΑΝΟΥΣ ΦΙΛΕΛΛΗΝΟΣ"（王中之王阿萨息斯，光荣的，希腊崇拜者），年代在公元 2 世纪。但同样的文字在米特里达特二世（Mithridates Ⅱ，公元前 123 ~ 前 88 年）时期就已在帕提亚钱币上出现[19]。中国铜钱的时代似乎至少在公元前 2 世纪末或公元前 1 世纪初，可能与张骞的报告处于同一时期。而铅饼也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 2 世纪末的西汉，即便这并不会使人们对铅饼的具体时代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总之，除了山普拉墓地出土的挂毯可能是作为战利品之外，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关于希腊化时代西方舶来品进入中国的间接实例十分稀少。但日后在该领域及对当地考古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将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二、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与中国之间直接往来的文献证据

记录罗马帝国与中国之间直接往来的文献材料早已被学者讨论了多次[20]，因此下文只会提到其中的某些例证。汉朝皇帝对罗马人的了解在诸如《后汉书》中有所记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21]这与《魏略》的记载相吻合："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22]尽管对罗马政治结构和疆域的记载主要是出自第二手材料，但文献能使我们对当时的物质文化有一定的认知，这主要是基于进贡给皇帝的物品："(大秦，即罗马帝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

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23]与此同时，上面已经提到，帕提亚人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试图阻断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一切直接联系：“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帕提亚）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24]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正如《后汉书》所载：“（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印度西北部）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25]

基于这种原因，关于希腊人或罗马人在中国的文献证据十分稀少也就不足为奇了[26]。而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一部希腊文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种可能存在的直接往来：根据托勒密[27]的叙述，一个叫马赫斯 · 提提安努斯（Mahes 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在公元1世纪时将他的代理人派到了帕米尔高原附近一个叫作“石塔”的商贸地进行交易[28]。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们遇到了被认为很可能是中国人的“丝国人”或“赛里斯”，中国人带走了这些代理人。根据托勒密[29]的叙述，从“石塔”到“赛拉”的旅程持续了数月，但争论在于他们最终到达的究竟是汉朝的都城还是其他地方[30]。另一个争议性问题在于马赫斯 · 提提安努斯的贸易代理人是否就是《后汉书》中所记载的公元100年11月的那一支商队中的成员：“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31]假定这两个国家就是希腊北部马其顿的罗马小行省的中式音译，而且《后汉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它们：“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32]但这很难让人信服。不过至少，对于这次被载入史册又被托勒密加以复述的旅程而言，与中国的贸易是十分重要的。

相似的情况可能还体现在所谓的“安敦”使者上。《后汉书》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作为外交礼物），始乃一通焉（指两国间的直接往来）。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33]“安敦”通常被认为是罗马皇帝马可 · 奥勒留 · 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时间为公元161 ~ 180年）的中式音译。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所谓的“使者”最有可能是罗马商人。因为商人更愿意自称为官方使者，他们将他们的商品作为官方礼物进献，结果令皇帝十分失望。这种解释在另两部中国文献中得以进一步证实：“（公元184或185年）大秦献三万幅（蜜香纸）。”[34]又：“（公元276 ~ 282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石棉）尤奇。”[35]“蜜香纸”可能产自南亚[36]，而《后汉书》中提到的火浣布[37]显然来自地中海，正如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10.1.6中所论证的：“在卡利斯托（Carystus）有一种类似蜂巢的网状石头，这种原料可以用作毛巾。一旦被弄脏，它们会被投入火中加以净化，就如同亚麻织物可以用水洗净一样。”[38]由于其轻便、易于长距离运输的特性，使得这些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能够打动皇帝的完美礼物，足以令它们获得贸易的必要许可。

《梁书》中记载了公元226年另一个罗马商人“论”（可能是希腊名字里昂的音译）的来访：“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39]罗马商人可能在公元184或185年（见上文）就已经通过这条经过越南的

南海交通线来到中国，其重要性在同一作者对公元6世纪活动的记录中得以证实："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柬埔寨）、日南、交趾（越南）。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40]

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中国使者或商人成功到达地中海的文字记载[41]：在公元97年，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但当他到达印度洋后却并未更进一步，"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42]。一个多世纪后，公元226年，马其顿商人里昂（Leon）返回西方，"权（孙权）……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43]。我们并不清楚里昂是否回到了故土，因为在任何拉丁或希腊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三、罗马舶来品

文献材料只是对中国的地中海舶来品介绍了一个大概，而罗马帝国早期（公元1、2世纪）的考古发现可以填补这一空白，首当其冲的便是一些进口玻璃器[44]。在江苏邗江甘泉山2号墓（时代被定为公元67年）出土了一堆嵌花器物残片，这是十分惊人的发现[45]。另一个早期舶来品的例证是一件透明蓝色玻璃杯。它出土于这一地区同一时代的老虎墩墓葬，墓主人被认为是一个高等级贵族[46]。通过对其化学成分的检测，这些器物毫无疑问都来自罗马。

关于这些早期进口玻璃器的罕见例证，可以通过1987年在河南洛阳一座东汉墓中发现的1个玻璃瓶得以完善[47]。瓶子的形制与中国传统玻璃器截然不同，其吹制工艺表明它应该是前3个世纪的地中海舶来品。另外，在南京东郊仙鹤观6号墓中出土了1件玻璃碗[48]。作为对克里斯蒂娜·霍普尔（Krisztina Hoppál）研究的补充，笔者认为它与来自罗马时期埃及卡纳尼斯（Karanis）的1件玻璃碗十分相似。其时代可定为公元2世纪后半叶，可能属于早期罗马进口玻璃器中的一部分。

来自西方的进口玻璃器在公元4、5世纪时变得日益重要[49]，但并不是所有玻璃器都来自罗马，正如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的1件玻璃杯一样[50]：从造型和装饰技法上看，这实际上是萨珊器物。布里吉特·伯雷尔（Brigitte Borell）曾指出，早期的玻璃器可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时代较晚的，"在扬州东汉墓葬中发现的玻璃器是通过海路传入的"[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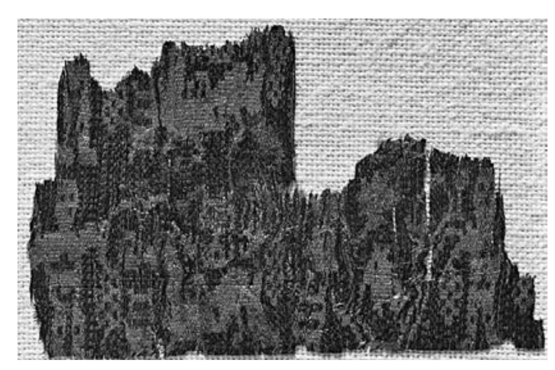
如果早期罗马进口玻璃器依旧在中国十分罕见，那同一时期的罗马钱币也是如此，一直到公元4世纪晚期[52]：自19世纪末以来总共发现了100枚公元5～8世纪的罗马钱币，中国北方草原及陆上丝绸之路值得重视。另外，人们往往喜欢在墓葬中将金币用作装饰品。

同样，其他珍贵的西方金属器也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个例子是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发现的直径31厘米的鎏金银盘[53]。中间的徽章部分是骑豹的狄奥尼索斯—

巴克斯，边缘部分是奥林匹斯山十二神的半身像。盘内的其他地方则满饰葡萄藤和各种小动物。盘上刻着两种铭文，其中一种是粟特文，时代为公元 5 ~ 7 世纪。而另一种则可能是以巴克特里亚德拉克马的形式记录了银盘的重量，时代不会晚于 6 世纪初。这件制作于罗马帝国时期的银盘，冲破了漫长的时空阻隔，终于在公元 7 世纪前到了中国。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公元 1、2 世纪的银器舶来品及类似器物，它们很可能同金器、火浣布、西方衣物（除了山普拉挂毯）、陶瓷、武器、宝石或其他小型物品一起，被商队和商船带到了中国以换取丝绸。我们希望这份清单能够在未来加以完善。之后的研究及对所有舶来品的标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路线、贸易枢纽，乃至全球市场的最初功能形态。

四、对丝绸的简要探讨

现在有必要通过对另一问题的审视来结束这一回顾了，与丝绸相关的参考文献正迅速增多[54]。之后的论述将集中在叙利亚沙漠城市巴尔米拉发现的一些例证，这将有助于主题框架的构建[55]。这个商业城市在过去数年的战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但发现了汉代的中国丝绸。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是一小片绿色丝绸加上编织过的面罩，时代在公元前 1 世纪上半叶，出土于阿特纳坦（Atenatan）墓葬[56]，而其他碎片上则分别绘龙或别的奇幻动物，上面还有汉字[57]。汉字用的是皇家书写形式，表明这些丝绸是在皇室作坊制作的[58]。它们可能是作为官方礼物或贡品被带到了巴尔米拉，即便没有人觉得巴尔米拉人能够读懂这上面的文字。




图一　65 号墓出土丝绸
（after Stauffer 2005，81 fig. 129）

在 65 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特殊的丝绸[59]（图一）。这件铋铬织物是用中国工艺制作的，但丝绸上的人物手持葡萄的形象是西方风格，从人物脚边的七弦竖琴判断，他可能是厄洛斯（Eros），或者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克斯（Bacchus）。其右侧的动物曾被认为是山羊，但它最有可能是骆驼，因为其背上有两个驼峰。这个细节十分有趣，因为正如

诸多墓葬浮雕所表现的那样，巴尔米拉人只养单峰骆驼，不养双峰骆驼。而商队则是用双峰骆驼穿越内亚的[60]。65号墓出土的这件丝绸是西方与远东传统相互交融的结晶。这说明制作者对东西方文化十分熟悉，尽力地做好这件丝绸，以迎合西方顾客的喜好。

附记：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本文的参考书目主要集中在近年的出版物上，这样也便于对早年的书籍和文章进行检索。

注　释

[1] a. McLaughlin 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Silk Routes. The Ancient World Economy & the Empires of Parthia, Central Asia & Hand China, Pen & Sword* [M]. Barnsley, 2016.

b. Lieu S., Mikkelsen G., eds. Between Rome and China: History, religions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J]. *Silk Road Studies*, 2016 (18).

c. Graf D. F.The Silk Road between Syria and China [A]. *Trade, Commerce, and the State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Studies in Roman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43 ~ 529.

d. Galli M.Beyond frontiers: Ancient Rome and the Eurasian trade networks [J].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7 (8): 3 ~ 9. 史学摘要.

e.Genito B.,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9 ~ 13.

[2] a.Olson R.A.Parthia, China and Rome. Perspectives along the Great Silk Route [A]. Studies in honor of Tom B. Jones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 vol. 203), Butzon+Bercker.Kevelaer, 1979: 329 ~ 339.

b. Mittag A., Mutschler F. H. *Conceiving the Empire: China and Rome Compared*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 Scheidel W., et al.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 Scheidel W., et al. *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a. McLaughlin R. *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b. Manning J.At the Limit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Tim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Kings [A]. Mair, Hickman and Renfrew, 2014: 5 ~ 14.

c. [1] a.

d. Bopearachchi A.Greeks, Scythians, Parthians and Kushans in Central Asia and India [A]. Eurasian Empires in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Contact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Graeco-Roman World, Inner A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1 ~ 274. 以及参考文献.

[4] 详见 Li L.On the Silver Multi-lobed Dou-Stemmed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t Xixin - Also on the Similar Artifacts Unearthed in China (中文，附英文摘要). 2014年9月在网上公布. DOI: 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09.004.

［5］ a.Nickel L.The Nanyue Silver Box [J].Arts of Asia, 42 (3): 98 ~ 107.

b. 同［4］, 65 fig. 1.

c. Zhixin J. S., et al.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No. 94 with fig.

d.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55.

［6］ a. 同［4］, 63 No. 1 fig. 1.

b.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56.

［7］ 也可参见尼雅的考古发现 : a.Zhixin J. S., et al.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2 with fig. 67.

b. Graf D. F.The Silk Road between Syria and China [A]. *Trade, Commerce, and the State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Studies in Roman Econom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70, 471.

［8］ 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9］ a.Watt J. C. Y. et al., eds.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October 12, 2004 – January 23, 2005*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8 fig. 46.

b. Whitfield S., ed.La Route de la Soie. *Un voyage à travers la vie et la mort. Exhibition catalogue Brussels, October 23, 2009 to February 7, 2010* [M]. Brussels, Mercator, 2009.cat. 48.

c. Borell B.Trade and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from 200 BC to AD 1000, RGZM Tagungen vol.9,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C]. Mainz, 2010: 127 ~ 142, 134, 135 tab.2 and 136 fig.11, 1.

d. Hoppál K. A. *Romai és a 'Kinai Birodalom' egymâsrol alkotott birodalomképének összehasonlito elemzése az irott forrâsok és a régészeti leletek tukrében* [M]. Ph.D. Budapest: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2015: pl.4.

e. Whitfield S.Silk, Slaves, and Stupas: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M].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73 ~ 92 pl.1b.

f. 关于西汉早期玻璃器见 Borell B. 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C].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57 ~ 65.

［10］ a. 同［9］a: 194, 195 No. 101 with fig.

b. Wagner M. et al. The ornamental trousers from Sampula (Xinjiang, China): their origins and biography [J]. *Antiquity*, 2009, 1065 ~ 1075.

c.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103 ~ 106.

[11] a. Zhixin J. S., ed.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3 No. 26 with fig.

b.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76 ~ 87.

[12] a. Erdenebaatar D.A Glass Bowl [A]. *Eregzen 2011* [C]: 186, 187.

b. Erdenebaatar D. et al.Excavations of Satellite Burial 30. Tomb 1 Complex, Gol Mod 2 Necropolis [A].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2011: 303 ~ 313.

c. Whitfield S.Silk, Slaves, Stupas.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M].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48.

[13] a. Eregzen G.,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Culture of Xiongnu, the First Nomadic Empire in Mongolia,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M]. Ulaanbator, 2011: 128, 129 No. 162 with fig.

b.Whitfield S.Silk, Slaves, Stupas.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M].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48.

[14] Zhixin J. S., ed.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4 No. 27 with fig.

[15] a.Barnhart R. M.Alexander in China? Questions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29 ~ 342.

b. Nickel L.Tonkrieger auf der Seidenstrasse? Die Plastiken des ersten Kaisers 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 Zuric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Georges Bloch Annual, 13-14 [M], 2006-07: 124 ~ 149.

c. Nickel L.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13 (76): 413 ~ 447.

d. Zhixin J. S., ed.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6. 101 No. 24 with fig.

[16] 见 Juping Y.Some clu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oman East hidden in China's "Early four historical books" [J], *Talanta* 46, 47, 2014-15: 125, 翻译及评述.

[17] a. Zhixin J. S., ed.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4 cat. 109 with fig.

b.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95 ～ 99.

[18] Zhixin J. S., ed. *Age of the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pril 3 to July 16, 2017*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4 cat.109 n.1.

[19] http://www.parthia.com/mithradates2.htm.

[20] 如 a. Ferguson J., Keynes M.China and Rome [A].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ANRW) II, 9, 2. Principat,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 New York, 1978: 581 ~ 603.

b. Leslie, D. D., Gardiner.K. H. J.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M]. Bardi, Rome, 2006.

c.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d.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London, 2010.

e. Hoppál K. The Roman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J].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1 (51): 263 ~ 305.

f. Christopoulos L. *Hellenes and Romans in Ancient China (240 BC – 1398 AD), Sino-Platonic Papers* [M], 2012: 230.

g. Yu T. *China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A Survey of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Sino-Platonic Papers* [M], 2013: 242.

h. McLaughlin 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Silk Routes. *The Ancient World Economy & the Empires of Parthia, Central Asia & Hand China, Pen & Sword* [M]. Barnsley, 2016: 66 ~ 73, 189 ~ 198.

i. Sánchez Hernández J. P. *Pausanias and Rome's Eastern Trade* [M]. mnemosyne 69, 955 ~ 977.

j. Xinru L. *Looking towards the West-how the Chinese viewed the Romans* [M]. Hildebrandt & Gillis 2016a: 1 ~ 6.

[21] Hou Hanshu, 88, 11;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23 及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5.

［22］ Weilue, 11;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23 及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55.

［23］ Hou Hanshu, 88, 12,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07;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5.

［24］ Hou Hanshu, 88, 12,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07;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7.

［25］ Hou Hanshu, 88, 12,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61;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5.

［26］ Bueno A.Roman Views of the Chinese in Antiquity [J]. *Sino-Platonic Papers*, 2016 (261).

［27］ Ptol., *Geog.*, 1.11.

［28］ a.Heil M., Schulz, R.Who Was Maes Titianus? [J].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015 (20): 72 ~ 84.

b. Andrade N.The voyage of Maes Titianos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Roman Levant and Central Asia - West China [J]. *MedAnt*, 2015 (18): 41 ~ 74.

［29］ Ptol., *Geog.*, 1.11.4; 1.12.1.

［30］ Heil M., Schulz, R.Who Was Maes Titianus? [J].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015 (20): n.6, 及参考文献.

［31］ Hou Hanshu, 4;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27;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131.

［32］ Hou Hanshu, 88, 1;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26;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5.

这一问题还可见诸如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129 ~ 131; 以及 Heil M., Schulz, R.Who Was Maes Titianus? [J].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015 (20): n. 58.

［33］ Hou Hanshou, 88, 12;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4;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7.

［34］ Nan-fang Tsao-mu Chuang, 9,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9.

［35］ I-wen Lei-chu, 76 (276 ~ 282 AD.),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9.

［36］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9.

［37］ Hou Hanshou, 88, 12.

［38］ 也可参见 Pedanius Dioscorides, *De Materia Medica* V.138.

［39］ Yao Siliun.Liang-shu, 34,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6.

［40］ Yao Siliun.Liang-shu, 54 (公元 6 世纪，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7;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92).

［41］ 可能取决于对罗马考古遗址中东亚人种的 DNA 鉴定，见诸如 a. Prowse T.L. et al.Stable Isotope and 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Geographic Origins on a Roman State at Vagnari (Italy) [A]. *Roman Diasporas.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bi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 [C]. 78, Portsmouth, 2010: 175 ~ 197.

b. Redfern R. C. et al.Going south of the river: A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ancestry, mobility and diet in a population from Roman Southwark [J]. *Journal of Archeological Science*, 2016 (74): 11 ~ 22.

［42］ Hou Hanshu, 88, 10,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25; 也可见 Hill J. E.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M]. John E. Hill, Queensland, 2009: 23 及 Hou Hanshu 88, 1.

［43］ Yao Siliun.Liang-shu, 48, 翻译见 McLaughlin R.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Continuum* [M]. London, 2010: 137.

［44］ a.Fuxi G.The Silk Road and Ancient Chinese Glass [A]. *Ancient Gla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C].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London, 2009: 88 ~ 97.

b.Borell B.Trade and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from 200 BC to AD 1000* [C]. RGZM Tagungen vol.9,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Mainz, 2010: 127 ~ 142.

c. Hoppál K. A.Romai és a ‘Kinai Birodalom’ egymâsrol alkotott birodalomképének összehasonlito elemzése az irott forrâsok és a régészeti leletek tukrében [M]. Ph.D.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2015.

d. Hoppál K.Contextualizing the comparative perceptions of Rome and China through written sources and archeological data [J]. *Dissertationes Archaeologicae ex Instituto Archaeologico Universitatis de Rolando Eötvös noinatae*, Ser. 3 No. 3, 2015: 85 ~ 301 (DOI: 10.17204/dissarch.2015.285).

e. Hoppál K.Contextualising Roman-related Glass Artefact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ino-Roman Relations [J].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6 (67): 99 ~ 114.

f. Borell B.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43 ~ 71.

［45］ a.Fuxi G.The Silk Road and Ancient Chinese Glass [A]. *Ancient Gla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London*, 2009: 89.

b. Borell B.Trade and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from 200 BC to AD 1000* [C]. RGZM Tagungen vol.9,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Mainz, 2010: 127, 128 fig. 1.

c. Watt J. C. Y. et al., eds.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 ~ 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October 12, 2004 – January 23, 2005*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8 fig. 47.

d. Hoppál K. A.Romai és a ‘Kinai Birodalom’ egymâsrol alkotott birodalomképének összehasonlito elemzése az irott forrâsok és a régészeti leletek tukrében [M], Ph.D.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2015: 344 cat. I.1.9 pl. 5.

e. Hoppál K.Contextualising Roman-related Glass Artefact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ino-Roman Relations [J].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6 (67): 100,

101. 112 cat. 1.1 fig. 9.

f. Borell B.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C].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45 ~ 47.

［46］ a. Hoppál K. A.Romai és a ‘Kinai Birodalom’ egymâsrol alkotott birodalomképének összehasonlito elemzése az irott forrâsok és a régészeti leletek tukrében [M], Ph.D.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2015: 245 cat. I.1.10.

b. Hoppál K.Contextualising Roman-related Glass Artefact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ino-Roman Relations [J].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6 (67): 100, 101. 112 cat. I.2 fig. 10.

c. Borell B.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C].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47, 48 fig. 3.1.

［47］ Watt J. C. Y. et al., eds.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 ~ 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October 12, 2004 – January 23, 2005*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3 cat. 13 with fig.

［48］ Hoppál K.Contextualising Roman-related Glass Artefact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ino-Roman Relations [J].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6 (67): 105 fig. 7. 114 cat. II.6.

［49］ 见 Borell B.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C].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50 ~ 56, 及综述。

［50］ Fuxi G.The Silk Road and Ancient Chinese Glass [A]. *Ancient Gla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C].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London, 2009: 89 with fig. 2.27; 也可见 a. Hoppál K. A.Romai és a ‘Kinai Birodalom’ egymâsrol alkotott birodalomképének összehasonlito elemzése az irott forrâsok és a régészeti leletek tukrében [M], Ph.D.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2015: 351 ~ 352 cat. II.4. pl. 1.

b. Hoppál K.Contextualising Roman-related Glass Artefacts in Chin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ino-Roman Relations [J].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016 (67): 104 fig. 4 and Appendix 113 cat. II.4.1 fig 12.

［51］ Borell B.Travels of Glass Vessel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 *Recent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Glass and Glaze, Series o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vol. 2,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Hackensack NJ, 2016: 66.

［52］ Li Q.Roman coins discovered in China and their research [J]. *Eirene. Studia Graeca et Latina*, 2015 (51): 279 ~ 299.

［53］ a. Watt J. C. Y. et al., eds.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 ~ 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October 12, 2004 – January 23, 2005*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4, 185 No. 90 with fig.

b. Hoppál K.Contextualizing the comparative perceptions of Rome and China through written sources and archeological data [J]. *Dissertationes Archaeologicae ex Instituto Archaeologico Universitatis de Rolando Eötvös noinatae*, Ser. 3 No. 3, 2015: 85 ~ 301 [DOI: 10.17204/dissarch.2015.285].pl. 57.

c. Hoppál K.Contextualizing the comparative perceptions of Rome and China through written sources and archeological data [J]. *Dissertationes Archaeologicae ex Instituto Archaeologico Universitatis de Rolando Eötvös noinatae*, Ser. 3 No. 3, 2015: 85 ~ 301 [DOI: 10.17204/dissarch.2015.285]. 291 fig. 6 left.

［54］ a. Hildebrandt B., Gillis C., eds.Silk. *Trade and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s between Rome and China in antiquity (Ancient textiles series, 29)* [M]. Oxford: Oxbow, 2016.

b. Hildebrandt B. Silk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A]. Trade and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s between Rome and China in antiquity (Ancient textiles series, 29) [C], 2016: 34 ~ 50.

［55］ a. Schmidt-Colinet A. Best wishes from China. Ancient textiles from Palmyra. A glimpse on globalization in antiquity [A]. *Das Spiel mit der Antike. Zwischen Antikensehnsucht und Alltagsrealität. Festschrift zum 85. Geburtstag von Rupprecht Düll, Bibliopolis, Möhnesee* [C], 2000: 280 ~ 289.

b. Schmidt-Colinet A., Stauffer A, Khaled al-Asad, eds.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 Neue und alte Funde, Damaszener Forschungen, 8, von Zabern, Mainz, 2000.

c. al-As'ad K., Chehade J.and Schmidt-Colinet A.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 Ein internationales und interdisziplinäres Projekt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C], 2005: 64 ~ 66.

d. Stauffer A.Kleider, Kissen, bunte Tücher. Einheimische Textilproduktion und weltweiter Handel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C], 2005: 67 ~ 81.

e. Schmidt-Colinet A.Palmyra. Stadt an der Seidenstrasse. Reichtum durch weltweiten Handel zwischen China und Rom [A]. *Syrien. Sechs Weltkulturerbe-Stätten in den Wirren des Bürgerkriegs, Nünnerich-Asmus, Mainz* [C], 2014: 20 ~ 27.

f. Thomas Th. K.Perspectives on the wide world of luxury in later Antiquity: silk and other exotic textiles found in Syria and Egypt [A]. *Silk, Trade and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s between Rome and China in antiquity (Ancient textiles series, 29*) [C]. Oxbow, Oxford, 2016: 51 ~ 81.

g.Graf D. F.The Silk Road between Syria and China [A]. *Trade, Commerce, and the State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Studies in Roman Econom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81 ~ 496.

［56］ a. Schmidt-Colinet A. Best wishes from China. Ancient textiles from Palmyra. A glimpse on globalization in antiquity [A]. *Das Spiel mit der Antike. Zwischen Antikensehnsucht und Alltagsrealität. Festschrift zum 85. Geburtstag von Rupprecht Düll, Bibliopolis* [C]. Möhnesee, 2000:

107 no. 15 fig. 65 pl. 81a-b.

b. Stauffer A.Kleider, Kissen, bunte Tücher. Einheimische Textilproduktion und weltweiter Handel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C], 2005: 76 fig. 121a-b and p. 80.

[57] a. Falkenhausen, L. von, 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 [A]. *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 Neue und alte Funde, Damaszener Forschungen* [C]. 8, von Zabern, Mainz, 2000: 58 ~ 65.

b. Stauffer A.Kleider, Kissen, bunte Tücher. Einheimische Textilproduktion und weltweiter Handel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2005: 76 ~ 79 fig. 122 ~ 127.

[58] a. Falkenhausen, L. von, 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 [A]. *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 Neue und alte Funde, Damaszener Forschungen* [C]. 8, von Zabern, Mainz, 2000: 58 ~ 65.

b. Stauffer A.Kleider, Kissen, bunte Tücher. Einheimische Textilproduktion und weltweiter Handel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C], 2005: 80, 81.

[59] a. Schmidt-Colinet A.Best wishes from China. Ancient textiles from Palmyra. A glimpse on globalization in antiquity [A]. *Das Spiel mit der Antike. Zwischen Antikensehnsucht und Alltagsrealität. Festschrift zum 85. Geburtstag von Rupprecht Düll, Bibliopolis* [C]. Möhnesee, 2000: 145, 146 no. 240 fig. 52. 105 pl. 2a. 13e. 96, 97 color plate IIIg.

b. Stauffer A.Kleider, Kissen, bunte Tücher. Einheimische Textilproduktion und weltweiter Handel [A]. *Kulturbegegnung im Grenzbereich, Zaberns Bildbände zur Archäologie 27* [C], 2005: 80, 81 fig. 128, 129.

[60] 也可参见 Genito B., Dongfang Q.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46 ~ 50.

China and the Roman Empire – Archeological testimonials for Roman contact with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enturies AD

Lorenz E. Baumer

Abstrac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have recently been the subject of growing interest. Pieces of woven silk discovered mainly in the Syrian Desert city of Palmyra and in Dura Europos on the Euphrates, present so far the only material remain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estifying to the contacts of the two distant Empires. But what about the materials that traveled in the other direc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is paper intend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this particular question from an archeological perspective. Chronologically, it focuses first o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that has so far provided only very scant and indirect proof for imports of Western objects into China, and then on the Early and Middle Roman Imperial periods that provided a few material testimonials, mainly of Roman glass. The article ends with a short look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silk that has been found in Palmyra and testifies to the awareness of Chinese artisans of Western iconography.

Keywords: China; Roman Empire; contact; First and the Second centuries AD; silk

蒙古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葬俗

尼古拉·斯热金[1]著　权乾坤[2]译

（1. 阿尔泰国立大学，巴尔瑙尔；2.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长春，130012）

内容摘要：本文综合研究了蒙古国中世纪早期突厥人墓葬，从而总结出其丧葬仪式的特点。通过对公元一千纪下半叶的30多处墓葬的发掘材料进行分析，重现了该地区游牧民族丧葬仪式的不同传统。区分出两种主要类型的遗存——随葬马的墓葬和“单一”墓葬。此外，对墓葬和墓葬伴生物如墓围栏等也进行综合研究。墓葬传统中一些共存现象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些组合在阿尔泰—萨彦地区的突厥墓葬材料中得到了呼应。在我们看来，随葬马的墓葬和“单一”墓葬中发现的几种传统的传播，证明了在蒙古中世纪早期群体的异质性。考古材料反映出中世纪早期突厥人文化中存在的几个群体，这些群体受到其族群形成和发展复杂过程的制约。

关键词：中世纪早期；突厥文化；蒙古；葬俗

一、引　　语

墓葬考古发掘材料是重建亚洲中部中世纪早期突厥人历史的主要来源。通过对这些墓葬遗存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思考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具体情况、意识形态的细节等关键问题。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阿尔泰—桑塞克地区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墓葬复合体进行了详细研究[1]。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元一千纪下半叶的墓葬发掘材料也被学者深入研究过[2]。反观，我们对蒙古境内突厥人的墓葬情况，相对了解较少[3]。然而，这片土地上的遗址对解决游牧民族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却至关重要，需要特别注意。

本文介绍了蒙古中世纪早期蒙古境内突厥人丧葬仪式的特点。这是通过对蒙古境内不同地区发现的30多处墓葬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研究蒙古境内墓葬遗址的最有成效的方法，是与阿尔泰—萨彦地区更多的中世纪早期遗存及在毗邻地区出土的墓葬复合体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可以对所分析的材料进行更准确的时间和文化归属，而且有助于确定它们在亚洲中部地区的突厥遗存中的地位。

二、研究中世纪早期突厥人丧葬仪式的几个主要方面

埋葬方式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葬俗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有一些保守性的指标，如埋葬（土葬、火葬等）方法，逝者在墓葬平面的固定某一区域，将动物放置在墓葬内等风俗，这些都对研究特定社会世界观起到了特殊并且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作为区分民族群体的依据。

中世纪早期突厥人丧葬仪式的主要指标是逝者的位置和方向，以及伴随逝者的动物随葬特征。许多因素解释了所示迹象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复杂性。1999年 A.V. Podosinov 通过研究广泛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后，证明了这方面研究的可行性。同时，只有对特定区域进行全面研究，才有可能客观地研究墓葬的方向和位置及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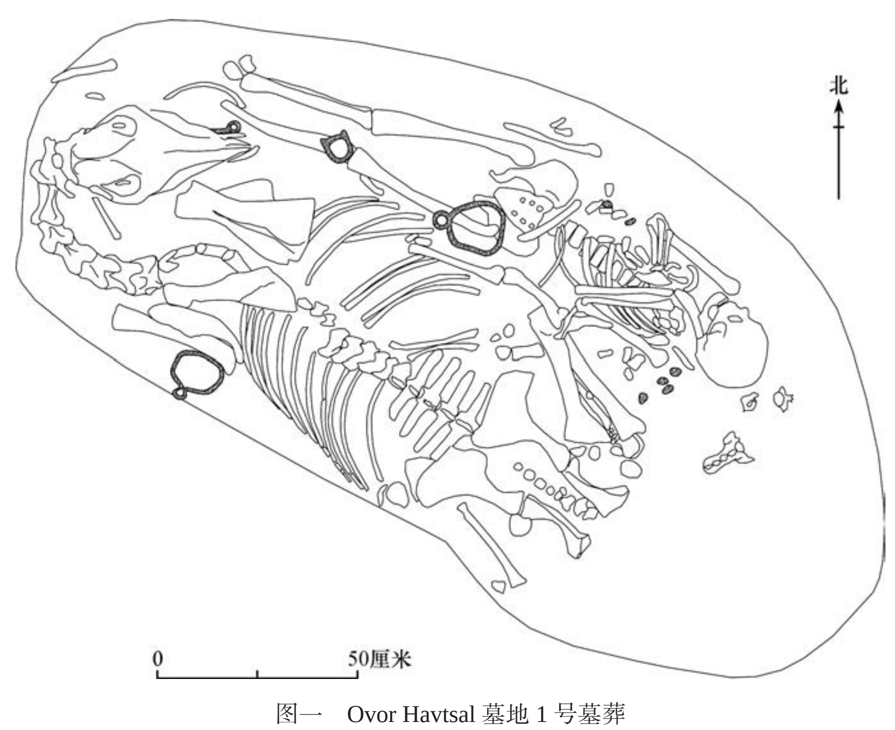
在研究亚洲中部中世纪早期突厥人遗址的出土材料时，学者经常关注遗存的方向或空间中各个元素的某些规律。常见的观测对象有围墙、雕像、鹿石、墓碑等[4]。值得关注的是，突厥人丧葬中反映出对太阳方向的特殊仪式。关于分析逝者方向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尝试解释在水平层位固定区域的埋葬方向。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仅仅限于依靠书面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研究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对日出的崇拜。其次，提出最初的概念。Ovchinnikova B. B. 在研究了大量中世纪早期突厥人墓葬遗迹记录后给出了详细解释[5]。在她看来，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不仅反映了对日出的崇拜，也反映了阴间在西方的观念。因此，逝者应该转向另一个世界即东方，同时多数陪葬的马朝向日落的方向。本文继承发展了 Nesterov S.P 的研究工作[6]。学者特别关注马在突厥人的葬礼中所起到的作用，强调动物在逝者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运输的功能。

关于突厥墓葬方向问题的研究，为墓葬断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同时也有助于对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文化发展进行分期。O. Pritsak 认为关于墓葬的埋葬时间与其葬俗存在必然的关联，并指出早期的突厥人的墓葬是朝向北方的，后来被朝向东方所取代[7]。之后将墓葬朝向与断代分期问题有效关联起来，要依靠对图瓦地区突厥文化墓葬材料的研究分析[8]。D. G. Savinov[9]和 V. A. Mogilnikov[10]也曾指出埋葬方向与下葬时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方案，认为墓葬方向与突厥文化的发展阶段之间没有直接关系[11]。A.V.Podosinov 不同意葬俗传统会产生急剧变化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他指出墓葬方向特征与古代社会世界观的特殊性有很深的联系。

通过研究亚洲中部中世纪早期突厥人墓葬的出土材料，我们能够确定其葬俗的两种主要变体[12]。第一种变体也是最常见的，以随葬马为代表。第二种变体为单一墓葬（没有随葬动物）。纵观蒙古中世纪早期的突厥墓葬形态，也能分出这两种变体。

三、随葬马的墓葬

墓葬中随葬马是中世纪早期突厥人葬俗的显著标志之一。迄今为止，蒙古境内已知18处这样的墓葬复合体。在大多数墓葬中有一只动物（11个遗存，61%）（图一）。剩下的墓葬（7座墓葬，39%）中，在逝者旁边发现了两匹马（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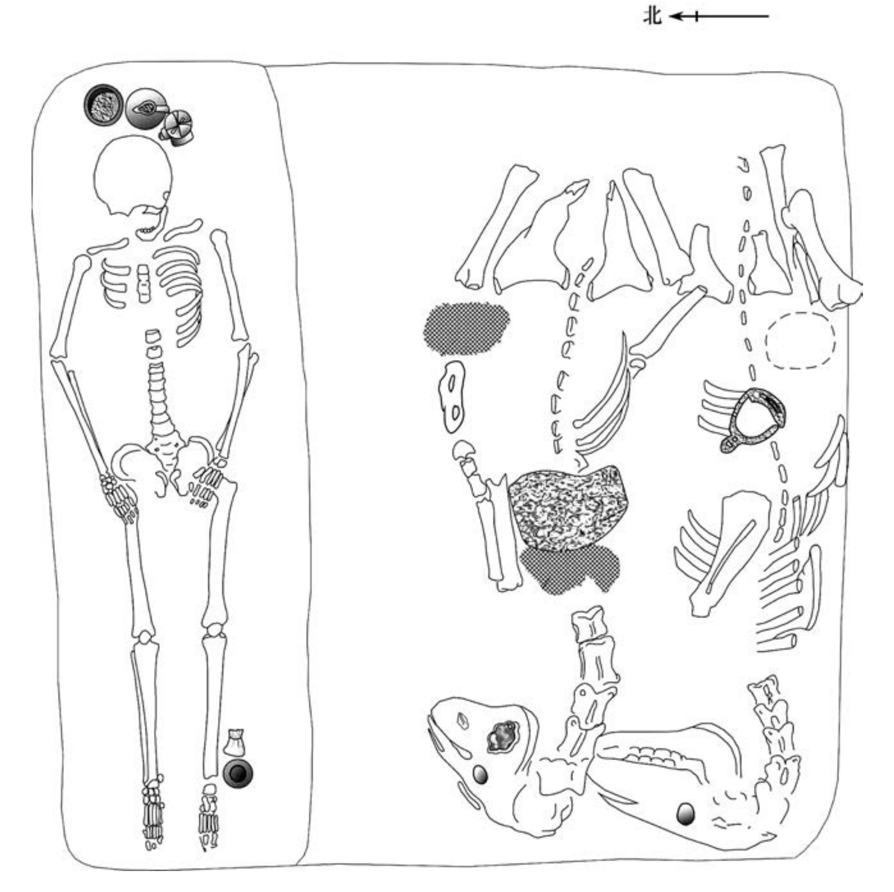


图一　Ovor Havtsal 墓地 1 号墓葬
（Erdenebat L.，Advatar C.，Ankhbayar B.，2010，s. 3）

在几乎所有的墓葬中，逝者都为仰身葬。而在阿尔泰—萨彦地区和亚洲中部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墓葬中却少见这一的特征。根据墓葬的发掘作描述，曾在 Ovor-Havtsal 墓葬中发现过，逝者呈俯身葬[13]（图一）[14]。有趣的是，我在对 Dzhargalanta 墓葬复合体 3 号的两个墓葬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据此推测这些墓葬年代为中世纪早期[15]。在 Burkhan-tolgoi 墓葬，记录了另一个非典型情况。根据该研究者描述，逝者呈站立式被埋置于墓葬中[16]。遗憾的是，仅有文字说明却并未附插图来示意这种罕见的情况。

墓葬中，逝者旁边随葬的马的位置也非常统一。从现有数据来看，在蒙古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大多数墓葬中，动物的腿蜷缩于腹部。

中世纪早期蒙古突厥人丧葬仪式逝者的朝向，是一个易变的指标。在已知随葬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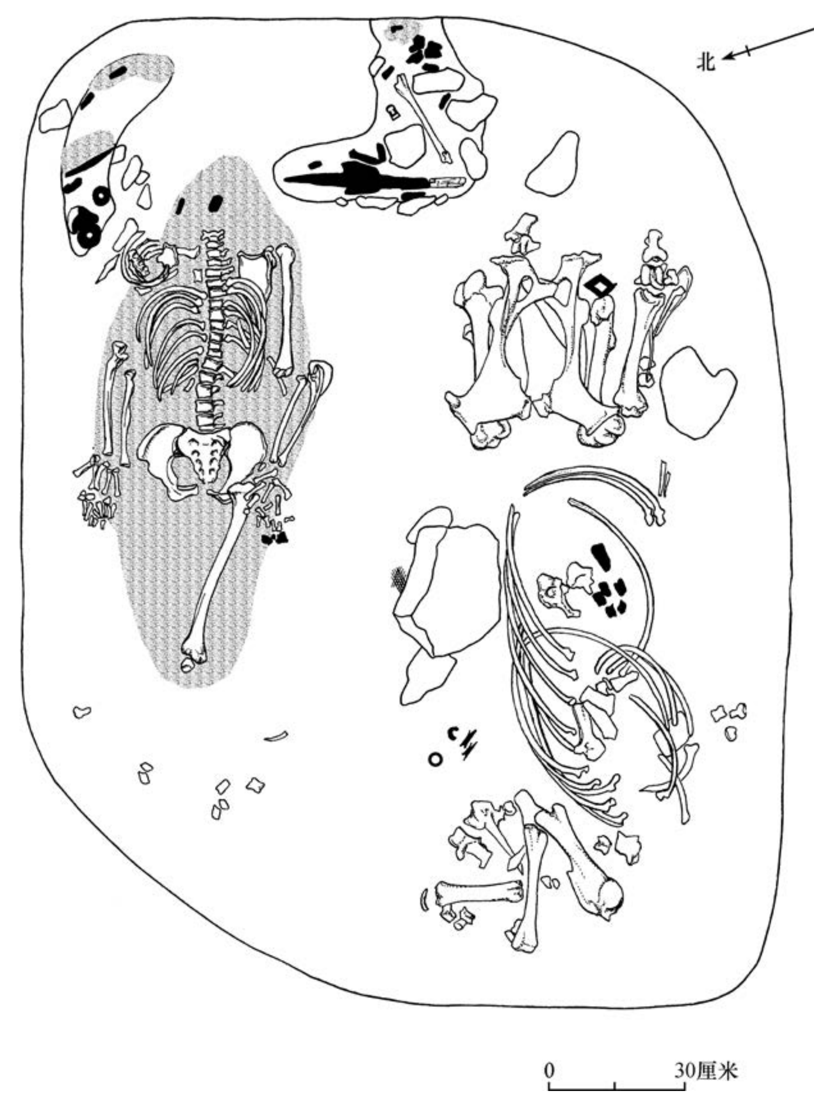


图二 Jargalant 墓地 2 号墓葬
（Evtuhova L.A.，1957，图 2）

的墓葬中，逝者头的方向朝东的占了 61%。另外，还能区分出一组朝向北的，占 28%。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阿尔泰和图瓦地区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墓葬发掘材料时，这些指标的比例几乎相同[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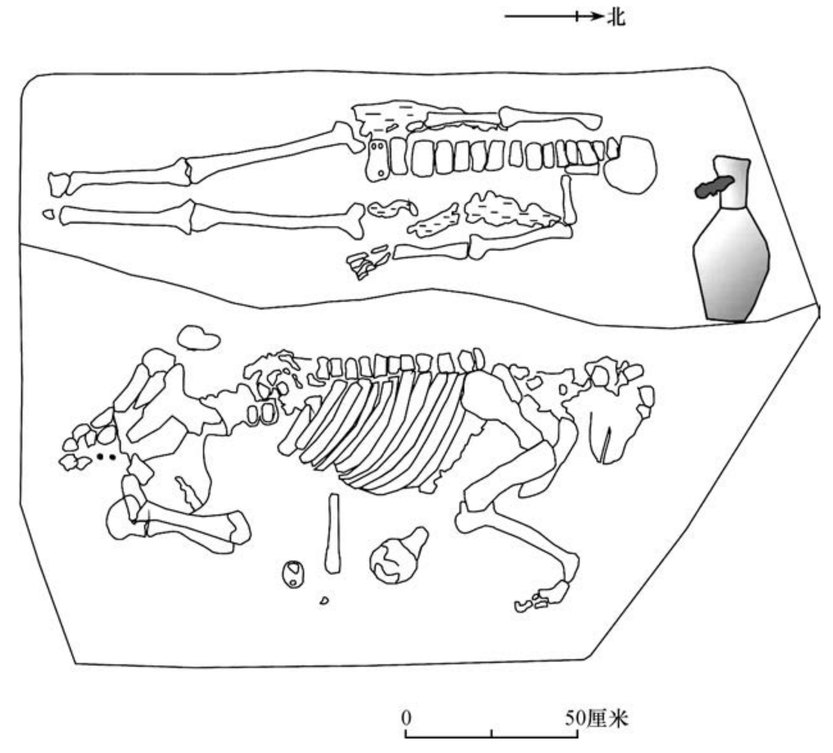
中世纪早期突厥人葬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逝者和墓葬中随葬马的相对位置。对于大多数蒙古中世纪早期突厥墓葬而言，逝者和动物方向相反的情况有 12 例，占 67%（图三）。逝者和马在同一方向上的记录较少，占 17%（图四）。

通过比照蒙古境内出土的随葬马的突厥墓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下列指标的稳定组合：人朝向东方，马的方向与人的方向相反，且随葬动物位置位于逝者的左侧。在中世纪早期突厥墓葬中，有 9 例墓葬存在此类特征，占总数 50%[18]（图一、图二、图五）。这些指标可以被视为丧葬仪式的一种“标准”，是亚洲中部不同地区出土的中世纪早期突厥墓葬的特征[19]。蒙古突厥墓葬第二种类型[20]的特点是随葬马的墓葬，马位于逝者左侧，占此类遗存的 28%（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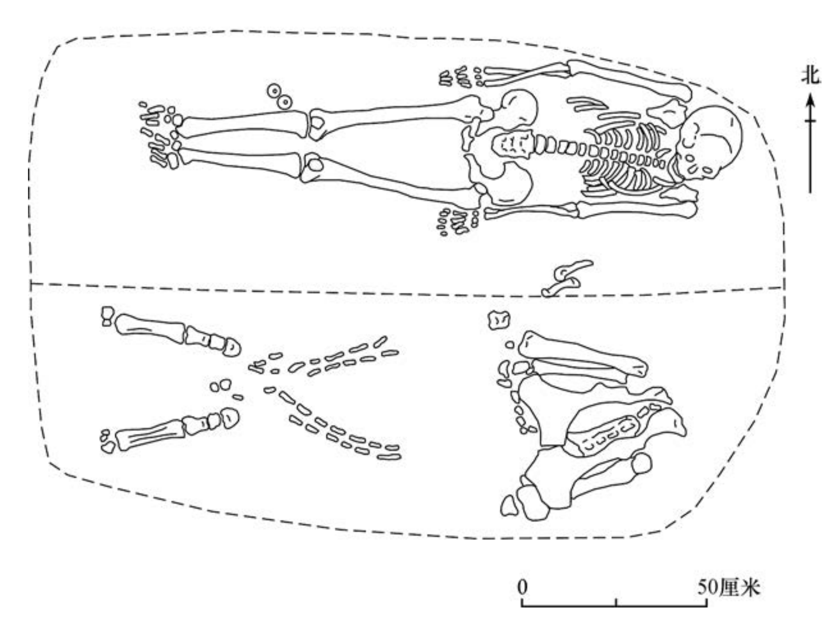
图三　Har-Amatin-Gol 墓地 8 号墓葬
（Tseveendorj D. et al.，2008，s. 3）

除了这些固定的葬俗外，蒙古境内中世纪早期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葬俗，也可归于突厥文化。在 Zagal 遗址的研究过程中记录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从发掘者[21]的描述来看，逝者位于墓葬中心，在其两侧分别放置了朝向不同的马——一匹朝向逝者的脚，另一匹朝向逝者的头。在阿尔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遗址上记录了与此类似的情况[22]。在几个突厥墓葬的研究中，注意到逝者和附近埋藏的动物没有头骨[23](图三、图五、图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盗墓或亵渎墓葬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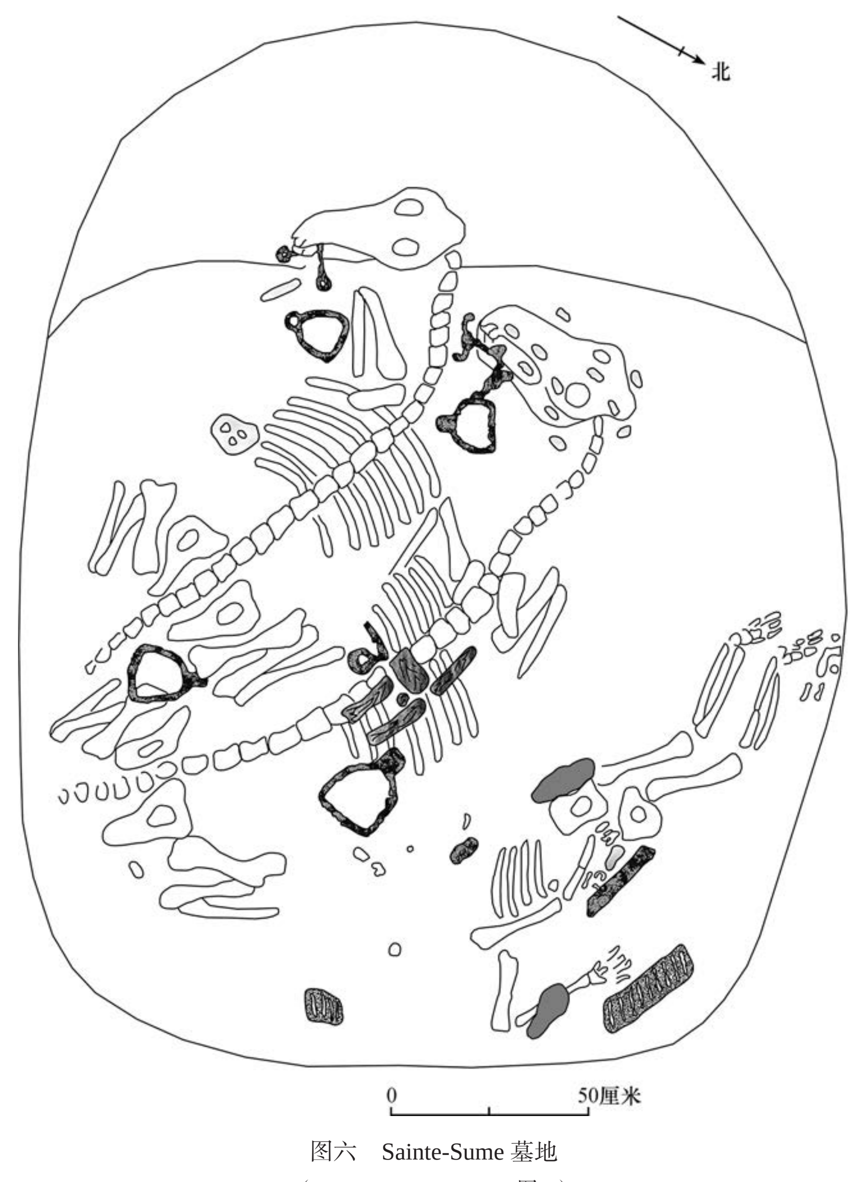
图四 Ugear 墓地 2 号墓葬

（Olziibayar，S.，2007，s. 3）



图五 Elst Hutul 墓地 5 号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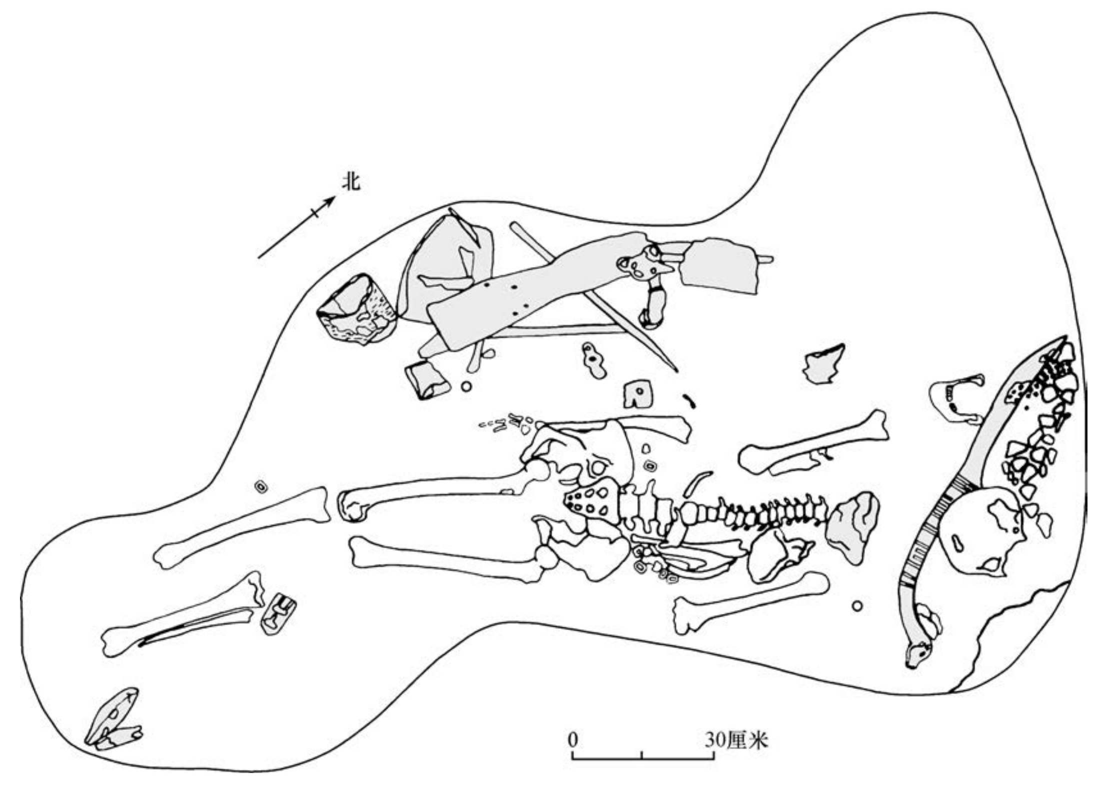
（Khudyakov Yu. S.，Turbat Ts.，1999，图 3）



图六　Sainte-Sume 墓地
（Borovka G. I.，1927，图 6）

四、“单一”墓葬

蒙古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一组特殊遗存是“单一”墓葬。它们的显著特征是没有随葬马，传统上被认为是特定人群的游牧仪式特征[24]。蒙古境内，在 Artsat Del、Burkhan-tolgoi、Zhargalant Khairkhan、Rashaantin Am、Tarimalt、Shiveet Tsankhir-I 墓地均有此类墓葬出土[25]（图七）。大多数“单一”墓葬都是用石块掩埋的。此外，还有两个案例，在有封土堆的墓葬中未发现随葬马的记录。



图七　Jargalant Hairhan
（Törbat Ts. et al.，2009，图 6）

大多数学者认为，亚洲中部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单一”墓葬与前一时期某一地区人群的葬俗特征有关，而非“阿尔泰突厥人”的典型特征[26]。S.I. Weinstein[27]认识到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但他并不排除有关遗存属于突厥文化的事实。G.V.Kubarev 强调，阿尔泰境内只有一例“单一”墓葬[28]。在该地区出土的其他无随葬马的墓葬要么不归于突厥文化，要么他并未关注到。与此同时，G.V. Kubarev 提到了“单一”墓葬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上的扩散情况[29]。蒙古境内的“单一”墓葬的数量很少，因此只对这些物体进行一般性描述，并根据对阿尔泰—萨彦地区材料的观察来概述其解释的可能性。

在对蒙古的“单一”墓葬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特征是逝者朝向东方，以及头部位于墓葬北部的传统。三处遗存记录了逝者旁边有马具[30]。

在研究过更多的阿尔泰—萨彦地区的中世纪早期“单一”墓葬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解释（Seregin NN，2013a，pp105-106）。这些发现为解释这一传统在蒙古的传播提供了材料。在 Burkhan Tolgoi 和 Caramalt 墓地并没有发现随葬马，同组其他墓葬则显示出典型的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特征[31]。这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对象属于所讨论的群体，并且他们的特异性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相关。逝者的社会地位低下，可能解释

了没有随葬马的原因。在对指定墓葬的研究中，发现的相当“贫穷”的随葬品，而这些在“贵族”墓葬中并未出现。

然而，上述解释却无法适用于蒙古境内的石堆墓葬。在两例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随葬品，包括稀有和珍贵的物品[32]。与此同时，在考古学家的调查之前，另两个类似的墓葬被破坏，无法判断该墓葬复合体的初始构成[33]。这种石堆墓葬，不排除特殊传统仪式的存在，这是由偏远地方埋葬逝者和没有马的情况决定的。应该指出的是，阿尔泰—萨彦及邻近地区已知有各种随葬品和随葬动物的石堆墓葬[34]。

五、墓葬复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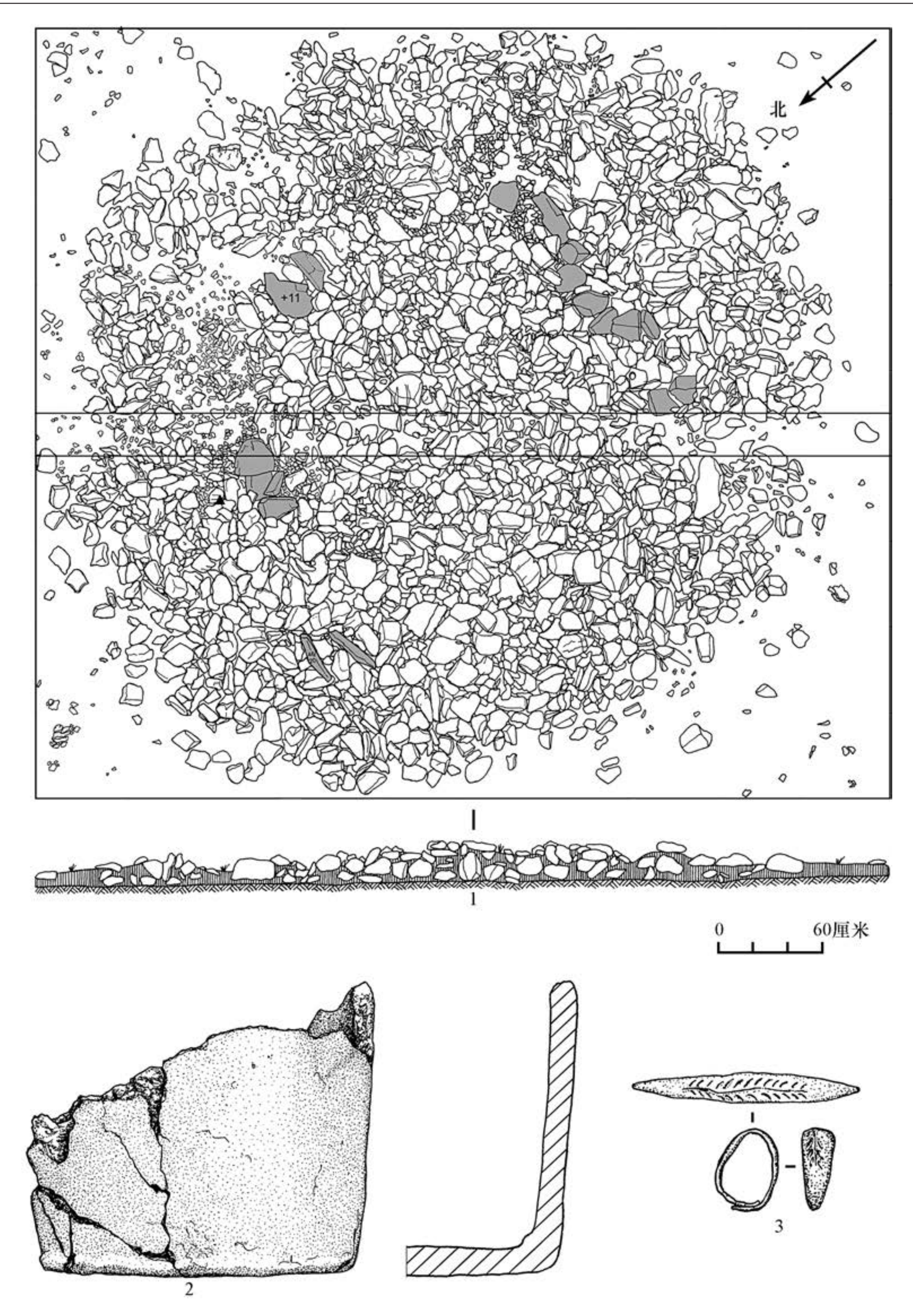
除了“标准”和“单一”墓葬外，蒙古境内还有许多中世纪早期的遗迹，学者对其解释是模棱两可的。这其中一个遗迹现象是 Har-Yamaatyn Gol 遗址的 10 号土堆墓葬，其特点是没有墓穴和地下结构痕迹（图八）。值得注意的是，该遗迹与突厥文化的墓葬在同一组中[35]。除了地表平面的位置特征相似之外，与相邻的“标准”墓葬相比，该遗迹的地面构造布局也相同。此外，在对其墓口进行勘测时，发现了一个青铜戒指，以及一个陶制容器的底部。因此，这无疑与突厥文化有关，并增加了一些属于早期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地表堆封土的“仪式”[36]。

关于“复合体”的语义问题仍然存在[37]。在我们看来，最合理的是将封土堆这样的墓葬“仪式”视为一种“祭祀”遗存[38]。与此同时，许多特征不仅将封土堆“仪式”与遗址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与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祭祀”对象结合在一起。对于石头围栏和封土堆“仪式”，一个相当常见的特征是，通常在墓葬东侧，有几个鹿石。在对其中一个“空”墓穴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部分铠甲残片[39]，这些都出自突厥文化的墓葬和“祭祀”围栏范围内。应该指出的是，带有封土堆的墓葬其测年在 5 世纪到 6 世纪下半叶，属于所研究人群发展的早期阶段。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作为这个时代的断代标准。在突厥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修建封土堆“仪式”的传统，可能与后来在“经典”墓葬复合体的建造中反映的意识形态有关。

在蒙古中部 Vaart 和 Naimaa-Tolgoi 中世纪早期复合体中也没有人类埋葬痕迹。在 Vaart 墓葬复合体，存在墓坑，其内有一个不大的木箱，里面有黄金制品和丝绸碎片[40]。在 Naimaa-Tolgoi 墓葬复合体中，在封土堆的下面，发现了马的骨头、马具和皮带残片[41]。此类遗存可能是一个祭祀性遗迹（图九）。

六、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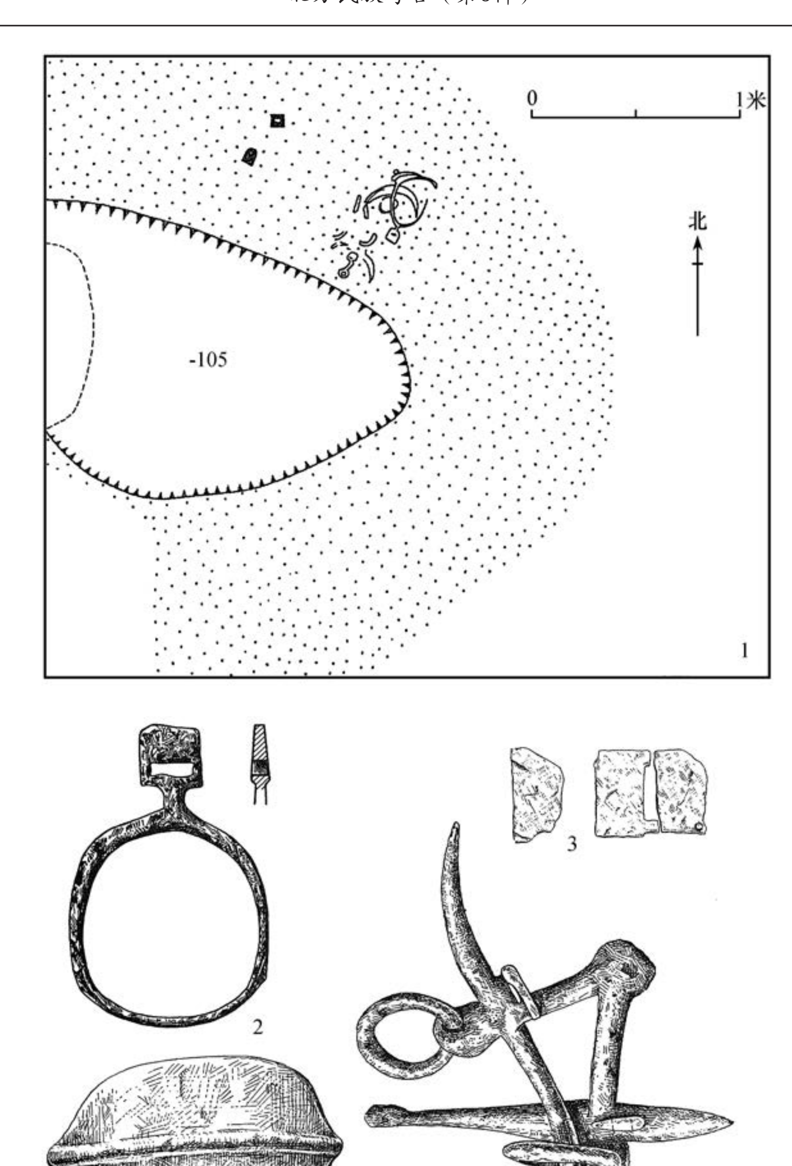
因此，通过对中世纪早期蒙古突厥人丧葬仪式特征的分析，我们能够识别出几组



图八　Har-Amatin-Gol 墓地 10 号墓葬

1. 填埋平剖图；2、3. 出土遗物

（Tseveendorj D. et al.，2008，s. 8）



图九　Naima-Tolgoi

1. 遗物平面图　2 ~ 4. 出土遗物

（Erdelyi I.，Dorjsuren C.，Navan D.，1967，图 39 ~ 42）

遗存。几个稳定葬俗传统的共存并不是偶然现象，一些指标组合也在阿尔泰—萨彦地区突厥墓葬中找到了类似的组合。在我们看来，在随葬马的墓葬和“单一”墓葬中，揭示出几种传统的分布，证明了中世纪早期人群的异质性。由于族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复杂，考古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早期突厥人文化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几个群体。

注　释

［1］ a. Худяков Ю.С. 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на Енисе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4. 152 с.

b. Кубарев Г.В. Культура древних тюрок Алта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5. 400 с.

c. 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Тув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абот Саяно-Туви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Пб., 2013. 232 с.

d. Серегин Н.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тюрок Алтае-Сая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Барнаул, 2013 б. 206 с.

［2］ a. Москалев М.Н., Табалдиев К.Ш., Митько О.А.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Тянь-Шаня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с сопредельными регио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ишкек, 1996. 259 с.

b. Табалдиев К.Ш. Курган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Тянь-Шаня. Бишкек, 1996. 256 с.

c. Худяков Ю.С., Табалдиев К.Ш. 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на Тянь-Шан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9. 293 с.

［3］ Серегин Н.Н. Изучение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тюрок Монголи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4. №1 (9). С. 101 ~ 114.

［4］ a. Гумилев Л.Н. Алтайская ветвь тюрок-тугю//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59. №1. С. 107 ~ 114.

b. Евтюхова Л.А. Каменные извая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Монголии//МИА. М., 1952. № 24. С. 72 ~ 120.

c. Грач А.Д.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Тувы. М., 1961. 94 с.

d. Кубарев В.Д.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4. 230 с.

e. Ермоленко Л.Н.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ая оградка, изваяние, балбалы как культовый комплекс//Охрана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Алтая. Барнаул, 1991. С. 166 ~ 168.

f. Войтов В.Е.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пантеон и модель мироздания в культово-помина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Монголии VI–VIII вв. М., 1996. 152 с.

g. Дубровский Д.В. Идея рядности в культуре кочевник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Древ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ледие). Улан-Удэ, 2005. С. 91 ~ 101.

［5］ a. Овчинникова Б.Б. К вопросу о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в подбоях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Туве//Этногенез и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Омск, 1983. С. 60 ~ 68.

b. Овчинникова Б.Б.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в подбоя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Туве//Древний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Восток.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М., 1984. С. 215 ~ 223.

［6］ Нестеров С.П. Конь в культах тюркоязычных племе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0. 143 с.

［7］ Подосинов А.В. Ex oriente lux! Ориентация по странам света в архаических культурах Евразии. М., 1999. 720 с.

［8］ a. Грач А.Д.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границы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66. С. 188 ~ 193.

b. Кызласов Л.Р. История Тувы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М., 1969. 211 с.

［9］ Кляшторный С.Г., Савинов Д.Г. Степные империи древней Евразии. СПб, 2005. 346 с.

［10］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В.А. Тюрки//Степи Евр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М., 1981. С. 28 ~ 43.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11］ a. Гаврилова А.А. Могильник Кудыргэ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алтайских племен. М.; Л., 1965. 146 с.

b. Вайнштейн С.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вязи 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в Туве)//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6. №3. С. 60 ~ 81.

［12］ Серегин Н.Н. Погребальный ритуал кочевников тюр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аяно-Алтая//Вестник НГУ. Сер.: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0б. Т. 9. Вып. 5: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С. 171 ~ 180.

［13］ Эрдэнэболд Л., Одбаатар Ц., Анхбаяр Б. Овор хавцалын амны турэг булш//Нуудэлчдийн ов судлал. 2010. T. X. Fasc. 9. Т. 125 ~ 132.

［14］ 文章插图（Erdenebat L., Advatar C., Ankhbayar B., 2010, s. 3）与描述不相符。这可能是由于绘图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编制出版物的不准确造成的。感谢 C.C.Tur 人类学博士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15］ Евтюхова Л.А. О племе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 IX в.//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57. №2. С. 207 ~ 217.

［16］ Турбат Ц., Амарту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ын сав нутг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 295 с.

［17］ 同［12］.

［18］ a.Боровка 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среднего течения р. Толы//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й о работах,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х в 1925 году. Л., 1927. С. 43 ~ 88.

b. 同［15］.

c. Erdelyi I., Dorjsuren C., Navan D. Results of the Mongolian-Hungar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1961–1964 (a comprehensive report)//Acta archaeologica. 1967. T. XIX. P 335 ~ 370.

d. Турбат Ц. Морьтой нэгэн оршуулга//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1998. T. XVIII. Т. 130 ~ 134.

e. Турбат Ц. Турэгийн уе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оёл//Талын морьтон дайчдын ов соё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4. Т. 27 ~ 43.

f. 同［16］.

g. Кубарев Г.В., Со Гилсу, Кубарев В.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Лхундев Г., Баярхуу Н., Ким Хый Чхан,

Канн Сом, Чжон Вон Чхол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долине реки Хар-Ямаатын-Гол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7. Т. XIII. С. 298 ~ 303.

h. 同［13］.

［19］ 同［12］.

［20］ a. Сэр-Оджав Н. Эртний Турэгууд (VI–VIII зуу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70. 115 т.

b. Наван Д., Сумьябаатар Б. Овог монгол хэл бичийн чухаг дурсга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7. 155 т.

c. 同［16］：108，271.

d.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Турбат Ц., Худяков Ю.С.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е впускное погребение на памятнике Эгин-Гол в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Прибайкалье в древности. Улан-Удэ, 2004. Вып. 2. С. 175 ~ 181.

e. Гунчинсурэн Б., Марколонго Б., Пужетта М., Базаргур Д., Болорбат Ц. Турэгийн уед холбогдох хоёр булшны тухай (О двух курганах тюрк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2005. Т. XXIII. Т. 104 ~ 112.

f. Олзийбаяр С. Огооморийн уйгур булш//Туухийн судлал. 2007. Т. XXXVII. Т. 26 ~ 31.

g. Цэвендорж Д., Кубарев В.Д., Лхундэв Г., Кубарев Г.В,, Баярхуу Н. Хар Ямаатын Түрэгийн үе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ын малтлагын үр дүн//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2008. Т. XXVI. Т. 262 ~ 273.

［21］ Худяков Ю.С., Лхагвасурэн Х. Находки из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го погребения в местности Загал в Монгольском Алтае//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2002. №8. С. 94 ~ 105.

［22］ a. 同［11］a：табл. XXIII.

b. Соловьев А.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могильнике Усть-Чоба-I на Средней Катуни//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1999. №4. С. 123 ~ 133.

［23］ a. 同［18］a.

b. 同［16］：109，110，274.

c. 同［18］g.

［24］ Серегин Н.Н. «Одиночные» погребения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тюрок Алтае-Сая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3а. Вып. 2 (8). С. 100 ~ 108.

［25］ a. 同［16］：107，108，271.

b. Хурэлсух С., Мунхбаяр Л. Рашаантын Ам ба Цанхирын агуйн оршуулгууд//Acta Historica. 2004. Т. V. Т. 20 ~ 30.

c. 同［20］e.

d. Хурэлсух С. Монгол нутах дахъ агуйн эртний оршуулгы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байдал//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2008. Т. XXVI. Т. 293 ~ 310.

e. Törbat Ts., Batsükh D., Bemmann J., Höllmann T.O., Zieme P A Rock Tomb of the Ancient Turkic

Period in the Zhargalant Khairkhan Mountains, Khovd Aimag, with the Oldest Preserved Horse-head Fiddle in Mongolia – a Preliminary Report//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Bonn, 2009. 365 ~ 383.

f. Турбат Ц., Батсух Д., Батбаяр Т. Скальное захоронение с музыкаль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в Монгольском Алтае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оценки)//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й Сибири. Улан-Удэ, 2010. С. 264 ~ 265.

[26] a. 同［8］b：22，23.

b. Длужневская Г.В., Овчинникова Б.Б. Кочев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Тувы в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Новейш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Тувы и этногенезу тувинцев. Кызыл, 1980. С. 83.

c. 同［6］：50.

[27] 同［11］b：331.

[28] 同［1］b：19.

[29] 同［1］b：19.

[30] a. 同［25］b.

b. Хурэлсух С. Монгол нутах дахъ агуйн эртний оршуулгы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байдал//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2008. T. XXVI. T. 293 ~ 310.

c. 同［25］e.

[31] a. 同［16］：107，108.

b. 同［20］e.

[32] a. [25] d.

b. 同［25］e.

c. 同［25］f.

[33] Хурэлсух С., Мунхбаяр Л. Рашаантын Ам ба Цанхирын агуйн оршуулгууд//Acta Historica. 2004. T. V. T. 20 ~ 30.

[34] a. Кызласов И.Л.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 инвентарем и сопроводительным захоронением животного. 1986.

b. Худяков Ю.С., Кочеев В.А., Моносов В.М. Балтарганские находки//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1996. №3. С. 46 ~ 53.

[35] a. 同［18］g.

b. Цэвэндорж Д., Баяр Д., Цэрэндагва Я., Очирхуяг Ц. Археология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баатар, 2008. 239 с.

[36] a. Илюшин А.М. Хронолог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ритуальных курганов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Охрана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Алтая. Барнаул, 1990. С. 117 ~ 119.

b. Мамадаков Ю.Т., Горбунов В.В.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курганы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атанда-III//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1997. С. 115 ~ 129.

c. Бобров В.В., Васютин А.С., Васютин С.А. Восточный Алтай в эпоху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3. 224 с.

［37］ Серегин Н.Н.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ритуальных» курган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тюр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е. Барнаул, 2010a. Вып. IV. С. 78 ~ 83.

［38］ a. Тишкин А.А., Грушин С.П. Что такое кенотаф?//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1997. Вып. 2. С. 24 ~ 28.

b. Тишкин А.А., Дашковский П.К.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истем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й населения Алтая скифской эпохи. Барнаул, 2003. 430 с.

c. Матренин С.С. Способы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II в. до н.э. – V в. н.э.//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народов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2005. Вып. 2. С. 35 ~ 51.

［39］ 同［36］a.

［40］ Dorjsuren C. An early medieval find from Nothern Mongolia//Acta archaeologica. 1967. T. XIX. P 429 ~ 430.

［41］ 同［18］c.

参 考 书 目

Кляшторный С.Г., Савинов Д.Г. Степные империи древней Евразии. СПб, 2005. 346 с.

Турбат Ц. Морьтой нэгэн оршуулга//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1998. T. XVIII. T. 130 ~ 134.

Худяков Ю.С., Турбат Ц.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е погребение на памятнике Элст Хутул в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Евразия: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Вып. 2. С. 82 ~ 87.

Funerary Ritual of Early Medieval Turks in Mongolia

Nikolai Sereg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unerary rites of early medieval Turks based on research on burial complexes in Mongolia. The author analyses more than 30 excavated objects that relate to various traditions of ceremonial practice in the reg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ium AD. Emphasis is placed on two types of sites: horse burials and ‘single’ burials.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funerary furnishing and enclosures. The author notes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traditions of ceremonial practice for which analogies can be found in

the Turkic burials of the Altai-Sayan region. The coexistence of horse burials and ‘single’ burials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arly medieval population in Mongolia. It is possible tha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reflect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groups in early medieval Turkic culture, or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urkic communities.

Keywords: Early Middle Ages; Turkic Culture; Mongolia; Funerary Rite

俄罗斯考古学家 В.Д. 库巴列夫岩画研究学术史回顾 *

肖　波

（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530028）

内容摘要：通过对 В.Д. 库巴列夫学术生涯及岩画研究历史的回顾，着重从岩画的内容、分期和断代，以及岩画的含义等方面对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尤其是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对阿尔泰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岩画的争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对一些疑似旧石器时代的图像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增加中国学术界对周边国家岩画研究进展的了解，进而寻找出中国北方岩画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蒙古岩画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中国岩画研究事业向纵横两个方面发展。

关键词：В. Д. 库巴列夫；岩画研究；学术史；回顾

弗拉基米尔 · 德米特里耶维奇 · 库巴列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Кубарев，以下简称 В.Д. 库巴列夫）于 1946 年 8 月 14 日出生于阿尔泰边疆区的诺沃博罗夫扬卡村，2011 年 5 月 8 日去世。他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俄罗斯远东、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研究专家，历史科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97 年 11 月，В. Д. 库巴列夫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所的通讯会员；1998 年起担任西伯利亚史前艺术研究者协会（克麦罗沃）的通讯会员；2001 年当选为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乌兰巴托）的通讯会员；2003 年，由于参与俄罗斯、蒙古、美国联合考察队在蒙古阿尔泰地区工作期间的突出贡献，以及积极参与国际项目“阿尔泰”，В. Д. 库巴列夫被聘为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工作的科学主管，并担任戈尔诺—阿尔泰国立大学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学生考古实习的组织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共出版、发表了 22 本专著和 400 多篇文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新疆民族艺术与国家认同（项目批准号：16ZD09）；广西社科规划项目：“广西、泰国、老挝岩画比较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项目批准号：18FMZ002）阶段性成果。

一、B.Д. 库巴列夫的主要学术活动经历

B.Д. 库巴列夫出生在诺沃博罗夫扬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和青年时代则在新西伯利亚市度过。1963 年，在其尚未从西西伯利亚水文气象局下属的第 7 职业学校毕业的情况下，就被派往乌考克高原的别尔特克高空气象站工作。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后，1965 年，在其本人主动要求下，被调往位于阿尔泰贝鲁哈山脉最高峰的阿克克姆气象站工作。1966 ~ 1970 年，B.Д. 库巴列夫担任蒙古边界附近乌兰德里克气象站的负责人。正是在高空气象站工作的这些年里，B.Д. 库巴列夫对该地区的历史和古代遗迹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空闲时间进行广泛调查，其中就包括对丘雅盆地的石器、游牧民族的古墓、石人，以及岩画的考察。除了考察外，他还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活动，当然，这些发掘都还属于业余性质的。

他初次发掘地点选在乌兰德里克气象站附近。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在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有机材料制品，包括木制餐具和杯子等器具，以及木雕艺术品。人的头饰和衣服上装饰了制作精巧的微型鹿、马和豹子的图像。与很多考古学家不同，B.Д. 库巴列夫一开始并未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但是他能够不断地自我“发现”，找到兴趣所在，并将自己献给最热爱的事业，进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他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众多古物研究者极其相似。随后，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出现，在他的命运转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0 年春，在新西伯利亚市中央报告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关于西伯利亚考古的汇报结束后，B.Д. 库巴列夫走近他，并向其展示自己在乌兰德里克业余发掘的日记和照片。第二天，B.Д. 库巴列夫在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办公室向其展示了乌兰德里克地区出土的巴泽雷克墓葬中的古代珍品。这种诚挚的探究精神、高度的天赋和极大的兴趣强烈吸引了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诚挚地邀请 B.Д. 库巴列夫参与自己的远东探险活动。在那里 B.Д. 库巴列夫参加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笔者注）和滨海边疆区的考古遗址发掘工作。同年，B.Д. 库巴列夫开始在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言、哲学所工作（即现今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在这段时间里，作为高级实验室助理，他每年都要在北亚综合考察队的阿尔泰、阿穆尔、滨海边疆和萨彦地区的考古分队工作。当时，每年的田野工作时间大约有 6 个月，但 B.Д. 库巴列夫总是设法至少抽出 1 个月时间去阿尔泰。1972、1973 和 1977 年，B.Д. 库巴列夫还参与了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领导的苏—蒙历史文化考察团。自 1973 年以来，B.Д. 库巴列夫开始在阿尔泰地区进行独立的考古研究。他被任命为北亚考古探险队东阿尔泰支队的负责人，此后，他在历史、语言、哲学所的整个工作期间都担负该队的领导工作。在该所 40 余年的工作中，他有数十项的考古发现。此外，他的科学兴趣范围非常广泛，从丘雅盆地的旧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直到现代民族志时期的各种遗物。

他领导的东阿尔泰支队发现并研究了超过 800 种不同类型和时期的文化遗址，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青铜时代的墓葬和祭祀建筑、鹿石和围栏石碑、古代和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墓葬、冶铁遗址、突厥石人、纪念性的石圈以及各个时期的岩画等。但主要材料是有关斯基泰时期或古代游牧时期（公元前 7 ~ 前 3 世纪）的。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大约 300 个已发掘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墓葬材料。这些墓葬至少属于 43 个墓地，均由 B.Д. 库巴列夫在乌兰德雷克河、塔山金卡河、尤斯特德河、巴尔布尔加哲河、布谷尊河、布拉特河、叶兰加什河、阿尔古特河、库洛塔河、丘雅河以及卡通河流域调查所得。这些工作成果部分体现在他 1987 年出版的《乌兰德雷克墓葬》[1]、1991 年出版的《尤斯特德墓葬》[2]和 1992 年出版的《塞留格玛墓葬》[3]三部专著中。

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B.Д. 库巴列夫在阿尔泰进行了探索性的工作，专门寻找不同时代的石质雕像和带有图画和杯状凹穴的石碑。在 1979 年出版的《阿尔泰的古代雕像（鹿石）》一书中，他收集了 100 多块鹿石的信息，其中许多是他自己发现的[4]。此外，他还是首位论证阿尔泰地区存在 7 ~ 10 世纪古代突厥石雕像的学者，绘制了 256 个石像的临摹图并记录相关信息[5]。随后几年里，他仍然对这些古代纪念碑及其包含的仪式抱有浓厚的兴趣。另一项不得不提的成就是他对尤斯特德河河谷中匈奴陶器窑址的发现和系统研究，这是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唯一的此类考古遗址，在这里共发现超过 5000 个陶器残片[6]。此外，他发现并发掘了西伯利亚之前并不为人知的卡拉科尔墓葬，墓葬石板上绘制了大量精美的壁画，是西伯利亚地区杰出的古代艺术遗迹[7]。毫无疑问，卡拉科尔墓葬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壁画本身非常精美，更重要的是墓葬中的图像主要是各种人像，尤其是头部外轮廓带有太阳芒线的人像，这类图像在欧亚大陆岩画中非常普遍，在我国内蒙古的阴山、桌子山，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塔姆加利等地区尤为集中，但能够与其进行类比的文物太少，卡拉科尔墓葬壁画由于年代比较明确，可以很好地填补这一空白。

B.Д. 库巴列夫属于那些现在极少见的没有获得正规学位的科学工作者之一。直到 1989 年，他才以函授的形式取得高等教育的文凭。在这一年，B.Д. 库巴列夫从戈尔诺—阿尔泰国立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戈尔诺—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而此时，他早已成为一位著名学者。随后，他进入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其导师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志研究所的科学主管兼主任 A.П. 杰夫杨科。1998 年，其博士学位论文《阿尔泰东部的古代游牧民族》通过答辩。然而，考虑到他完成的科研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答辩委员会认为可以绕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历史科学博士学位。

B.Д. 库巴列夫对历史科学的重大贡献当属对岩画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对阿尔泰地区大约 200 个岩画点基本信息的记录。但他最杰出的创造性成就是对卡尔巴克—塔什岩画群的全面研究。作者在该岩画群多年工作的结果是出版了 4 部专著，即 1992 年与 E. 马托奇金合作出版的《阿尔泰岩画》[8]，1996 年与 E. 杰克布森合作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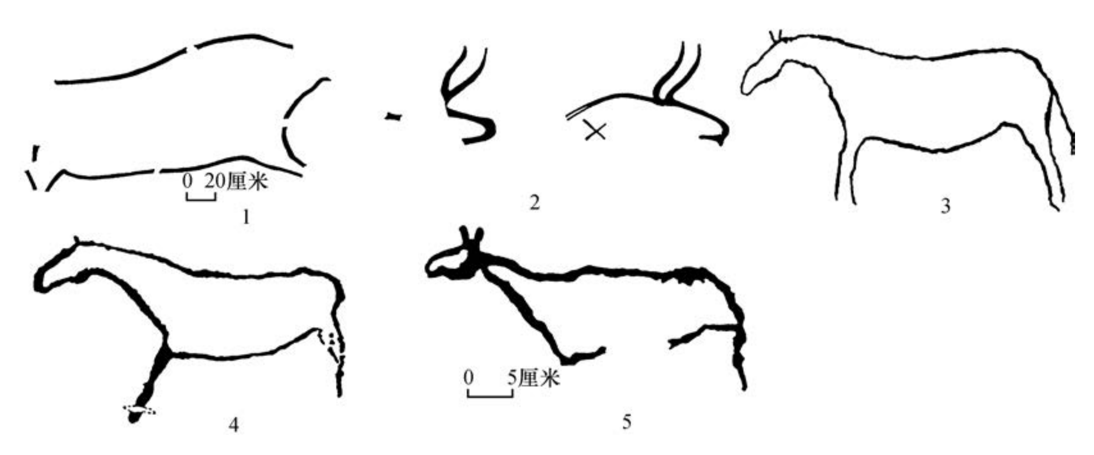
的法文版的《中亚岩画全集 · 南西伯利亚 3 · 卡尔巴克—塔什 I（阿尔泰共和国）》[9]，2003 年出版的《阿尔泰岩石艺术》[10]，以及 2011 年出版的俄文版《卡尔巴克—塔什 I 岩画（俄罗斯阿尔泰）》[11]。后一本著作用力颇深、制作尤其精良，用照片、平面图和许多临摹图对该岩画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此外，他还于 1993 ~ 2006 年对蒙古阿尔泰地区的岩画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这些工作均是在俄、美、蒙 3 方合作框架下完成的，主要依托于"阿尔泰的古代艺术"和"中亚岩画全集"两个项目。上述两个项目的参与者包括美国俄勒冈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韩国高句丽历史研究所，以及韩国岩画学会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根据 1993 ~ 2006 年的调查结果，В.Д. 库巴列夫及其国际同行已经发表了超过 100 篇文章和专著。其中俄文专著有两部，分别为《查干—萨拉和巴加—奥伊古尔岩画（蒙古阿尔泰）》[12]《什文恩特—海尔汗岩画（蒙古阿尔泰）》[13]，此外还有几部蒙文专著。其研究方法基本与卡尔巴克—塔什岩画点的研究方法相同。由于岩画数量众多，并且兼有具象性、完整性等特点，可以与众多考古资料交叉比较，因此，能更为全面地展示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面貌，对传统的考古资料也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蒙古地区的岩画研究是其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研究工作的延续。因为上述地区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交通联系和文化交往，所以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В.Д. 库巴列夫虽然仍继续领导东阿尔泰支队在阿尔泰共和国从事传统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但此时，他主要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到岩画领域，这也成为他今后学术生涯关注的一个重点。

二、岩画的年代

关于阿尔泰地区岩画的年代，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该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在《乌考克高原最古老的岩画》一书中，В.И. 莫罗金和 Д.В. 切列米辛在将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南部乌考克高原的岩画与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旧石器时代岩画进行广泛比较后指出，乌考克地区卡尔古德岩画中的马、公牛和鹿图像（图一）属于"金属时代，更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或者中石器时代"[14]，换句话说，属于"石器时代"[15]。在随后的著作中，作者进一步将其年代范围定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并不排除其年代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16]，但是，В.Д. 库巴列夫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上述作者的分类可能有问题，与卡尔古德地区的马、公牛和鹿图像最相似的并非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岩画，而是本地区具有类似风格的年代可以确定的一些青铜时代岩画。因此，卡尔古德地区的上述图像均属于青铜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属于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17]。也就是说，在卡尔古德河流域，乃至整个乌考克地区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卡尔巴克—塔什岩画中与原物大小相当的鹿图像是整个地区岩画中年代最早的。用萨维诺夫的话来说，本地区最早的岩画应当属于阿凡纳谢沃时期[18]。据俄国学者对叶尼

塞河中游地区 32 个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标本做的碳十四测年，“其年代为 4820 ± 50 至 3700 ± 80 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 3706 ~ 前 3384 至公元前 2389 ~ 前 1883 年”[19]，而 A.B. 博利亚科夫对上述数据分析后认为“叶尼塞河中游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33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之间，但也不排除其上限达到公元前 3700 年”[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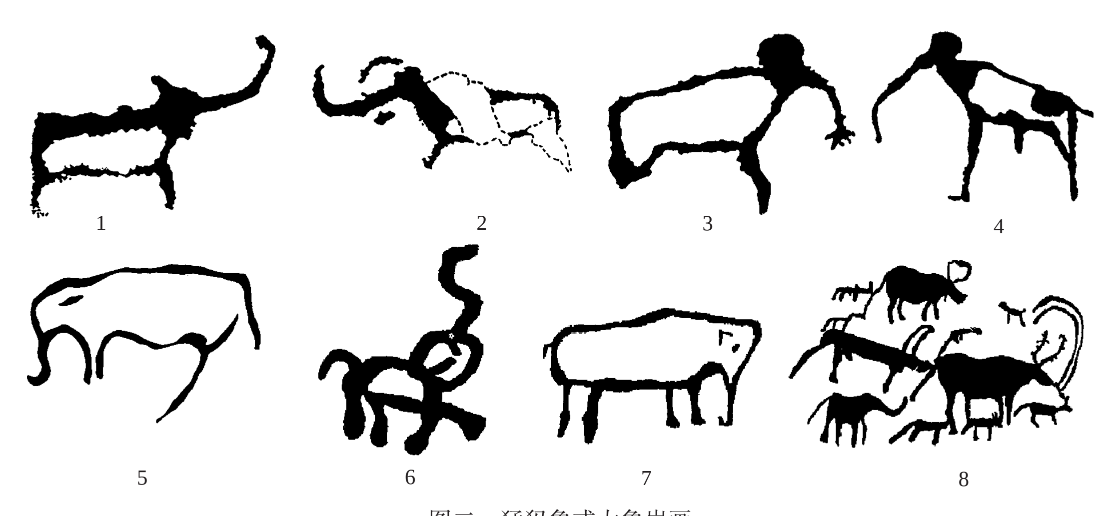


图一 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乌考克地区卡尔古德岩画
（图片引自 Молодин В. И., Черемисин Д. В. *Древнейшие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О РАН. 1999）

对于蒙古阿尔泰地区，最古老的岩画被认为是辉特—青格尔（Хойт-Цэнкер）洞穴岩画。1966 年，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曾带队对该岩画点进行考察并开展相关研究。岩画用红色颜料绘制而成，图像有野羊、野马、野驼和大象等。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进行比较后，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认为“辉特—青格尔洞穴古代艺术匠人的艺术作品就其全部特点和思想实质来看，与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家们的创作最为相近”[21]。这种观点得到很多蒙古和俄罗斯学者的支持，但也部分学者对此有质疑。质疑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Э.A. 诺夫哥罗德娃和 A.A. 福尔莫佐夫。Э.A. 诺夫哥罗德娃认为这个年代数据可能被高估了，她指出“洞穴（辉特—青格尔——笔者注）中的大象或猛犸象形象更可能是野猪图像……在肯特·阿依玛克的阿尔山—哈德露天山岩上发现了一些完全相似的图像，可以确认其年代属于更晚期的中石器时代甚至是新石器时代。在该岩画点周围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碧石或玉髓材质的石片、刮刀和薄板”[22]。（图二，1 ~ 5）Э.A. 诺夫哥罗德娃对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没有找出足够有力的论据”来证明阿尔山—哈德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此后，她又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上述岩画的年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传统向中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23]。A.A. 福尔莫佐夫将辉特—青格尔洞穴岩画与阿尔山—哈德岩壁画进行比较后，发现两处岩画点的符号和图像都很相似，并认为“后者实际上是对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所谓猛犸象图像的一种复制，但实际上，显然描绘的是一头野猪”[24]。此

外，A.B. 瓦列诺夫[25]和 O.B. 科尔松[26]等学者也对辉特—青格尔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表示怀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大象岩画在我国北方地区也有发现（图二，6～8）。陈兆复先生认为，这些地方的大象早在一万年前已经灭绝，因此这些岩画的创作年代应在一万年前[27]。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苏北海先生[28]。而汤惠生先生等则认为，这是对图像进行错误辨识的结果，艺术是精神世界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将岩画形象与古生物进行比较，这些所谓的旧石器时代艺术作品都是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时期的作品[29]。

而 B.Д. 库巴列夫则认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种所谓的猛犸象或者大象的年代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或者中石器时代的，因为所有这些大象的图像都不具备猛犸象的一些基本特征，按照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说法，西伯利亚猛犸象有"笨拙的身体、大大的头部、前肩胛骨上方有一个陡峭的驼峰以及巨大的、通常呈螺旋卷曲状的象牙，即门牙。猛犸象的身体完全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特别是两侧非常茂密，躯干下面看起来像一条连续的长发边缘"[30]。在对现有资料分析的基础上，B.Д. 库巴列夫坚持认为目前在中亚地区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岩画[31]。



图二　猛犸象或大象岩画

1～4. 查干—萨拉　5. 辉特—青格尔洞穴　6. 青海刚察哈龙　7. 甘肃祁连山　8. 新疆阿勒泰

（1～5. 蒙古阿尔泰；6～8. 中国）

［1～5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Якобсон Э. Петроглифы Цагаан-Салаа и Бага-Ойгура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5: 17；6～8 引自苏北海．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卡尔巴克—塔什岩画的年代。该岩画点是阿尔泰地区最重要的岩画点之一，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保存状况良好，为深入研究本地区的岩画，进而建立整个阿尔泰地区岩画的发展序列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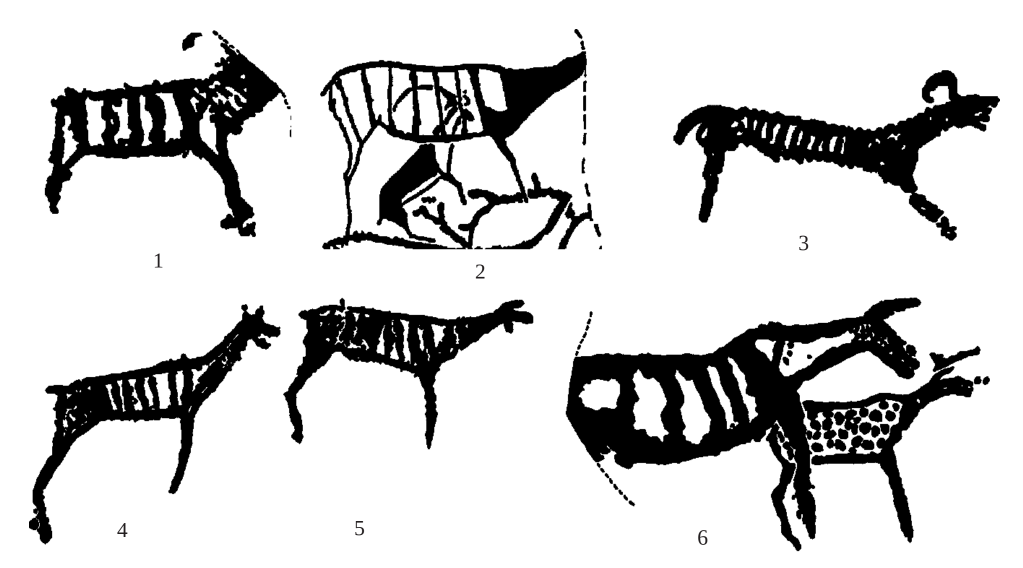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B.Д. 库巴列夫对岩画断代的基本方法就是将岩画与考古出土文物进行广泛比较。后期出土文物较多，如斯基泰、匈奴—萨尔马特，以及古突厥时期

的文物都很多，不少文物中的图像或者文物本身的造型也都能跟岩画中的形象尤其是动物形象相对应，断代的依据比较充分。但早期遗址和墓葬出土的艺术品并不多，很难进行广泛的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墓地，伴出大量的彩绘图像，主要为人像，少部分为动物图像，为该地区岩画的断代提供了很好的依据。该墓地位于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区昂古代区的卡拉科尔村，1985 年被发现。根据俄罗斯考古学家对其中的 4 座墓葬发掘所得到的资料可知，该处墓葬均属于青铜时代，并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在墓坑上方均覆盖一块石板，人体骨骼和墓坑的底部均有红色的赭石颜料，两腿之间安放了一个球形陶容器。其人像年代被断为公元前 3000 年末至公元前 2000 年初，即青铜时代早期[32]。事实上，这个墓葬的出土文物也的确成了 B.Д. 库巴列夫断定阿尔泰地区青铜时代岩画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于卡尔巴克—塔什岩画的年代和分期，B.Д. 库巴列夫的观点前后发生过变化。在 2001 年发表的《阿尔泰岩画和墓葬壁画中的萨满教主题》一文中，他将卡尔巴克—塔什岩画分为 4 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6000 ~ 前 4000 年），代表性的图像是带有沟槽轮廓的鹿和驼鹿，某些图像的尺寸达到了 2 米 ×3 米；第二期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公元前 3000 ~ 前 1000 年），典型图像是女人图像（部分伴有野兽）、男性生殖器崇拜图像、手印图像、凹穴、双轮马车和驮载的公牛、赶牲口的人和带有槌和矛的武士以及虚幻的猛兽和鹿等；第三期是斯基泰时期（公元前 8 ~ 前 3 世纪），以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山羊、狼—犬、猫科猛兽、鹿和马等）为其主要特征；第四期为古突厥时期（公元 7 ~ 10 世纪），典型图像是用石墨画的猎鹿场景和古突厥文字的题词”[33]。而在 2011 年出版的《卡尔巴克—塔什 I 岩画（俄罗斯阿尔泰）》一书中，他将卡尔巴克—塔什 1 号地点的岩画进一步分为 6 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4 千年下半期至公元前 3 千年初），图像包括鹿、驼鹿、熊、野猪、蛇以及凹穴。第二期为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3 千年），这一时期的图像多数是鹿，但是这些鹿通常围在一群人（持弓的猎人、带有萨满头饰的女人、持手杖的“祭司”等）中间；此外，还有数量不多的大型野牛和野马；最为典型的图像为手臂上举的只有 3 根手指的正身女像。第三期为早期和发达青铜时代（公元前 2 千年初期和中期），这一时期的图像在卡尔巴克—塔什地区最多，包括动物图像和人像，而动物图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牛；此外，还有奇幻外形的野兽图像以及鹿和山羊的混合图像；人像包括男人和女人，其中男人图像通常被公牛、鹿和山羊等动物图像所环绕。第四期为晚期青铜时代和早斯基泰时期（公元前 1 千年），其中鹿图像的风格与鹿石上鹿的风格类似，该时期的图像还包括带有马车夫的马拉双轮战车，而马车夫和马是发达青铜时代的二轮车辆岩画中所不具备的。斯基泰的动物图像与前期的图像也有所不同，是确定该时期岩画年代的主要依据。第五期是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这一时期的图像主要根据考古出土的遗址和墓葬中墙壁上刻画的图像来判断。第六期为古突厥时期（公元 7 ~ 10 世纪），该时期岩画的制作方法主要为雕刻，主要题材包括猎取鹿、山羊、野猪等动物的场景。”[34]

应当指出，这种按照岩画主题来进行年代划分的方法只是初步的，因为不少主题按照风格的不同会延续很长时间。例如，虽然鹿和驼鹿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但 В.Д. 库巴列夫同时也指出，带有树状角的鹿则属于青铜时代[35]。另外，Ю.С. 胡佳科夫也对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含有武士形象的岩画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分布范围涵盖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阿尔泰、蒙古以及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包含了马、马具、武士、武器以及其他元素，历经斯基泰时期、匈奴时期以及中世纪时期”[36]。

与 В.Д. 库巴列夫观点类似，Е.А. 奥克拉德尼科娃和 Л.С. 马尔萨多罗夫也认为“卡尔巴克—塔什遗址包含着不同时期艺术家创作的岩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古突厥时期。该岩画址的题材多种多样，主要包括 3 大类图像：野兽图像、类人形图像和几何图像。最早的图像层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巨大的鹿图像）和铜石并用时代。这时的图像被称为‘栅栏状的’图像（图三）。在青铜器时代，岩画的主题变得更加多样化。主要题材有戴蘑菇状帽子的人、腰部附近带有棍棒和椭圆形物品的男性形象、战车、带有装饰物的动物以及混合的动物图像”[37]。所谓栅栏状图像，是指用石质工具采用连续敲击的方式制作出动物的轮廓，动物的身体部分呈栅栏状。Э.А. 诺夫哥罗德娃、М.А. 杰夫列特和 Е.Г. 杰夫列特将蒙古地区类似的图像断为铜石并用时代，基于此，Е.А. 奥克拉德尼科娃认为卡尔巴克—塔什的栅栏状图像同样可以断为铜石并用时代，具体来说，为公元前 4000 年末至公元前 3000 年[38]。在这一时期，戈尔诺—阿尔泰泰加林地区的狩猎文化在欧洲南部、中亚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并对岩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此时，岩画中包含明显的二元对立因素，这



图三　阿尔泰卡尔巴克—塔什岩画中的栅栏状动物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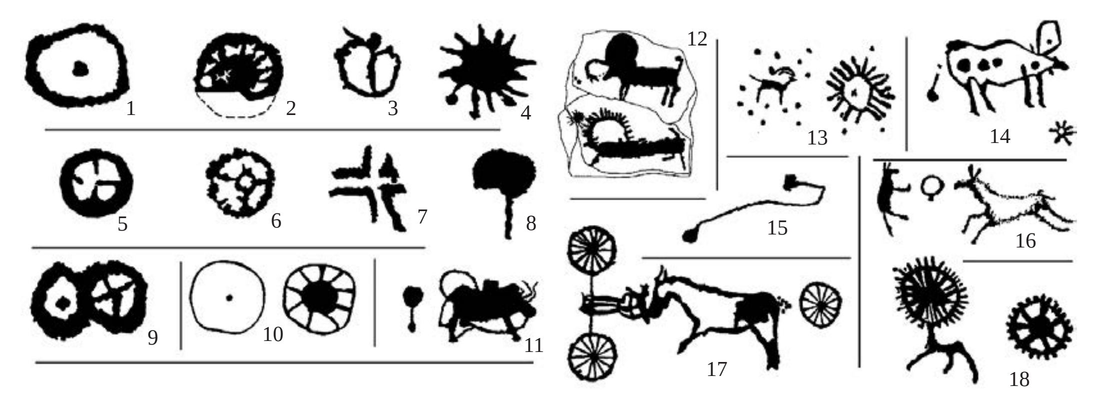
1、3. 山羊　2、4、5. 鹿　6. 公牛

［图片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Калбак-Таша I (Российский Алта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и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1］

是泰加林地区的狩猎文化和以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之间对抗的一种文化隐喻，典型的二元对立图像是熊和公牛[39]。与 В.И. 莫罗金和 Д.В. 切列米辛的观点一致，Е.А. 奥克拉德尼科娃也认为，阿尔泰栅栏状岩画风格的改变，是由于从欧亚大陆南部（近东、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的铜石并用时代和古金属时代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В.И. 莫罗金指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有可能勾勒出古金属时代造像传统的携带者向阿尔泰山南麓以及新疆的迁徙路线。"[40]而 М.И. 阿尔塔莫诺夫和 Н.Л. 奇列诺娃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研究阿尔泰古代游牧民族，以及寻找公元前 2 千年末至公元前 1 千年斯基泰动物风格的来源时就注意到，这种风格也是在中东艺术的影响下产生的。由此可见，西方的造像传统对阿尔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41]。

三、岩画的内容和含义

阿尔泰地区的岩画大部分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与草原文化有关，刻画的动物大都是畜牧或游牧民族常见的一些野生动物或者家畜。在对图像的解读过程中，В.Д. 库巴列夫特别强调"语境"的意义，尤其关注符号类图像在整幅画面中所起的作用（图四）。



图四　星体标志和不同形状的符号

1 ~ 8、17. 查干—萨拉 / 巴加—奥伊古尔　9、12、13、18. 查干—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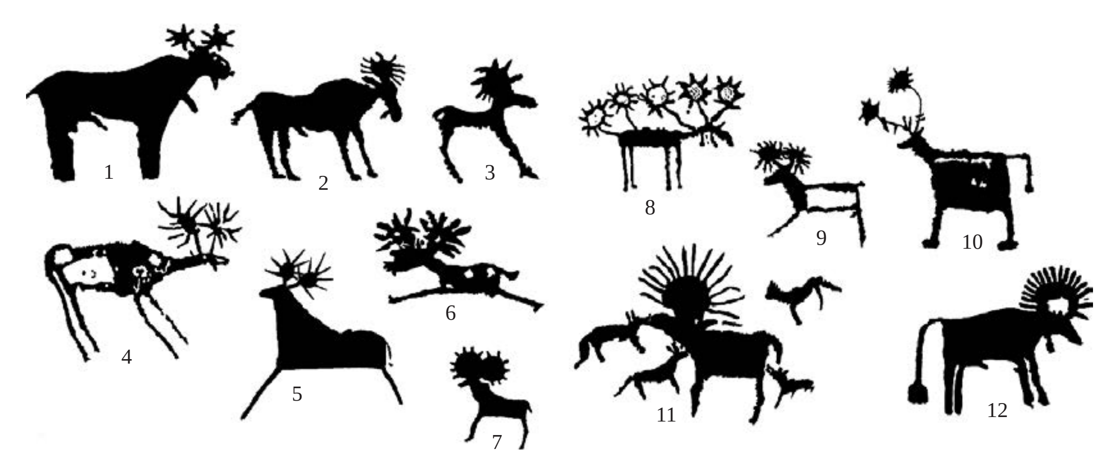
10、11、15、16. 哈尔—萨拉　14. 伊尔比斯图（1 ~ 13、15 ~ 18. 蒙古阿尔泰；14. 俄罗斯阿尔泰）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ифы и ритуалы,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е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6 (3): 43］

他指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阿尔泰（指俄罗斯阿尔泰——笔者注）和蒙古地区，艺术家们（萨满或者调停人）描绘了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动物图像，并通常赋予其神圣的职能。为达到此目的，艺术家们设计了一种用各种魔法符号标记神圣动物的简单方法，将其放置在图像旁边，直接与星象和原始魔法有关。"[42]这种组合类似于象形文字组成

的语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非常有效地呈现几千年前发生的仪式和解释与仪式有关的故事情节，甚至可以近似解读出阿尔泰山脉古代居民的某些神话内核。许多具有神格特征的岩画通常出现在发达的青铜时代和古游牧民族时期。在俄罗斯和蒙古的阿尔泰地区，这些符号主要是圆盘、圆环和螺旋形的符号，通常出现在含有动物图像的大型画面中；或者是动物的角部、躯干和尾巴处带有圆盘，圆盘的外部有一圈射线状的线条，看上去像太阳（图五）。这些太阳符号无疑是“天”的象征，与动物图像进行组合，从而赋予了后者神圣性。不同动物的创作者可能不同，代表的含义可能不同，反映的宗教观念也可能不同。因此，马、公牛和鹿等动物图像都应结合具体的语境以及各个民族的宗教神话来进行解读。但是，动物是作为神、神的献祭物抑或萨满通天的助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另外，某些相同的观念也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些马的图像描绘了翅膀，象征着天马，巨大的鹿角象征着飞升，公牛角形成的环状物内的圆盘象征着太阳和月亮，这些形象与动物和太阳的组合图像类似，均是表示这些动物与“天”的密切关系，赋予动物某种神圣性，而整个岩画点也可以视为米尔恰·伊利亚德所称谓的“神圣空间”[43]。



图五　带有太阳形角状物的动物图像

1～6、8、10、12. 查干—萨拉 / 巴加—奥伊古尔　7. 希弗耶特—哈伊尔汗　9. 伊尔比斯图　11. 哈尔—丘鲁乌

（1～8、10～12. 蒙古阿尔泰；9. 俄罗斯阿尔泰）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ифы и ритуалы,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е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6 (3): 42］

此外，阿尔泰岩画中广泛存在着成对出现的人物、鹿、马和公牛等动物图像，有时甚至表现为交配的姿势（图六）。这些图像是古代双生崇拜的反映或孑遗。在印度—伊朗神话中，双胞胎阿什维那（Ашвины）即太阳的儿子和母马阿什维尼，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和生育。印度诗歌《梨俱吠陀》中记载的双胞胎要么是驾驶战车飞驰的年轻人，要么是神奇的马[44]。中亚牧民对双胞胎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哈萨克斯坦的英雄史诗中，这里有关于用双胞胎所生的马作为祭品的记载[45]。马也是古印度太阳神苏利

耶（Surya）的化身。苏利耶与妻子曾以马的形象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称为阿湿毗尼，即“马生”，在中国典籍中被意译为“双马童”，他们后来成为朝霞、晚霞和星光之神[46]。根据中国古代神话记载，“治水成功的禹，据说有一匹叫做‘飞菟’的神马，一天当中能够驰行三万里，受了禹德行的感召，自然地来到禹的宫廷，做了他的坐骑。又据说有一头会说话的走兽，名叫‘趹蹄’，原是后土的家畜，大约也是马，也来做了禹的坐骑”[47]。B.Д. 库巴列夫指出：“中国古代神话中提到的‘飞菟’和‘趹蹄’一对神马，显然借用了印欧神话中关于神奇天马的思想。”[48]汤惠生先生则指出：“在美国哥伦比亚河中游的岩画中，我们可以常常见到反映这种创世神话的神祇，当地人把他们称作‘孪生神’（twins）、‘兄弟神’（Brothers），而岩画学家们则称其为‘成对人形’（Paired anthropomorphs）。”[49]这里所论及的“孪生神”、“兄弟神”和“成对人形”都是以连体形式出现的，与上述的双生动物形象并不一致，但其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另外，在一些双生马的尾巴处，还有带有太阳光芒的圆盘状图像，这正是太阳的象征。祖晓伟在《神话学视域下的人—马关系》一文中对马与太阳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50]。而 B.Д. 库巴列夫则进一步认为马的图像普遍与天堂和太阳崇拜有关[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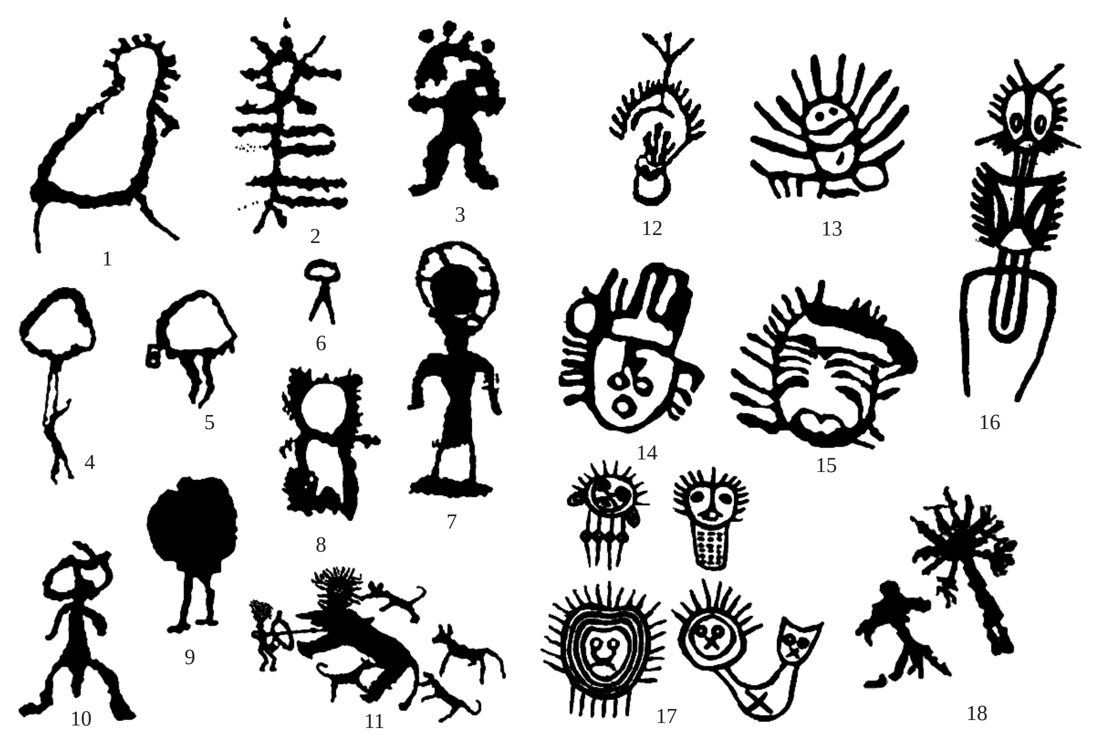
图六　岩画中成对出现的马

1. 卡尔巴克—塔什　2、3. 查干—萨拉（1. 俄罗斯阿尔泰；2、3. 蒙古阿尔泰）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ифы и ритуалы,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е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6 (3): 44］

B.Д. 库巴列夫注意到，与许多标有星体标志的动物形象不同，阿尔泰地区的“日首人身”形岩画极为罕见（图七）。这些图像均非具象，而是非常刻意地表现出来，将之与普通人像区分开来，主要是在头部有一个尺寸比较夸张的轮廓或头饰，部分头部周围有光晕或一系列点。人像的性别不是很清楚，但少部分通过生殖器的刻画可以看出是男性（图七，4、10）。其中一幅图像特别引人注目，在蒙古查干—格尔山谷的微型孤立岩石上凿刻出一幅“行走”的太阳图像。在圆盘下，古代艺术家敲凿出了两条腿，但看上去并不像人类，而是像鸟类（图七，9）。这种图像在中亚和中国北方地区都发现很多（图七，12 ~ 18）。其中，哈萨克斯坦塔姆加雷和中国内蒙古桌子山地区是这种图像较为集中的两个地点。与阿尔泰地区相比，上述地区的“日首人身”形岩画更具象，神格特征也更明显。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阿尔泰地区没有具象的类似图画。在俄罗斯阿尔泰

地区卡拉科尔墓葬的棺材石板上就发现数量众多具象的“日首人身”形图画，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图八）。这些发现不仅为此类岩画的断代提供了依据，而且表明该地区的确有类似的作画传统，只不过作画地点由地表转到了地下。关于这类图像，学术界多数将其称为“太阳神”，但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其与萨满教的关系。美国学者王朋林在《岩画中萨满阶层的图像隐喻和数字帮助下的萨满教概念化》一文中就将这种图像与中国古代的“日者”相对应，并指出：“‘日者’即中国古代社会的‘萨满和巫师’，萨满的名称同时包含‘太阳’和‘天空’两种意思。”[52]此外，波兰学者安哲·若兹瓦多斯基在《太阳神还是萨满？对中亚“日首”岩画的解释》一文中也对这种日首人身岩画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述，并认为这种图像指的就是萨满[53]。肖波在《从“日首人身”形岩画看“皇”字起源》一文中对这种图像的内涵进行过全面分析，并对这种“日首人身”形岩画与“皇”字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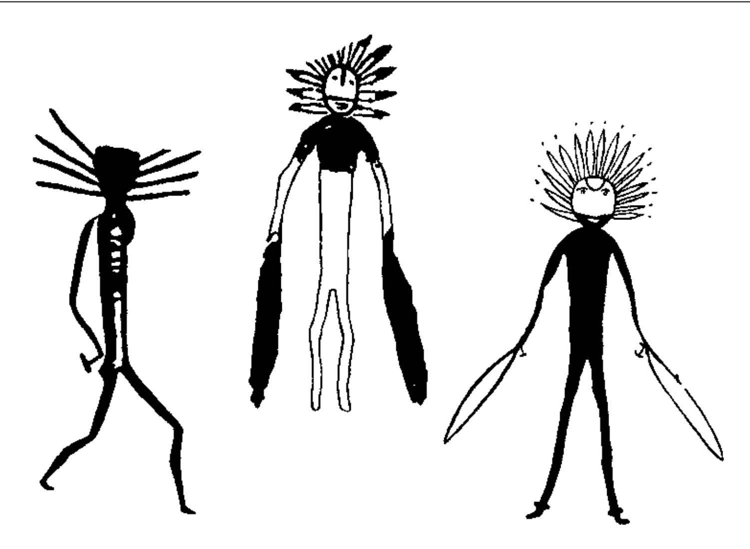


图七　“日首人身”形岩画

1～8、11. 查干—萨拉　9、10. 查干—格尔　12～15. 阴山　16、17. 桌子山　18. 塔姆加雷

（1～8、11. 蒙古阿尔泰；9、10. 俄罗斯阿尔泰；12～17. 中国内蒙古；18. 哈萨克斯坦）

［1～11.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ифы и ритуалы,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е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6 (3); 12～15．引自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6、17. 引自梁振华编．桌子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8. 引自 Hermann L. Rock Art of Tamgaly in Kazakhstan. Adoranten.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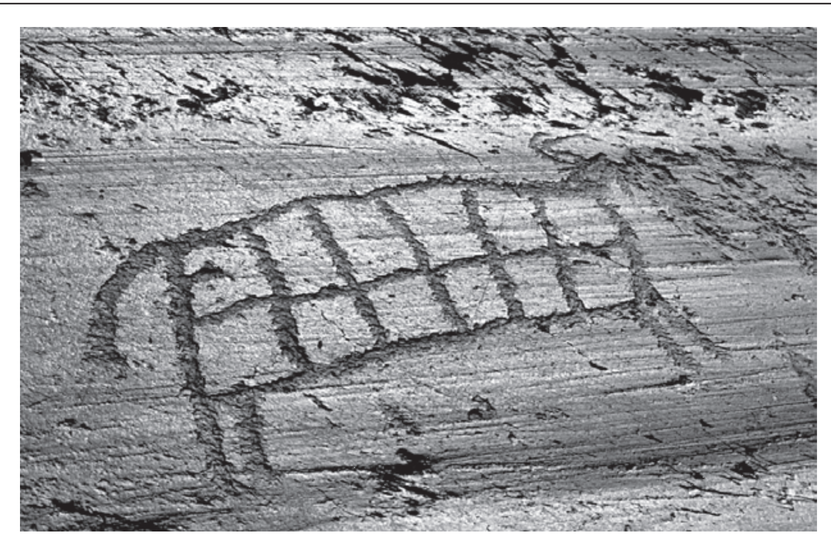


图八　卡拉科尔墓葬壁画中的人像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Шаманистские сюжеты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росписях Алтая.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1 (6)］

另外，B.Д. 库巴列夫注意到，动物一般刻划夸张的大角，因此，应当假定它们与天空和整个宇宙有着某种语义学上的关系。某些公牛图像的尾巴末端是带短射线的圆盘，看上去像太阳，象征着该动物属于天界。“方格形”的公牛形象同样传达了类似的观念，反映了动物的神圣性（图九）。在其中一幅公牛图像的长方形躯干上，共计有 12 个方格，而“12”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居民观念中是一个神圣的象征着“天堂”的数字[55]。这种“方格形”的动物图像其实是所谓的“X 射线”风格或者“骨架”风格的一种变体，这种风格的图像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存在，普遍认为其与萨满教有关。除了方格状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除了动物外，不少人像也具有这种形式。E.Г. 杰夫列特通过对西伯利亚岩画中“X 射线风格”的人形图像、持鼓的人形图像以及带有射线状头饰的人形图像的微观分析，并与萨满教装饰及用具进行比较，指出“萨满教的世界观是西伯利亚人复杂的象征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岩画主题为探寻萨满教概念的早期根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56]；伯查得·布伦特杰斯则认为“沿阿穆尔河定居的部落创作的人面像和‘骨骼’风格的岩画都是萨满教的反映”[57]。汤惠生先生则对这类风格的岩画图像做过全面而深入的分析[58]。实际上，B.Д. 库巴列夫也注意到了岩画和萨满教的关系。B.Д. 库巴列夫在 2001 年发表的《阿尔泰地区岩画和墓葬壁画中的萨满教主题》一文中，主要是用萨满教的理论对该地区岩画和卡拉科尔墓葬中一些带有冠饰的人形图像进行了考察，并从萨满教神话学的角度对岩画的内涵进行了解读[59]。

此外，还有一种图像比较值得关注，这种图像和前述的“方格状”动物图像既有联系也有所区别，前者看起来像骨骼，后者看起来像动物身上的“斑点”（图一〇）。B.Д. 库巴列夫在谈到卡尔巴克—塔什地区此类公牛图像时说道：“它们的身体上覆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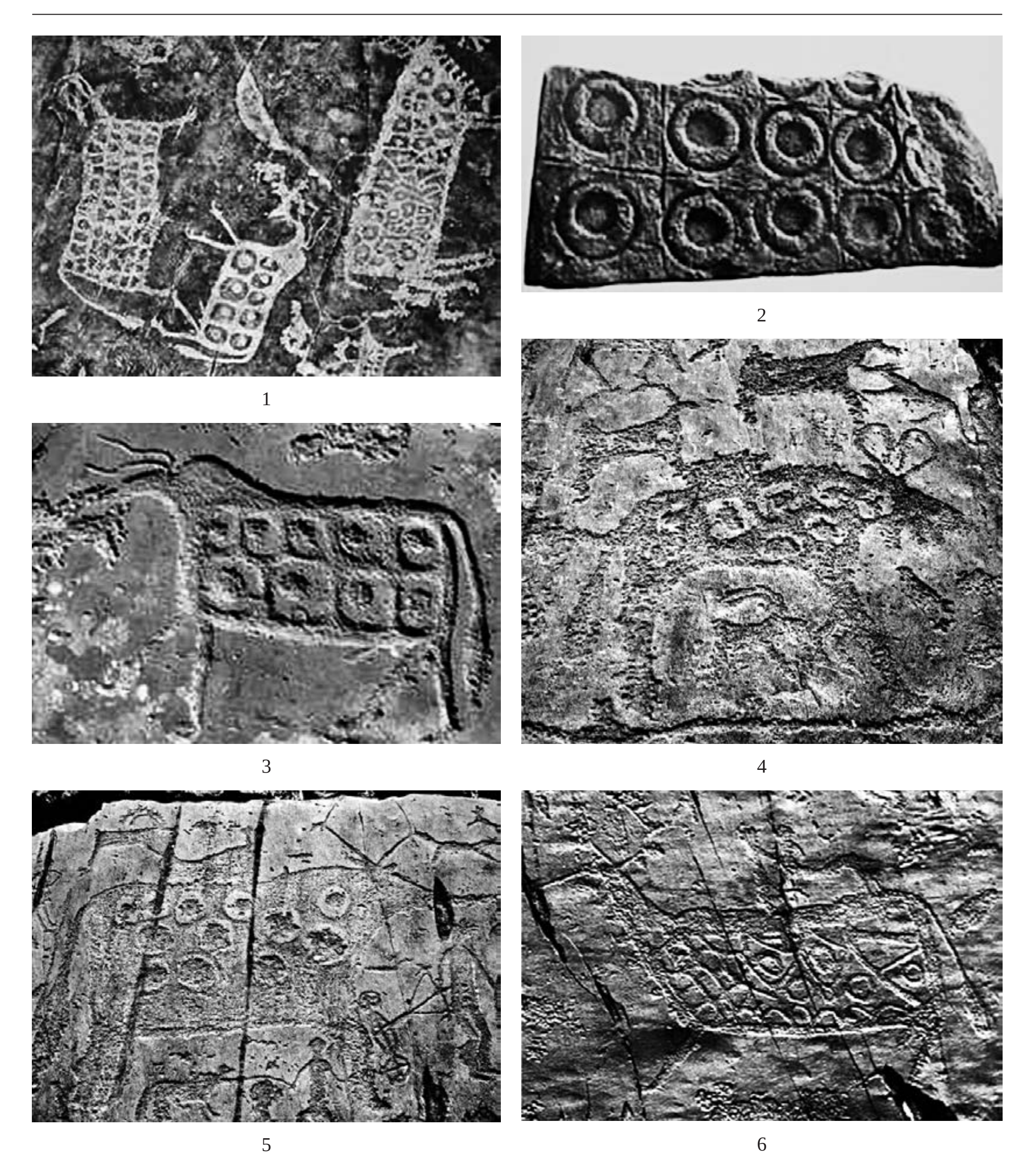


图九　方格形的公牛图像

［引自 Кубарев В. Д. Билуут-Толгой: новый памятник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Монголи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7 (3): 65］

圆形斑点，带有射线的星形标志，横向和纵向条纹，穿过不同的人物。”[60]这种“斑点纹”同样和天体神话有关，并且可能来自于中东地区。在伊朗和印度的神话中，带有这种斑点的公牛与月神的形象有关[61]。我们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对这种形象的解释。例如，在古巴比伦阿什舒尔巴尼巴拉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Ашшурбанипала）的占星术论文中就有此类记载[62]。古巴比伦占星家定期观察太阳、月亮和金星，目的是预测国王的命运，即整个国家的命运。例如，在寺庙的墙壁上，应用了装饰性组合图像，其中心元素是圆形，其形状类似于卡尔巴克—塔什公牛身上的圆圈（图一〇，2）。另一头公牛身上装饰着带有星体符号的图案（图一〇，5）。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星体符号是太阳和月亮。圆点在中心的图像通常是太阳的象征，但有时候表示的是月球，这主要取决于图像载体所处的具体语境。按照 E.A. 奥克拉德尼科娃的观点，公牛身体用剪影法敲凿出的圆圈可能是月亮的象征，而只敲凿出圆形轮廓的图形是太阳[63]。公牛身上的 12 个圆圈可能意味着一年中的 12 个月，而 7 个圆圈则表示一周中的天数。公牛身上的 8 个圆圈可以象征一年中的 8 个月，同时也可能与特定的天体现象相关，如金星每 8 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即每隔 8 年回到之前的位置。在卡尔巴克—塔什岩画中还经常遇到牛身上有 9 个圆圈，可以解释为母牛的怀孕周期（图一〇，1）[64]。总之，卡尔巴克—塔什是古代天文学家用以表征和计算时间的遗迹。这种时间的表征和计算方法与中东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王国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从 B.Д. 库巴列夫岩画研究来看，在释读岩画内容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各种理论学说，神话学、宗教学、天文学，甚至结构主义的句法论、语法论等。基本原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用唯一的解释理论来对所有岩画进行单维度的解读。



图一〇　阿尔泰和亚洲西南部“斑点纹”动物图像

1、3～6. 卡尔巴克—塔什岩画中的公牛图像　2. 带有“眼睛状装饰物的”墙板，尼尼微时期

［引自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Марсадолов Л. С. *Наскальные образы быка и хищника горы Калбак-Таш: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роточности древн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ландшафтов Евразии.* Науч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6 (4): 19］

四、结　　语

В.Д. 库巴列夫无疑是俄罗斯岩画研究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贡献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首先，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阿尔泰地区，该区域跨越中、俄、蒙、哈 4 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岩画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与当地丰富的考古学文化相互对应，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诚然，不少学者都对这一区岩画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如 А.П. 奥克拉德尼科夫[65]、Е.А. 奥克拉德尼科娃[66]、В.И. 莫罗金[67]、Д.В. 切列米辛[68]等都曾涉足这一地区的岩画研究，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其他考古学家在自己著作中述及该地区岩画的更多。但是，必须注意到，由于技术上的局限，上述学者所做的工作很多都还比较粗糙，尤其体现在照片和临摹图上。另外，岩画点位置的详细记录以及岩画点的分布图等方面的信息记录也还不够科学、规范。而 В.Д. 库巴列夫的著作则克服了这些缺陷，不仅使信息记录更加准确、规范，而且图像的考证方面也更加深入、具体，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В.Д. 库巴列夫的岩画研究开创了良好的跨国、跨区域合作的局面。他在对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历史、考古及岩画研究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造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持续了十数年的俄、美、蒙、法、日、韩等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蒙古阿尔泰岩画研究项目。诚然，在此之前，以 А.П. 奥克拉德尼科夫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也曾做过类似的努力，但主要是出于广泛调查，建立岩画资料档案的目的，总体来说，研究深度还不够，跨国合作的目的性也不是很明确。与之不同的是，В.Д. 库巴列夫的跨区域合作是建立在本身科学研究自然扩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解决更多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而新疆阿尔泰属于整个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新疆岩画的研究应当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岩画进行广泛比较，从而揭示出其在整个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而 В.Д. 库巴列夫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新疆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岩画的价值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注　释

［1］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Уландрыка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7.

［2］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Юстыда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1.

［3］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Сайлюгема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

［4］ Кубарев В. Д. Древн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5］ Кубарев В. Д.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4.

［6］ Кубарев В. Д., Журавлева А. Д. Керамическ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хуннов Алтая [А]. Палеоэкономика Сибири [С].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6.

［7］ Кубарев В. Д. Древние росписи Каракола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8.

［8］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аточкин Е.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Алтая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1992.

［9］ Kubarev V. D., Jacobson E. Repertoire des petroglyphes D’Asie C entrale. Fascicule № 3: Siberie du sud 3: KalbakTash I (Republique de l’Altai) [M]. Paris: De Boccard, 1996.

［10］ Кубарев В. Д. 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Алтая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3.

［11］ Кубарев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Калбак-Таша I (Российский Алтай)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1.

［12］ Кубарев В.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Якобсон Э. Петроглифы Цагаан-Салаа и Бага-Ойгура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5.

［13］ Кубарев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Шивээт-Хайрха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9.

［14］ Молодин В. И., Черемисин Д. В. Древнейшие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О РАН. 1999: 12.

［15］ Молодин 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скаль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на Плато Укок [A].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1993г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а: 18.

［16］ Молодин В. И.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 и проблема миграци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популяций в юго-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A]. Палеодемография и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C]. Барнаул: Алт. гос. ун-т. 1994б: 23.

［17］ Кубарев В. Д. О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Калгуты [A]. 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Азии [C]. Кемерово. 1997 (2): 94.

［18］ Савинов Д. Г. 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A].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Бертекской долины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плоскогорье Укок)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4: 130 ~ 135.

［19］ Поляков А. В.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A].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C]. Барнаул. 2010б.

［20］ 同［17］.

［21］ 〔蒙古〕Д.迈达尔．蒙古历史文化遗存（节译）［A］．欧亚草原岩画艺术论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22］ Дорж Д., Новгородова Э.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Монголии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Ин-т истории АН МНР. Ч. I. 1975: 39.

［23］ Новгородова Э. А. 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53.

［24］ Формозов А. А. К проблеме “очагов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J].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83 (3): 12.

［25］ Варенов А. В. К уточнению датировки пещер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из Хойт-Ценкер Агуй, Монголия [A].Наскальноеискусство Азии [C]. Кемерово: Изд-во Кем. гос. ун-та. Вып. 1. 1995: 17, 18.

［26］ Корсун О. В. К проблеме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наскаль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птиц из пещеры Хойт-Цэнхэрийн-Агуй [A].Культурные традиции Сибири и Америк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и экология [C]. Чита: Изд-во Читин. гос. ун-та. 1995: 89 ~ 91.

［27］ 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70，371.

［28］ 苏北海．新疆岩画［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577.

［29］ 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80.

［30］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Вангейм Э. А., Равский Э. И. и др. Сибирь в древнекаменном веке. Эпоха

палеолита [A].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C]. Т. 1: Древняя Сибирь.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68: 83.

［31］ Кубарев В.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Якобсон Э. Петроглифы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Алтая [A].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1996 года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97в: 25.

［32］ 同［7］：102，103.

［33］ Кубарев В. Д. Шаманистские сюжеты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росписях Алтая [J].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1 (6): 82.

［34］ 同［11］：59 ~ 63.

［35］ Кубарев В. Д. Билуут-Толгой: новый памятник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Монголии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7 (3): 65.

［36］ Худяков Ю. С. Образ воина в наскаль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A].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7: 181 ~ 189.

［37］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Марсадолов Л. С. Наскальные образы быка и хищника горы Калбак-Таш: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роточности древн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ландшафтов Евразии. Науч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6 (4): 16.

［38］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Решетчатые фигуры горы Калбак-Таш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11 (3): 120 ~ 127.

［39］ Черемисин Д. В. Древнейшие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 [M]. Барнаул: Алт. гос. ун-т. 2000: 55.

［40］ Молодин В. И., Черемисин Д. В. Палимпсест на валуне с озера Музжы-Булак [A]. Первобыт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Человек и искусство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2: 62.

［41］ a. Артамонов М. И. Сокровища скифских курганов [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68.
b. Членова Н. Л. Памятники I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н.э. Северного и Западного Ирана в проблеме киммерийско-карасукской общности [A]. Искусство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Ирана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1: 208 ~ 217.

［42］ Кубарев В. Д. Мифы и ритуалы, 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е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6 (3): 42.

［43］〔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 31.

［44］ Иванов В. В. Опыт истолкования древнеиндийских ритуальных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от asva – конь [A].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Индии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107.

［45］ Кобланды-Батыр. Казах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5: 260.

［46］ 祖晓伟．神话学视域下的人—马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47］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7.

［48］ 同［42］：44，45.

［49］ 同［29］：216.

［50］ 同［46］.

［51］ 同［42］：45.

［52］ Пенглин Ванг. 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етафоры состояний шамана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шаманизма с помощью чисел [J].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2006 (5): 272, 273.

［53］ Andrzej Rozwadowski, Sun gods or shamans? Interpreting the ‘solar-headed’ petroglyphs of Central Asia [A].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65 ~ 83.

［54］ 肖波．从“日首人身”形岩画看“皇”字起源［J］．艺术探索．2015：4.

［55］ 同［35］：65.

［56］ Ekaterina Devlet. Rock art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Siberian and Central Asian shamanism [A].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3 ~ 51.

［57］ Burchard Brentjes. Rock Art in Russian Far East and in Siberia, sited from http://www.rupestre.net/tracce/?p=2065.

［58］ 同［29］：114 ~ 128.

［59］ 同［33］：89 ~ 107.

［60］ Кубарев, В.Д. Образ быка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Алтая [А]. Первобыт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Человек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б. науч. трудов, посвященный 7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Якова Абрамовича Шер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2002: 51.

［61］ 同［60］：52.

［62］ Svyatopolk-Chetvertynsky, I.A. Sumerian-Babylonian Calendar and the Symbolism of Sacrifice (in Russ.) *Astronomy of Ancient Societies* [M]. Moscow: Nauka, 2002: 129 ~ 134.

［63］ 同［37］：22.

［64］ 同［37］：22.

［65］ a.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Древние рисунки Кызыл-Кёля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5.

b.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и др. Петроглифы долины реки Елангаш (юг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66］ a.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Калбак-Таша [J]. Изв. СО АН СССР. Сер. обществ. Наук. 1981 (11).

b.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средней Катуни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4.

c.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урочища Шалкобы (Горный Алтай) [А]. Новое в этнографии (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1): 130 ~ 140.

［67］ 同［14］.

［68］ 同［39］.

A Historiography of Russian Archaeologist V.D. Kubarev's Rock Art Research

Xiao Bo

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career of V.D. Kubarev in the field ofrock art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his achievements. Kubarev's study covered the subject matter, location and dating of rock art, as well as its interpretation. Core debates in the Soviet and Russian academic circles concern the existence of Paleolithic rock arts in the Altai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images which are suspected to date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er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rock art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mong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t is hoped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will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art of Northern China and the rock art of Russian Siberia and Mongolia.

Keywords: V.D. Kubarev; Rock Art Research; Historiography; Review

高原文明的历史见证

——《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评介 *

魏　坚[1]　孙　危[2]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450001）

内容摘要：陈弘法先生的译著《蒙古高原考古研究》一书出版已逾两载，这对于关注中国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学者来说，实在是重要的学术资料。但因笔者近期才得空通阅此书，并萌发一吐心中所想的念头，故而不揣冒昧谈谈浅见，与诸君共享。

关键词：《蒙古高原考古研究》；书评；北方民族

本书约 30 万字，系陈先生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翻译的 20 余篇俄文考古论文的文集，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书的最后还附有陈先生撰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若干情况”。

第一部分为“综述”。这部分译自蒙古国学者达·迈达尔所著的《蒙古历史文化遗存》[1]一书。在这部分内容中，系统而概括地介绍了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鹿石、方形墓、匈奴墓、匈奴腰饰牌、突厥墓、突厥“围墙”、突厥石雕像、突厥碑铭和契丹、西夏、蒙古的古代城址等文化遗存的有关情况，以作为全书的序言。

随后五个部分介绍的内容既是蒙古高原非常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工作者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

第二部分为“鹿石”。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是古代的雕塑艺术精品，有刀形鹿石、长方柱形鹿石等。这些精美的鹿石，都经过细致的敲凿雕刻，图案华丽而规范。鹿石是公元前 13 ~ 前 6 世纪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类重要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夸张的图案化鹿纹而得名。目前在欧亚草原发现的鹿石有 660 多通，主要分布在南俄草原、蒙古图瓦、阿尔泰、我国新疆及中亚地区。鹿石一般或单独向东傲立于赫列克苏

---

* 原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18 年 10 月 2 日 6 版。

尔石堆墓前，或成排列布于石堆或石圈祭坛之内，形成大型祭祀遗址，气势恢宏，体现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有的鹿石上只雕刻了圆环（耳饰）、连点（项链）、腰带，以及刀、剑、弓、弓囊、盾牌等纹样。所以，鹿石一词成了欧亚草原特定碑状石刻的代名词，并可分出若干类型。

这部分有《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匈蒙考古队关于蒙古鹿石考察工作的若干总结》两篇译文，原文分别面世于1962年和1978年，而陈先生早在1979和1984年就将这两篇论文译为中文，只是因刊载这两篇论文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系内部资料，故而影响不是很大，但这两篇译文无疑开启了我国学界对鹿石这种独具草原文化色彩的遗物的认识和关注。不过目前我国学界对鹿石的专题研究还略显薄弱，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最早公开发表的论文为张志尧的《新疆阿勒泰鹿石之管窥》[2]。其后较为重要的成果有：乌恩的《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3]、潘玲的《论鹿石的相关年代及相关问题》[4]和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与鹿石的若干联系》[5]等。另外，国内对鹿石相关论著的翻译也渐次展开，如沃尔科夫所著的《蒙古鹿石》[6]一书，该书对蒙古鹿石的介绍大都是第一手考古学资料，且在沃尔科夫研究鹿石的时代，有不少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探讨了鹿石的分布、分类、年代及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使得鹿石研究更加趋于全面、科学。此外，就俄文资料而言，还有《关于鹿石的原型问题研究》《赫列克苏尔与鹿石》《鹿石研究》《鹿石文化起源研究》几篇论文，也是关于鹿石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部分为“方形墓”。共收录了《蒙古乌兰固木古墓群》和《蒙古昌德曼文化》两篇译文，对1972年在蒙古国西北部乌布苏省乌兰固木市郊昌德曼山发现的两处“方形墓”墓群类型和出土器物进行了描述，并对因后一处墓群而得名的“昌德曼文化”进行了讨论。对于这两处墓地的方形墓，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至少可以细分为圆木木椁石冢墓、圆木木椁土冢墓、石箱墓和石箱石冢墓四个类型。这两篇译文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点。

其一，为我们认识与乌布苏省毗邻的俄罗斯图瓦地区的乌尤克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1915～1916年，苏联考古学者阿德里阿诺夫在乌鲁格—切姆河谷左岸、毕耶—切姆及乌尤克河附近发掘了60座墓葬。此后十多年中又发掘了160多座墓葬。1958年，库兹拉索夫将图瓦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命名为乌尤克文化，并将该文化分为两期六个类型，六个类型分别代表斯基泰时期生活在图瓦地区的六个游牧民族。这一观点后来被曼奈奥勒所接受，他在1970年出版的专著《斯基泰时期的图瓦》中，将乌尤克文化分为三期：早期（公元前7～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5～前4世纪）和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还将墓葬细分为六个类型、八种亚型。乌尤克文化与著名的阿尔赞王陵的1号、2号坟冢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些考古发现很可能与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蒙古昌德曼文化》一文中所言，“蒙古昌德曼文化与图瓦乌尤克

文化乃是同一个地域的两种同源考古文化，于公元前 7 至 3 世纪存在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西北部”。如此，我们就将昌德曼文化、乌尤克文化和斯基泰人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为我们认识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乃至蒙古东西两部考古学文化的差异性指明了方向。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学界已认识到，蒙古国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大致可分为有明显区别的东西两个区域，东部包括肯特山和东蒙草原地区，西部则以蒙古阿尔泰山系及其邻近地区为主。

从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来看，石板墓是蒙古东部地区最典型的遗存。其基本特征是以石板为葬具，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随葬品以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陶鬲和柄部饰动物纹的铜刀为典型。蒙古西部地区则流行冢墓（带有封冢的墓葬），乌兰固木市郊发现的那些方形墓即为代表，墓内出土了青铜和铁制的刀、短剑、战锤、骨镞、铜镞和“野兽纹”铜镜、骨饰牌、带扣等。陶器多半是饰堆塑和彩绘的小口瓶。此外，蒙古西部地区还发现了鹿石。就人种而言，石板墓中的人骨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表明公元前 1000 年，蒙古东部地区居民的人种类型同蒙古现今居民已无区别；而西部地区冢墓中发现的人骨则以欧罗巴人种特征居优势，表明同西方和蒙古西北方的古代居民有联系。

第四部分为“匈奴墓和腰饰牌”，有《蒙古呼尼河畔诺音乌拉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达尔罕山匈奴墓发掘记》《蒙古匈奴墓中发现的彩绘陶器》《苏联南乌拉尔山洞中的匈奴墓葬》《苏联和蒙古的匈奴墓葬结构》《苏联西伯利亚匈奴腰饰牌》《苏联南西伯利亚匈奴青铜器收集品》和《苏联匈奴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八篇译文，是全书的重点之一。

匈奴考古历来是我国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热点，无论是大到对匈奴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还是小到对具体的匈奴遗迹、马具、饰牌的微观探索，这些译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笔者虽然很难就陈先生的这些译文对我国匈奴考古研究的价值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近年来随着蒙古国高勒毛都等一批匈奴大墓的发掘和相关材料的不断问世，相信对此前翻译成果的借鉴和对比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此外，С.И. 鲁金科所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已于 201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笔者在内容、手法和技巧上都从陈先生的译作中受益良多。

第五部分为“突厥石雕像、围墙、墓葬和碑铭”，亦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共有《苏联额尔齐斯河上游的石雕像》《关于苏联东阿尔泰地区古代突厥人“围墙”的新资料》《苏联中央图瓦的古代突厥武士墓》《中央亚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碑铭的发现和研究》《蒙古的碑铭学研究》《蒙古却林古代突厥碑铭》和《蒙古阿尔哈纳纳的突厥铭文》七篇译文。

突厥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很长时间以来，以历史学研究居多，考古研究相对薄弱。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除了刊布过一些与

突厥有关的资料外，涉及突厥考古学研究的论著非常有限，且主要研究对象限于突厥石人、突厥碑铭和突厥金银器这三类遗物。而这部分的译文正好为前两类研究对象增添了鲜活的材料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蒙古国最新发掘的几座突厥墓葬的材料公布后，必将对我国的突厥考古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六部分为“古城”。收录了《蒙古境内的契丹古城遗址》《苏蒙考察队研究蒙古境内中世纪遗存小分队关于蒙古古城的考古调查》《内蒙古哈拉浩特西夏遗址》和《苏联康堆元代宫殿遗址》四篇译文。

就这部分内容而言，除了笔者在翻译《古代蒙古城市》（商务印书馆，2016年）时，曾参考过陈先生早年刊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印的《文物考古参考资料》中的《古代蒙古的城市（康堆宫殿）》等译文，颇受教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游牧和定居的问题不得不提。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游牧民族是否存在定居和农耕颇有争议。但随着在蒙古高原考古发掘中对游牧民族定居证据的发现日益增多，游牧民族也存在定居这个观点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同。而城市则与定居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定居生活发展的高级形态。由此学界也开始探讨游牧民族经营种植业的证据，以及种植业对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的是，游牧民族采用定居生活方式乃至修建城郭，或许还与其经营商业具有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今后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记得在谈起《蒙古高原考古研究》这部译文集的书名来历时，陈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提到苏联著名蒙古学和考古学家 Э.А.诺夫戈罗多娃所著的《古代蒙古》（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1989年）这部书。该书利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辅之以古人类学、民族学、碑铭和文字记载材料，对蒙古高原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对蒙古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及其宗教观进行了阐述，并对蒙古境内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描述。作者引用的俄、蒙、西、中、日等的文献资料共863种，且作者还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对比和分类断代。

陈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古代蒙古》是一部系统综述蒙古考古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蒙古古代史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重要专著，也许应当说，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因此，Э.А.诺夫戈罗多娃《古代蒙古》一书对于我国北方地区考古及古代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延续，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作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形态关系密切。但中国古代文明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一直存在着交流和互动。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如果我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明缺乏深刻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文明。长期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

由于种种原因，都埋头于国内的考古工作，很少有人致力于外国考古研究。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只在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有发言权，在中国以外的考古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种状况，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地位十分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首先需要认真了解国外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我国已故的北方民族史专家林幹先生就曾在 20 世纪末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有过自己的期望——要收集国内已经发表的并翻译国外的北方民族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出版。

笔者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条道路上，翻译事业定然能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会对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

滴水穿石，积小溪以成江河。从事考古资料翻译工作达四十载的陈先生，如果能看到此盛况的到来，当是他最大的愿望。让我们像陈先生一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更多学术前沿的译作成为蒙古高原文明的见证！

注　释

［1］　达·迈达尔. 蒙古历史文化遗存［M］.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1.

［2］　张志尧. 新疆阿勒泰鹿石之管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4）.

［3］　乌恩. 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与文物，2003（1）.

［4］　潘玲. 论鹿石的相关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学报，2008（3）.

［5］　李刚. 中国北方青铜器与鹿石的若干联系［J］.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6］　〔俄〕B. B. 沃尔科夫. 王博，吴妍春译. 蒙古鹿石［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Historical Evidence on the Plateau Civilization——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Wei Jian　Sun Wei

Abstract: Mr. Chen Hongfa’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has been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This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reference for scholars concerned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ethnic groups of norther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 the publication in question and gives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its content.

Keywords: *Mongolian Plateau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view; ethnic archaeological in Northern China

《民族文物通论》书评

董　艺

（烟台市博物馆，烟台，264000）

内容摘要：本文是关于目前学术界对民族文物研究公认比较权威的《民族文物通论》一书的评述。笔者介绍了全书的内容结构及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而总结了宋兆麟先生在书中提出的经典的理论观点，即民族文物应有自己的理论研究方法——历史层次学和民族支系学。最后笔者针对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及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民族文物；宋兆麟；历史层次学；民族支系学

一、全书及作者综述

《民族文物通论》是我国民族考古学宋兆麟先生根据自己多年来在民族地区调查的一手资料，整理归纳出来的著作之一。

全书共分三篇，上篇主要是与民族文物有关的一些理论方法，涉及民族文物的概念、特点、田野调查方法、整理保管，以及研究民族文物的方法等；中篇是具体的民族文物的研究，选取了若干典型个例，与考古遗物进行比较研究；下篇是对明清以来遗留下来的民俗画的研究，重在探讨民俗画的学术价值。书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有：①比较研究法，作者将具体的民族文物与考古遗物进行比较研究；②引用文献法，作者在下篇民俗画的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献的原文，将文献记载的内容与画中所反映的生产生活情形相互考证；③举例说明法，书中提到的理论方法都是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后得出来的，所以作者在文中举出了大量实物资料，极有说服力。

作者是我国考古学家宋兆麟先生，宋先生早年跟随苏秉琦先生学习考古学，之后又跟随林耀华先生学习民族学，并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首创了民族考古学。宋先生治学前期主要是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后期主要从事民俗文化的研究，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民俗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二、书中经典理论观点

民族文物的研究，应该要遵循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是地层学和区系类型学，由于有这两大理论支柱，使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使错综复杂的考古资料进入了科学系列。民族文物别具特点，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先生在书中提到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论方法是历史层次学和民族支系学。

首先，民族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层次学。考古学的文化堆积是有序的，有明确无误的地层关系，下早上晚。考古学家可根据地层关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遗物进行研究。民族文物没有地层的堆积和保护，人为干扰严重，古今掺杂，并且本身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无序性和紊乱性，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学那样按地层发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把无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找出时间、空间序列。为此，先生提出可以建立一种民族文物层次学，作为指导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论之一。具体内容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标准文物，作为鉴选有关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时代的同类文物，又有发展演变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也可以鉴别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物[1]。

其次，应建立自己的民族支系学。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并且不少民族内部又分许多支系，反映在物质文物或文物制度上也千差万别。故而民族支系的研究在学术上，尤其是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如同考古学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2]一样，任何一个民族支系的确定，都应该归纳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先生提到的“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时间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3]。民族支系学的宗旨是探讨各支系的渊源及其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语言特点、分布区域、演变，本支系与其他支系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异同。

民族文物的历史层次学是解决民族文物发展系列的准则，民族支系学则是解决民族间、民族内部支系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准则。

三、浅议书中观点

（一）关于文物的分类

先生在书中提到文物可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两大类，又将古代文物分为文物史迹和文化遗物两类，将近现代文物分为民族文物、民俗文物和革命文物三类。针对这一划分，笔者想谈一下几点意见。

第一，将文物划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这显然是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划分的，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无可厚非，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又将古

代文物划分为文物史迹和文化遗物，这种划分方法同考古学上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物资料划分为遗迹和遗物的划分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划分的对象不同罢了，一个是实物资料，一个是古代文物，二者都是古代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只是古代文物是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艺术等价值的实物资料。

第二，关于近现代文物的划分，笔者认为先生将其划分为民族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三类是不妥当的。

首先，按先生书中提到的“民族文物指近现代各民族的文物”，“民俗文物指各民族大众所留下来的文物，通常说来，每个民族都有上下层两种文化，民俗文物则是下层文化的遗物”。笔者认为按先生的说法民族文物完全包括民俗文物，不能把民俗文物单独划分出来和民族文物作为平行的一类近现代文物。关于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笔者在这里想谈一些自己的认识：民俗文物，作为当代风俗习惯的代表性实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与民族文物的关系是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共性方面看，两者都是属于文物的范畴，都是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见证而进行搜集、收藏、研究的。从差异的方面看，①两者分属于不同学科。同一件实物，从民族文物学的观点出发，属于民族文物，而从民俗学的观点出发，属于民俗文物。例如，反映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实物，反映当代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道德礼仪的实物等。②在研究对象上，民族文物的范围大于民俗文物。民族文物面对着全国的或某地区的每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整体，而民俗文物仅局限于全国或某地区的每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局部（如风俗习惯、民间文学等）。③在研究的时间概念上，民族文物长于民俗文物。在时间概念上，民俗文物的搜集更注重于现状，而民族文物的搜集，不仅重视现状，而且也注重于近代、古代。

其次，革命文物，书中描述的是“指清末以来，在推翻帝制，建立新中国斗争所留下来的文物资料”。笔者认为，革命文物也可以纳入民族文物的范畴，不应该单独再划一类，文中所说的斗争无非是近现代以来各个民族为求得解放、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其中“所留下来的文物资料”，也正是各个民族在斗争过程中所留下来的资料，是民族文物的一部分。

最后，先生将民族文物划入近现代文物的范围，显然将民族文物的定义狭义化了。

（二）民族文物的含义

关于民族文物的定义，先生首先列举了目前几种比较权威的定义，然后总结出民族文物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皆为民族文物，其中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狭义的民族文物指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根据先生对文物的分类，将民族文物纳入近现代文物，可见先生更倾向于将民族文物狭义化，笔者认为民族文物应该广义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民族文物应该包括古代的民族文物。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杨堃先生早已论述："在从古至今人类三百万年的漫长历史中，民族发展的历史却仅有四万年之久。在这四万年的历史中，人类经历了氏族、部落、部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发展阶段。"[4]在我国，氏族、部落、部族所遗留下的文化遗产通称古代文物，习惯上纳入考古学的研究范畴。狭义的民族文物，即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民族文物。这样划分固然有一些道理，但笔者认为研究民族文物，要把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近现代的民族文物，正是古代民族文物的继承与发展，存在着源流关系，具有继承性与延续性。用政治史的事件标记来"一刀切"，把文化传承性很强的民族文物割裂开来的方法，显然失之偏颇。所以，凡是被确认了族属关系的古代民族文物，也应该属于民族文物的范畴。

其次，民族文物应包括汉族的文物。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目前确定的民族有 56 个，历史上则有更多的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发展、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一切考古出土的和从民间搜集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物和文化遗物，都是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所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文明史。所以，民族文物和一般文物，其实质都是民族的，具有其不能割断的历史的民族性。不具有民族性的文物是不存在的，所以，汉族文物理应也属于民族文物的范畴。

（三）关于民族文物的研究范围

先生在文中提到从事近现代民族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首先从不同的经济类型入手，其中生产工具占有重要地位；
> 其次从反映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方面的民族文物入手；
> 第三是物质生活方面的文物制度；
> 精神文化方面的文物也不少。"[5]

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范围划分的不准确，原因在于反映经济类型的民族文物，比如生产工具也是反映物质生活方面的文物，反映社会制度的民族文物很多也是反映精神文化方面的文物。关于民族文物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物质文化类和精神文化类。在物质文化类中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即采集渔猎、农业生产、畜牧业、手工业、服装与饰品、民居与建筑、交通邮传、交换与贸易；在精神文化类中包括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组织（族源、氏族部落等）、婚姻家庭、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语言文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节庆礼仪、医药科技、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

（四）关于民族文物的五大系列

先生在书中将民族文物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①生产工具；②舟车；③手工工艺；④神偶与替身；⑤文字。"[6]

笔者认为，先生所列的五大系列包含的民族文物并不全面，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民族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发展中消亡，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民族问题会长期存在。作为民族的存在，无论其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总体文化水平的差异大小，都应当是一律平等的，人类的共同任务是逐步缩小差异，解决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这一观点，在文物范畴内，笔者认为，世间所有的文物都是民族文物，无一例外。

四、结　　语

读后掩卷沉思，我不禁感到中国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留下来大量的代表各个民族文明进程的民族文物。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民族文物的价值，尤其是近现代少数民族文物"活化石"的这一价值，考古遗物多残缺不全，不会"说话"，少数民族文物则比较完整，且附有生动的情节，容易知其用途和来龙去脉。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逐步扩大，旅游产业的延伸，当代少数民族文物的流失严重，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抢救少数民族文物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并且要在抢救、收藏民族文物的同时，充分发挥民族文物的作用，提高民族文物的应用价值。如何使民族文物更贴近生活，开辟民族文物利用的新天地已经成为民族学界和博物馆学界共同的新课题。

此外，笔者不得不对宋先生的治学特点感到由衷的敬佩。宋兆麟先生的治学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将田野调查作为治学的重点。宋先生对田野调查非常重视，也肯于去实践。他不仅做了几个重点地区的调查工作，还跑遍了全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及台湾。第二，进行多学科的比较研究。宋先生有意识地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几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内容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攻克了学术上的不少难题。第三，注意搜集历代的图像资料和实物，并将此视为研究的重点。宋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中或多或少都配插图，以图补文、以图释文是其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宋先生的学术成就离不开他极具特色的治学特点，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解读民族文物可以发现各个民族生动的历史，读一本民族文物的名著，就如同和各个民族的史学家探讨历史，其乐无穷。

注　释

[1]　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2]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J］．考古，1959（4）.
[3]　同［1］.
[4]　杨堃．民族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　同［1］.
[6]　同［1］.
[7]　王胜华．西盟佤族的猎头习俗与头颅崇拜［J］．中国文化，1994（1）.
[8]　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A Review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Dong Y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a book tha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authoritative publica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concerned with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identifying their material cul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ook's structure and content as well as the introduc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latter include the traditional scholarly orientation represented by Mr. Song Zhaolin and his point of view that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should develop a methodology of its own, taking into account historical develome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lans and lineages. Finally, this review proposes a few alternatives to the theoretical views and case studies presented in the book.

Keywords: Song Zhaolin;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Methodology

征稿启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 15000 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 ~ 6 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 3 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 20M，请发至 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3007.31)



科学出版社互联网入口



赛博古二维码

文物考古分社
部门：(010) 64009636
部门E-mail：arch@mail.sciencep.com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60776-8

定　价：148.00 元